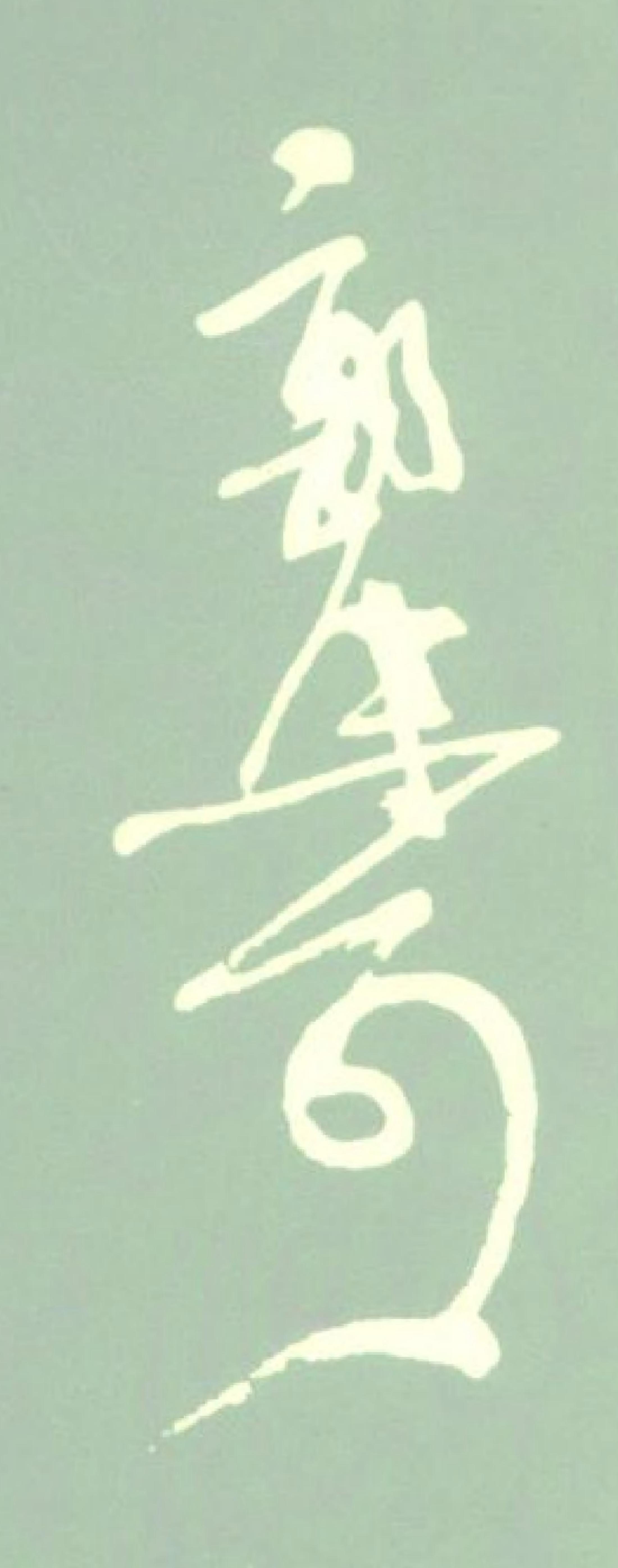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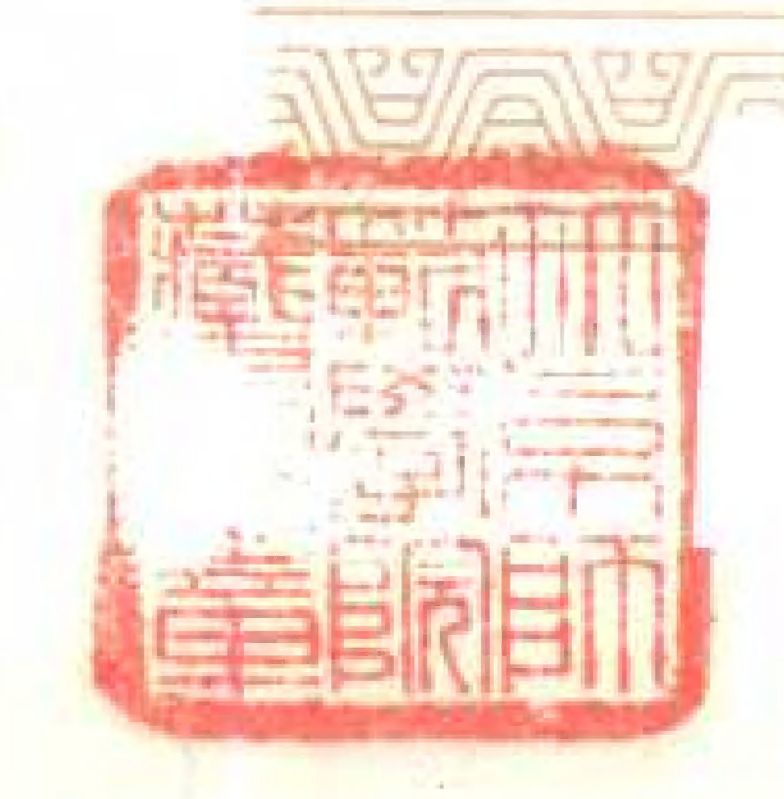
盲　肠　炎

断　断　集

羽　书　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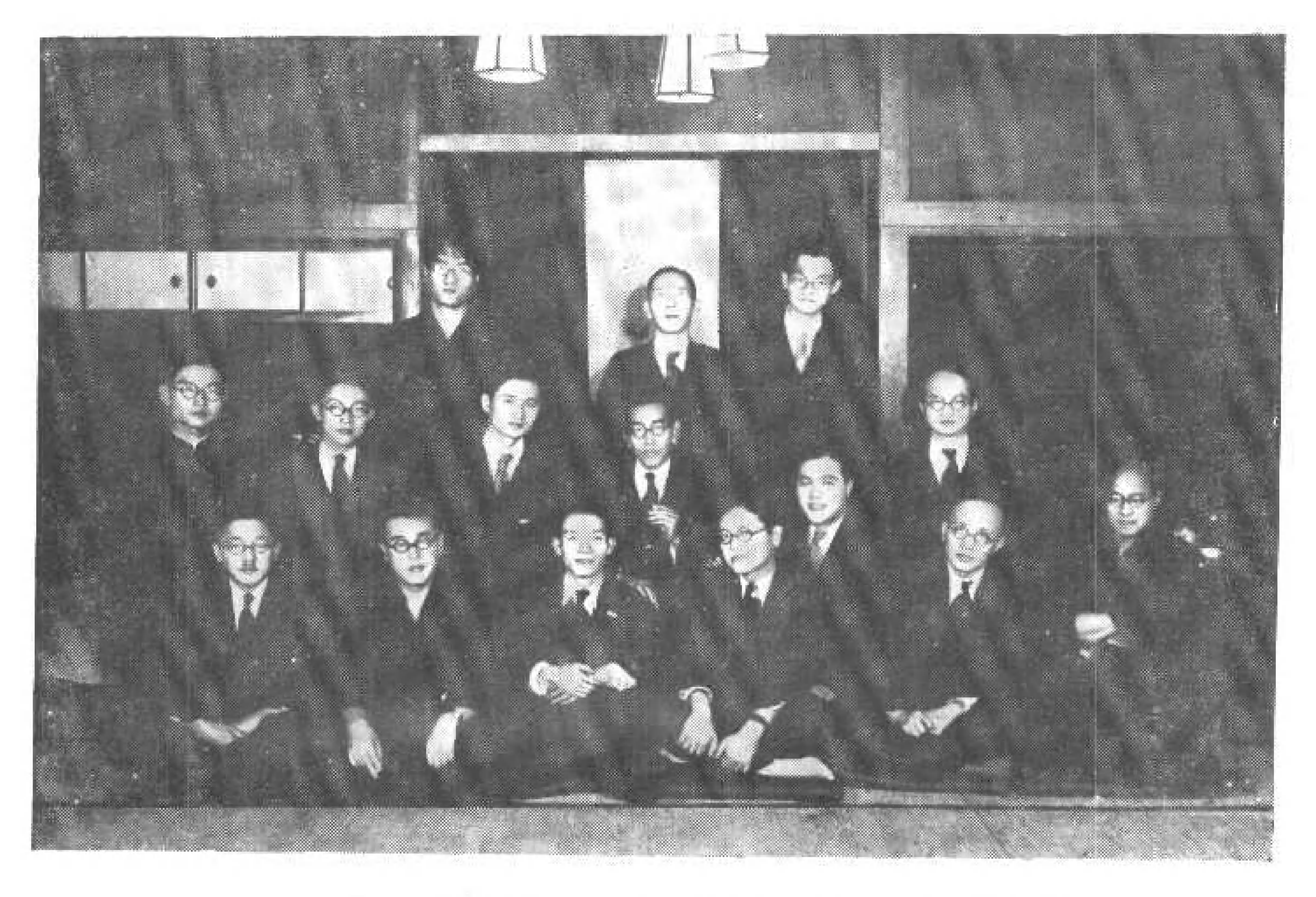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八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frac{7}{8}$ 插页 5
字数 230,000 印数 1—2,960
199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306-6/Z·48
定价 9.55 元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郁达夫赴日宴会合影

（前排左起：吉村永吉、石田幹之助、郁达夫、竹内好、作者、武田泰淳。中排左起：土居治、饭塚朗、郭明昆、实藤惠秀、千田九一、曹钦源。后排左起：增田涉、一户務、松枝茂夫。）



一九三八年一月与周恩来、叶剑英、
彭德怀在汉口大智门车站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参加群众集会时摄

三年来的文化战

郭沫若

《三年来的文化战》手稿之一页

第十八卷说明

本卷收入《盲肠炎》、《断断集》、《羽书集》三个杂文集。

《盲肠炎》原收杂文九篇，一九二八年与《水平线下》合辑，由创造社出版部初版；一九四七年上海群益出版社曾刊印单行本。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群益出版社版，经作者修订后，删去《马克斯进文庙》一篇，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这次按《沫若文集》第十卷版本编入。

《断断集》系作者于一九五八年根据一九三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沫若近著》，删去其中《清代大音乐家万宝常》一篇，将《"举案齐眉"》、《刺身》和《水与结晶的溶洽》三篇附文改作正文，编为一辑，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十一卷。这次除将《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包括附录)、《再谈官票宝钞》和《答马伯乐教授》四篇移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外，余均据《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版本编入。

《羽书集》原收杂文七十四篇，一九四一年由香港孟夏书店初版；一九四五年，作者从孟夏版中删去十七篇，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再版。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群益出版社的重印本，经作者校阅后，删去《我们为什么抗战》、

《国难声中怀知堂》和《由四行想到四川》三篇，按写作时间的先后，重新排次，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又从孟夏版中抽出《驳〈实庵字说〉》、《关于“戚继光斩子”的传说》、《续谈“戚继光斩子”》和《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四篇，编于集后。这次除将原孟夏版中的四篇移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外，又重收原群益版中删去的三篇，余均据《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版本编入。

第十八卷目录

盲肠炎

断断集

羽书集

盲 肠 炎

《盲肠炎》题记

盲肠炎近来成为了相当时髦的名词。国民党某“党要”曾把中共问题比为盲肠炎，要开刀。① 民社党某“新贵”也曾把该党的革新派比为盲肠炎，也要开刀。② 其实这两位摩登大夫对于医理病理，实在是外行得很。盲肠炎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险症，虽然可以死人，死亡率是很小的。治盲肠炎的方法也不必一定要开刀，用消炎性的内科治疗，也还是可以收到效果。乱下诊断，乱开刀，对于医道固然外行，对于政治也同样外行。

但我这儿所提出来的“盲肠炎”却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医案了。我得声明，我并不是对于前两位大夫的蹈袭，当然我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创世纪》月刊创刊号。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加有作者题注：“这篇题记原是初版《盲肠炎》的序。《水平线下》那一部分剔开了，已编入自传性质的文字里面。”

① 陈立夫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与中央社记者谈话，将解决中共问题比之为“治盲肠炎”，并说：“如证明其确将危及生命，自当施用手术，加以割除。”

② 民社党，系“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前身为中国国家社会党，一九三四年成立，以张君劢为首。一九四六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该党新晋常委蒋匀田曾在一次讲话中将党内的革新派比作盲肠炎，要开刀。

并不想争这优先权，说他们是对于我的蹈袭。一句话归总：我们是两不相干的。

我虽然也学过几年的医学，但我是学而未成。我对于医理病理认真说也并不怎么内行，而对于政治倒老老实实是充分外行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把盲肠炎来比譬了资本主义，在今天看起来，实在并不十分妥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的阶程，比如鸡蛋有壳，蚕蛹之有茧那样；待鸡蛋孵成了鸡，蚕蛹化成了蛾，则壳与茧必被打破，资本主义也必被扬弃而已。

中国的资本主义过了时，发育得很不顺畅，一出马便呈现出病态。它是先天不足，而又外感频袭，而外感在今天却更加严重了。这个营养不良的小囝是长不成器的。假使再让我用医学的智识来做比譬的话，我倒要把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强大的一个资本主义比成恶性的癌，不仅是我们，就是全世界的健全组织都是在被它侵蚀着的。

我们今天倒要防御这个癌，隔离这个癌，割掉这个癌，然后一切的生机才能有保障。故在今天倒不是向自己的盲肠炎开刀的问题，而是向癌肿开刀的问题了。癌肿是有窜走络(Metastase)的，中国今天的买办官僚资本，事实上就是那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窜走络。这个窜走络如不除尽，中国本身的民族资本或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是没有方法进展的。不，危险比这更大，会要闹到全殖民地化的地步。故我们今天的问题，倒不是怕受“共管”，而是由“共管”化而为单管了。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所给予的迫切课

题，美国的华莱士①已经告诉了我们：就是对于杜鲁门主义②的毫不犹豫的斗争。

我这部医案对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病情虽然已经不切合，但大体上的处方是没有错的。医生医病也有养病的一段期间，在病情诊断不能十分确定时，要有一段期间来静观病情的发展。我们要算又静观了二十多年，不，事实上自已就是病人，在病苦中苦斗了二十多年，病情今天是明朗化了。翻翻以往的病历，于豫后的工作倒也是不无裨补的。

在我自已尤其值得提起的，是这部书在我的精神发展上表示着转捩点的一个里程碑。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这一年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执行其历史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年，中国在那时更明确地迈出了她的反帝反封建的健步。

我在那时候，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当我的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在这儿所收的属于

① 华莱士(H·A·Wallace，1888—1965)，美国农业问题专家。在罗斯福总统任内为农业部长。1940年任副总统。1944年6月访苏联后曾来中国访问。杜鲁门任总统后，华莱士继续主张罗斯福的睦邻外交，公开反对杜鲁门政府的反苏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

② 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新殖民主义纲领。

《水平线下》的一部分，便是代表着转换过程中的写作。但这个转换起了更大的质变，便是使我自己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我的文艺生活更确确实实地告了一个段落。尔来二十年，无论在写作上或生活上和所谓“纯文艺”实在是愈隔愈远，这如用今天最时髦的纯文艺家的话来说，便是我失掉了“写作的马达”①。但我是心甘情愿，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我自己在这儿可以公开的宣布：我要取消掉我这个“文艺家”或“作家”的头衔。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当为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既不长于“写作”，那就不应该滥竽作家，世间上也尽有的是“有理想，站得住的作家”，他们是具有着“写作的马达”的。不过那样的作家似乎也可怜得很，虽然雄赳赳地发动着“马达”，在高喝着“中国文艺往那里走？”“绝不宜受党派风气所左右！”然而那“马达”却是躲在一个党派的尾巴毛里面的。何必躲躲闪闪呢？你有的是“写作的马达”，就让你的“马达”去“写作”好了。你是第三种人的复活②，你的高论，仅仅是“为写作而写作”而已，装腔作势是多余的。

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毛骨竦然”的事遍地皆是，而那位高喝着“中国文艺往那走”的“作家”，对于“文丐”们“人在中年便

① 作者原注：自“写作的马达”以下的引用语，具见《大公报》五月五日社评《中国文艺界往哪里走？》。原文未署名，作者不知何许人。

②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即杜衡）在《现代》、《读书杂志》等刊物上，宣扬“文艺自由”论，自称是超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上海《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界往那里走？》的论调与胡秋原、苏汶如出一辙，故称它是“第三种人的复活”。

大张寿筵”，却“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竦然”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些“文丐”们该拿来剿灭吧？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张寿筵”的目的一半也就是要使这种人的“毛骨竦然”一下的，今天可以说是收到实效了。据“毛骨竦然”家说：“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①，那吗这老头子似乎也就值得“令人毛骨竦然”了。他是一个老牌文艺家，为什么竟写“原子问题”，而不写《差半车麦秸》②呢？

我的见解倒是很平凡而简单的：不做“文艺家”不要紧，我们总得要做“人”；写不出“伟作”可以和萧伯纳相比的也不要紧，总要对得起每天给我们饭吃的老百姓。谁要“毛骨竦然”，多让他“毛骨竦然”一下。认真说，也就为了这个目的，我把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清算，这部《盲肠炎》，里面包含着《水平线下》，再度提供出来。二十多年前我也是喊过“为写作而写作”过来的人，我可以斗胆的骂我自己：那只是幼稚的梦呓而已。

我自己还没有资格充当“平民化的向日葵”，当然更没有资格和那些自命为“贵族化的芝兰”，“并肩而立”。但我想，那生在山野中的芝兰如果有知，怕已经在抗议吧。到底是那

① 萧伯纳(G·B·Shaw，1856—1950)，爱尔兰人，生于都柏林。英国剧作家。著有《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魔鬼的门徒》等。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国在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北端比基尼珊瑚岛水面试验第五颗原子弹，威胁世界和平，次日正是萧伯纳九十寿辰，他写信给报社，抗议美国的试验。

② 短篇小说，姚雪垠著。内容写一农民游击队员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成长。初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香港《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三期。

一位帮闲专家把我“贵族化”了呀？

我是自甘于“水平线下”的，二十多年前的志愿是这样，二十多年后的志愿也依然是这样。

1947年5月19日

盲　肠　炎

我们学过医学的人通常容易遇见的病症，有所谓盲肠炎的。我遇见这种病总要联想起个人资本主义上来，不仅它们的性状相象，就是人们对于它们的态度也大概相象。现在且让我先说盲肠炎的性状是甚么，人们对于它的态度是甚么，再来说到它和资本主义相象的地方。

盲肠炎病名，严格地说时，应该称为虫状突起炎，即“阑尾炎”。在我们人身上消化系统里面有一个无用的长物，这便是小肠和大肠交界处，在小肠开口部下方的一节盲肠。这节盲肠在人体的营养上没有功用，它只储蓄些老废物在那儿有时作怪。它何以会有时作怪呢？因为盲肠的盲端还有一个两三寸长的附属物，就好象一条蚯蚓，吊在那儿。这个附属物就叫做虫状突起。这个虫状突起本来也是一段肠管，因为发育不良，所以只萎缩成蚯蚓般的外状，但是它的中心是仍然有空穴的。盲肠中有害无用的废物，如象化脓菌、大肠菌以及由外界误吞入的果核、石粒之类，偶尔窜入虫状突起的空穴中时，便在这儿作起怪来，发生出种种程度的炎症。——这便是盲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洪水》周刊第一期，原题为《盲肠炎与资本主义》。

炎的病源论了。但它发表出来的病状是怎么样呢？我在此不是做医学教科书，我只能简单地叙述几句。

虫状突起的部位在我们下腹部的右侧，所以盲肠炎发作时大概是右下腹部疼痛，发烧，呕吐。但腹部痛位每不一定，有时全腹胀痛，有时又只在上腹，这是初学诊断的人容易受骗的地方。全腹的胀痛在二三日后仍然会限制于右下腹部的，在这儿制造一个脓疱，脓液渐被吸收时，体温也就渐次平复。大概两三个礼拜，多则四五个礼拜，病人终会复原的。但不幸遇着病状剧烈时，脓疱向腹腔内破裂了，化脓菌窜入真正的人体内部——腹腔，便会引起急性腹膜炎，一二日间便要丢命。即使没有向腹腔破裂，幸而复原了，但要再发，要屡次再发。

以上我把盲肠炎的病源和症状约略说了。我们说到治疗上来，便时常听着两派的争论。简切痛快的外科派，他们的主张是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行开腹手术，把病源地的虫状突起割了，便把盲肠炎根治了。这个手术很简单，手术的效果也非常显著，但可惜人类的精神，根本上害着了一种姑息病，一种怕流血的病。不怕手术的效果如何好，手术的痛苦如何轻微，而人总是怕流血的。因而温文尔雅的内科夫子们走来开始和平的说教，先教病人保持着绝对的安静，静静地睡着不许移动，然后再在患部或者用温水来温它一下，或者用冰块来冰它一下，或者用鸦片来麻醉它一下，病轻的不医也会好，病重的是阎罗王要他命。然而重症总比轻症少，结局是内科夫子的收入总比阎罗王占胜利了。好了又发，发了又姑息，弄到后来把身体弄衰弱了，又才跑到外科门前去要求行手术。这样的

正不乏人。我常听见外科先生们说：盲肠炎病好医，姑息病不好医！

资本家是社会的盲肠。他们对于社会是并没有甚么贡献的。他们的主义是在榨取劳工者的体力以获取剩余价值。他们这种营利的精神使他们于同阶级间不能不起竞争，使他们不能不采取扩张复生产（Erweiterte Reproduktion）的手段。甚么叫扩张复生产？那便是每年每年所得的赢利除去资本家自己的享受外，叠次加入企业的资本内以推广继续其产业。资本家阶级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他们没有统筹全局的计算，只图自己的私图而自由竞争，结果使供给与需要之间不能协调，于是产业停顿而发生经济危机。多数的劳动者在平时做了他们的刍狗①，而在此时更不得不被他们抛弃于街头。社会呈出纷扰的状态，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这条社会的盲肠害了盲肠炎的结果啊！

我们个人谁都是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的，我们对于社会也谁都想它保持健康的状态。社会的健康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才能显现。共产主义的标帜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在那时候没有生活上的忧虑，我们的生活社会能为我们保障，社会的生产力可以听我们自由取得应分的需要，而我们个人和万众一样对于社会亦得各尽其力而成就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社会会有人不欢迎吗？宗教家所仰望的天国不必在天上去求，原是在这地上可以建设的。有人或许会

① 用草扎成的狗。古人用作祭祀，祭后即弃。《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以为这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但是这种人并不是不欢迎这种地上乐园，他们是欢迎过度而生出了这样的杞忧。在飞机尚未发明之前，人谁信二十世纪中有人会在天空中翱翔呢？

1924年6月

一个伟大的教训

欧战正当剧烈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棉纱事业呈现过一次很兴旺的状态，一时工厂林立，销数日增，使眈眈虎视的邻邦的日本人曾瞠目地惊赞不置。但自欧战告终后不一二年间事业便渐渐衰颓，迨至去年（一九二四）四月我重游日本的时候，便已风闻中国的棉纱事业有破产的倾向了。去年十一月我又回到上海来时，所有新兴纱厂竟已先后倒闭。啊，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教训，这对于我们中国今后所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多么明白的启示哟！我为这个现象叩问了不少的经济专家，但他们都好象漠不关心，看得是全然不关痛痒。我自己的见闻也很狭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先觉的人论到过这件事情的重要上来。我自己对于经济的智识，原不过是一个初等小学的生徒，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作数，但是愚者千虑也必有偶尔一得之时，我自己本我自己爱国的热诚，写出这篇短论。

论到我们中国今后所当采取的经济政策的问题，就我见闻所及，论者的意见仍属没衷一是。有的信奉亚丹斯密① 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北京《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号。

① 亚丹斯密（A·Smith，1723—1790），通译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著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等。

学说，尊重个人的天赋人权，对于个人资本主义，不惟不许有任何机关加以暴戾的阻遏，还当努力加以奖励以增长国家的富源；有的则主张施行社会主义，而于同是信奉社会主义者中，又有急进与缓进的不同。缓进派视个人资本主义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经的阶段。他们以为个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现代有百利而无一弊：个人资本主义可以使资本积聚，可以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可以团集和训练工人，这于实现社会主义上正是必要条件。象这种貌似进步的论调，很足以悦人听闻而使人迷惑：因为一方面可以博得自由主义者的同情，别方面也使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几于无辞以对。如以多数决议的办法以定决我们中国今后所当采取的经济方针，我恐怕自由放任主义终会得到胜利，便是个人资本主义是值得在我们中国厉行的。

我们现在且不必征引马克思的学说，说个人资本主义在它根本上是要必然崩溃的；我们就退一千步来说，就算个人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的至上的轨模，是救我们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灵剂，但在我们中国所处的现状之下，个人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在我们的国内发达？便是说我们中国人中能不能产生得出几个雄厚的经济大王，和外国的大资本家们对抗？假使能够，你们也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宣传。但是，你们讴歌个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们哟，你们请把眼睛睁开到事实上来吧！中国的经营棉纱事业的资本家们大都失败了！世界大战中所有一时如春笋茁发的新兴纱厂都先后倒闭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训，这是怎样的一个答案呢？

资本主义本来是一种带着传染性的东西，凡它所接触到



的地方便立刻要受它的感染，而感染的第一步便是棉纱。我们中国人不怕要高讲甚么精神文明，不怕要高谈甚么孔丘、老聃①，但到外国的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一经输入进来，也没有人劝诱，也没有人胁迫，但都不再用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而要用洋纱洋缎了。我们中国的资产家不怕就受着不平等的关税的束缚，不怕就全不受国家政府的保护，但在欧战剧烈的时候，中国人民排斥日货剧烈的时候，洋货一时不能进来，也晓得向外国去置办些生产机械来自行兴办工厂，不再效乡里的匹夫匹妇自己驾着车子纺棉线了。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初受资本主义化的征候。假使我们还是处在英国的亚丹斯密当时的世界，假使我们中国是与外界不通往来的绝域，更假使欧洲的战争能延长到百年以上，我们中国人的排斥日货也能延长到百年以上，这个个人资本主义的萌芽，听其在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土地上自由发展，那么再隔百年或许我们中国也能达到英美现有的地位，我们中国也很可以发生些“托拉斯”、“新机克德”等高级的混合经营了。啊，但是可惜，我们中国发动得太迟，而他们欧洲人的竞争商场（无形之间就争的是我们中国呵！）的打架也调息得太早了！

我们中国人现在所处的是甚么地位呢？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现状呢？他们已经是“柯如青铜根如石”的了。这样的雄大的古木盘据在我们中国的身上，我们的

---

① 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道德经》。

几株嫩苗想起来和它们竞参天之势，这是能够的吗？欧战终结以后，各国的资本家又加倍地活动起来，有的更到我们中国的内地来经营巨大的工厂，层层的榨取我们。他们有雄厚的资本，他们有高级的组织，看你几株嫩苗，怎样能够和他们竞争。怎么能够不倒塌呢？

绝大的教训便是在这儿！便是个人资本主义即使“最合乎人性的自然”，即使是有在自然发展中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之可能，但在现在的中国是没有望它发达的希望了！

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隶，不想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国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的颜色便缩头缩尾吧。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临到了穷途，为甚么还不走！

1925年 4 月26日夜半

附　录

本篇初刊时，文末有《附白》。一九二八年收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版《水平线下（全集）》时删去。现附录如下：

今天晚上接到勉己兄一封信，叫我在五一增刊上要做篇文章，我受他的热情感发了，赶着便草了这篇短篇。这是我蕴在心头久想吐出的话，今晚上算吐出了几分，可惜时间太迫，不能尽情的畅吐，我只好更待别的机会了。不过我在此还要附加几句：我自己并不是共产党人，我也不曾受过人一个半边的津贴，我所说的话都是赶着我自己的良心说的，万一我的见解如有错误，我希望能够鉴我愚忱的人不要吝惜教海。

沫若附白

为"五卅"惨案怒吼

"五卅"惨剧，英国人残杀我们无数的同胞，激起我们空前的民气，我们于悲愤泣血之余，也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素号为睡狮，到这时候是真正醒了。

我们谁都知道这次肇祸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纱厂虐待工人，酿成罢工风潮，而某纱厂之厂长日本人竟敢枪杀我们的同胞顾正红①，因此才有上海学生四处讲演募捐以救济工人之义举，更因此才有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惨杀我手无寸铁之学生与市民。这次事件之是非曲直早已昭昭在人耳目，便是友邦人士之主持公道者，也没有不同情我们，而祝贺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事发以来已经半月以上了，英国政府还在袒庇他们在华官吏的非法行为，使他们强硬到底，死不认罪。一方面多方百计，利用他们的宣传机构以诬陷我们，他方面又四处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北京《晨报副刊》，原题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

① 顾正红（1905—1925），江苏滨海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因领导工人群众抗议该厂厂主撕毁与工人签订的协议，遭枪杀。

杀，继续他们的高压政策以威胁我们。他们的处心积虑是决没有惩祸窒凶之一日的。

还有祸魁的日本也事事效法英国而不知悔改，四处调兵遣舰以示威胁。安东的日警枪杀了我们七名的学生。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开会讨论救国，横遭日警的干涉。① 他们的政府嗾使他们全国的报章妄事诬蔑，目我们谨守秩序的商人学生为暴徒，谥我们力争人格的罢工罢市为“赤化”！半月以来我们对于外人决不曾加以一次的杀害，这正是我们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而他们偏偏说是高压政策的成功。诸如此类，倒黑为白，淆是为非，真足令人发指！

同胞们，我们是醒了。我们外察仇国，他们的态度既如彼其蛮横，而我们内察当局，他们的奴颜是永远甘于媚外的。当局一方面希望有人出来排解以卸仔肩，别一方面更竭力减轻条件以图敷衍了事。同胞们，这是何等重大的时机，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我们岂能任他们一二小人向蛮横的外人请求：顾全我们一点面子，赏赐我们一点枝叶的权利，撤换一二外人的官吏，便可以从此自馁吗？

同胞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身受帝国主义者非人道的压迫决不始于“五卅”，我们身受他们的无形惨杀的同胞决不限于“五卅”死难的诸位烈士。

我们谁都知道英、日两国是执行经济侵略政策的国家，侵

---

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纪念“五七”国耻十周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日警干涉，夺走我国旗，并逮捕我学生十九人。

略政策之目的在于掠夺贫弱民族使沦于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十八世纪以来，因为工业革命的结果，许多工业化的国家，都感受生产过剩的痛苦，而急急图谋扩张殖民地与商场。美、非、澳三洲与半个亚洲都被白种人瓜分了，现在吞无可吞的列强与后进发展无地的日本，都向着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华，来榨取我们的脂膏，吮吸我们的血液。我们身受他们的侵略已经快要满一世纪了。

同胞们！列强之所以能执行经济榨取的原因，一方面是要积累他们的资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有我们中国这样可供经济榨取的区域存在。大工业生产者是不能不靠非工业国家之消费者以为维持的，而我们泱泱中华，恰恰在维持大工商业国的存在上出了莫大的力气。我们从前还在睡着的时候，他们便用了阴谋和武力强迫我们订了无数不平等条约。其结果，他们可以在我国自由建筑铁路，在内河及领海内自由航行，自由开设工场，自由采掘矿山，自由建立银行；而于贸易方面，可以设定居留地，特享领事裁判权，束缚我们的关税。

这些特惠维持着他们在华经济的发展。他们要维持经济的发展，便不能不坚持这种种不平等条约。要坚持这种种不平等条约，便不惜用高压手段来压迫我们。

同胞们！我们须要知道，我们受他们非人道的压迫，不始于"五卅"，我们遭了他们无形惨杀的同胞，不限于"五卅"死难的诸位烈士！我们是早应该觉醒的。"五卅"的诸位烈士，给了我们一声警钟，使我们翻然醒悟了起来。我们现在的要求，难道不应该从拔本塞源做起吗？

北京临时执政派遣来沪的人员①，荏苒因循地曾向外人方面提出了极糊涂的十三个条件。那十三个条件，我们是大大不满意的，然而六国委员②还公然拒绝。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呀！我们认定中国国民解决"五卅"惨案的要求，只有一个，便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同胞们！你们以为这种要求是过分吗？你们须要知道这才是酿成此次祸害的根本原因。病根不除，我们敢断定同样的惨祸会永远复发。而我们国民的民气，再衰三涸，将要永远沦为外人的奴隶而不能振拔。同胞们，我们要趁此机会，赶快振作起来，我们要（一）收回租界，（二）收回领事裁判权与无限制的治外法权，（三）改订关税条约，（四）禁止外人在我国内直接投资于铁道、航业、工厂、矿山、银行及施行文化侵略等。

我们须要知道，这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当然也是他们施行经济侵略政策者的生死关头。我们把这些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他们的内部便要起重大的变化。他们要维持他们的侵略地位，决不肯轻易地容许我们，但我们难道有甚么爱惜要永远听他们强顽吗？我们有唯一的惩创他们的武器，便是实际和他们经济绝交。如他们不赞成废除条约，我们便在贸易上对于他们实行非买同盟，在产业上对于他们实行不合作主义，他们失却了供养自己的市场，他们的内部便不能不自起分裂，而我们即使未能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名，而已收

① "五卅"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曾派遣蔡廷干、曾宗鉴等人，赴沪调查事件"真相"。

② 指"五卅"惨案发生后，英、法、日、意、美、比利时六国驻华公使组成的沪案委员团。

到抵抗侵略政策之实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武器，这是贯彻我们最后要求的唯一的后盾，我们赶快起来从事于实际救亡的行动吧。

这项行动决不是一手一脚所能举办的事情，也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功业，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的毅力，继之以有组织有规划的持久战争，然后才能济事。所以我们于实行经济绝交上，也不能不有一定的步骤：

第一，我们须实行对于英、日经济绝交，这因为他们两国是此次的祸首，并且是向我国厉行经济侵略的先锋。

其次，是应该组织一个有系统的大集团，我们主张先由各省的各界组织同志会，由各界同志会组织省同志会，由省同志会组织全国大会，然后我们一切战斗才能集中领导，才能持久，才能收到最后的成效。

同胞们！要相信这才是起死回生的方略，要这样才能不负我们“五卅”死难诸位同胞，要这样才能不枉费我们此次空前的民气。我们请再把我们的意见撮述如下：

第一，我们目前的急务是监督外交；

第二，我们唯一的要求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第三，我们采取的方略是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的持久战；

第四，我们进行的步骤是全民大团结。

这便是我们当前的历史使命。同志们，时会到了，我们赶快团结起来奋斗！

1925年6月16日

穷汉的穷谈

灵光①先生在《孤军》②杂志上做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道："共产党利用共产的美名，以衔惑一般无十分判别力的青年与十分不得志的穷汉。"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真好，真正是盛水不漏，真正是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道穿了。怎么说呢？

第一，共产党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废除私有财产的，它要把社会上的产业从个人的手中剥夺过来，让大家来共它一共。所以这种主义和有产业的人是对头。换句话说，就是有钱的人是不受共产的美名衔惑的。有钱的人不受共产的美名衔惑，能受共产的美名衔惑的当然只有穷汉了。

穷汉也是有等级的。穷汉假如能得志，就是说现在虽然穷，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能够有碗饭吃，或者还能够有希望成为资本家的人，那他对于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不消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文字有删节。

① 即林骙，字植夫，福建人。当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的文章发表在《孤军》第三卷第四期，题为《独立党出现的要求》。

② 政论性月刊。上海孤军杂志社主办，何公敢主编。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

也是反对的，不消说他也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衔惑。这样能得志的穷汉既不受共产的美名衔惑，那吗能受共产的美名衔惑的当然只有不得志的，而且是十分不得志的穷汉了。

其次呢，共产主义既是反对私有财产的，那吗在现在私产制度的社会里面，它要算是大逆不道的革命的主张了。就跟我们民国以前，在君主的国度里要实行民主革命一样，我们知道搞革命的人有许多是搞掉了自己的脑袋子，有许多至少也是亡了二三十年的命的。所以现在要在私产的国度里实行共产革命的人，失掉脑袋子的事情就算被他免掉呢，这二三十年的命是不能不让他亡的呀！自己的颈子上顶着一个替别人家建功立业的脑袋子，还要去亡二三十年的命，这又何苦来哟？人生只有这几十寒暑，养养儿来防防老，积积谷来防防饥，也就乐得马马虎虎地过去，何苦要把自己的脑袋子来作玩，弄得个妻离子散呢？所以共产的名不怕就怎样美，凡为世故很深、有判别力的人，他是不肯受它的衔惑的。这样的人多半是老人，老人不肯受衔惑，受衔惑的当然是只有青年了。

青年也不一定就是无判别力的。有的青年刚进学堂门就要问你毕业后的用途，他们的判别力有的比老人们还要充分。这类的人是我们所称为"老成持重"的吧，大约他在私产社会里面是十分可以得志的了。象这样的青年，他当然也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衔惑的。这样的青年不会受共产的美名衔惑，那吗受共产的美名衔惑的当然只有无判别力的，而且是无十分判别力的青年了。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的材料，就只有这两种：一种是连死

也不害怕的小孩子，一种是连钱也不会找的穷光蛋。但这不怕死，不要钱，岂不是把共产党的精神谈得干干净净，把共产党人赞美到十二万分了吗？

不过灵光先生说：共产二字是美名，这在我看来倒觉得有点不对。这共产二字实在并不甚美，不惟不甚美，而且因为它反转弄出了许多的误会出来。

我们中国的字是再简便也没有的字，我们中国的国民也是再聪明也没有的国民。只消看见一两个字便可以抵得着读破几部大书。譬如你讲自然主义是怎么样，他听见“自然”两个字便要说道，“哦，是。这是我们陶渊明的‘暂得返自然’①呀！”你要讲写实主义呢，他就说写实是照着实实在在的物件去写生。你要讲唯物史观呢，他就说马克思是把人来当成物件的。你要讲共产主义呢，那自然你衣包里的钱是该我共的，或者我衣包里的钱提防他要来共了。唉，简单的确是简单，聪明也的确是聪明，可是可惜所谓共产主义这样东西，才不是那么一回事。

共产主义的革命，决不是说今天革命了马上就要把社会上的财产来共的。共产的社会自然是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就跟大同世界是孔子的目标一样。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决不是一步就可以跳到的，在这里有一定的步骤。我们知道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的始祖，但他说共产革命的经历便含有三个时期。第一个便是以国家的力量来集中资本，第二个便是以

---

①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著有《陶渊明集》。“暂得返自然”一句见他的《归田园居》第一首。

国家的力量来努力发展可以共的产业，第三个是产业达到可以共的地步了，然后大家才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共产的理想生活。共产革命要经过这三个时期才能成功，而且这三个时期要经过多少年辰，我们还无从知道。不过共产主义者只是努力把产业集中，使它可以早日得共而已。据这样看来，共产革命的精神分明是集产，何尝是共产呢？所以共产主义又称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这个名称倒还比较适当一点。你看在那第一第二的革命途中，所谓共产主义不分明还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吗?并且我们还有事实来做证明，我们知道，俄国是实行共产革命的国家，而它现在却是实实在在地在施行着国家资本主义。不明白此种关键的人，他以为俄国的革命是失败了，殊不知所谓共产革命的本身才本来是有这样的步骤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共产主义和现刻盛行一时的所谓爱国主义又有甚么矛盾呢？然而偏偏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不怕他们写起文章来也会谈世界大同，不怕他们也在书斋里贴甚么“天下为公”①，但他对于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总是视如洪水猛兽。这大约是别人的产我可以去共，我的产就不好让别人来共吧。

末了我再声明几句。灵光先生不必便是望文生训的图简便的聪明人，但天下也尽有这样的聪明人存在，所以我这个穷汉也免不得在此多说了一番穷话。

1925年10月19日

---

① 语见《礼记·礼运》。

双声迭韵

恐怕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吧？有许多人一谈到共产主义上来，总要这么说道：中国人假如要实行共产，那吗外国人便要立地走来共管。“共产”和“共管”这两个东西竟来得这样密切，我恐怕是双声和迭韵的关系吧？

又是灵光先生的那篇文章。他在《孤军》杂志三卷四期的《独立党出现的要求》里面说道：“以我之见，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成功则已，若一成功，同时便是中国受列强共管之时。”他也这样，觉得共产就要共管呢。不过灵光先生从前也是高谈过共产主义的人，不能说他对于共产主义完全不懂，那吗他这“共产”和“共管”的意思，恐怕又不仅是双声和迭韵的关系吧？

灵光先生这样说，其他的先生们也多在这样说，共产便要共管。是的，这其中怕一定有什么真理存在吧？那吗，干卿甚事？为甚么我们一共起产来，他们外国人就要来共我们的管呢？哦，我明白了。我们大家都已晓得我们中国是穷光蛋的国家，我们就要共产也还无产可共呀。那吗我们说要共产，岂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原题为《共产与共管》。

不是要去共他们富家翁外国人的产吗？这样一来，这双声迭韵说就不攻自破了。我们要去共外国人的产，所以外国人就不能不来共我们的管啦。我们彼此算是不共戴天之仇，不是你共，便是我共。但是，这其中至少恐怕总还要打得一个你输我赢，然后产也才能共得起来，管也才能共得起来吧？作兴中国人就算打输了（在崇拜外国的人看来，中国人总不行，总是打不赢外国人的），但是从共产革命起至共管实现止，至少总不能说是"同时"，至少总不能说是"立地"吧？中国人就算软弱，象"五卅"惨案一样，多少也还支持了几天啦！而灵光先生偏偏要说是"同时"，我恐怕这于无心之间未免有几分在替外国人说话吧？

外国人深怕我们要去共他们的产，所以他们就把"共管"这个戒尺来恫吓我们。其实他们真个要来共管我们吗？他们要恫骇一些麻雀子，只消立几个稻草人不也就够了吗？

唉，我想，我们真真是在做梦呀。把洋烟大抽而特抽的，抽得已经上了大瘾了，听见别人家说"我要把洋烟来毒死你呀！"，才骇得把头藏在被窝里，这不真真是"阿弥陀佛"么？

灵光先生，你是聪明的人，你要晓得我们受外国人的共管，其实已经不消等共产党来革命，已经有了好多年辰了。譬如你我身上穿的西装，那呢绒的料子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你我都在《孤军》上做文字，《孤军》用的报纸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你要说这是经济上的自由买卖，不是行政上的强迫支配么？那吗我要问你：我们的关税是甚么人在管？我们的盐税是甚么人在管？我们的邮政是甚么人在管？管我们中国财政部的太上财

政部是甚么人在管呀？你还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握到我们中央及地方的主要行政权么？好的，做我们执政的是段祺瑞①，做我们督军、巡阅使的是张作霖、吴佩孚②这一竿子百家姓上有名的人。但是，这些人你还以为他们真是中国人吗？那么李提摩太，李佳白，朱尔典，汤若望，张伯伦，康德，林权助，③你都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人呀！唉，我们都是受了百家姓的欺骗啦。

---

①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②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曾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吴佩孚(1873—1939)，字玉山，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豫鲁三省巡阅副使。

③ 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七年间在我国山东、山西传教。一八九一年到上海任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一九〇一年创办山西大学堂，继续从事文化侵略。著有《留华四十五年记》。　李佳白(G·Reid, 1857—1927)，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一八八二年来华传教。一九〇二年组织“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教务联合会”。先后主编《尚贤堂纪事》、《国际公报》等刊物。一九二七年死于上海。　朱尔典(J.N.Jordan, 1852—1925)，英国外交官。一八八九年任英驻华使馆书记。一九〇六至一九二〇年任英驻华公使，推行侵华政策，扶植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汤若望(J·A·S·Bell, 1591—1666)，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六二二年来华。崇祯三年(1630)受命编纂《崇祯历书》。清军入关后投归清朝，任钦天监监正，死于北京。　张伯伦(J.Chamberlain, 1836—1914)，英帝国主义扩张侵略政策的倡导者。一八九五年任英国殖民大臣。　康德(A·M·R·Conty, 1864—?)，法国外交官。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年任法国驻华公使。　林权助(1860—1939)，日本外交官。一八九〇年任驻中国烟台领事。一九〇六年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一六年再度出任驻华大使，并任“关东州”长官。

你并不是不晓得的：他们的财产是存在外国人的银行里的，他们的粮饷，他们的军火，是外国人供给的，他们不过是外国人养的几只反毛狗，养来看管我们这几万万条驯善的羊子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外国人立来恫骇我们这些麻雀子的稻草人呀！你看他们不是专心一意地在替外国人保全生命财产，只把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拿去孝敬洋大人、洋祖宗的吗？你还以为他们是中国人，你未免太把他们小视了呀。

照这样看来，到了现在还怕外国人来共管，岂不是上了烟瘾还怕别人拿洋烟来毒杀你吗？灵光先生，我们现在不是怕毒杀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看要如何才能够把烟瘾戒脱的时候呀。戒了洋烟打吗啡针，戒了吗啡用海罗因，这在黑甜乡里是永劫不能翻身的。而你偏偏说："我们还可以利用帝国主义本身利害的冲突，以图我国家之独立发展。"你这岂不是就象把烟瘾过足了，在天堂里谈天话一样的吗？我们终归是怕外国人的。怕了又不敢惹他们，只得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老本领，联这个去打那个，合那个去打这个，合来联去，纵横还是自己上当，这就是所谓"利用"么？这就是所谓"独立发展"么？灵光先生，你也未免太幽默了。

我们现在不是怕共管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应该想想，怎样才能够从这既成的经济的国际共管之下脱离的时候呀。外国人以绝雄厚的经济战斗力来君临着我们，我们于不识不知之间，无条件地把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而且几几乎是唯一的市场提供给他们去了。他们的经济的侵略，一直杀到我们的五腑六脏里来，我们不惟没有心思和他们抵抗，而且还有条约去

保护他们。这点灵光先生想来是很明白的。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惟一的生路，不该是彻底地去反抗他们的经济侵略吗？你要反抗他们的经济侵略，这第一步的手段不就是应该把那种种保护他们的条约废除，回头还要聚集相当的资本来，和他们在经济场中决一死战？现刻世界上的市场所剩无几了，我们即使很幸运地能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废除，但他们外国人要发泄他们过剩的资本，他们还是要来侵略我们的。他们即使受了种种的制裁，但他们单以雄厚的资本来和我们竞争，我们的资本力如弱小时依然还是要受他们制服的。那么，我们只好赶着我们的力量收集最大的资本来和他们对抗了。但我们一国之内能够使资本集中到最大的地位的，不是只有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的权力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吗？更换句话说时，不是只有把全国的私有财产集收于国家的手中，以国家为单位努力去提高产业，以防外国人的侵略吗？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要说话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借过灵光先生的书来研究过一下（我翻译的河上肇① 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的原本，是灵光先生借给我的）。我觉得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革命在产业后进的国度中所必然采取的形式。那吗实行共产革命岂不就是抵抗共管？实行共产革命岂不就是实行爱国主义？假使居今日而谈爱国主义，另外还有一种经济政策的方针，或者是要厉行个人资本主义（关于这一层，

---

①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三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著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等。

国家主义者① 均未明言，所以不敢断论），那我就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会怎样行法。

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既是反抗共管的唯一的武器，而厉行国家资本主义又是共产革命在产业后进的国度中所必取的形式，那么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假如真个“成功”，岂不就是列强（这“列强”两个字我实在不高兴用）共管的消灭吗？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的成功，同时就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他们把商场失掉，过剩的资本没有地方发泄，他们的内部愁他不起变化！那么，我们中国的共产革命的成功说不定就是世界共产的发轫呢。怎么能够说“我们中国共产革命一成功，同时便是受列强共管之时”呢？这在道理上我恐怕说不过去吧？在道理上说不过去，然而灵光先生和其他的先生们偏在那样说，我想去想来，怕还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吧？

1925年10月22日

①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则宣扬“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以曾琦、李璜为代表，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

不读书好求甚解

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坏脾气。不读书好求甚解，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坏脾气。

譬如有人要赞成一种主义，他对于该项主义并不加以甚么的研究，只要看见一个名称起了一种感情作用，或者抓着一两句口号来望文生训地解释一下，他就梦梦然地成了该项主义的主义者了。

他要反对一种主义时，也是这样。

近来国家主义者之反对共产主义，已经成了全面的对敌，这是无可隐讳的。国家主义者如真真正正能从学理上把共产主义攻破，在我们以研究学理为职志的人，也未尝不是一件痛快的事。然而他们之攻击共产主义也，则多因某个共产党人之不惬人意因而迁怒及其主义，是犹因饭碗之不洁而生辟谷之想，其于所攻击之主义无损于毫末，而攻击者则徒遗人以笑柄耳。

国家主义者攻击共产主义，除去许多因噎废食、隔靴搔痒的感情话而外，他们所持的最大理由大概是说共产主义是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原题为《新国家的创造》。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文字有删节。

认国家的。不错，共产主义如果到了完成的时候，那就是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国家这个制度的确是有消灭的可能性的。然而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何能说共产主义是否认国家的呢？

不过国家主义者——尤其是中国的国家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否认国家，也有他们的赃证。他们惯爱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叫着“工人无祖国”（“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这句话的本意在马克思自己本是用来表示他并非否认国家，而我们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却转引来做他否认国家的根据，这不消说可以算得是天下的奇闻，然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不读书好求甚解”的一个铁证了。

国家主义者如肯多读两部书，或者就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肯拿来略读一遍，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二章，就在“工人无祖国”那句话之后不多远一点，不是有十条共产党的政纲吗？请看那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条文是些甚么。

第五条　以国家资本建立完全独占的国民银行，以收集信用于国家之手中。

第六条　集收交通机关于国家之手中。

第七条　增殖国民工场与生产机关，准据一种共同的计画以开辟并改良土地。

5. Zentralization des Kredits in den Handen des Staats durch eine Nationalbank und Staats Kapital und aussch liesslichem Monopol.

6. Zentralization des Transportwesens in den Handen des Staats.

7. Vermehrung der National fabriken, Produktions instrumente, Urbarmach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Landereien nach einem gemein schaftlichen Plan.

在这儿他重重迭迭地用了许多“国家”(“Staat”)、“国民”(Nation”)等字样，只要是有眼睛能认识字的人，想来总不会再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是否认国家的吧？并且我把马克思的原文也特意一并引用了出来，想来总不会再有那样善于怀疑的人竟疑我说马克思是承认国家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其初期实在是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话，是完全出于我的杜撰的吧。

马克思既是承认国家的，他为甚么又要倡导“工人无祖国”的“谬说”呢？这岂不是他自相矛盾，自己搬石头来打脑壳吗？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了！马克思是承认国家的，不过他所承认的国家，决不是现在的建立于私产制度上的既成的国家罢了。现在的既成的国家是由私产制度产生出来的，她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护符。更详细地说时，在这种国家制度里只有少数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大多数没钱的人只是附属的供人使用的有生命的物件。国家里面的种种法律、行政、风俗、道德，都是这少数有发言权的人的自卫的工具。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① 的话，这已经是被我们古人道

① 语出《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穿了的，我们现在也用不着再去引些舶来的学说来从事纷扰了。

现代既成的国家是成立于私产制度上面的，她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护符，所以这样的国家只能说是少数人的国家，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人是还没有资格敢说他自己是有这种国家的。让我们在这儿打一个譬比吧。譬如我们现在办一所大学，我们现在办的大学不消说都是立足于私产制度上的，我们第一要征收学费，至少要每年能缴纳百元上下的学费的人才能成为我们的学生。这些学生一入了学堂，他们当然便是学堂的主体了，象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学堂，或者说是有学籍。但是和这学堂有关系的校役，他们只是以雇佣关系给学校服役的工人，他们虽然也得在学校里面住，得在学校里面吃，然而无论怎样德摩克拉西① 的学校，在它们的教职员和学生的登记表里面，总不会有校役的名籍的吧？这校役无学籍的事实就是"工人无祖国"的说明了。所以马克思才说出这句话来以表示他并不是否认国家的。

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本来没有的东西，人们不能从工人手里取去。无产阶级只有先求政治上的支配权，把自己提高到国民的阶级，自己来组织成一个国家，这虽然决不是有产阶级所说的国家，但仍然是国家。"

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 Man kann ihnen nicht nebmen, was sie nieht haben. Indem das Proletariat zuna-

① 英语democracy 的音译，意为"民主"。

chst sich die politische Herrschaft erobern, sich zur nationalen Klasse erheben, sich selbst als Nation Konstituieren muss, ist es selbst noch national, wenn auch keinesweges im Sinneder Bourgeoisie.

照这样看来,"国家"这种制度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旧式的国家,一种是新式的国家。旧式的国家是有产阶级所形成的,它是掠夺榨取的一种武器,它的本身就包含酝酿战争的毒素。新式的国家反对旧式的国家,它要采取公产制度,它当然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它的目的是在实现永远平和。

国家形式有两种,国家主义也可以说是有两种了。

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这是旧国家主义,这就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变形,对内则称为军国主义,对外则称为帝国主义。这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表现时可以说是"霸道"①。

反对这种国家主义而欲纠合无产阶级以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不消说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也可以称为新国家主义。这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表现似乎可以称为"王道"②。

这王霸二道本来就是对峙的。在西方或者日本的国家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所以他们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信徒不惜加以极端的排斥。但是我们的国家主义者之排斥马克思学说及其信徒,是不是也是由于信奉资本主义,信

① 儒家称凭借武力,利用权术、刑法的统治政策为霸道。

② 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称为"王道"。

奉个人主义的原故呢？奇妙的是他们也在不满意于国内特权阶级的暴行，也在不满意于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他们之中也还有标榜大同思想的人。他们自命为国家主义者，自言具有爱国的至诚，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造成欧西或日本的那种畸形的国家呢？我希望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排斥只是出于不了解或者误解，实际上他们是不免有些误解的，就如上面他们引用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的话来说马克思不承认国家，也就可以证明了。

假使他们是完全出于误会而反对马克思主义，那我劝他们再潜心研究一下，然后再来反对或者赞成。

假使他们根本是反对共产主义，那他们也应该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旗帜打鲜明起来，不要久藏在"国家"的美名之下以煽惑青年的视听。本来"国家"二字在表面上看来原是很冠冕堂皇的东西，古今来多少的志士仁人，因为不明白她的本质盲目地为她牺牲了！军人说是为国捐躯，然而万骨之枯仅仅在造成一个英雄的名将。农人说是在为国辟除草莱，工人说是在为国殖产兴邦，然而万民的膏脂仅仅填满了几个便便大腹者的私囊。乡下人走进城隍庙里去烧香，一些血汗钱投在进香钱筒里丁丁当当的响，他满以为是城隍老爷领了他的香钱，殊不知城隍庙里的香橱司才拿去挟姘头，打马将，抽大烟，灌黄汤。啊，国家主义者啊！你们假使真个是这样的蒙昧，那你们的动机不怕就出于利国福民，然而你们的结果必弄到祸国殃民。你们在热心鼓吹之余也要三加思索呀！

总之，居今日二十世纪的世界，居今日深受资本帝国主义

压迫的我们中国，无论从学理上，从经济上，从人道上，都没有再提倡旧国家主义的余地了。我们真真是爱国的，我们真真是想救中国，想救我们中国人民的，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厉行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儿虽然把有产阶级的衮衮诸公除外了，然而这是势所必然，但也要看你们自己觉悟的程度怎样。你们假如觉悟到你们的产业在外人的经济压迫下终没有多么大的发展的可能，你们假如觉悟到你们的产业终久会被外人鲸吞，你们假如觉悟到就在共产社会里你们的后代儿孙也有无上的福分，你们假如觉悟到你们爱国的心真真是比爱财产还要真诚，那你们当然尽可以前来实行新国家主义，前来作无产阶级的伴侣，那我们中国的革命也才可以称为“全民革命”啦！

真正的爱国者们啊，我们大家觉悟起来，大家团集起来，大家来从事于新国家的创造吧！

1925年12月20日

卖淫妇的饶舌

国家主义者每爱说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国家的，他们连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没有分析得清楚，所以我才做了《不读书好求甚解》来指摘这种纰缪，叙述马克思主义并非否认国家。

出乎意外的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①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克②骂列宁的话来骂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而他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这样一来，简直把他们所极端反对的马克思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伯特金③去了。我觉得有点过于滑稽，而且作者的态度也太不客气，所以我至今还没有答复。

最近郭心崧④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叫着《马克思主义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四期。

① 作者原注：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

② 考茨克（K·Kautsky，1854—1938），通译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出版《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③ 克鲁伯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著有《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等。

④ 郭心崧（1897—？），字仲岳，浙江平阳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参事、邮政总局局长。

国家》(《独立青年》① 第三期)评我的《不读书好求甚解》。他也是反驳我的，不过他的态度比较尚不失为讨论的态度，所以我这个“卖淫妇”要借这个机会再来“饶舌”一次。

心崧先生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因为恩格斯说过“如果没有抑压阶级之必要的时候……国家权力渐次归于无用而终于死灭。”——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他全文的结穴。

〔注〕“死灭”这个字在原文为 einschlafen，我看还是译成“永眠”的好。因为下文另外有一个absterben，要这才好译成“死灭”。河上肇博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推移之过程》第三节曾引用过这几句话，但这两个字的位置前后弄颠倒了。

现刻我要来批判他这两句话的价值了。

第一，国家终会归于死灭的话，我在《不读书好求甚解》中已经说过。我说“共产主义如果到了完成的时候……国家这个制度的确是有消灭的可能性的。然而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何能说共产主义是否认国家的呢?”这可以看出我那篇文章所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可不可以永存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马克思承不承认国家的问题。心崧先生把我那几句话完全抹杀了，专门在做共产主义完成以后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文不对题，而且是“匿证佯争”(petitio Principii)的诡辩。

第二，国家终会归于死灭的话，是一个社会进化的公例，凡是社会科学家都承认这个公例，并不是恩格斯一个人的主

① 月刊，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编，一九二六年一月由《孤军》更名而来，一九二六年八月停刊。

张，也并不能引为马克思否认国家的罪状。“否认”是根本推翻，“死灭”是自行蜕化。心崧先生所引的恩格斯那几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是“国家不是‘废止’了的，是死灭了的”（Der Staat wird nieht abgeschafft, erstirbtab. Duehring's Umwaelzung der Wissenschaft, S. 302, Verl. v. Dietz, 1921）。心崧先生该是见到的吧？

这儿abgeschafft（废止）一字，在恩格斯原文是打了引用号的。恩格斯的原书本是为反驳Duehring① 氏而作，正是因为有人误解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国家，所以恩格斯才有这几句文章。下文还有一句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国家在今明两日之内立当废止的话，由此可以评定”。（Hieran ebenfalls die Farderung der sogenannten Anarchisten, der Staat solle von heu'e auf morgen abgeschafft werden.）（前书302—303页）。以表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我们所争的也就在这一点。

要主张“废止”（abschaffen）才可以说是“否认”（verneinen），只承认“死灭”（absterben）那只是国家要自行“永眠”（einschlafen），并不是马克思要“否认”它，也并不是马克思能够“否认”它的。要说恩格斯说过国家是终会死灭的便是马克思“否认”国家，那么谁说人是终会“死灭”的，你可以说甚么人都是“否认”人的存在的吗？地球快要到冰化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是终会“死灭”的，你可以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一切科学

① 即杜林（K・E・Dühring，1833—1921），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

家都是“否认”人类的存在的吗？我想就是小学校的生徒也断不会这样说的，然而心崧先生偏说恩格斯说国家是终会死灭的，所以马克思是否认国家。这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吗？

总上所论，我敢于断定：心崧先生那篇驳我的文章完全不合逻辑。而我说“‘工人无祖国’这句话的本意在马克思自己本是用来表示他并非否认国家”，这样一个解释，对于“祖师的主义”（这五个字是心崧先生有意用来奚落我的，不过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不能说是“不忠实”。

1926年3月9日

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灵光先生在《独立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即"双声迭韵" 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连题也就够长的一篇文章。不消说这大部分是对我说的话，有许多地方我认为是有讨论的必要的，所以我愿意平心静气地，逐次和灵光先生讨论。

灵光先生说过他"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也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这点我觉得很好。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所以我们然后也才有讨论的余地。譬如我们同是要往北京走的人，一个要乘火车，一个要走路，我们要来讨论那一种走法便当，我们的讨论彼此也才容易达到一个结果。假如我们一个要往北京，一个要往广东，那我们是永远没有碰头的时候了。

灵光先生说他是"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他的政见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不过他却"不赞成共产革命"。他的"不赞成共产革命"的理由，最简赅的是他自己坦坦白白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原题为《社会革命的时机》。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他说："以我之见，我们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可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用社会政策可以达到共产的目的吗？这一层，因为即使不用社会政策，暂且不追究。照理论上讲来，个人资本主义（就是"现经济制度"）听其自由发展起去，由于循环性的经济恐慌，由它自身的矛盾总有一天必然崩坏而蜕变，即"达到共产"的时候。不过我在这儿要想叩问灵光先生的，就是，灵光先生既是"不反对共产主义"，既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人，那么假使"目的"早一天能够达到，而且"时机未熟的社会革命"不见得有"危险"的时候，你究竟该采取那一种态度？这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讨论的根本问题。这点我们假如决定了，其余的枝叶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灵光先生说"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是有"危险"的，他根据的是日本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计画》的那篇文章（《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下篇第四章）。这篇文章我翻译过，也经过赵修乾① 的翻译，载在《孤军》杂志的第二卷第四期里面。这篇文章我在译的时候，早就发生过疑问，我在前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早就有一封信寄《孤军》的主编何公敢② 先生。这封信稿我本是想在《孤军》上发表的，公敢因为嫌我的文章

① 赵修乾（1890—？），福建闽侯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沈阳东北大学数学系教授。

② 何公敢（1887—？），名松龄，福建闽侯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孤军》杂志主编。

没有发挥尽致，而且论证比河上博士也不见得有多么充足，所以没有发表。我在去年又才追索回来了。

现在灵光先生说“沫若先生也译过河上先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于‘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是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于政治革命而已’等语是如何解释呢？”他这里所引用的几句话就是河上肇那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灵光先生所说的“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了。灵光先生问我作“如何解释”，我觉得时机正好，我在此不妨直切地把我的信稿发表出来了，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不见得一定要招致生产力之减退，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也不见得仅仅限于政治革命，就是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不见得一定有甚么危险。我的旧信稿，不敢说就是甚么真知卓见，不过在此提供出来，聊以供朋友们的讨论罢了。

公敢兄：

惠示读悉。《孤军》讨论会极赞成，弟亦愿意加入，惟八月中旬杭州正式成立会却恐不能到会，因弟目前移译《新的一代》① 一书，须到来月中旬方能竣事。

弟于社会经济诸科素无深到研究，惟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信心，近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完后，此信心益见坚固了。弟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

① 即《新时代》，一九二五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郭鼎堂译。《新时代》，通译《处女地》，俄国屠格涅夫作。

海，这是必然的路径。现在从事各种改革，在精神上均须有这种自觉，即是须采取最捷近的路途，向海里走去。我是相信在产业未进步、物质条件未具足的国度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政治革命是愈早愈好的。俄罗斯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政治与经济并不能同时解决，关键要在改革政治以改革经济为目的。在中国目前提倡奖励私人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怕海远了，要在河道上先凿一个大湖，这是阻碍社会的进行的。并且这种主义在人类是无政府的时候，无目的地在私欲之下蠢动着的时候，无须乎提倡也会自行生长。惟从国际经济方面看来，中国目前已成为全世界资本家的世界市场，中国新兴资本家以微弱的资本，以不熟练的经营，要起而与世界诸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竞争，这是非取绝对的保护政策是不能成功的。欧战时期中国纺织业一时非常发达，然自欧战告终各国局面稍稍回复之后而全纺织业界便大受打击，几至于全部破产。闻资本家代表张某之漫游欧洲，实际是想输入外资以挽回破产的悲运。传闻如果属实，则可见私人资本主义非有绝对的保护权力，在中国是断难与国际资本家竞争的了。这一层在以增进物质之生产力为目的而倡导私人资本主义的人是南辕而北辙。我敢断言，私人资本主义之在中国充其量只能制造些阻碍社会主义实现的小资本家，俄国正苦于这种小资本家的跋扈而多费精力呢。利用私人的利己本能本可以积累些资本，但在中国是迟了。在几株大木浓荫之下，一株小小的嫩苗要想出头和大木们竞冲天之势，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到现在而还能讴歌私人资本主义的人是看到前者而忘却了后

者。同是要有绝对的国家权力才能发达的东西，我们自然当采取较近的捷路走，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孤军》的国营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的先决条件是要推倒现政府。你们有这样的决心吗？我觉得现在所当讨论或者实行的便是如何造成一种力量来推倒政府，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不这样时，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谈社会主义者尽可在讲堂里、酒店里高谈，谈资本主义者也乐得在小资本家的厨房里讨得一个饭碗，中国也可以算得天下太平了。

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之计画》一文论证太薄弱，而他的结论又来得太仓卒了。文中所举的唯一的证据：英国殖民地奴隶解放之失败，证明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在同一的证据里面亦可证明时机虽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进增——即是该殖民地在施行奴隶制度时，自足经济亦尚未发展到尽头，欧人以暴力使自足经济变为奴隶制度，这也是“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然而明明是使物质的生产增进了。这可见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社会革命本不是一跃便可企及的，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也恐怕没有这样的莽猴想一跃而实现共产制度。社会革命之急先锋列宁把社会革命分为三个时期：(一)宣传时期，(二)战斗时期，(三)经营时期。这可以见得这位引导者头脑之完密，而同时对于后进者实指示了一条坦坦的道路。在我们现在是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期中，如何团结力量以攫取政权，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应有的事。中国的智识分子应该早早觉醒起来和体力劳动者们握手，不应该久

陷在朦胧的春睡里！时间不够，想驳河上肇氏一文至今尚未动手，赵君所译不知已登出否？弟此信已粗略把近来所怀抱的意见开陈了，能在《孤军》上补补空白，也可以勉偿一份文债。

被家主放逐，现已迁居到福冈市外马出滨松原大佛像前，后有信件，请寄此处。

郭沫若上 七月二十二日

这封旧信我本是在仓卒之间写成的，其中的理论诚然尚未发挥尽致，而且所论事实有些已不免化为陈迹了（譬如纱厂倒闭事后来已成事实，又譬如《孤军》的国营政策近来也改变了）。但是我信中的大旨，我至今还发现不出甚么大病来。尤为是关于“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一节，在我信中虽然只有一个证据，但如在承认我的解释上立言，则我的证据虽然只有一个，而河上博士是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他所得的结论，我至今还是不敢苟同。

本来企图社会革命的例证，要在已往的历史上寻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以往的社会革命多是于不经意之间发展出来的。只有在我们人类的一般智识和一般自觉渐渐进步了的现代，才能有以人类的意志企图社会革命的计画出现。这一点在 Staudinger① 的《道德之经济的基础》（Wirtschaftliche

① 即施陶丁格尔（F. Staudinger，1849—1921），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提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著有《道德律》、《伦理学与政治》等。

Grundlagen der Moral)里面，河上博士的《唯物史观研究》中有一篇节译，题名为《唯物史观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论得相当透辟，我觉得很可以供参考。我现在把他很重要的一段摘译在下边吧。

"人类一般的智识之进步，与一般的自觉之可能，我们是承认的。这种智识与这种自觉使人类知道在更高级的生活组织中的人类之共通的利益关系，于是为图其实现而成为根本的社会改革之要求。这种改革不消说就是要使人类从盲目的物质的社会力解放出来，而自适于自由之天地。人类在未知道自然法则或仅知其一小部分而未概赅的时代，对于自然界之压迫与束缚，最初以为终是不能脱离，然在自然科学的智识渐渐进步以后，竟公然得以自由，而于广泛的范围内更得以支配自然与自然力且从而利用之了。社会改革也就和这是一样。我们在前是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因果律所支配着，即在今后于不定的期间内或亦不能脱离，但我们随智识之进步得以发见此因果律而生出自觉，最后是更得以支配而利用之。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使'必然'的事物转化为'当然'，这是我们人类所能办到的事。在这儿理想主义才强有力地现出头来，给与我们以前途的光明，而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是以共同管理的社会支配的名义为其特征的。……恩格斯所谓'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之飞跃'，于此始能寻出其真实意义了。"

他这段议论我觉得正是共产革命的哲理的根据。本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是以纯粹自然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社会进展的结果。然而人类社会根本是"当然"(sollen)的世界，不是

纯全的"必然"(sein) 的世界，不过要研究它的进展的程序以采取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就是把人类的主观暂时除外,完全以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物而研究)是最为便宜,我们可以免却种种的纠纷。研究的结果，一种社会制度成为该社会中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即使听其自然 (其实这是完全的假定),也要产生出更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我们已经发见了这种社会的因果律,我们人类难道真是自然的死物,不能采用何种手段来使旧社会早早发展到了尽头，使新社会早早产生吗？譬如我们研究病理学(这是一种自然科学)晓得肺 Distoma①这种病原虫在我们的肺中经过二十年的光景是自会死灭的,但这是关于我们切身的事情,难道我们要听其自然，把二十年的生命来和 Distoma 拚个你死我活吗？这儿的问题不消说很简单，我们谁也是想仰借实际的治疗医学来使病源早早断根的。说到社会问题上来,我们既探得了它的因果,又何以不能及早想个方法,使自己从"盲目的物质的社会力" 及早脱离,使我们早得幸福的生活呢？从"必然" 的研究的结果一把眼光掉到"当然"的价值问题上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应有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里面不怕是那样冷静的进化论者,而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则成为猛烈的革命论者了。在《唯物史观》里他说：

一个的社会组织对于一切的生产力尚有余地使其尽量地发展时，是决不颠复的；而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的存在条件尚未孕育于旧社会的胎内以前,亦决不会发现。

---

① 源自希腊语,意为双口吸虫。

而在《共产党宣言》里则说：

> 共产主义者无论在甚么地方对于各种反抗既成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状态的革命运动，一概援助。共产主义者在这些运动之中以私有财产问题为运动的根本问题，这私有财产问题的发展形式之程度如何在所不问……使支配阶级者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战栗。

这在有一些学者（如象Toenies，Sombart①）以为完全是马克思思想的矛盾，但我们把自然的研究和当然的要求一划分明显出来，何尝能够说他是矛盾呢？不消说照自然的方面讲来"一个社会不怕把进展的自然法则探索着了，那个社会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设法排除"，但是照当然的方面讲来，"他是能够缩短而且缓和那产生的痛苦的"（Sie kann die Geburtswehen abkuerzen und mildern）。单是这点"能够缩短而且缓和"新社会的"产生的痛苦"，不正值得我们人类的努力吗？我们假如能够愈见"缩短"，愈见"缓和"，这在价值上讲来，岂不更是我们人类所宜希望的吗？这儿马克思所说的"缓和"当然不是社会政策家所主张的劳资协调等等的改良政策，这种政策只是使痛苦延长，每次痛苦的量虽然貌似"缓和"，然而延长的量结局才是增加了的呀。所以在私人资本主义未到破产之前，早早企图有计画有目的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而且"缓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痛苦，岂不是于理当然，而

① Toenies，疑为滕尼斯（F.Tönnies，1859—1936），德国社会学家。著有《公社与社会》、《社会学导论》等。 Sombart，即桑巴特（W·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现代资本主义》、《德国社会主义》等。

且事实上亦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吗？

于事实上不见得是不可能的根据，于上函中所举英国殖民地的一例已得充分的证明，即是西印度群岛在英人未去殖民以前，自足经济尚未发展尽致（因为奴隶解放后尚有复回自足经济的余地），而英人强施以奴隶经济的制度（这明明是一种时机未熟的社会革命），竟公然使生产力增加了（因为奴隶解放以后回到了自足经济的制度，使奴隶经济下的生产力减退了，这第二次减退的一分当然就是第一次增加的一分）。这样的一个证据假如还嫌不充分时，我们就请把日本来做个例吧。日本在明治初年还是封建经济，它从封建经济改革为资本制度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不是时机尚早呢？我们请把河上肇博士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 德川幕府之末叶，黑船渡来，……叩封锁国之门户而强制通商。但是资本主义好象一种传染病，交通一开始后，不久便会把对手资本主义化了。日本的封建经济制度假使任其自然的进行（除却外来之刺激）时，恐怕还要迟缓多少年代才能终止；然而世界交通之发展，促进了日本经济制度之改造。
>
> ——见《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上篇第二章第十二节。

这是日本的经济学专家对于他本国下的观察和断案，这分明是一种“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然而革命以后，日本的生产力是减退了的吗？这儿下面本来还有河上博士一长段证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史实，但这几乎是人众皆知的事情，我不愿意再多事征引了。

总之，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只要企图得法，不见得便是

定要失败的事情。而失败了的，即如河上先生所举的奴隶解放的一例，这是完全出于人道的要求，并不是根据于缜密的经济计画的。（因为岛上的土人虽然不肯再从事劳动，但当事者何尝不可输入别地的自由劳动者以事补充呢？）这从经济方面讲来当然会遭失败，然从人道上讲来也不能说不是成功。目标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自异。河上博士却不幸举此一例以作经济上的例证，且只凭一例便轻于下出严重的断案，这是我始终不敢苟同的！我在翻译他的原文的时候，本来早就想写信去请教他，但至今尚未写，不过他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据他现在研究的进境看来，已多不能满足的地方。或者我这儿所反驳的一点也是他所不能满足的吧？河上博士因为生在日本的关系，所以对于剧烈的共产革命纯全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以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之社会革命或实现社会革命之政治革命是以旧组织之资本主义下社会生产力有无发展余地为前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序文），但在我看来，这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要以资本主义的行将破产为前提，在马克思自己是不曾主张过的。他虽然说过“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当以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劳动之组织为必要”，他虽然说过“如象美国和英国一样的国家，劳动者能以平和的路径达到他们的目的”，但他并没有说过河上博士那样解释的意思。“劳动阶级的某种程度的组织”不一定要等资本主义行将破产，英、美两国他虽然承认有平和革命的可能，但不能作为他素所主张的流血革命的否认。“要把旧社会之死的苦恼和新世界之诞

生所伴随的流血之努力弄简单些，弄短缩些，弄集中些的方法只有一个——即是革命的恐怖。”这是他在一八四九年五月九日在《新莱茵日报》①所发表的言论。这种言论和他的《唯物史观》的见解，看来是矛盾，而实际是矛盾的统一。即是前者是“当然”的要求，后者是“必然”的研究，而他的“当然”的要求是建设在“必然”的研究上的。他并不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②一样，要蔑视物质的条件而一步升天。我们一口气说共产革命当然也不是一步可以升天的事情，马克思自已把共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我在《穷汉的穷谈》中已经说过，更把上函所引的列宁所说的三个时期（“The Soviet at Work”）两两比附起来可以得到如下的表式：

列宁	精神的准备（宣传主义）时期		
列宁	政治的战斗（征服有产者）时期	……革命的变革时期	马克思
列宁	经济的经营（经营专业）时期	……共党主义之半成期	马克思
		共产主义之完成期	马克思

把两者比附起来刚好成为四个时期，灵光先生所说的“预备时期”不消说在这儿是并不缺少的了。我们晓得共产革命要经过这许多时期才能完成，绝没有人说过主张共产革命立地就是要共产的！在这样的计画之下，我相信“时机尚早的社

① 通译《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一八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德国科隆创刊，马克思主编，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

② 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之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其创始人为俄国的克鲁泡特金。

会革命"不会有"危险"的发生，而河上博士把共产革命解释为定要以资本主义之行将破产为前提，有失马克思的本意。定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尽头才能革命，那么要到如何的程度才算是发展到尽头呢？河上博士说："这个问题有世界的考察之必要。……但是这国际的方面之研究且让诸异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文)这儿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缺陷。

总之，我对于河上博士所说的"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是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于政治革命而已"的话，我不敢赞成。智者千虑偶尔会有一失，而愚者千虑也偶尔会有一得。灵光先生，你肯以为我这些解释是我的"一得之愚"吗？你假如肯承认我这些解释，那我们慢慢地再好作前进的讨论。我的这些解释如果不能成立，也请你纠正吧，我虽然不敢自诩有揖拜昌言的雅德，但我总还不至于连豚鱼之不如。

一写又写了一个通夜。好了，看看也快要天亮了。

1926年2月19日①

〔**本集注释者：** 曾绍义〕

---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写作日期为"一月十九日夜"。

断 断 集

《断断集》小引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我结束了在日本亡命十年的生活回国。八九月间曾经把几年来写的文字编为《断断集》，由施复亮① 先生的介绍，交某新开的书店出版。结果书店没有开张，连稿本也被丢掉了。当时剔出了一部分带学术性文字，编为《沫若近著》，在一九三七年由北新书店出版。这一部分算被保留了下来。其它的都是发表过的东西，现在又收集到一大部分，有一小部分是无法收集了。我把这收集到的部分和《沫若近著》里的一部分编为一部，仍保留《断断集》这个名字。

"断断"自然有断断续续的意思，但也有另外一种古义，《书·秦誓》②"断断猗(兮)无他技"，据说是"守善之貌"(见《书疏》③)。我看这是和"无他技"连系着，大概就是坦坦白白的意思。我是采取这个意思来命名这个集子。

郭沫若 1958年12月1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十一卷。

① 施复亮(1899—1970)，原名存统，浙江金华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② 《书》，《尚书》的简称，亦称《书经》，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秦誓》系其中之一篇。

③ 即《尚书正义》，凡二十卷，唐孔颖达等撰。

屈原时代

一

一九三四年的正月尾上，我应开明书店的征求写了一本关于屈原的研究，起初本来是作为“中学生丛书”之一而写出的，但写得太艰深了一点，后来得到书局方面的同意，把《离骚今言译》加上去便让它独立了。“中学生丛书”是限于写三万字的，因此我那篇《屈原》是受了限制的东西，留在我心里的意思还有好些没有写出。特别是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是完全省略了。我现在在这《屈原时代》的题目之下，想写出关于这一方面的考察。

二

中国社会的史的发展，我在七八年前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是分析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身分制的封建社会，直到最近年代才有近代资本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六卷第二期。

发生。这个见解我现在还依然维持着的。①

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大概已经为一般所公认。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封建制的话便颇不为人所赞同。一般的人大抵狃于三代是封建制，秦汉以来是郡县制的旧观念，三代中夏殷两代已被驱逐到封建制以外去了，如把周代也要驱逐出去，就象中国是没有经过封建制的一样，于是便把周代剩下来，作为旧观念中的封建社会。把旧观念和新观念苟合一下，便生出了在氏族制的废墟上建立出了封建制度的一个奇怪的结论。

新观念下的封建制是建设在地主和农奴的关系上的，农奴和奴隶之别在前者有身体上的自由而后者无身体上的自由，前者有半个人格而后者则纯是生产工具，前者是由后者解放出来的。由氏族社会的阶段不经过奴隶制的生产，农奴无从产生。故在理论上说来既认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则周代至少西周其生产方式的主流总不得不为奴隶制，而在史实上也恰恰有铁样的证据。

殷代的宗主权被周人夺取了的时候，殷民族和其同盟民族之大部分，事实上是化为了奴隶的。《左传》②定四年明明说周成王以殷民六族给鲁公伯禽③，殷民七族给卫康

① 作者原注：这见解经过继续的研究已有变化。我认为殷周都是奴隶制，自战国以后转入封建制。

② 《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该书多用历史史实解释鲁国史书《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春秋时代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撰。

③ 伯禽，姬姓，周公旦长子。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反叛后，周成王把殷民六族及旧奄国之地分封其子伯禽，国号鲁，是为鲁国的始祖。

叔①，怀姓九宗给唐叔虞②，这些六族七族的殷民，九宗的怀姓，老幼男女，父子妻孥一道与物品同时锡予，不是奴隶是什么呢？这是典籍上的证据，还有在青铜器铭文上的证据，一向没有为人所注意，经我揭发了十几项出来。

关于金文中的证据，我在《古代社会研究》里所叙述的，对于各器年代多未确定，颇为笼统。现在经过了几年的考察，年代大多弄清晰了，不嫌累赘，我现在要把一些重要的资料叙述在这儿。

（令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令鼎）王曰“……余其舍（施舍之意）汝臣十家。”

上成王时器。

（盂鼎）王曰“……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周公簋）“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

（麦尊）“侯锡者䢼二百家剂。”

上康王时器。

（不嬰簋）伯氏曰“不嬰，汝小子，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矢五十为束），臣五家，田十田。”

上夷王时器。

---

① 康叔，周武王弟，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故称康叔。周公攻灭武庚后，把殷民七族和原来商都周围的地区封给他，国号卫，是为卫国的始祖。

② 叔虞，姬姓，名虞，周成王弟。周公灭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把唐（包括以前夏代建都的地区）封给他，并把怀姓九宗赏赐给他，故称唐叔，是为晋国的始祖。

（克鼎）“锡汝邢家槼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锡汝史小臣霝龠鼓钟，锡汝邢逷槼人耤（籍），锡汝邢人奔于量。”

上厉王时器。

以上以家为计，与弓矢土田贝物等同锡的“臣”，不是奴隶是什么呢？臣有“剢”，有“耤”，便是所谓奴籍，也就是《左传》襄二十三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的丹书。奴隶本是有等级的，《左传》昭十年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令簋》和《盂鼎》，在“臣”之下也有所谓“鬲”或“人鬲”，而“人鬲”之中包含着“自驭至于庶人”。如驭等于舆，则臣等于皁；如驭等于圉，则臣等于皁舆隶僚仆，要之必为奴隶，固毫无疑义。

最有趣味的是孝王时的《曶鼎》（时代的考察详拙著《两周金文辞大系》），那里面讲到奴隶贩卖和以奴隶赎罪的话，五名奴隶的价值抵不上一匹马，更远远地抵不上六石米。这是研究周代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料，我索性把那原铭和释文揭载出来供读者的参考。（见插图）

曶鼎铭释文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
　　　　　　　　　　　　　　　　　　　　室　王

若曰“曶，令汝更乃祖考嗣卜事，锡汝赤∞□，□用事。”
　　　　　　　　　　　　　　　　　　　　　芾，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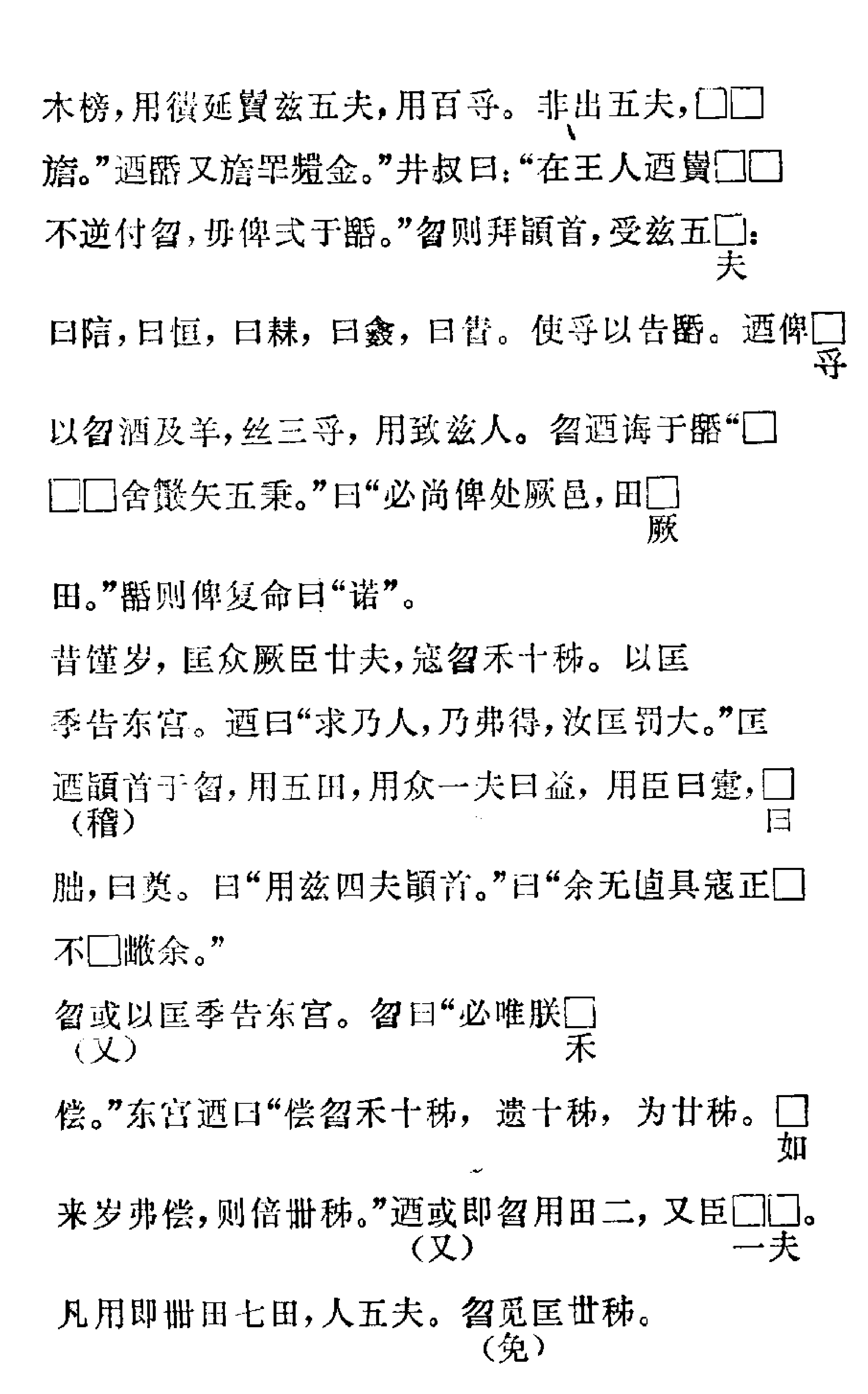
王在邅应，井叔锡曶赤金鋚。曶受休，□□
　　　（居）　　　　　　　　　　　　对扬



曶鼎铭原文影

王。曶用兹金，作朕文考䆐伯䵼牛鼎。曶其□□（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宝。

唯王四月，既眚霸，辰在丁酉。井叔在异为□。□（曶）使厥小子𩁹以限讼于井叔："我既賣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限许曰"䛠则俾我偿马，效□□（父则）俾复厥丝束，"䛠效父迺许𧶠曰"于王参门□□



木榜，用償延賣兹五夫，用百寽。非出五夫，□□
旟。"迺𠭯又旟罙𤊾金。"井叔曰："在王人迺賣□□
不逆付曶，毋俾式于𠭯。"曶则拜䭫首，受兹五□：
　　　　　　　　　　　　　　　　　　　　夫
曰陪，曰恒，曰秝，曰𩛥，曰眚。使寽以告𠭯。迺俾□
　　　　　　　　　　　　　　　　　　　　　　寽
以曶酒及羊，丝三寽，用致兹人。曶迺诲于𠭯"□
□□舍𩛥矢五秉。"曰"必尚俾处厥邑，田□
　　　　　　　　　　　　　　　　　　厥
田。"𠭯则俾复命曰"诺"。

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
季告东宫。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罚大。"匡
遮䭫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益，用臣曰疐，□
（稽）　　　　　　　　　　　　　　　　　　曰
朏，曰奠。曰"用兹四夫䭫首。"曰"余无𠧟具寇正□
不□𣪕余。"

曶或以匡季告东宫。曶曰"必唯朕□
（又）　　　　　　　　　　　　　禾
偿。"东宫迺曰"偿曶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
　　　　　　　　　　　　　　　　　　　　　如
来岁弗偿，则倍卌秭。"迺或即曶用田二，又臣□□。
　　　　　　　　　（又）　　　　　　　　一夫
凡用即卌田七田，人五夫。曶觅匡卅秭。
　　　　　　　　　　　　　（免）

铭文共分三段，第二段所记载的便是贩卖奴隶的事。虽然文字稍有残缺，但大意可以明了。是名叫曶的人先向名叫限者的家臣效父购买五名奴隶，用一匹马和一束丝。限中途变卦，叫他的家臣二人（效父为其一），一人还了马，一人还了丝。二人又约好了用现钱交易，取償百寽。但这交易又为

限所反对。屡次爽约，故成讼事。我们由这段铭文看来，可以知道在孝王时有奴隶人口之公然贩买，而交易形式是兼行着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的两种。实物交易时五人的奴隶只值得马一匹和丝一束，便是五个人的价值抵不上一匹马。货币交易时五人合債百寽，一人值二十寽。債字当是货币的意思，金文中常见，音读不可考，时常是以寽为单位的。寽即锊字，汉以来又往往误为鍰。这个字经我的考证是有两个系统的，用为货币单位时是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用为衡量单位时是重六两或六两大半两（"大半两"即三分之二两）。这儿是用作货币单位的，当是前者。一人值二十寽，用汉时的五铢钱来合算时，一个人只值得四十六文钱。

铭文的第三段是以奴隶来赎罪的事。是在一年饥馑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匡季的人率领他的奴隶二十人去偷了曶的禾十秭。曶便向王官名叫东宫的去告发了他。匡甘愿拿五田，众一夫，臣三人，来抵偿，但曶仍不满足，要他非偿还禾稻不可。东宫便叫匡"偿十秭，遗十秭，为廿秭，如来岁弗偿，则倍卌秭"。匡却又加上二田和一臣来私下了结，一共赔了七田和五人，而曶也就免少了他的罚禾廿秭，原禾的十秭当是追回了的。据《说文》①，知道"五稯为秭，二秭为秅"，又据《仪礼·聘礼》②，知道"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为一秅"。

① 《说文解字》的简称。东汉许慎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古文字学著作，凡十四卷。

② 《仪礼》，又称《礼经》，儒家经典，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旧说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但据近人研究，此书成于战国初期至中叶。全书共十七篇，《聘礼》是其中之一篇。

秭是半秅，当二百秉。“秉者把也，谓刈禾盈一把也”（郑玄[①]说），三十秭则为六千把。匡宁肯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出六千把禾，可知七田五夫必比六千把禾贱。禾一把可取米一合之谱，六千把仅取米六石。六石米之价竟在七田五夫之上。五夫约值马一匹丝一束，或價百锊，七田不知当值几何，但七田每年所出必远在六石以下。五夫各夫所值亦必远不及一石。古代田积之小与人价之贱，实在足以惊人。

象这样任意用来和马匹、丝束、钱锊、禾秭交换或抵偿的“臣”和“众”，除解为奴隶之外，还有第二种的解释吗？五人的奴隶抵不上一匹马，一人的奴隶抵不上一石粟（恐怕连半石都抵不上），得着这样明白的史实，我们能够说西周的生产方法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上的吗？

西周是奴隶制是毫无问题的！

奴隶制度在西周末年厉王奔彘[②]的那个革命的插话上便在开始动摇，但它的根蒂就在春秋中叶都还依然存在。在这儿有北宋宣和五年在临淄出土的《叔夷镈》及《叔夷钟》（旧称《齐侯镈钟》）是绝好的证明。那是齐灵公十六年（鲁襄公七年，西纪前五六六年）的器皿，叔夷[③]在灵公十五年灭莱之役有功，受了齐侯的爵赏，便作器以纪其事。那在金文中是很堂

①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毛诗》、《周易》、《尚书》、三《礼》、《论语》等先秦群经典籍，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

② 指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的国人暴动，围攻王宫，周厉王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的历史事件。

③ 叔夷，春秋时宋国人。宋穆公的后代，曾任齐国大夫。

皇的一篇文章，长约五百字，其中有两句是：

"余锡汝釐都𬴾劇，其县三百，造载徒四千，为汝敌寮。"

"余锡汝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作。"

孙诒让曾考定出① 釐就是莱（古音莱读如釐），那是确切不易的。我们由这两句看来，可以明白地知道，莱被齐灭后，他的国土成为了齐的郡县（注意：郡县制并不始于秦），他的人民成为了齐的奴隶。所谓"敌寮"，敌通嫡，是直属的意思；寮便是"隶臣僚，僚臣仆"的僚。于四千的"嫡僚"之外又有三百五十家的"釐仆"，这奴隶制的规模，不能不谓为宏大。

总之，在殷代灭后，中国的社会曾亘历过几百年是奴隶制度，由上举的一些证据看来，凡是不为先入见所囿的人，我相信是能够承认的。

三

知道西周乃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对于自春秋末年以来至嬴秦混一天下（西纪前二二一）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便可以迎刃而解。那个黄金时代的意义不外是奴隶制向身分制的转移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屈原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后半期的人（西纪前三四〇——二七八），他和他的作品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也就和浮雕一样呈现出来了。

---

① 作者原注：见孙著《古籀拾遗》上卷。〔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注释者〕

我们要晓得，周人在太王以前本是没有多么高度文化的后进民族，他们把殷朝的宗主权劫夺，把殷民族的大部分奴化了，同时把殷人的文化承继了下来。但他们的承继是有统制的承继。在周人统制下的殷人虽然陷到了臣仆的境遇，他们本来是文化上的先进，这层我们是不要忘记的。他们在周人的文化统制之下隐忍了几百年，在春秋末年他们又抬起了头来了。承继着奴隶宗主——周室之衰落和"世卿制"之逐渐废除，应运而起的"执命"的"陪臣"与"横议"的"处士"，不外是皁舆之流之高级者或地主化了的皁舆。文化的主体由后进的君子转到了先进的野人，由统治者阶级转到了被统治者阶级。当时的两大学派的领袖孔子和墨子都是宋人而居于鲁者①，他们这些人物，由周人的立场上说来，都是奴隶的子孙。近人有解释墨子之墨为劓墨之墨的②，则墨子还是刑余之人。儒家称道尧舜，主张"有德者必在位"的哲人政治，墨家祖述夏禹，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命，在当时都是反贵族的革命思想。他们都不认周人为绝对的权威，要在周人所夸耀的文武之上提出些伟大的传说人物来。他们所用的表现思想的工具也是当时的白话，这是应该注意的。凡用"焉哉乎也"为语助的

① 作者原注：《史记·孟荀列传》和《汉书艺文志》言墨子为宋大夫，葛洪《神仙传》、《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杨注》及《元和姓纂》均言墨子宋人。独《吕览慎大篇注》以为鲁人。孙诒让采后说，我看当和孔子一样，本是宋人而居于鲁。〔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著有《墨子》。——注释者〕

② 作者原注：钱宾四说，见《古史辨》第四册序。案：此说不确。墨子乃宋公子目夷氏之后。

这种文体，在现今看来虽是文言，而在春秋、战国时却是白话。周人的台阁体① 的文字如《诰》、《命》、《雅》、《颂》以及金文，“焉哉乎也”的语助几乎是绝对不使用的，到了春秋战国便猛然一变。那时候的文体的变革和近代的文学革命，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的，实在是毫无二致。

屈原本是楚的贵族，和孔墨等在北方居于野人的位置者不同。但屈原后于孔墨一百余年。北方的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的革命思潮是已经荡到了南方。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等一系统的幻想人物以及由那些幻想人物所演化出来的哲人政治的理想，他是完全接受了。而他在文字变革方面尤为接受得彻底。他把那种革命扩展进了诗域里去，他彻底地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来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地采用了方言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他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复的革命。他有锐敏的感受性，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更加上他的超绝的才质和真挚的努力，他的文学革命真真是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实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我在前著《屈原》中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这个断案我至今还是感觉着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我们如把近代的文学革命家，往往进一步便退两步的，和屈原比较起来，便可以感觉到屈原的伟大，而我们自己真是可以惭

① 明初上层官场中形成的一种文风。其特点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和颂扬统治者功德。这里作者是借以形容《诰》、《命》、《雅》、《颂》的风格。

愧得无地自容。屈原的文学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倒退，象“雅颂”体的四言格律的诗，他当然会做，然而他至死都把它摒弃了，坚守着了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彻底地创立了一个体裁。这样的气魄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人追慕而效法的。

四

屈原委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时代也真真地玉成了他，但他的资质却给与了他一个很大的限制。他以贵族的身份能够接受奴隶解放的时代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了《清庙》、《生民》① 之列，但他在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时代。

他的遭放逐是应该在襄王七年或其后的一二年中（前著《屈原》拟为六年或七年，失之稍早）。楚怀王被秦人诈骗了去，囚死了，是在襄王三年。其后三年之间秦楚断绝了关系②。到襄王六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③，秦人乘胜来威胁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襄王受不过威胁又才和秦人讲和，到第二年更做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始终是主张绝秦的人，他在生涯中所受的彻底的打击，就应该在这前后的几年内。

---

① 《清庙》为《诗经·周颂》的一篇；《生民》为《诗经·大雅》的一篇。

② 作者原注：此前后事迹见《史记·楚世家》。

③ 白起（？一前257），战国时郿（今陕西眉县）人。秦国名将。他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事，见《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

他被逐的地点是在汉北，期间有十四五年，直到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侵略楚国，把楚国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湖、江南，逼得楚国君臣仓皇奔走，东北保于陈城；屈原自己也从汉北逃到江南，做了《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在汨罗自沉了。他能够自沉是他"行己有耻"①，是他的人格过人，不象后世有好些文人一遇着威逼便忝颜事仇而歌功颂德。但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呢？以楚人对于秦人的敌忾，以他的得楚人的爱戴，他假如有实际家的手腕，我相信楚人一定会服从他的领导，抵死地和秦人抗衡。事实上这种抗战之零碎的表现，虽然史籍上没有记载，在当时一定是相当猛烈的。譬如，我们试问，白起既取了洞庭、五湖、江南，何以他又把它抛弃了？楚国的那些地方何以直到后来才为秦人所吞并？这，决不会是秦人的讲人情，也不会是白起的讲战略，一定是楚国的民众间所蜂起的巴尔奇山②式的游击战，阻止了白起的锐锋或则扰乱了他的后路，所以白起虽然得到那样压倒的胜利而终于没有立即把楚国覆灭。这儿正足以见到民众的力量！屈原虽然爱怜民众，但他却没有本领来领导民众。他被放逐在汉北的十四五年，详细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似乎是始终成为了忧郁的囚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君，是当时的一般执政者，是自己的怀才不遇。十几年的一肚皮牢骚终只好让一死来爆发。他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这儿

① 语见《论语·子路》。

② 英文 Partisan 的音译，意思是游击队。

与其说时代限制了他，无宁是资质限制了他。他假如是有实际家的本领，在那被放逐的十四五年间便应该有些准备。在这儿令我们想起了后于他六七十年的他的同国人的项梁来，让我现在且揭引一两段《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在下边吧。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西纪前二二四年)者也。……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七)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

我们请看这位项梁，他的准备，他的部署，是怎样呢？他在秦人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之下当然没有屈原所处的时代那样自由，然而他早把下层的力量认定，而且组织得头头是道了。我们再看他听从范增的计划，尊重民意，立楚义帝的一节吧。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

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把这些时代相去不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步骤来和屈原比较起来，他们的态度便全然两样。实际家能够领导民众，组织民众；诗人，其进步者如屈原，竟只能感受着民众的气势而呼号，在实践上则在时代的边际上徬徨。

屈原根本是一位诗人，他的失意正是时代对于他的玉成。假使他不是诗人，他一定不会失意。朝消极处说，只要他能"突梯滑稽，如脂如韦"①，即是所谓"幽默"得一点，他一定可以"从俗富贵"，何至于失意？朝积极处说，只要他能"悃悃款款，诛锄草茅"②，如项梁一样早作准备，他一定可以"与骐骥亢轭"③，更那有工夫来失意。假使他是不失意，他后期的作品是不能够产生的。仅仅是他的前期的一些作品，决不能在文艺史上造出一个时代来。他如顺当地做一个富贵人下去吧，即使他就做到了楚国的令尹，我想他的品格是只能够做到温文尔雅的太平宰相；或则终老在他的左徒的位置，做得一个漂亮的外交官，如此而已。时代对于他真是特别的厚待，他既禀赋有充分的诗人气质，而使他处到了国将破家将亡的境遇，玉成

① 语见《楚辞·卜居》。

② 语出《楚辞·卜居》："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

③ 语见《楚辞·卜居》。

了他成为了一个空前而且恐怕绝后的伟大的诗人。

五

我对于屈原的诘难，问"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或许有人会以为有点出轨，会以为即使屈原在当时把民众领导起来，赤手空拳也不会把白起的兵力如何。或许更会以为屈原是有先见之明，看到了这样的无可如何，所以才自杀了；因此我的求全之毁，我的仅仅把屈原看成为一个诗人，恐怕有点不合实际。在此我须得还要补充一番意见。

我们要知道，屈原那个时代也正是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递禅着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兵器，除开石器时代的遗品之外，都是用青铜铸的。秦初的吕不韦戈① 现存于世，也是青铜。铁在初见视为贱金，只用来做工农的用具。到战国末年才渐渐有铁兵出现，《荀子·议兵篇》② 上说"楚人宛巨铁弛，惨如蜂虿"，怕是中国用铁兵之始。战国末年为奴隶制与身分制的交换枢纽，同时也为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的交换枢纽。知道这层才可以明白秦始皇吞并了六国之后，何以他要"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各重二十

① 战国时秦相吕不韦（？—前235）所造之兵器。山东潍县陈簠斋收藏。

② 《荀子》，战国时荀子（约前313—前238）作，共三十二篇。《议兵篇》系其中之一。

四万斤；[1] 而陈涉、吴广等一些农夫牧竖何以便能够“锄櫌棘斤，因利乘便”[2]？原来秦人所销的是废铜，而陈涉、吴广等所使用的是铁器！

这些议论早由章鸿钊氏所揭发[3]，但我最近发现了一项史实，知道了销兵铸器的事，不始于秦而始于楚。

已经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那年的夏间安徽省寿县的东乡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淮水泛滥，发现了古物。后来该地方的人便秘密开掘，获得铜器、石器等共八百余件。其中有几个器皿的铭文上发现了两个楚王的名字，一个是酓肯，一个是酓忎。寿县本是古时的寿春，是楚国的最后的都城，是襄王的儿子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的。所以酓肯大约就是考烈王熊完；而酓忎即考烈王的儿子幽王熊悍，是毫无可疑的。现在且说有酓忎的名字的几个器皿吧。

有一个是鼎，今藏定海方氏；在盖唇和器唇外沿各有一道

---

① 作者原注：《水经注》卷四载“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今案“身长五丈，足六尺”，当是金人的长度，后人误以为长狄之长，天地间不应该有那样的长人。

② 语出贾谊《过秦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鉏櫌棘矜，非銛于钩戟长铩也。”

③ 作者原注：见章著《石雅》末附《中国铜器时代表》。〔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吴兴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创始人之一。著有《石雅》、《古矿录》等。——注释者〕

主铭。（副铭从略。）

盖文是：

> 楚王酓忎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窒铸乔鼎之盍（盖），以共胾祟（蒸尝）。

器文无“之盍”二字。

还有一个是盘，今藏北平图书馆，在唇沿上也有一道主铭。

> 楚王酓忎战隻兵铜，正月吉日，窒铸少（炒）盘①，以共胾祟。

两个器皿不用说是同时做的，所谓“战隻兵铜”的事，据我的考察，大约是在幽王三年。《史记·楚世家》于幽王三年载“秦魏伐楚”一语，又《六国年表》于同年秦魏栏内载其事，秦言“发四郡兵助魏击楚”，魏言“秦助我击楚”，但都没有说到谁胜谁负。幽王在位十年间，此外是没有战事的记载的。由新旧史料的合证，可以知道是楚得到了胜利，把秦魏的联军打败了。打战是在三年，铸器是在正月，所谓正月当得是四年的正月。同时所铸的器皿，由副铭上所勒的工名看来，很不少；因此也可以知道所获的兵铜，也相当多。但最该注意的是把兵铜销毁了来铸造器皿！可见销锋铸器，并不是秦始皇的倡始。楚国得到了兵铜，不把它作为兵器使用，也可以见得在幽王时代楚国已经在用铁兵。

幽王四年上距屈原之死仅四十一二年，幽王时已经在用

① 作者原注：少字或释为小，但观其盘制实如今之锅，与备盥洗用者不同，故释为炒。

铁兵，那么屈原时代的楚国的工农所用的锄斤一定是铁器。使用铜兵的白起所将的秦兵，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并夺取了洞庭、五湖、江南而终于抛弃了的，不是楚国工农的铁器在那儿说话吗？我相信楚国末年之改用铁兵，一定是在那次抗战上得来的教训，秦人后来采用铁兵也是一样。在那时有那样英勇的工农，屈原在他被放逐的十五六年间如早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是很大的力量吗？如果屈原真真是那样的实际家，秦楚的争霸真真是未知鹿死谁手。

总之，屈原仅是一个诗人，他在诗域内的成功是时代玉成了他，但他的成功已经是足以不朽的。

中日文化的交流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

诸位朋友：马先生① 要我到这里来讲文化。在我未答应出来之前，许多朋友以为我绝对不会出来；在我既答应出来之后，又有许多朋友以为我为什么要出来。这理由很简单。从前《庄子》上有一个故事②，说有越国的流人，离开本国后几天，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欢喜；离开几个月后，看见本国人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年后，看见和本国人相象的都高兴极了。我一九二八年离开中国，已经有八个年头，能够获得一个机会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上海《立报·言林》。

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一九〇六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王正廷任第一任总干事，一九二二年后由马伯援任总干事。会所在神田保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常在该地进行交往、集会等活动。

① 作者原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马伯援(1884—?)，湖北枣阳人。民元临时政府内务部总务司司长，不久辞职，改就基督教社会服务事业。——注释者〕

② 《庄子》，战国时庄子(约前369—前286)作。道家经典之一。故事见《庄子·徐无鬼》。

诸位见面，那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以这原故，所以我今天出来了。我和诸位见了面最好是不谈话，以心传心。但听说马先生从各位那里榨取了两毛钱入场费，不管文化不文化，似乎不讲值得两毛钱的话是下不了台的。（笑，鼓掌。）

今天选的题目叫做《中日文化的交流》。就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彼此互相发生的关系。这个题目本来很简单，但过细的说来，不说今天的一两个钟头，就是一年两年也是讲不完的。有许多大学教授要用毕生之力去研究的东西，要在一两个钟头内说完，当然是很困难的事。还有，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今天是我个人很简单的发表我的意见，值不值得两毛钱，我不敢担保，如果不值得，请诸位去叫马先生还你们的钱。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相互关系怎样，我就不说，想来大家都已经是晓得的。简单的说来，可以说是：

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

从中国流到日本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

从日本流到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结果没有十分的表现，似乎是失败了。

中国文化，假如我们用考古学的分类来说，可以说：在殷代以前是“石器时代”，殷周是“青铜时代”，秦汉以后是“铁器时代”。各时代文化的个性不同，但可以归结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这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文化是一个系统传下来

的。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国文化，虽然几次被外来民族蹂躏，经外来民族的参加，但从古代到最近百年，还是保持着一贯的传统。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全部由中国民族所自己创造的，有许多部分是由外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很有弹性，无论什么文化都能接受，都能把它消化，把它同化，这是中国民族的特色。例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特别地发达，构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而且赶过了它。隋唐时代的音乐，也并非中国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来自新疆一带。那时新疆本来不是中国国土，分成很多的小国，如龟兹、西凉① 等等，统称为西域。隋唐的音乐便多由西域传来。唐朝以来成为固有的胡琴、琵琶、二弦、月琴、横笛、洞箫等，都非中国所固有，都是从西域来的。但这些音乐为中国所同化，而生出这些音乐的国家都是早已不单独存在了。根据这些，可见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是很有弹性的。无论什么性质的文化，一入中国这个大洪炉中便消化、融化，而成为自己的东西。但是到了近百年来，和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一接触，象诸君都晓得的，中国却失败了。没有从前那样的成功，这是明白的事实。

以上是中国文化的大概。现在回头来看日本文化吧。日本民族在民族形成以前，文化的发展比中国迟缓。日本人和中国文化的接触，是在战国时代。在汉朝西汉武帝时代，朝鲜

---

① 龟兹，古西域国名，又称丘兹、屈兹、屈支、鸠兹、归慈、归兹、曲先。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　西凉，古西域国名。在今甘肃省西北部。

本来是中国的四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①。现在日本学者在朝鲜发掘，把乐浪文化研究得很有条理。朝鲜和日本相隔得很近，在西汉时代，中国文化，至少文化的下层——生产方法是和日本接触了的。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到日本。东汉更加接触的多了。前几十年，在九州福冈志贺岛上发现了“汉倭奴国王印”六个字的金印，是东汉时代的古物。这印仍在日本的黑田②侯家保存着。足证东汉时代中国与日本已经有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再根据陈寿的《三国志·魏志》③，内有《倭人传》，说日本当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其中三十多国是与魏有关系的。和东晋、南北朝也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历史上有证据的。但在隋唐时代，日本已经是成为了文化国家了。隋朝只有三十多年，到了唐代日本又有遣唐使，又派很多留学生到中国去。在唐玄宗时代，有一位副使名叫仲满④，竟留在中国不肯回去，住了五十多年。橘逸势⑤是很有名的，在旧新

① 乐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在今朝鲜的平安、黄海、京畿诸道及忠清北道等地。 玄菟，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在今朝鲜咸镜道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南部等地。 真番，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相当今朝鲜黄海北道大部分，黄海南道及京畿道北部。 临屯，郡名。汉武帝元封三年置，辖境相当今朝鲜咸镜南道大部分及北江原道北部。

② 即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明治维新时政治家。一八八八年曾组织内阁。

③ 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史学家，所著《三国志》凡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为纪传体三国史。

④ 仲满，日本派到中国的副使。因恋慕中国，改姓名为朝衡。曾任左补阙之职。

⑤ 橘逸势，唐德宗时日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后留下肄业，历二十多年，直到日本使者高阶真人来请才回。

《唐书》①中可看到他的名字(误为橘免势)，同时又有一个同样很有名的空海②(是一个和尚)，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是以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到中国留学(和我们来日本留学一样)，到了唐文宗大和元年才回了日本。他回来后，对佛教的宣传非常努力，所以到后来空海的势力非常膨胀，佛教的宣传也大大的发展，日本人称为弘法大师的，即是这位空海和尚。他把中国文化介绍了很多到日本来，对于促进日本文化的向上发展有很大的功劳。《伊吕波歌》，即用日本言语的基本音所构成的歌，俗传就是他做的。同时他和橘逸势两个人的汉字都写得很好。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晓得，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以满腔的热情来接受的。日本有名学者，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去年才逝世的内藤湖南③博士说得很好，他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硷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这是日本学者的话。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旧文化流入日本是很透彻的。当然，日本文化也有固有的成分，但说到动机和方法上来，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日本的风俗习惯都与从前的中国相同，如日本用席子，本来中国也是"席地而坐"的。还有中国有名的逸话，说梁鸿孟光两夫妇是很重礼节的。孟光非常恭敬自己的

① 《唐书》，包括《旧唐书》与《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昫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为纪传体唐代史。

② 空海(774—835)，日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后成为日本真言宗之开山祖。相传日文平假名、《伊吕波歌》均为他所作。著有《弘法大师全集》。

③ 内藤湖南(1860—1934)，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

丈夫，送食的时候“举案齐眉”。现在中国的桌子那末大，怎样能够“举案齐眉”？这在摩登的中国人看来，是很难解释的。但到日本来一看，便立刻可以了解。象下女送饭来的时候，的确是“举案齐眉”。还有，初到日本时，看见吃茶的茶具，一个小盘子里放五个小茶杯，一个小茶壶，一个茶洗，以为这是日本的固有文化。其实不然。今天在座的诸君中，一定有潮州同乡吧。在潮州，茶具和日本一样，而且茶杯比酒杯还要小。（笑）。他们滴几点茶在茶杯里就请你喝茶。可知日本茶具还是经过进化了的，长大了的。（笑）。福建、潮州到现在还保存着中国固有文化，从福建又流入日本，日本就保存了这种艺术。本来中国受了南北朝时的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满清几次的外族的统治，言语、风俗、习惯都有外来的成分。那时中国人受到外族的侵入便向南跑。所以现在的福建、潮州、广州的话很不易听懂，并非这些地方偏僻，有“南蛮鴃舌之音”①，其实要它们才真是保存了古来文化。我并非福建人，潮州人，或广州人，想借这些来证明我是中国的正统，我是四川人。（笑）。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读《诗经》、《楚辞》都已经走了韵，这不是诗走了韵，而是我们走了韵。

又譬如日本人用的袢。以一匹布来缠绕住下体的，其实就是中国古时的犊鼻袢。因为形式和没有穿鼻孔的小牛的鼻

① 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朱熹《集注》："鴃，博劳也，恶声之鸟，南蛮之声似之。"后人用此讥人操偏僻难懂的南方方言。

套绳相象。又譬如日本人吃的生鱼片“刺身”，其实中国也是有的。广东的鱼生粥，虽然不是全生，但如浙江西湖里有名的菜“醋鱼带柄”，就是全吃生鱼片（所谓带柄就是把剩下的鱼骨再烧成一样菜或煮一个汤送来）。这也就是中日文化的交流。（笑）。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由中国流到日本来，浸润得很透彻。可是，后来却完全转变了。中国与欧美一接触是失败了的，而日本与欧美一接触却收到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前，中国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后，却很不容易接受？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论时期，在接触上中国早过日本，明末西欧文化已经传到东方来了。那时已经有许多西方人如汤若望、利马窦①到中国来，已经把天文、数学传到了中国了。为什么三百年前已经传到的西欧文化，三百年后仍赶不上？日本接触西欧文化的时期很短，有些还是由中国间接传过来的。如基督教的《圣经》，日本的是从汉文转译的，这是实在的事情。那末为什么日本可以成功，而中国却不能成功？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很多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的不用说，日本，甚至西欧的学者也都在竭力的研究。现在就根据我个人的意见，简单的举出几个原因来。

第一，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土地宽大，出产丰富，而

---

① 利马窦（M·Ricci，1552—1610），原名发利南诺（Valignano），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传教，兼通中西文字。著译有《乾坤体仪》、《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等。

且人口密度也不大，人民的生活即在旧有的生产方法之下已足够维持，故对于新的生产手段没有积极的要求。因此对于新文化、科学知识不易接受。因为生产方法没有改革，自然社会的经济机构也不易变动。对建筑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文化建筑物也就没有彻底接受的可能。的确是因为地大，所以旧式生产方法仍可以应用，马虎的敷衍下去。譬如江西，虽然不是古代的中原，倒可以说是现代的中原。我曾经到过江西，看见那里有很多的地面没有开辟，旧的生产方法马马虎虎的可以敷用，因此没有促进新生产方法的Moment(因素)。

第二，中国周边的民族(例如南洋、越南、暹罗、缅甸、西藏、蒙古、朝鲜)的文化比中国低，生活要求也低，不能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几年前我经过朝鲜，在釜山住了一个礼拜。那里有许多中国商人，他们卖的东西是中国人所不用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运坏的东西来卖，而不运好的东西来卖？他们说，因为不需要。朝鲜人只要能穿一年的布，就已经以为是很好的了，他们用不着再好的。周边民族不需要中国的高级的商品，因而不能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是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三千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很有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譬如钱多在平时是很好的，但在跑路的时代便成为很重的担子。因为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动不动就往后看，而不往前看。直到现在，如湖南

省的何键①，广东省的陈济棠、古公愚②之流，都还在主张读《四书》《五经》，要以孔孟之道来治国平天下。这是接受西欧文化不能成功的一大原因。

第四，上面说过，中国文化在明末就已经与西欧文化接触，假如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三百年间，当然可以发展出一个东西来。但是，在这中间受了一大打击，就是满洲人入关，用中国的旧文化来统治中国，用明朝的办法来治理中国人。考试制度继续维持了二百六十年。在这期间，许多聪明人的头脑都陷在八股文里，许多心血都费在一部《四书味根录》③里，也有许多有反抗性的人，但仍然跳不出《五经》《三传》④。所以离开八股的只好去学汉学，象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如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⑤几位学者，他们的成功可

---

① 何键（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在《请命令学校读经以发扬民族精神而实现总理遗教案》中，公开宣称："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

②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粤系军阀，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古公愚（1884—1959），原名古直，号层冰，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教授。

③ 疑为《四书体味录》，清浙江会稽宗稷辰撰。系阐发朱熹《四书集注》的八股文范本。

④ 《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合称。

⑤ 戴东原（1723—1777），名震，安徽休宁人。清代思想家，学者。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有《戴氏遗书》行世。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等。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清代音韵训诂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之子。清代训诂学家。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

以说是很有光辉的，现在的学者还没有谁可以赶得上。然而戴、王、段等的成功，只是对旧的文化加以解释、整理，没有把中国文化推进得一步。就这样，在生产上、精神文化上，有种种的制限，在文化阶段上就落后了几百年。这几百年间中国人的脑筋是睡着的。到近来一醒来看时，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发展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就竭力的追也追不上了。

日本却根本不同。他接受西欧文化所以得到成功，是因为：

第一，日本的范围小。我们往日本的乡下去看一看，无论那儿的山巅，那儿的谷底，都是开辟了的。日本人口日日增加，如果仍用旧的生产方法，则生活就不易维持了。

第二，中国民族的要求足以促进日本生产发展。

第三，日本虽然有他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的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

第四，是日本在变革时代产生了明治天皇①，在他下面的为政者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②等，对文化的指导都很合理。那时日本对于西欧文化，是以全部热情去接受的。在那时代，对本国的固有文化看得一钱不值，更

---

① 明治天皇（1852—1912），名睦仁。一八六七年即位，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在位四十五年。

② 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政治家。奉王阳明学，曾任陆军大将。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政治家。一八七一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任参议兼内务卿。　木户孝允（1833—1877），本姓和田，日本政治家。一八七一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历任文部卿，内务卿等职。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政治家。一八八五年起四任日本首相。曾领导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

不用说对中国文化了。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日本接受西欧文化是成功了。

但在日本一般地接受西欧文化成功以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就完全变了。甲午战争①，日本在世界上现出头角之后，中国文化的方针就是学日本。以后直到今日，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学日本。有日本可以成功、中国也可以成功的观念存在心里。中国派到日本来的留学生，前后有好几十万，目前也有七八千，最盛时有一万多。中国学习日本，学习日本，学习了几十年，留学生有几十万，然而结果怎样呢？直到现在还是有几千人来学习日本。（鼓掌）。

因为中国文化历史太长，从前很自负，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百年来累次受了外来势力打击之后，中国人被人看得来连狗也不如，② 被看成为劣等民族。中国人自身也以为自己很低下，遇见外国人便叩头百拜。但其实用不着那样悲观。我自己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但中国民族确是优秀的民族。现在我举一个例子，使大家高兴一下，满足一下。德国学者康恩（Kahn）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及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出一百个头盖骨，来测量了它们的容量。现我可以把数目举出来。

---

① 指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因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海陆军进行挑衅引起。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中国战败，被迫订立《马关条约》。

② 作者原注：以前上海有外国租界时，公园门外悬着"华人与犬禁止入内"的木牌，但事实上狗可以进去，华人却不能进去。

百分比＼容量	一五〇〇 C.C. 以上	一四〇〇——一五〇〇 C.C.	一二〇〇——一四〇〇 C.C.	一二〇〇 C.C. 以下
黑　　人	〇	〇	四九	五一
澳洲土人	〇	五	五〇	四五
欧 洲 人	二七	二五	四〇	八
中 国 人	三二	二七	三八	二

C.C.（立方厘米）

根据这个表看来，头脑愈大的，中国人就愈多，而头脑愈小的，中国人就愈少。并且最大的头脑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比欧洲人少，所以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欧洲人劣等。

最后，我要表示出我的一片希望。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长时间的鼓掌）（斐琴记）

“举 案 齐 眉”

《后汉书·逸民传》[①]言梁鸿妻孟光为梁鸿具食甚敬，“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前次我在青年会讲演时提起了这段故事，说“案”就如日本现今所用的“食膳”，日本女人讲究礼节的，搬运食膳大都是“举案齐眉”。中国的食案后来长大了，要举到齐眉，非有大力士不可。

有人说我这种解法是弄错了。据说案就是椀，并不是食案。最近更听说有人在南京的报纸上做文章来讥笑我的。

这些讥笑我的人，我怕是上了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辞源》的当吧。《辞源》那部书实在有大部分并不是辞之源，要想求辞之源，应该还要去翻翻古书。

《考工记》[②]“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郑玄注“案，玉饰案也。枣栗实于器，乃加于案”。这说的案，明明是食案。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北新书局版《沫若近著》。

①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为纪传体东汉史。《逸民传》系其中记叙遁世隐居者的一类传记。

② 即《周礼》第六篇。先秦古籍中的重要科学技术著作，记述有关百工之事。

杨雄《方言》①"案，陈楚宋魏之间谓之䈰，自关而东谓之案"。这所谓䈰就是《仪礼》中所常见的棜或棜禁，都是食案。《仪礼》《特牲馈食礼》"棜在其南"，郑注"棜之制，上有四周，下无足"。《礼记·礼器》②"大夫士棜禁"，郑注"棜斯禁也。禁，如今之方案，椭长，局足，高三寸"。据此看来，无足的棜就是现今的承盘，有足的棜禁就是日本式的"食膳"。郑玄所说的"今之方案"就是后汉的食案，那是椭长、曲脚而高三寸的东西，并不是所谓椀。

这样的食案，连周代的遗物在现今都还有留存的。

胜清光绪二十七年（西纪 1901 年）陕西宝鸡县西三十里的斗鸡台出过一群古器，初归端方③所有，端方死后已经入了美国，保存在纽育的美托罗坡里唐（Metropolitan）美术馆④里。那当中几种酒器下的长方案便是所谓棜或棜禁。这是春秋以前的案。据端方的《陶斋吉金录》"高八寸，长三尺八寸五分，广二尺"，就象没有底的一个空匣。寻常的木制品，再加上杯盘，以一个女人的力量是容易举到齐眉的。

再举一例吧。两年前的夏天在安徽寿县的朱家集出了一

① 杨雄（前 53—18），一作扬雄，字子云，蜀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所著《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

② 《礼记》，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选，共四十九篇。《礼器》为其中的一篇。

③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清朝满族人。历任南北洋大臣。一九一一年奉命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至资州为起义群众所杀。

④ 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art），一称"都城艺术博物馆"，成立于一八七〇年，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

大批的铜器，是战国末年楚幽王墓中的殉葬品。其中有一个小食案，四条腿，不很高，象一条小凳子。象那样的案不是很容易举的吗？

总之，案就是案，并不是椀。讲求字源的最古的字书，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正说"案，几属"。

我们是应该信任《考工记》、《方言》、许慎、郑玄，还是去信任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呢？

解案为椀是不通故实者的妄作聪明。

“刺　身”

日本人吃的生鱼片“刺身”（sashimi洒西米），据我看来是中国传去的习惯。

有一位日本的先生调皮我，认为我这种说法是“珍无类的名说”（这是骂人的话，意思是怪透顶）。据说日本人早就在使用铁器，将生鱼切成片子来吃，用不着要待中国传来。又说“刺身”是“当字”（ateji）①，“洒西米”（sashimi）本是日本固有的语彙，并非汉音（见《东洋》杂志正月号）。

任何民族在原始时期有生食的习俗，这是不能否认的。日本民族的古代便能吃生鱼，我并不否认，但生鱼而切成薄片，配以海苔、罗服丝，拌以酱油，并名之曰“洒西米”，这种吃法，却是中国输入的。

广东潮州人吃“鱼生”也要配海苔和罗服丝，吃的方式和日本吃“刺身”完全相同。最有趣味的是吃“鱼生”时所用的酱油名叫“三渗酱”，是在酱油里面渗些醋和姜汁，故名为“三渗”。这三渗两个字在中国古音都是收唇音，应读为samsiam，潮州人是依然保存着这种古音的，但听他们说起来却是sə,siam,前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北新书局版《沫若近著》。

① 作者原注：日本固有的语汇，用汉字来勉强依附的字。

一个m音儿乎是听不见的。这sa,siam不就是日本sashimi（“洒西米”）的字源吗？

Sashimi（“洒西米”）这个字可知并不是日本所固有的字，不过如 kasutera 或者 tembura①之类而已。再隔些年辰恐怕连 kasutera 或者 tembura 也会成为日本所固有的字吧。

问题应该是“刺身”是几时传到了日本来？在这儿恕我浅学，实在说不出它的绝对年代（或者有博学的先生们能考证得出亦未可知）。我想可能是在近代由潮州传来的，也可能更早一些，潮州不过是把中国的古习保存了下来而已。潮州以外生吃的习惯废弃了（杭州尚存此习，但不普及），收唇的古音也多失掉了，“三渗”这个称谓变成了别地方所说的“三鲜”，成为了熟食的羹名了。

收唇音在中国境内还被保存着的只有广东和福建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外则有越南和朝鲜，这是一般语言学者所知道的。但在日本的所谓“训读”里面却也保存了不少的收唇音，让我顺手举几个例子在下边吧。

	中国古音	日本训读
暗	am	yami
衔	xam	kamu
嵌	kam	hame
甘	kam	ama

① 作者原注：日本人叫鸡蛋糕为 Kasutera（卡斯德拉），这是葡萄牙文Castella的音译。又油炸鱼虾之类叫 Tembura（吞布拉），可能是 Tempera（胶质颜料）的音变。

签	kam	kami(纸)
鉴	kam	kagami(金鉴)
今	kim	ima
沁	tsiam	shimu
苦	tsiam	toma
染	ziam	somu

这些我相信不会是偶合。加上这个 sashimi，可又是收唇音被保存于日本的一例。此外如三弦，古音读 samxien，流入日本便成为“三味线”（shamisen）。日本人称“三郎”为“saburō”，读“三六十八”为“sabu-roku-jiuhachi”，sabu-都是 sam 的音变。

总之，sashimi 是由 sa，siam 而来，即是日本的“刺身”是中国传来的吃法。我这种说法或许会成为名实相符的“珍无类的名说”吧。

1936 年 2 月 2 日夜

水与结晶的溶洽

这本是二月四日写给某君①的一封信，写到中途不记得是被什么事情打断了，没有写完。后来把某君的地址也丢掉了，连消息也没有通。朋友们见了我这封残信，说可以拿来公开。我顺从了大家的意思，特补写出这几行以明原委。

1936年10月14日

某某兄：

接到你的信已经五天了，因为要等《盍旦》②四期，所以直等到今天才来回答你。《盍旦》，今天接到了。周金的批评③我已经看过。我现在拉杂地写些意见在下边，如可用时，便请摘要发表吧。　　郭沫若　2月4日

我那次的讲演为时间与环境所限，有许多的话，没有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质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① 最初发表时为"孙席珍"。孙席珍(1906—1984)，浙江绍兴人。作家。

② 综合性月刊，主编管舒予、齐燕铭，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北平创刊。

③ 指周金《评郭沫若讲〈中日文化之交流〉》一文，载《盍旦》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出。《国闻周报》① 所载的记录是从《留东新闻》② 转载的，那篇记录和我的原辞大有距离。《东流》③ 上另有一篇比较正确一点。周金先生假如看到了《东流》上的那一篇，或许可以减少一些忧虑吧。

等质的文化容易溶洽，如清水之与浊水。异质的文化不易溶洽，如水之与油。我的讲演所包含的不外是这个命题，而且记得当场也曾说过和这约略相同的话。然油与水并不是完全不能溶洽，用高度的压力可以使它们生出Emulsion（乳融）。这高度的压力便是 Revolution（革命）。而我十年来所关心的、所主张的还不仅只是这水与油的溶洽，而是水与结晶的溶洽。《东流》的记录最后的几句：

>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这儿所呼唤着的便不外是要溶洽水与结晶。

“接受资本主义文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过去”。在中国目前是应该如何接受。有人主张“中国本位”的，这是半封建的意识。有人主张“全盘接受”的，这是买办意识。我们

---

① 综合性周刊，上海国闻周报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停刊。

② 综合性周刊，东京留东新闻社编辑出版。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东京创刊。

③ 文艺月刊，主编林焕平。一九三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自第二卷第一期移至东京出版。一九三七年七月终刊。

目前应该“批判地”来接受，接受遗产中的精华分子。要说没有接受的必要，或那样的问题是过去了，那却不免犯了点子Kinderkrankheit（幼儿病）。

我要请周金先生安心：我从不曾“把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抹杀”过，更从不曾“完全从历史唯物论走开”过。就如周金先生所说“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背了千百遍，结果也是枉然”的一样，我们须当把一切的资料占有起来。向公式的归纳也好，由公式的演绎也好，总要求公式是正确的公式。好在我们的先觉者们已经替我们归纳出了好些正确的公式来，我们目前就来做一个忠实的“公式主义者”，也是可以不必怕人笑话的。精确科学的数学，不是经常在使用公式吗？……

（下缺）

斗牛国的牛

西班牙自今年二月的国会总选举 人民战线①得到了大胜，政权便归到了左翼政党的手里，人民的权威逐渐地树立了起来。

七月十八日不幸有不明大义的军人在摩洛哥叛变②，率领着外人部队和摩洛哥人部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去进攻他们的祖国。人民平时养蓄军队，本是为的保卫人民，保卫国家，然而结局只是一场骗局。耗费着人民的膏血以保卫人民、保卫国家为职责的军队，其实只是寄生在人民身上的少数特权阶级的走狗。在特权阶级为人民所不齿的时候，他们便要来屠杀人民，破坏国家了。这是有阶级存在着的国家的通病，倒不限于一个西班牙。然而西班牙的人民毕竟是可以钦佩的。

西班牙军队的叛变本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女子月刊》第四卷第十期，原题《西班牙的精神》。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① 西班牙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共产党、社会党、全国总工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等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组成。二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

② 指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西班牙长枪党头子陆军将领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和参与下在摩洛哥发动的叛变。一九三九年三月，叛军攻陷首都马德里，西班牙遂落入佛朗哥独裁统治之下。

在保卫特权阶级而破坏人民战线的团结。在摩洛哥起了叛变之后，北部国境也起了叛变；据最近的消息，连马德里德首都的军队也同时响应过，但顿时便被镇压了。这计划和组织倒也不限于西班牙一国，而是有普遍于世界各国的倾向。在欧洲方面，国际上目前是划为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汎系的意大利，纳粹的德意志，是在明里暗里地援助叛军的，人民战线是他们的共同的仇人。他们把飞机、战舰、军火、军人去援助叛军，又利用各种宣传机关替叛军作有利的宣传，因此叛军的势力颇为雄厚，而战况的真相也不容易明了。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相信的，便是政府兵，即人民战线的义勇军，是英勇无敌的。

西班牙政府对于叛军是以人民义勇军来对抗的，从军的多是工人、市民，甚至有多数妙龄的女子。他们临时被组织起来，全凭自己保卫祖国的赤诚，和叛军作殊死战。溯自叛变之起，迄今已有五十多天了。一方面是有组织有训练的正规兵，另一方面是临时被组织起来的人民大众，这拿常识来判断，无论怎样是该由叛兵得到胜利，首都马德里德早就应该落在叛军的手里了。然而叛变以来已经五十多天，战线的情形依然没有如法西斯纳粹者流所期待着的那样的发展。否，反而是人民愈相信左翼，他们最近更把政权依托给泥水匠人出身的“西班牙的伊里奇”——加伯列罗① 去了。

---

① 即弗朗西斯科·拉尔果·卡瓦列罗(F·L·Caballero, 1869—1946)，泥水匠出身，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全国总工会领导人。一九三三年西班牙大选后，政治态度进一步左倾，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报刊曾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内战期间任首相兼国防部长。

据最近日本报纸的消息，北部战线伊伦要塞的陷落大概是事实。因为那叛军的惨无人道和人民的壮烈行为，不是人可以想象得出的，也不是日本的新闻记者所乐于想象的。我现在把那大概的情形译述在下边吧：

四号的清早北部叛军领袖摩罗手下的约有两个联队的兵，由圣马霞尔炮台攻进了伊仑市，市民各户都顽强抵抗。到了万策俱尽时，大家在家中安下炸弹或者把洋油桶抱进屋里，用火点燃，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拥有一万二千人的伊仑市在仅仅两个钟头之内，完全化为灰烬。

当叛军攻到伊仑，在离伊仑与法境安德间的国际桥有二百码远的时候，有老弱男女的大众各挟着包袱向法国境内逃难。不问是道路，是河川，是铁道，都一律象洪水一样向法国境内流。等到叛军一到，那些惨无人道的叛军，竟对于这些难民，由四方八面来用机关枪扫杀。叛军通过国际桥的时候，把桥上的难民象小石子一样挤下了河去。

以上两节是我从日本报纸上的摘译，这我相信完全是真实的事情。日本报纸一向是袒护叛军的。日本人忌讳“革命”这个字眼，平常在报章上是不使用的，偶尔出现于进步者的笔下，发表时都会被编辑把它改成“××”。然而这次对于西班牙的叛军是一律称为“革命军”。他们的“革命军”那样的残忍，而义勇军那样的壮烈，这决不会是他们所乐于想象的事情。

朋友，你读了上述的消息是有怎样的感触呢？让我率直地说出我自己的感触吧。西班牙是有名的斗牛国，历年的斗牛壮士骑在马上持着枪矛和狂怒的牯牛决斗。成功是把狂牛

屠倒，失败是被牛角穿破心肝，然而屠牛的壮士仍屡年不绝。西班牙的人民大众目前正在大规模地斗牛。人民战线正决心在和狂牛决斗，虽然象伊仑那样有时也肝脑涂地，被牛角穿死，然而狂牛终竟要被屠杀的。

有抱炸弹、抱洋油桶与敌同归于尽的这种精神，我相信西班牙人民终久会得到解放。但是在这儿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华北事变吃紧的时候，有一名大博士① 提出了把北平作为无军备的文化都城的建议。这好象是在爱护文化、爱护北平，而其实是投降主义、秦桧主义！试问执行了秦桧主义的南宋，结果是怎样？

1936年9月7日草

① 作者原注：此人即是胡适，当年向日本人摇尾乞怜，今天已经受着美国人豢养。

青年与文化

今天是明治大学的同学，要我来讲演。

讲演的题目是《青年与文化》。

今天只能很轻淡的、很简略的说几句，因为有许多话是不能说的。现在要讲的问题，第一，青年是什么？其次，文化是什么？再就是文化与青年的关系，现阶段的文化危机，和青年对于文化的使命。

青年是什么？这也许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普通都是把那十岁以下的人，当做幼年；十五岁以下当做少年；二十岁左右便是青年；三十以上是壮年；四十以上是初老；五十以上是中老；六十以上，便是天下之大老了。

所以什么叫青年，本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在不成问题的地方，往往便会生出问题来。因为这当中还有许多例外：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秃头，就成了老头子；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做早老症（Progeria）。这是因为松果腺的缺陷所发生的变态。反过来却还有一种人，从生下地来，一直到老年，到死，都还是婴儿状态，这种叫做婴仿症（Infantialism）。这是因为脑下垂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体的前叶有了疾病的缘故。从这种情形看来，普通的所谓年龄，是不能判定人的年青或年老的。这还是许多变态的现象，还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病态，有的人一直到死，都还是青年的；有些伟大的人物，如象德国的歌德便是一个。他在七十三岁的时候，还要和一位十七岁的姑娘恋爱。他的伟大的名著"Faust"(《浮士德》)是在八十二岁才完成的。据这样看来，年龄是可分成生理上的年龄和精神上的年龄两种。虽然没到老年而精神已经衰老了的人，我们也可以叫他做老年；但是许多前进的人，不怕到了七八十岁，他在精神上，却还是个青年。

我们都晓得，宇宙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东西，便是显示着波状曲线前进的。起初是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顶点的时候，便又会下降。我们人类精神的发展，也是一样，发展到了一定的顶点，便又会下降。我们人的一生也正是这样，由幼而壮而老而死，正是一个波状曲线。但这曲线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形状有种种的不同。象刚才说过的歌德，是象他于女性中所希望着的"永远的母性"一样，他是永远的青年，他的精神是永远向上发展的。那在曲线上的表现，是上升到极致点的阶段，高而且长。所以要说青年是什么，那就应该说是，是在波状进展中向顶点发展的那一个阶段。这精神向上发展的这个阶段，便是青年。

再说什么是文化；文化这也是普通人都很了解的。不过普通好象一提到文化，总觉得便会染上了唯心的色彩，总以为文化都是精神的唯心的。如象德国的学者，便把科学分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

把关于人文一方面的东西，叫做文化科学，把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如象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作为自然科学。这样把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对峙起来，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这许多研究物质的科学、进步的科学，都是我们的文化，或者从某种观点上来说，这些才是真正的文化。所以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化。我看这是应该从发生史的观点来看，那就是：人类的劳动对于自然的不断的征服。

五、六年前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北京人"① (Sinanthropus Pekinensis)，这比往年在爪哇发现的"直立猿人"②(Pitanthropus rectus)，要稍微迟一点，然而据学者的推测，这些猿人离我们已经有十五万年的历史。这些十五万年以前的猿人，也有他们的文化，曾发见他们有用火的痕迹，有用石器的痕迹。这火和石器便是我们人类克服自然的最初的武器，也是人类文化的最初记录。我们人类的文化，就是这样，是从克服自然开始的。但是文化是进展的东西，这文化的最初形态，也是和小小的单细胞一样。慢慢由最初的原始的简单形式分化起来，集合起来，扩大起来，便形成了我们今日的文化。它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没有间断，直到现在，它的

① 亦称北京猿人，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化石。一九二七年首次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又由我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头盖骨。据研究"北京人"约生存于四、五十万年以前。

② 亦称"爪哇猿人"、"爪哇直立猿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猿人化石。1891年由荷兰人类学家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州（Medium）特里尼尔（Trinil）地方发现，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其特征介与猿与人之间。

规模是更宏大，范围是更深远了。因而在古时看来是文化的，在今日看来已经是非文化。文化始终是进展着的。从原始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一直到铁器时代，文化也是一步一步的呈着波状的进展。这种进展，就好象连峰一样，一个峰头接上一个更高的峰头。现代的人类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高的阶段；还不单只是这些，因为这儿还有一个生生不已的动的倾向，便是包含有向更高一个阶段发展起去的那种努力。所以要问文化是什么，那便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高阶段而又有发展向更高阶段的劳动成果。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青年与文化的关系。青年是人生向上的一段期间，文化是人类始终向上的一个过程，在这儿我们看到青年是文化发展的契机，可以说世界所有的一切文化，都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在以前还没有阶级的时代，在氏族社会的野蛮人中有吃老人的习惯。把老了没中用的人，把他们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吃，就和日本人吃生鱼片一样，这种办法叫做“升遐”。这在原始时代，因为老年人不能劳动，对于征服自然已没中用，所以才这样对待的。其后呢？其后是有寄生阶级和生产阶级存在了。造者不享，享者不造。寄生的年纪纵老虽没有被吃，而生产的年纪一老依然是被吃。奴隶时代、封建时代，那是不用说的。就是在资本制度下的我们今日，只要把眼睛睁开看看，凡是生产者，不是年纪一老便在被人吃吗？工人和勤劳大众在年青时被人榨取，一到老衰，便一样地只好“升遐”。

说到文化是青年人创造的这一点，在欧洲是有统计的，大

凡伟大的文学、科学的创作和发明，都是三十前后的人的成就；老而不衰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在青年时代，就应该努力。我们要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

现阶段的文化，是从五十万年至少十五万年前的猿人时代的简单的文化进化而来，这当中的过程，如要细细说来，不要说一时说不完，恐怕就是说到我成为天下的大老，说到我死的时候，都是说不完的。不过我们要晓得，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它是逐渐扩大的，从家族扩大到氏族，更扩大而成民族国家。有人说我们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①是一部流血的历史，这就是因为扩大的斗争的关系。文化是不断的进展，不断的向更大的一个目标扩大。由小的集团向着大的集团，向着更大的集团。我们今日的文化，是向着更大的集团发展着的，已经由过去的家族、民族，发展到了民族国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但是我们现在更应该放大眼光，看得更深远些，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趋势，要把全人类打成一片。刚才讲过，文化是波动的进展，是连峰形的，目前资本主义的文化，确实是文化进程上的一个高峰。但在人类整个的文化之大的进程中，这个小的部分，是在后退了，它翻过了顶点，在倒拉住人类精神的前进趋势。这个后退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现在涨漫了全世界。譬如说德国，德国的纳粹，用纯粹民族的口号，排斥异民族，排斥犹太人，连爱因斯坦②那

① 指清朝乾隆时钦定为正史的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

② 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生于德国，一九三三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

样的学者都被驱逐到国外。爱因斯坦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是永远不朽的，而德国纳粹的行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老实说，世界上无论那一个民族，绝对没有什么真正纯粹的，就是我们中国，固然分汉族、满族、蒙族等等，但汉族也不是纯粹的汉族，满族也不是纯粹的满族。象德国这种纯粹民族的口号，是骗三岁的小孩子都骗不到的，然而他们却用来对于人类文化伟大的导师，加以惨酷的迫害。不只是德国，意大利和目前的西班牙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我们一个人，若不把眼界放大，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个人对自己本来很容易处置，不高兴生活下去，拿起一只手枪，乒的一声，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能够自杀这或者是我们人类的独有的大本领。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文化也同样是可以自杀的。当前的文化，确实遇着了重大的危机，一不小心，便会使这波状跃进的连峰，急转直下地趋于毁灭。美洲的马雅文化①之被毁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日飞机大炮，固不待说，化学兵器、细菌兵器，更有许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兵器，对于这一切，若不用理智来领导，恐怕现阶段的文化，会一落千丈地遭到大毁灭。

今日已有很多的前进思想家，起来拥护文化。去年已在巴黎开过了第一次文化拥护的大会，想来在座的诸位，都是晓得的。今年又在伦敦开第二次大会。但不幸的，是许多文化

① 位于墨西哥东南部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一带的马雅人所创造的古文化。发祥甚早，公元初，已有象形文字出现。其他如天文、数学、建筑、雕刻和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十世纪后开始衰落，十六世纪时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

的导师，一个个先后逝世，如巴比塞①、高尔基和我们中国的鲁迅。这些导师一个个的离开了我们，是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很大损失！

说到今日青年对于文化的责任，这不用说是异常重大的。我们晓得文化本是有向前发展的趋势的，可是到了我们今日的现阶段，却遭遇到异常的危险。人类的一部分在发挥着他的退回无文化状态的兽性。这两个倾向正抗争得异常激烈。今日的青年，特别是今日中国的青年，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把文化由危机中救起。我们要爬上更高一座山峰，不要跌落到无底的深谷。现在非文化的努力，扼制着全国，全世界，我们应该起来反抗这种扼制，和这种向无文化状态退回去的兽性奋斗。这也就是克服自然的努力，克服暴力的努力。这层便是今日的青年的责任！

我要告诉你们：今日的一切事，是只有靠自己来努力！我们应该认清文化的去路，把握着这种路线，负起这使命来！

我要告诉你们，这时候我们应该克服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来发挥集体精神；在集体的力量中，把自己的存在，光大发皇起来。只要大家不肯向那退回无文化状态的兽性投降，肯热心，肯认真，将来的文化是有希望的。目前这悲剧的时代，自然是难处的。有好些不觉悟的青年，特别是到日本来的留学生，依然在醉生梦死。这不少的人，听说每天晚上都要到舞场去跳舞。这种享乐的个人主义者，简直不是青年；这种醉生

① 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著有《火线》、《光明》、《斯太林传》等。

梦死的东西，真是死了的王八蛋！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的态度，是觉得一切都没有办法，总以为个人的力量是不中用的。这种错误观点，依然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消极表现，因为他不干就不干，干就干到底，就是英文所说的 All or Nothing(不全则无)。这态度是应该纠正的，不是干就干到底，不干就不干到底，而是随时随地都要干！个人都在以集体主义的精神努力，那努力的成果总汇起来便足以转移时势。个人向集体没入不是消灭自己，而是扩大了自己。也还有一部分人太虚骄，口头说得悲歌慷慨，实际上一点本领也没有，一切都是假的！

时至今日，我们要虔诚地在各方面认真的干！

要有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有抬起头来的一天！

最后我对大家说，我希望大家认清楚：

我们要使青年永远文化化；

更要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拓生记

这篇讲演，当时说得很侷促，有不少的日本宪兵刑士在场，有好些话还没有说尽。譬如波曲线的那种自然趋势，文化便是要克服它的。个人的文化化便是要克服那种趋势，文化的青年化也便是要克服那种趋势，便是要使那波状曲线成为向上的无穷曲线。拓生的记录经我检阅了一遍，更补写这几句。

郭沫若 1936 年 11 月 10 日

旋乾转坤论

——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

自来男子对于女子的要求有所谓“贤妻良母主义”。这主义如单就字面上来说，是无可非难的：因为妻而求其贤，母而求其良，是应该的事体。问题倒应该是那“贤”和“良”的标准——究竟要怎样才算真正的贤，怎样才算真正的良。

象古时候的“无违夫子，以顺为正”①，或“夫死从子”②、“母以子贵”③的那种妾妇之道，那似乎连妻和母的资格都还说不上，当然更说不上所谓“贤”，所谓“良”吧？然而那样的以脂粉奴隶而兼家庭奴隶的妻母，却正是古人乃至一部分的今人所悬想的“贤妻良母”。这样的妻，这样的母之所以“贤”，所以“良”，大约是因为她们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比起娼妓和奶妈来要经济得多的原故吧？

可怜数千年来的女子就受了这“贤良”两个字的买贿，做了一辈子的义务娼妓、义务奶妈而不自觉。有妻之名而无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妇女生活》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①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② 语见《仪礼·丧服》。

③ 语见《公羊传·隐公元年》。

之实，有母之名而无母之实，抚养出来的公子少爷们自然也就是些视妻为娼、视母为奴之辈。他们苦心孤诣地想把女人的运命束缚于终身而兼世袭的义务娼妓兼奶妈之位置而美其名曰“贤妻良母”。而这“贤良”的醍醐味直到现在似乎又把往日的娜拉① 灌醉，唤回“木偶家庭”去了。听说中国有过一位在外国受过教育回来的高等女性，她在现世界所流行着的——其实就是“贤妻良母”所养育出的——“复古与独裁势力下”，要指示出“妇女的立场”，叫妇女们“安心的躲在爱人怀里来发展母性的伟大功能”。她“承认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平等”，要把从前由男子向女子所要求的“吃苦”，转变而为女子自身的“志愿的吃苦”。——这位女士真是发挥尽了她的“母性的伟大功能”，我想，普天下的“纳粹”男子怕都应该向她高赞五万遍Ave Maria（福哉，玛丽亚）的吧！

一口气说“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平等”，似乎是很合乎科学，但其实有什么“不平等”呢？男子和女子的起源，不同是一个胎元细胞吗？更说得明白一点，不同是一匹精虫和一个卵细胞的拼合吗？这点是天经地义，无论是孔夫子或孔夫人，无论是拿破仑或约塞芬②，都不能形成例外。

自然，男女是有性的不同。但这不同，不应该皮相地在既

①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所作《玩偶之家》（又译《傀儡家庭》、《娜拉》）中的女主人公。

② 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约塞芬（Josephine Bonaparte，1763—1814），拿破仑的皇后。

成的男女身上去求，而应该在那同是一个混沌的胎元细胞上去求。假使那些倡导男女不平等——就是说男尊女卑——的人，肯向这一方面的科学去探讨一下，他会惊异，人虽同是受生于父母，受自母者男女等量，而受自父者女的却比男的要多一样东西。——这层凡是学过遗传学，留心过性的判别之起因的人是谁都明白的。我现在不妨粗枝大叶地，图式化地，介绍一下吧。

本来我们人的体细胞，在细胞核中是有四十八个染色体的，这东西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得出来，四十八个在其形状大小上是形成二十四对。然而男的却要少一个，便是第二十四对是奇数。在体细胞之外有职司生殖的生殖细胞，便是女体的卵细胞和男体的精虫。这两种细胞所含的染色体数，却和体细胞有异。卵细胞是只有二十四个染色体的，即是体细胞的所有数之折半。男体的精虫却有两种：一种有二十四个，一种有二十三个。二十四个的一种和卵细胞相合成为四十八个，便产生女子。二十三个的一种和卵细胞相合成为四十七个，便产生男子。

女子要比男子多一个染色体，这点便是男女性的先天的差异，而那所多的一个却是从父体传过来的，这不是很可惊异的事体吗？

古人说："阳数奇，阴数偶"①，在这儿是得到了科学上的证明；但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②，则应该反过来说，是

---

① 语见班固《白虎通·嫁娶》。

② 语见《易·系辞上》。

“乾道成女，坤道成男”，如更要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①的话，那普天下的男子倒是应该“回到厨房里去”的！

我真是有点奇怪，我们中国人闹维新革命已经闹过了半世纪以上，而社会上的一般漂亮人的主张，却多是毫无科学的常识，而只把几千百年的陈腐老调搬出来谱以钢琴。就如那位主张“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士吧，听说她一进四川，便把四川人卑视得来象石器时代的人种。然而居今日而唱着那样“安心的躲在爱人怀里”的甜沃沃的蜜汁水粉论，说句不客气的话，倒有点象是还没有达到石器时代的水准的大猩猩(Gorilla)社会里的歌调。因为大猩猩社会正是以一雄而御群雌，雌者是只伏在巢穴里“发展母性的伟大功能”的。

男女除掉性别外，我不相信在智能上有什么“不平等”。自然也有些生物学者要把女人看成为别一种的下等动物，这是人性中的雄的大猩猩的说话，并不是真实的生物学在说话。生理学告诉我们，女子反是得天独厚的。女子的体魄，无论在生诞比率与年龄比率上，都表现着有比男子更强韧的抵抗力。独于智能，自有历史以来，总表示着有大相悬异的高下，我相信，这都是后天教养的结果。女子的性能是受着了束缚，没有得到应分的发展。而那贤妻良母主义便是自男性中心社会成立了以来——约略也就是自有历史以来——束缚着女性的铁链。

自然，女子也有她的生理上的天然限制，除开少女期便不

① 语见《易·系辞上》。

免有月事的纠缠，而她如不为人妻则已，既为人妻则不免要生儿育女。这些从冠冕处说自然也就是“母性的伟大功能”，是女子所特具的本领而为男子所绝对办不到的。然而由这种天然的限制所招致的女性的痛苦，就由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说，都应该使其尽量的减少，或用科学的合理的方法来使其效能扩大，不应该在天然的限制之上还要加以人为的限制，而增加其痛苦。

就拿生育来说吧。怀妊、分娩的那一联的工作，自然非母性不能。然而在分娩以后，儿女不必一定要仰仗母性的。就连哺乳也没有母性的一定的必需。美洲的一位农妇一胎产了五个女儿的新闻，想来在中国也一定是传遍了的吧。那五个女儿由一个公司把她们收买了起来，作为满足人的好奇心的活宝，用着周到的方法来把她们抚养着，近来都是长得十分健康而美好的。这是儿女的抚育不必一定需要母性的无上的证明。那五个女儿假如听其自然，让那一位贫穷的农妇哺育下去，要求她们能够活周全，恐怕都是很难的事。这不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实地示教吗？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如真是走上了理性的轨道，一切的施设都是以人为本位，我想儿童公育早就是应该认真实行的。儿童公育不仅是解放了女性，而且救济了儿童。在公育上如果是使用褓母，那一个人的母性更可以发挥成十个百个人的母性。这公育也并不是近代才发现的理论，在古代希腊的斯巴达，已经是实行过（虽然并不周到）而且收到效果的。对于古调有偏爱的人，不妨把眼界放宽一点，来唱唱这项有益的古调吧。

因为女子有天然限制的生育，便把一切家庭的杂务都专属之于女子，这不是母性的发展，而是母性的虐待。爱用鞋底皮来代替脑皮的人，总以为割烹缝纴之类是女性的天职。那些妄人动不动便在呼唤着女性“回到厨房去”，说厨房是女性的天国。那些家伙都是睁眼瞎子，他们竟没有看见普天下的厨房司务和成衣大师都是男子在干的！

或者有人会说，女人须得生育，这是很苦而且是有功劳的事件，所以应该让女子在家安息。单拿中国的“安”字来说，不是以女居屋下为安吗？这也是一种用鞋底皮代替脑皮的骗人的说话。其实家庭杂务所费的精力，据学术的调查结果，要赛过任何女工工场的十小时以上的工作。自然这是以中流以下的家庭主妇，不用女佣，即以一人操持家政者来说的话。中流以上的太太、少太太们，呼奴使婢，坐在家里抱着爱犬呆打孩的自然是例外。然而那种勤苦的家庭主妇，不正是贤妻良母主义者所悬的鹄的吗？而那劳苦是苦过女工！这正证明了那贤妻良母主义是怎样的一场骗局！这场骗局的陷害而且还不仅是属之于女性的。我们试把这种主义发展得最完备的我们中国民族来想想吧。我们中国的女子教育在先年是闹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的。根据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公例，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种环境制度下的女子，有才者便不适于生存，而无才者则反是。这在事实上也有丰富的证明，便是古今来的才女多是郁郁一生而夭死。这儿是有严厉的人为淘汰存在着。淘汰既久，则才女的遗传因子逐渐消亡，不才女的遗传因子便形成独占。这结果是使人类消亡了一半以上的良

好的遗传因子。男体细胞的染色体，由母体来的是要多占一个的，染色体便是遗传因子的串珠，多一个不才的母体染色体，便多一套不才的遗传。由女性的退化便必然地招致男性的退化。如此传衍下去，一代不如一代，自然会招致人种或民族的整个的退化。我们中国民族在精神生产上的落后，在这儿不是可以找着它的一个原因吗？贤妻良母主义之害，充其极可以至于灭种，这实在是比什么洪水猛兽还要厉害的。有富于奴性的母亲，自然会产出富于奴性的儿子，儿皇帝汉奸已经层出不穷，我们难道还要加工制造吗？

现在如果真有意思为我们民族的前途设想，我看与其再翻贤妻良母主义的灭种老调，是应该来提倡一下贤夫良父主义的时候了。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声音不仅在男性中没有人提出，就连在女性中也没有人提出。好，就让我来占有这个提议的优先权吧。我希望天下的为人夫、为人父者都真正的贤良起来。自然，我这种提倡，也并不是要向男子提出“男三从”，叫他们“在家从母，出嫁从妻，妻死从女”，也并不是要向他们宣传“妾公之道”，叫他们“无违夫人，以顺为正”；我是要叫他们放开眼界为民族或人类的前途着想，要他们尊重妇女的人格，而同时也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男女应该以同等的人格相对待，互相尊重，互相玉成，以发展各自所禀赋的性能，不应该有片面本位的片面义务，以招致无形中的负号淘汰。男子该享高级的文化创造之乐，女子也该享高级的文化创造之乐。女子当为必要的生活服务，男子也当为必要的生活服务。事实上男子在尊敬女子的时候，他是乐于去代替女子服

务的。《西厢记》①上的张生告诉我们，他如能和那“多情小姐”崔莺莺“同鸳帐”，他可以不要那小姐的红娘丫头“叠被敷床”。普天下的男子凡是在恋爱的时候，他的“卑己自牧”的情怀都不亚于张生，而他的“叠被敷床”的本领也本来并不亚于丫头。真真以妻为妻、以母为母而时常怀着爱慕与尊敬的人，我相信他是决不会那样高傲地来唱着所谓“贤妻良母主义”的。因为女人由其生理的天然限制，本来就具有谦和的性质的，而为男子者还要从而“贤”之，“良”之，那实际是奴之娼之。这绝不会是尊重别人人格而同时尊重自己人格者所应有的事。这结果不仅是使妇女退化，使子孙退化，而终至使全人类全民族退化，那样的朕兆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倒不是故意夸张，来危词耸听的。

我提倡贤夫良父，当然我也并不要求愚妻恶母。以人格为本位的真正的贤妻良母，我是极端渴仰着的。妻而求其贤，母而求其良，也和夫而求其贤，父而求其良的一样，是应当的事。再者，人格本位的贤妻良母也就和人格本位的贤夫良父一样，也并不是怎样悬拟过高的理想。在现阶段上我们对于女子的要求是希望她们尊重自己的人格，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博得男子的尊敬心，更进而化育男子使他们成为贤良的人格。这层不是一味的退撄，也不是一味的浮夸可以博得来的，总要有点坚确的实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应该老早让它过去了，照现代的意识说来，应该是“女子有才便是德”。真的，

---

① 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元代王实甫作。

凡是真正有才能、有学问的人，不仅是女子，都是很谦和的，都能够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真正觉醒的女子是该在实质上求平等，而不在皮相上求平等。不虚骄，不浮躁，坚实地向着正确的目标，一步一步地修养自己，锻炼自己，而同时牺牲着自己；并使接近自己的人，也让他们坚实地向着正确的目标，一步一步地修养自己，锻炼自己，而同时牺牲着自己。就这样在人生舞台上共演着“人类解放”的悲壮剧，互相调剂，互相玉成，在不久的将来总有达到理想局面的一天。

以上拉杂地写了一些，似乎太空洞，而有些地方又有点象矫奇。然而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是可以了解我的意思的。具体的办法就让读者替我补充吧，而这补充不仅是要靠着文章，而且是要靠着行为的。

1936年12月7日作

〔**本集注释者**：《屈原时代》 肖远强
其 他 陈彬彬〕

羽 书 集

改编小引

《羽书集》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出版后不久，香港为日寇占领，版被毁。另一种是一九四五年重庆群益出版社版。重庆版比香港版少十七篇，因为把它们编入《今昔蒲剑》里去了。现在的改编本又从重庆版中删除了三篇，按照写作年月的先后，重新排列；最后四篇是从香港版中抽出编入的。旧版分为了若干辑，现在也不分辑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下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所写的东西，有好些是“言不由衷”的。为了敷衍反动派，不愿意说的话有时说了，愿意说的话多没有说，或者说得非常隐晦。因此，有好些文章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我很想把这个集子，整个废弃。但因为有旧版流传，因此，我把文字校阅了一遍，删节了一些，仍然保留下来了。请读者作为那一时期的历史资料看吧。

郭沫若 1958年11月30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第十一卷。

第 一 序（香港版）

抗战以来所发表过的言论或随笔之类，我收集了起来成为这个集子。除掉已经收在《归去来》里面的之外，近年来也曾经写过些较有文艺性的生活记录，因为性质不大相近，暂时控留着，等待下一次另成一集的机会。

抗战以来，关于学术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废了，但我也并不引以为憾。在目前这样天翻地复的时代，即使有更适当的环境让我从事研究，我也不会有那样静谧的心境。我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式的行径，的确是超过了我。

有好些朋友质问我：四年来为甚么少写文艺上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也苦于解答。不过这个《羽书集》，我想，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答案吧。在大动荡的惊涛恶浪中，我这些小船固定在一座珊瑚礁上了。我不仅没有工夫写，甚至没有工夫看。

不过，我的自信和兴趣还没有失掉，虽然已达到了“不足畏”的五十无闻之境①，仍有可以绞出的脑汁和心血。无论是文艺创作或学术研究，再给我一些岁月，总能有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出现。

郭沫若 1941年10月18日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① 《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第 二 序（重庆版）

《羽书集》在四年前曾经由陪都大东书局接受，准备出版，已由书局将原稿送审，一切手续均已停当，但书局却不肯印行，只得又把原稿要了回来。据说是这书局受了什么恫骇，我至今都有点不大了解。因为送审手续完毕了的书，还有什么忧虑？而本书的内容又有那一个字可以使得它忧虑呢？

书在重庆没有出成，后来由杜守素①兄在九龙替我印了出来，由他亲自校对，版样一切都很能令人满意。但不幸刚出版不久，香港九龙便相继沦陷了，所有纸稿和存书又都一火而焚了。因此《羽书集》的初版流传于人间的很少，在重庆的恐怕还不上三十部吧。

就这样，这个集子的生肖，实在是有点不大吉利，一扼杀于恫骇，再火焚于倭寇，很难见见大世面。然而它也好象是一位"打不死的程咬金"，见土就活，现在公然又可以死灰复燃了。我不敢保证它究竟能够长命到什么时候，不过它很执扭。凡是负了恶星下凡的胎儿，人要叫它死它偏偏不死，而一些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杜守素（1889—1961），原名国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史学家。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杜国庠文集》。

贵人家的子弟，人要叫它活它偏偏不活，所以说不定这个集子是会出乎意外地可以长命的。

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时代的浪痕，假使它要长命的话，或许这一点就是它可以长命的价值吧。但我自己是很明白它的性格的，它是有点近于“鸣锣奉告”式的宣传文字的总汇。假使让一批学院派的学者们看来，会说它一钱不值。又假使落到另一批骂座派的豪杰们① 手里，当然又可以发现出好些不曾兑现的预言。但我也并未打算把宣传就看成为“卖膏药”的同义说。膏药不是我在调制，要使宣传不落空，还有调制膏药者要负更大的责任。

不过我自己并不十分愿意祝福它的出世，倒也是实在的。初版毁后已经四年，尽有时间和可能使它原样再版，然而我没有做。我反而把那带有学术性或少带宣传性的一部分文字剔取了出来，编入了后出的《蒲剑集》与《今昔集》的两个集子里去了。因此这儿所留着的倒确确实实是剔剩下的残余。做母亲的人，尽管怎样打算存心公平，总不免是有些偏爱的。自己爱的不一定就是好的，自己不爱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我自己的存心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本书的好坏，还是要让读者或社会来决定。

集中《龙战与鸡鸣》一文里面有一节应该修正的地方，我现在把它写在这儿。《晋书·卞壶传》② 有云“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曰：诸君以道德恢弘，

① 作者原注：指胡风一批人。

② 《晋书》，纪传体晋代史，唐房玄龄等撰。《卞壶传》系其中列传之一。

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壶而谁”？汪逆诗“如含瓦石”一语便是用的这个典故，我起初没有觉察，还费了好些心思去推索它的意义。我以为汪逆自己也觉悟到他是等于死了，而且死得足够腐烂，没有含玉的资格，所含的只是瓦石。我这推索不用说是求之过深了。

前两天的报上载出了汪逆已在日本病殁的消息，朋友们说：死得太便宜了。自然，他如再迟死得两年，看到日本覆灭，国家把他生擒，付诸人民裁判，那是会更加痛快的事。然而汪精卫死在今天已可算不甚便宜了。假使他早死得六年，他毫无疑问会荣膺“国葬”。更假使早死得三年，德寇的败征还没有十分显露的时候，他死时的心境也会比较恬静：因为他满可以还有希望做洪承畴①。然而他却死在今年今天，尽管怎样愚昧，也该早觉悟到他的铁像是铸就了。真可谓“如含瓦石”；死得是太不“闲泰”。

1944年11月15日

---

① 洪承畴（1593—1665），福建安南人。明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四年（1641年），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大会战，兵败降清，是历史上有名的汉奸。

我们为什么抗战

东方有一大群疯狗，这一大群疯狗便是日本国的飞扬跋扈的军人。

日本的军人，尤其他们的领导者，他们自幼年时便受着偏颇的军事教育，他们的头脑异常简单，除掉侵略、占领、轰炸、屠杀之外，没有其他的字汇。他们自中东之战，日俄之战①，屡次的战役获得了战胜的甘饵以来，他们只知道战争的利得而不知道战争的惨祸，这，早昏迷了他们作为人而存在的良心，他们是把人的血液当成醇酒了。

欧洲大战对于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势渐渐地失掉平衡，日本的军人便愈加跋扈起来，他们在他们的本国是早已施行了军事的统制的，连那号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园寺② 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连生存权都时时要受着危害，其他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海《抗战三日刊》第二期。

① 中东之战，即中日甲午战争。 日俄之战，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本胜利后，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② 即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政治家。早年从事维新运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曾两次出任首相。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设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这一大群的狂暴军人的统制之下，在吐放着他们的毒气。他们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不仅是想吞灭我们全体的中国，而且是想混一我们整个的世界。这，我们是明确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具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们晓得，人类的福祉是在人类生活得到理智的统制时的和平状态之下所建设起来的。人类自脱离了兽域以来，他的目标是正确地向着人类的协和，泯除着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偏狭的传统，尤其个人所禀赋着的先天的兽性而前进着的。以往的人类文化是这样建设了起来，今后的人类文化也当这样建设起来。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宗替我们建设了四千年的文化，以仁义为大本的文化。这文化我们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使日本人早于千年以前脱掉原始的畛域，和我们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我们中华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内，曾受过一度原始民族，满洲人的蹂躏，受了他们的无理的统制束缚，聪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残，因此对于世界文化几乎没有丝毫的贡献。然而深赖欧美民族在和平的统制之下建设了新兴的科学文明，补偿了我们的缺陷。这文明又由欧美民族作为礼物赠给了日本。使日本早于五十年以前脱掉封建的畛域，又和欧美人达到同一的水准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军部统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是毁坏文明，摧残人类福祉的飞机大

炮，毒气细菌！

日本的狂暴军部是世界文化，人类福祉的最大的威胁，这，是明而且白的事体。

不仅我们中国民族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是整个人类都是达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过往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谋人类福祉，费尽无数心血所创建的文化利器，都为日本军阀所逆用，用来毁灭我们全人类了。

我们中国民族本着他爱好和平的素质，我们被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现在提着正义的剑，起来了，我们不仅是为要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为要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抗战，我们并且是为要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抗战。

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我们的意志却很坚强，我们也明确地知道，日本军部的强悍是因有日本经济为粮台，而日本的经济基础是奠设在我们中国身上的。我们中国能制日本经济的死命，同时也就是能制日本军部的死命。古语云："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①，我们要拚却我们的一切，至少是要达到与日本军部同归于尽的一步。

我们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存权，牺牲了自己的祖国，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得到保障，我们能遂行着这种使命，我们是感觉着无上的光荣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你们一致起

---

① 语见《尚书·汤誓》。

来和我们携手，为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歼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

1937年8月17日于上海飞机大炮的轰击中

抗战与觉悟

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我们在华北对于日本的抗战，已经两个月了。自从虹桥事变① 发生以来，我们在上海对于日本的抗战，也已经一个月了。在这一两月的抗战期中，我们全国上下的一德一心，前线将士的英勇杀敌，各界民众的踊跃输将，使一般的国际朋友都刮目惊叹，就连惯于造谣诬陷我们的日本军部和它的爪牙，他们在上海招待国际新闻记者的时候都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应该引以快慰的。（前几天我到前线去过一次，会见我们的淞沪总司令张治中② 将军，他对我说，我们从敌人的阵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家信来，信上写着说他们一上岸便和我们的前线接触，他们没料到我们中国士兵是异常的勇敢，他们的小队长阵亡了，中队长阵亡了，联队长也阵亡了，士兵伤了的不计其数。但他自己却没有料到，在他自己把这信写好还没交出，而他自己也阵亡了。这位阵亡的也是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大公报》。

①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二人乘车向虹桥机场寻衅，打死机场守卫。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击毙寻衅者。日本帝国主义借此扩大事态，于八月十三日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② 张治中（1890—1969），字文伯，安徽巢县人，国民党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位中队长，足见日本的军人也深切地得到了一番的教训了。）

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样的言论已经普遍到了全国。我们全国的同胞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口头笔下表现出这样的话来了。在没有抗战以前，有一部分的恐日病患者，把日本的武力估计得过高，把我们自己的武力估计得过低，以为我们只要一抗战一定会打败，而且会至于亡国，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再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了。究竟我们国民的潜在力是很伟大的，我们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①，我们受尽了日本人的气，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一旦奋发起来便使日本人生出了恐怖，使那些只是害怕日本的恐日患者也一样生出了恐怖。

这一两月的抗战，平心地论断起来，我们可以说已经是得到了相当的胜利的。在北方敌人虽然占领了北平、天津，但是我们的军队已经把敌人包围了起来，使它丝毫也不能发展，目前在天津的近郊我们的先锋已经在和敌人以炮火相见了。在上海，尤其使敌人发生了焦躁，使敌人变成了疯狂，敌人以一百几十只的兵舰进攻我们，把我们毫无办法！一次求援，再次求援，三次求援，现在敌人的陆军已陆续增加到十一个师团，和海军的陆战队人数合计起来在二十万人以上！然而自战事发动以来已经一个月，而敌人始终被局限在沿江沿海的一带地域。敌人一再声明，说要在几月几日之前解决我们，然而结果只是一些空炮。日本的所谓“皇军”的威力，是扫地无存了。

① 语见《史记·滑稽列传》。

他们一味的只是拿些高言壮语来威胁人，然而现在威胁是不灵了，他们就因为这样所以焦躁得发了狂，四处用飞机来向我们轰炸，然而轰炸的结果是怎样呢？充分的表现了他们的野兽的面孔和心肠，充分地使他们自己失掉了全世界的同情，并充分地激起了我们的民族的义愤和士兵的敌忾！在未抗战以前，许多害怕日本，因而袒护日本的国家，近来因为日本军人的狂暴兽行，都一致地在痛骂他们了。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两月来的抗战，在军事上，可以说是已经得到胜利的。

战争的胜利不仅是限于军事的胜利，我们还有经济上的胜利，道德上的胜利，也是同样地获得了。

我们先说经济上的胜利吧。日本自发动战事以来，据一般人的统计，它每个月的耗费是五万万元，但我想，在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一点。请看日本国内屡次请求增加预算便可以明白。一次是五万万七千万元，再次是二十万万，他们今年的预算总额已经超过了五十万万元了。这要算是它的有形的损失。还有它的无形的损失，我们单拿上海来说，她的损失已经是不可计算的。闸北、虹口、浦东一带的日本人的产业，几乎全部被打光了。日本在上海费了二三十年的惨苦经营，我们可以说，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经化成了炮灰。日本人的经济上的损失，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经济上的胜利。我们的产业，无论是新式的机械工业或旧式的手工业，可以趁这个机会在内地复兴起来，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要求，我想我们聪明的产业家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一点，已经在着手擘画。譬如我们把日本的棉纱人绢等来说，日本的在沪纱厂已经被炸

毁了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国内纱业与人绢业也因受着军需工业畸形发展的压迫，并因战事的结果失掉了市场，短缫的短缫，倒闭的倒闭。这必然的结果便是给予了我们一向受着日本压迫的纺织工业和旧有的丝绸业、织布业等以复兴的机会。平常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提倡使用国货的企图，现在可以说是靠着日本的狂暴军阀来替我们促成了。这在经济方面的胜利已经是决定的胜利。

我们再说到道德上的胜利吧。日本的狂暴军部纯粹以侵略的目的发挥他们的兽性，他们任意毁坏我们的文化机关，屠杀我们的智识青年，轰炸我们的无防卫、无抵御的妇女老弱，他们已经变成了人道的刽子手，文化的敌人。日本的一般无节操的怕死的政治家和言论家们大都屈膝在军部面前替他们作播音器，由他们在国内国外昧尽良心，专门造谣欺骗。他们的出阵兵士，大都是用着威逼和欺骗手段被逼而来的。因为这样，那些士兵都是很怯懦的，一被我们冲锋，便立即抱头鼠窜。一被我们擒获，便立即跪地求饶。他们的这些行动是把他们的国格已经丧尽了。然而，我们却和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是举国一致的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的这次神圣战争是灭却了自己的私欲而保持人类的天理。我们这一次的抗战，替我们的国家、民族，争回了人格不少。北方佟麟阁、赵登禹① 的

① 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在平津一带率部抗日，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进犯北平南苑时负伤死难。　赵登禹（1890—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国民党第一三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平南苑与日寇作战中阵亡。

战死，南口杨方珪①的一团人的战死，宝山姚子青②一营人的枕城而死，飞机师阎海文③因飞机受伤，用落下伞飞下，飞下了敌人的阵地，用手枪射杀了敌人，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向着自己的太阳穴上一击而阵亡。这些可歌可泣的壮烈行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替我们增加了无数光荣的篇页。这些烈士的壮烈行为同时也使我们顽廉懦立，把我们的士气和民气，愈见鼓舞，兴奋，而增高了。这层，和敌人比较起来，我们在道德上已经是胜利了。

但是，目前虽然已经有了这些军事上的胜利，经济上的胜利，道德上的胜利，我们仍然不能满足。我们所求的胜利不仅仅是这一点。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敌人的武力依然是不可轻视的。敌人因为节节失败，处处失败，恼羞成怒，必然要倾倒他们的全力来和我们决一雌雄。请看日本的首相近卫④屡次放言：说要长期作战，彻底地使我们屈膝；日本的内阁一再向议会提出增加预算的请求而且得到通过；日本的侵入我国的

① 杨方珪，应为罗芳珪，字建唐，湖南衡山人。国民党第八十九师第五百二十九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北平南口与日寇作战，全团官兵大部与阵地同归于尽。

② 姚子青，广东平远人。国民党第十八军九十八师第三营营长。“八·一三”战役中，坚守上海宝山，全营官兵英勇阵亡。

③ 阎海文(1915—1937)，辽宁北镇人。空军驾驶员。上海“八·一三”事变时，在空战中因飞机中弹，跳伞降落敌人阵地，以手枪射击日寇，留下最后一弹自击，壮烈牺牲。

④ 即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战犯。一九三七年出任日本首相，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又连续两次组阁。日本投降后切腹自杀。

军队，无论南北，都一再地向他的本国求援，这些都可以表现他们的决心。我们对于敌人的这种决心，应该要把我们抗战的意识和抗战的觉悟检阅一下：究竟对于长期的全面抗战有怎样明确的认识，在最后的胜利未到来之前我们有怎样彻底的觉悟？这种认识和觉悟的随时检阅，在抗战期中，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知道，近来已经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存在着一种侥幸的念头，希望战事早早得到一个段落，使他们的和平的享乐生活得以早早地恢复起来。这种心理在目前的抗战上是很危险的！我们虽然不好说这是汉奸心理，然而也可以说这是亡国心理！我们不是说要长期抗战吗？这长期岂是一月两月便可以了事的？在敌人方面或许有那样的企图，想在南方得一个相当的胜利，以敷衍他们的面子，之后，便暂且收敛他们的锋芒，而专门向华北进攻。这种战略，如果是有的，正是敌人的最恶毒的战略。因为敌人的进攻我们是利于把战线缩短，把战地局部化，好让他们紧扎紧打，各个击破，因此我们的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正是敌人所最忌避的。我们现在假如希图战事早早告一段落，岂不是正中了敌人的奸计？这种侥幸的心理，对于抗战的认识和觉悟是太模棱了。我们这次的抗战是要求我们全国的人民抱着最大的决心，忍受最大的痛苦，牺牲一切和敌人拚命。敌人不是一月两月可以打得倒的敌人，因而我们的抗战也不是一月两月便可以告一段落的抗战。我们这篇伟大的用血写出的文章才仅仅是在开头，我们要坚定着自己的决心，要抗战他一年两年乃至十年八年，

在敌人没有打倒之前我们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我们也知道，近来又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他们见到敌人的狂暴，也不免发出浩叹。他们说，损害太大了，牺牲太大了，这种想法，我们也可以说和恐日心理是相差不远的，战事自然是不免有损害和牺牲的，敌人的存心是要整个吞灭我们，故尔屡次发动战事。我们起来抗战，也就是甘心忍受莫大的牺牲，甘心忍受莫大的损害，而来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保卫我们祖国的独立的。试问：我们目前所受的损害可以和亡国相比吗？我们目前所受的牺牲可以和灭种相比吗？假使我们的国亡了，种灭了，我们的身家性命还有甚么存在？我们目前是要以一人的死争回一族的生，是要以一家的亡争回一国的存。我们的前敌将士在战壕流的血是有光辉的，就是我们的许多无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敌人的轰炸所流的血，对于敌人也并不是全无代价。我们的无辜老弱所流的血，写出了敌人的狂暴，我们的无辜老弱是用血证明了敌人的兽性，证明了敌人是人道的刽子手，是连禽兽都不如的。我们无辜老弱的血，和我们前敌将士的血一样，并不是白流了的。但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却就在不要使我们的老弱同胞和武装同志的血白流了！

还有，我们说到损害，对于损害的意义也应该有一种深切的考虑。第一，我们要知道敌人在这次抗战中，它所受的损害已经比我们更大。我们知道，敌人的产业是高度化了的，我们的产业落后，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落后的产业在平时的经济上，自然是敌不过高度的产业。然而在战时的消耗战

上，那情形便恰恰相反。敌人就毁灭了我们的一座城赶不上我们毁灭他的一座工厂或一个堆栈。事实上我们把敌人在上海的工厂和堆栈已经毁灭了不少，但是敌人所毁灭的我们的城市究竟是占少数。敌人的毁灭，我们正该欢迎，因为旧的不毁灭，新的不能建立。旧的城市正是我们的负担，我们平时是负之过重而又毁之可惜的。现在好了，敌人的飞机炸弹正替我们开展出了除旧布新的机运。

第二，我们还要知道，敌人的损害固然是我们的胜利，而我们的损害却同时也就是敌人的损害。这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世界商场，而尤其是日本产业的重要的消费地。日本的这次侵略加上我们的抗战，这明白地便是破坏了他的商场，减低我们的购买力。所以我们的损害，在这儿老实说是成为了我们的武器。我们不仅应该欢迎敌人的损害，而且在必要时是须得自行损害。如保全国土是我们全般国民，尤其前敌将士的责任，我们是不能把寸土尺地轻易地送给敌人的。但是，遇着在战略上或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须得退却，这时便是我们应该以自行损害作为最高武器的时候。拿破仑远征俄国，俄国人自行焚烧了莫斯科的战略，① 是值得我们想起的。

要之，我们这次的抗战关系于我们国族的生死存亡，我们

---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实行战略撤退，焚烧莫斯科，陷敌于饥寒困苦的绝境。俄军乘机反攻，最后拿破仑仅剩二万余人逃去。

全体国民是不能够苟且偷安，或畏难不前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的意识，坚定我们自己的决心，要真真正正地做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地步，不仅是口头说说，文字上写写而已。还有，我们在刊物上时时见到有"胜固不骄，败亦不馁"的标识，这也是值得我们时常提醒着自己的金言。我们自然人人都希望打胜仗，然"胜败是兵家之常"，打起仗来不一定是常常打胜的。尤其我们的敌人是顽强的劲敌，它处心积虑的图谋吞并我们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准备，而我们的抗战是仅仅只有五六年的准备的。我们的准备实在还不充分，但敌人不让我们有充分准备的余裕，现在逼着我们不得不起来抗战了。我们尤其要觉悟：军事上要保持每战必胜，那是太把重大的责任专门放在了武装同志的身上了。在这儿所谓长期的抵抗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时时加以考虑的。这意义是说：我们即使打败了，我们也要抵抗，充其量我们要打到一兵一卒都不残存，我们民族的最后一珠血都是要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而流的。所以我们在这神圣抗战的期中要不图苟安，不怕牺牲，不怕打败仗，打了一次败仗立刻垂头丧气的那种行为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在战事未发动以前，我自己曾经往浦东去访问过张发奎① 将军，他有句话说得好。他说，他立在军人的立场是要"屡败屡战"的。前几天我又到前线上访问陈诚② 将军，

---

① 张发奎（1895—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总司令、第二方面军司令。

② 陈诚（1896—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他也是和张发奎将军同样的口吻，说要“屡败屡战”。这句话是应该作为我们全体国民的座右铭的。我们人人要存着必胜的决心，然而我们也要不怕屡败的挫折。我们的寸土尺地都不要丧给敌人，然而在万一的机会上寸土尺地有不能保存的时候，我们也要保存我们的不屈的精神，而要求敌人拿出重大的代价。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都是我们人民的榜样。

事实上敌人在军备上虽然强过我们，然而他的经济基础异常脆弱。这一两月来的抗战已经就表现得明白了。他们国内和在沪的资本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恐怖，甚且有因为这次的战事而自杀了的人。他们的物价一天一天地暴腾起来，各种债券一天一天地暴落下去，只要我们时时提醒我们的最大决心，敌人的总崩溃的时期终竟是不很远的。在目前我们自然是单独地在和敌人对打，我们自然并不拒绝国际的友人为我们帮忙，然而也不应该存一种依赖别人的那种卑劣的心事，“天助自助者”①，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我们把敌人打到相当疲敝的时候，帮忙我的友人自然也就会起来了，这也是促进敌人总奔溃的一个重要外因，敌人总奔溃时期究竟到甚么时候才来，虽然不敢预言，然而断断乎要不到十年百年。敌人的总奔溃便是我们所期待的最后的胜利，在这个总胜利到来之前，目前的小胜利，我们可以满不在意，就是目前的小失败，我们

---

① 这是一句英国的古谚，原文为“God helps them than help themselves”。

也应该满不在意。我们要“屡败屡战”，战到敌人总奔溃到来的一天，要有这样的觉悟才能够保障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7年8月20日①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九月十一日”。

告国际友人书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斗士，一切理智清明的义士仁人们：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文化，我们全人类的福祉，目前临到了绝大的危机。

西方，把国际势力划分了两大阵营的西班牙的战火① 业已经年，迄今尚未止熄。东方，我们目前的中国又在和强暴的日本军部作殊死战了。

日本的军部自从中东之战、日俄之战，屡次的大战役获得了胜利以来，他们只知道战争的利得，不知道战争的惨祸。他们是把战神认为他们的守护神了。

欧洲大战，东方没有直接参加，播及于日本的影响很小。否，它反而是得到了偏惠，把它的各种势力扶植了起来，对于我们中国生出了独占的野心。这野心，尤其在最近的六七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上海《救亡日报》，原题为《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

① 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人民为保卫共和国，反对以佛朗哥为首的武装叛乱的战争，当时除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直接支持叛军外，全世界进步力量均积极支持西班牙政府。

揭开了一切的面网，毫无掩饰地暴露着了。

自一九三一年以来，日本侵袭我满洲，蹂躏我上海，夺取我热河，割裂我冀东，犹然不知满足，丝毫也不想收敛它的侵略的狂势。最近复自行酝酿出芦沟桥事变，以重兵五十万进攻华北，夺取我北平、天津，屠杀我无防卫、无抵抗的民众，而于我文化机构，尤狂肆摧残，逮捕我学人，枪决我青年，炸毁我学校，焚烧我图籍。这种狂暴的行为，就是未开化的蛮人都是不能做出的，而日本军部横无忌惮地，在二十世纪开明的今日，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为快意了。

华北的轰炸尚在继续进行，华南的轰炸十日以来又早已开始。上海的四郊、杭州、苏州、南京、南昌、九江、武汉、长沙，各地都同时受到日本军部的轰炸。我无防御、无抵抗的民众，尤其孱弱的妇女幼儿年老无力者，死在轰炸机的投弹之下的，总当在十万人以上。北平、天津等地的死亡，还不及算入。现在上海四郊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又和天津一样，已经打成一片焦土了。

朋友们，我们明确地知道，日本军部的野心是没有止熄的一天的。他们的所谓“大陆政策”①，正明目张胆地表示着非完全占领中国不可。他们之想吞并中国，处心积虑已经有四五十年了。他们认为他们的羽毛已经丰满，他们的海陆空军都是“世界无敌”。而且在目前的西方，西班牙的内战尚在进行，各文明国家成为对立的形势，爱好和平的友邦，表面上似

① 即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提出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大陆的侵略计划。又称“田中政策”。

乎已没有余力顾到远东，所以日本的军部更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发动了他们将近全部的武力大举图华。我们中国，目前的确是处到危急存亡的关头了。

但这危机是我们中国一国所独有的吗？否，这是带有全世界性的！我们中国的危殆只是这个危机的开始。这个危机，犹如猛烈的霍乱、鼠疫，它在短时期内便要向全世界蔓延。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都是同样地受着莫大的威胁。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故意要危辞耸听，也并不是要诬蔑日本的军人。日本的军人，他们在公开的宣传上所说的话，有时比我们所说的还要更甚。他们老早便在梦想着成吉斯汗①的再来，其荒唐无稽的宣传家，更认为成吉斯汗是他们的源义经②（Minamoto Yoshitrune），他们早就在梦想着再演出"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是的，朋友们，他们这种想念的确是"梦想"，我们可以绝决地这样说。但是，这梦想不是有逐渐实现的可能了吗？六七年来日本军部在我们中国境内所演的惨剧，不是对我们全世界、全人类在连打警钟吗？我们中国如逐渐地被日本人吞灭了，谁还能够断言，日本人不会象五世纪前的蒙古人，把战祸蔓延在全世界？我们要断言日本军人的野心是梦想，须要有实力来证明它的确是梦想！

我们中国人现在是起来了。我们是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

---

① 即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古代蒙古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

② 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末镰仓初期的一位武将。文治五年于衣川馆自杀。

步，在死里求生地起来了。我们明知道我们的力量很薄弱，我们的军备远不如日本，——因为日本人的整军经武已经有五六十年，而我们是只有五六年——但是我们不顾一切地起来了。我们的旗帜上所写的不仅是要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权，要保卫我们祖国的独立，而且我们是要做世界文化和人类福祉的防波堤，我们要保卫世界文化并保卫人类福祉。

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种想念是夸大吧，以为我们这次的对日抗战是不度德、不量力，仅如以卵投石，或如上海某外报所载的嘲笑漫画，是以戎克船①和日本的军舰冲击吧。不，我们相信，凡是真正爱好和平，爱好文化，理性清明的友人，决不会有如是想。我们相信我们的友人是彻底同情于我们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友人就和我们自己一样，是相信着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全国上下是一致地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士兵乐于牺牲一切以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的人民也都乐于牺牲一切以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大家在同一的目标之下举起了抗敌的烽火，举起了二十世纪的赤十字军②的军旗。我们纵使是戎克船，然而这戎克船上是载满了猛烈的鱼雷和各种各样的水中轰炸器的。这，我们相信，住在上海的国际友人们，可以作我们的保证。这十日来的上海的

---

① 戎克，英文Junk的音译。戎克船，即"木制帆船"。

② 中世纪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侵略性远征，前后凡八次，历时近二百年，参加东征者以十字为标记，故名十字军。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是取其不辞艰苦、坚持长期作战的精神，并赋以革命的"赤"色新义。

战况，我们的戎克船不是事实上击沉了日本的军舰吗？

战争的胜负并不全靠着武器，武器终是要靠人来运转的。日本的士兵乃至日本的民众，我们的确地知道，他们也并不是渴于血液的猛兽，他们的出征乃至赞助出征，只是受着军部的迫胁，出于不得已而然。日本早早就施行了军事独裁制，除掉军部和少数马路政客之外，人民全体，上而资产阶级，下而无产大众，都失掉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仅仅是在军部的一颦一笑之中唯唯否否而已。日本的唯一元老西园寺公爵(K. Saicnji)，有名的自由主义宪法学者美浓部①博士(Mimobe)，都早已失掉他们的发言权，甚且连生命都时受危害，其它是不言而喻的了。故尔日本的出征军，我们敢于说一句，他们是将骄兵怯。然而我们的却不同，我们的士兵和全体民众，是人人都抱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的。决定胜负的关键应该是在这儿。历史教训我们，中东之战时日本的军备不如我们，而日本战胜了。日俄之战时日本的军备更远不如俄国，而日本又战胜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日本所争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和现在的纯粹出于侵略，是完全两样的。我们现在是处在了中东之战和日俄之战的日本地位，而日本是处在当时的我国与俄国的地位了。

日本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在反对日本出兵，虽然他们的立场不同。他们应该比谁也还明白，他们的经济基础一多半是建设在我们中国这个世界商场上的。他们要榨取我们是以维

① 即美浓部达吉(1873—1948)，日本法学博士。曾任贵族院议员。

持和平状态为适宜。战争，不啻是破坏了他们自己的产业，荒废了他们自己的市场，同时也就可说是日本的自杀。日本军部之所以有强盛的今日，是全靠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现在他们发动了战争，这是阻遏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眼前是展开了日本军人的拿手好戏“切腹”(Harakiri)之一幕的。日本的经济生命可以说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同时日本军部的生命也就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我们要长期抗战，使日本的经济机构全盘破产，同时也就是使日本军部归于消灭。

日本军部侵略我们中国有句口头禅，就是要“防止共产党”，他们屡次逼迫我国当局和他缔结“防共协定”。其实这是最可笑的连小儿也骗不了的幌子。共产党不仅在苏联担当着政治的处理，在英法等国也公开地参加着国家的政权，谁要你日本去“防止”？这些都暂且不论。先说到我们中国的国内吧。我们中国共产党正竭诚地提倡联合战线，以巩固国防，共赴国难。何劳你们来替我们“防止”？我们的友邦苏联，更老早把她在中国境内由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各种特权放弃了，而在她的本国是在极力施行着民治主义，更何劳日本军部来代替我们“防止”？倒是以“防共”为幌子的日本军部，既夺取了我们的满洲、热河、冀东、华北，而在这些地域又任意没收人民的土地财产。日本军部倒正可以说是最猛恶的一群强盗。这正是我们所应当防止的东西。同时也正是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的朋友们，所应当协同防止的。

日本军部侵略我们中国还有第二句口头禅，便是说“要保持东亚的和平”，而自诩为“安定势力”。这个幌子尤其令人发

笑。东亚的和平由什么人来扰乱了?为什么应有保持的必要?不正是因为有了日本军部这一大群强盗的出现吗?

诚然,我们明确地知道,和平是很可宝贵的。和平是文化之母,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人类生活得到理智统制时的和平状态之下所创造出来的。人类自从脱离了兽域以来,他的目标是正确地向着人类的协和前进着的,泯却各民族各社团的偏狭的传统思想,尤其个人所禀赋着的兽性,而前进着的。以往的文化是这样建设了来,今后的文化也当这样建设起去。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宗在二三千年前便以礼让的教条来训练我们,我们从不曾以暴力来侵凌过任何国家,我们只是以我们历代所创造的文化作为礼物赠送给邻近的兄弟民族。日本民族也就是我们的赠予的一个主要的对象,事实上他们是受了我们的文化的洗礼,在千年以前脱离了原始的畛域,和我们达到同一的水准的。

然而口口声声以“保持东亚和平”自命的日本军部,他们回答我们的礼物是些什么呢?——唉,真真是可以感谢的礼物啦,是飞机大炮的轰炸,毒气细菌的毒杀!这轰炸,这毒杀,目前虽只是赠送与我们,然而在不久的将来,谁也不能保定,它们是不被赠给全世界的人类的。日本的狂暴军部明白地是全世界人类的大的威胁。过往无数志士仁人为谋世界和平,为谋人类福祉,费尽无量的心血所创建的文化利器,都为日本军部所逆用,用来摧残人类,以发泄他们的兽欲了。

我们中华民族本着爱好和平的天性,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现在提起正义的剑,举起二十世纪的赤十字军的军

旗起来了。我们的旗帜上的标识是：争取民族的生存权，保卫祖国的独立，要以全民族的血来建立一道新的万里长城，保卫世界文化并人类福祉。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斗士，一切理智清明的国际的弟兄们，尤其日本国内的弟兄们，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保卫全世界的文化而战，为保卫全人类的福祉而战，把全世界文化和人类福祉，在大规模的毁灭危机之前救起。

1937 年 8 月 21 日沫若起草于上海

国难声中怀知堂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①，现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他那娓婉而有内容的文章，近来在《宇宙风》②上已有好两期不见了。记得最后一篇文章的末尾，是把苦雨斋记成为"苦住斋"的。苦住在敌人重围中的知堂，目前不知怎样了。

前天王剑三③来看我，他是才从青岛回上海的，我问到他，有没有关于知堂的消息？

他说，有人造他的谣言，说他化了九千块钱包了一架飞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上海《逸经》、《宇宙风》、《西风》联合旬刊第一期。

知堂，即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浙江绍兴人。散文家。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

① 语出《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② 文艺期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停刊。

③ 即王统照（1897—1957），山东诸城人。小说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山雨》等。

机，准备南下。

其实这“谣言”，我倒希望它要不是谣言才好。九千块钱算得什么，虽然在鼎沸时期要拿出九千块钱的现金未免也夸张得一点，然而，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①，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象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想写的还多，然而就此切着。

1937年8月23日晨

① 语见《诗·秦风·黄鸟》。

理性与兽性之战

人类本是从猿人进化来的，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使人类逐步进入文明，然而人性中所包含的兽性却时常倒拉着进化的车轮，向无文化的兽域逆转。兽性的克服本来就是一切文化的本质，而兽性的反抗也每每使文化濒于破产。尤其是在世界文化要向更高一个阶段飞跃的时候，有一部分狃于旧有习惯的人，便不惜倒行逆施狂暴地发挥其兽性。目前的世界正是到了这样的时期。

目前的世界很显明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克制着兽性，发挥着理智，把人类推动向进化一方面走；一边是发挥着兽性，克制着理智，把人类推动向退化一方面走。这两大阵营是壁垒森严，而且是普遍于全世界的。西欧诸国的情形我们暂且不提，在目前我们中日两国的战争，不正是这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吗？这抗战可以说是理性与兽性之战，是进化与退化之战，是文化与非文化之战。

我们中国早就有三千年的封建文明的，我们的文明尊重礼让，我们的民族嗜好和平，我们的列祖列宗努力克服了我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上海《文化战线》旬刊创刊号。

民族血液中所包含着的兽性，我们对于邻接的兄弟民族素来是只有以自己的文明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日本人也正是受了我们礼物的一个主要的民族。他们的文字、思想、艺术、社会组织的机构、生产方式等等都渊源于我们。几千年来我们对于日本是竭尽了沾溉的能事的。三百年来我们中国受了原始的满洲民族的统制，阻碍了文化的进展，这要算是我们民族的厄运。我们不幸在这期间之内对于世界文化是落后了。

日本就幸得没有膺受着异民族的兽性的压迫，在完全地接受西方文化上它算比我们早成功了几十年。因为它和我们的利便不同。在日本，革新是由皇室的力量来推动，反革新者便是叛臣；而在我们，则革新是由人民的力量来推动，言革新者就是乱党。我们就在这内部摩擦、肃清专制上多费了几十年工夫，而日本终竟比我们先进了。这是事实。

然而日本对于我们几千年来所赠送它的礼物回敬了些什么呢？自甲午中日之战以来，不断地对于我们加以侵略，目前更横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事实俱在，并且是我们所身经的，不必缕陈。我们可以明白地说：日本人是在尽力发挥着他们的兽性，要摧残世界文化。

人类是有自杀的本领的。历史昭示我们，有既成的各种文明由于自杀行为是已经遭了湮灭。我们目前的文化是濒着绝大的危机的。不仅我们的学校、图籍、进步的学者和青年，遭了日本军部的摧残和屠杀，就是日本的学校、图籍、进步的学者和青年也同样遭了日本军部的摧残和屠杀。日本军部的这种疯狂的“切腹”行为，如不加以理智的有力防止，世界文化

的前途真正是有点不堪设想。

保卫文化的责任现在是落在我们中国人，尤其中国的文化人的肩头了。我们不仅要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祖国的独立，我们同时要发动至大至强的理智力来摧毁敌人的一切矫伪的理论，暴露敌人的一切无耻的阴谋，廓清敌人的一切烟幕的言论，以保卫世界文化的进展，人类福祉的安全。

我们要运用全力来扩展这理性与兽性之战，联合全世界理性清明的民族或个人，扑灭全世界一切人形的兽类！

1937年8月25日晨

由“有感”说到气节

十年退伍一残兵，今日归来入阵营。
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
金台寂寞思廉颇，故国苍茫走屈平。
挈眷挈家何处往？蚩蚩叹尔众编氓。①

这是我在八月七号做的一首旧诗了。那时平津失陷，全面抗战尚未开始，故不免略有“寂寞”之感，诗成，放在案头，并无发表之意，不识几时被朋友抄了去，前几天竟在《救亡日报》②上出现了一次，但末句却错成为“叹尔蚩蚩众编氓”弄得来失掉平仄，这是有点使我惶惑的。据朋友说，是暗记错了。这一错却又激起我来费这一番笔墨。

朋友们有的劝我不要做旧诗，但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该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在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此诗和下诗均见本编第二卷《战声集·归国杂吟》。

②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沪创刊，作者任社长，夏衍和阿英分别任主笔和主编，后迁至广州、桂林出版。一九四一年三月停刊。

的想法，目前正宜于利用种种旧有的文学形式以推动一般的大众，我们的著述对象是不应该限于少数文学青年的。

索性再记出一首旧诗吧。

悲歌燕赵已消沉，
沦落何须计浅深？
到底可怜陈叔宝，
南冠赢得没肝心。

这是听见江朝宗① 辈就伪职时所做的。

中国士人的气节不知何以竟扫地到目前的这样状态。儿皇帝、卖国奴、大小汉奸层出不穷。推究其原因，大约终因是爱钱与怕死吧？

有月为一千几百元的收入而一家父子均成为奸谍的老诗人，真真是可以惊人的事。

在目前似乎提倡俭约，奖励自杀，都要成为救亡工作了。

1937年8月

① 江朝宗(1858—?)，安徽旌德人。曾代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日本侵占北平后，出任北平维持会长。

忠告日本政治家

老实说一句话，世界上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

前年“五一五”事变①为日本少壮军人所杀了的犬养毅②，日本人是称之为“立宪之神”。因为日本自有国会以来，他是历次当选的一位议员，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一贯地站在立宪的立场，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活到了七十几岁在首相的现任上为军人所枪杀，而枪杀了他的军人，却被日本军部把他们粉饰成民族英雄。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和犬养毅在议场斗争上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③。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间我们一同在东京的日比谷吃过一次饭。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主催的，因为他在议会上发表过一次侃侃而谈的正论，大家要慰劳他。座中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少数陆海军“少壮派”军人杀死首相犬养毅，迫使政府成立军人内阁，强化军国主义体制。

② 犬养毅(1855—1932)，日本政治家。一九二九年任日本立宪政友会总裁。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

③ 尾崎行雄(1859--1954)，日本帝国议会议员。一九二五年后坚持反对军国主义立场。

有一位美国教士，中国人中有马伯援和我，话题是求尾崎说到战事的预测。尾崎说，战事是难免的，日本的政治家已经把军部无可如何，只有希望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可以觉悟。这话说得最诚恳，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是可以用尾崎这话来代表的，但最感动我的是尾崎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多得几个，那日本便可以得救。

的确的，日本的政治家中，我看怕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所以把军部无可如何者，便是军部屡次把死来威胁他们。这几年来日本的政治家中为军部所格杀的，可也不少了。滨口幸雄、犬养毅、井上准之助、团琢磨、斋藤实、高桥是清① 等，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点骨鲠之气的人，然而通被日本军部所格杀了。日本国内事实上是形成了恐怖时代，所有一切的政治家，都是被恐骇得来，不是不敢说话，便是成为日本军部的喇叭。

就是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爵，不已就够可怜了吗？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马之友，自维新以来，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贡献，的确是可以不愧为一个元老的。尤其在近年来，他对于日本军部的控制，我看，的确是费尽苦心。自从滨

---

① 滨口幸雄，应为滨口雄幸（1870—1931），日本立宪党总裁。一九二七年组织内阁，一九三〇年在东京被右派枪杀。　井上准之助（1869—1932），日本内阁财务大臣。一九三二年被右派“血盟团”暗杀。　团琢磨（1858—1932），日本实业家，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一九三二年被“血盟团”暗杀。　斋藤实（1858—1936），日本政治家。曾任海军大臣、总理大臣、内政大臣。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中被暗杀。　高桥是清（1854—1936），日本政治家。一九一八年任首相。一九三四年任内阁大藏大臣。“二·二六”事件中被杀。

口幸雄遇难，日本的政党防线溃了堤，日本军部的势力象洪水一样泛澜以来，西园寺公爵的苦心便是在怎样使日本军部就范的一点。政党既失掉效用，足以牵制军部的只有军部自身，西园寺公爵是见到了这一点的，他的政治的指针，我们明白地可以看出，起初是以海军牵制陆军，其次是分化陆军的内部。斋藤，冈田①，两位都是海军大将，他们两位的出乎意外的相继组阁，便是利用海军以牵制陆军的表现。去年“二二六”之变②，冈田内阁虽然终至瓦解，但那次的事变没有演成严重的内乱者，事实上也是海军尽了他的保卫的责任。广田③的过渡内阁究竟只敷衍了一时，接着是宇垣④内阁的流产，林⑤内阁的畸形儿之产生。宇垣和林都是陆军大将，宇垣是陆军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谓肃军派，是军部中的第三种势力。这流产内阁和畸形内阁的产生，便是分化陆军内部的表现。

这种用海军牵制陆军，用陆军的某派牵制某派的策略终竟是失败了，结果是图穷匕首现，现出了目前的近卫内阁来。

---

① 冈田，即冈田启介(1868—1952)，日本政治家。曾任田中内阁海军大臣，一九三四年任总理大臣。“二·二六”事件后下台。

②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数“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杀死了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事后广田内阁上台，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③ 即广田弘毅(1878—1948)，日本战犯。“二·二六”事件后任总理大臣，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一九三七年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④ 即宇垣一成(1865—1956)，日本陆军大将。一九三七年受命组阁，未成。

⑤ 即林铣十郎(1876—1943)，日本陆军大将。曾任驻朝鲜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就任总理大臣，四个月后下台。

近卫文麿，据日本人说，是西园寺公的“秘藏子”①，也是西园寺公的“最后一张牌”。本来在去年“二二六”之变时，西园寺已曾决心把他这“最后一张牌”打出，叫近卫组阁，然而近卫那时辞退了，把他的代身广田来代替了他，结果，到今年来在种种策略用尽之后，仍只好把“最后一张牌”打出去，然而，被打出了的这“最后一张牌”，却可怜，才是放大炮的一张牌。

近卫本来是一位贵公子，年纪也仅仅四十七岁，又是一位神经衰弱、患着失眠症的人，要希望有怎么大的魄力，把谁也控制不了的日本军部控制起来，那未免也是一种奢望。然而近卫却完完全全做了日本军部的“罗波子”(傀儡)，做了日本军部的扩声器，却也是出人意外的。

近卫是有高等教养的人，他在大学时期还曾师事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博士，在近卫年青的时候，并曾做过些左倾的文章。壮年入贵族院，曾锐意于贵族院之改革，日本的有识者都以为这位贵公子是相当有为。然而这位先生在日本的举国仰望中一登台，却完全成了日本军部的“罗波子”，日本军部的扩声器。

由这扩声器中我们听见了好几次的播音了，说，中日的事件只有用军事来解决，不准第三国干涉。说，要彻底使我们中国“屈膝”，失掉抗日的意志。最近日本议院的临时会议又开幕了。近卫的演说又是一次军部意识的播音。

据说，“中国未能了解日本真正的意向，并尽力对日蔑视。

---

① 日语，宠儿的意思。

一个国家不仅以敌视与轻蔑他国为国策，且用之为遂行国策之指导的原则，此实在世界史上未有之前闻”。

这话我觉得很有趣，只消把“中国”和“日本”的字样兑换一下，把“对日”改为“对华”那简直就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话。

又据说，“日本拟予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俾令其完全失去战斗的精神，如中国不能重新考虑，而对日坚持抵抗，则日本亦有长期周旋之准备”。

这又是“屈膝”放言的那一套了。

身为一国的宰相，应该要过细筹画一下一国的大计。一个国家临到军人专政的时候，便是那个国家走到末路的时候了。

尾崎行雄的话令我们想起，日本军部实在是在碰崖，这座“崖”就是我们中国。

尾崎行雄的话再令我们想起，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几个，日本便可以得救。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明治时代的老一辈的人我们可以不用说，连滨口、犬养、斋藤、高桥那样的人，似乎都已经没有了。

“二二六”之变，在当时，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军部把东京播音局占领起来，用兵士提着枪逼着播音局员报告军部所发出的消息。播音员的那战栗而又亢扬的声音，听起来真令人可怜。

近卫先生的几次发言，都令我联想到了那“二二六”当时的播音。

近卫先生，我们并不希望你发挥你青年时代的幼稚病，谈

甚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我们希望你要真能体谅你的先生西园寺公望的苦心，至少要做到滨口、犬养、斋藤、高桥诸人的不怕军部的气概，步着他们的后尘，为你的祖国而死。

老实不客气的说一句话，你假如“不能重新考虑”，不把你“屈”在狂暴军部之前的“膝”伸出来，日本是要亡在你的手里的。

我们所希望于日本政治家的，也是这样，够勇敢一点，救救你们的祖国。

1937年9月7日

全面抗战的再认识

关于全面抗战，一般人的解释，似乎是专门注重在战域广泛的一点。

这次的战争本发动在华北，但是，我们对于日本的抗战却不局限于华北。我们在上海也和日本抗战了起来；其它沿江沿海，凡有日本飞机来袭击的地方，我们的空军都一律地向它抗战。象这样，在目前虽然名义上并没有下总动员令，而事实上是已经发动了全国一致的作战过程。这个现象，似乎也就是一般人所了解的全面抗战了。这，不用说是全面抗战的一面，而且是最为醒目的一面，然而这并不是全面抗战的全面。

一般人说到战争，便把它局限到军事的作战上去，这是不正确的一种见解。战争本身是有进化的。就单就军事上的作战说，有古时的单人独马、一刀一枪的平面战争，有现代的机械化、化学化、海陆空军大集团的立体战争。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其进化是很可以惊人的。这种现代的立体战争，已经不是单独的军事上的事，这儿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了起来；全国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抗战半月刊》第三期。

学术、产业、政治、经济、教育、训练等等，在平时都要有充分的素养，而且是有系统有计划的素养，然后才能结晶为现代的立体战争。譬如我们的科学和工业如不发达，我们不能够制造多量的战车和坦克车，不能够制造多量的军用气体，我们的部队便无从机械化起，无从化学化起。这事实在我们目前是存在着的。我们中国因为产业落后，文化落后，因此在作现代的立体战上我们便感受着很大的缺陷，我们的部队不仅还没有机械化，化学化，连我们的海军都还没有建立，我们空军也太不充分。假使在这次的抗战上，我们有更多的飞机，有得若干的潜航艇，我们的战争一定更有可观，那是毫无可疑的事。

真实的全面抗战应该是国家社会内的一切施设的战时机构化。所谓战时的经济，战时的财政，战时的教育，战时的社会问题等等，那些问题都有专家在那儿规划，而且有一部分已由我们的政府和社团次第施行着了。这规划愈完密，施行愈迅速，我们的全面抗战的威力便愈宏大。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划和施行，但可惜的是，那周密的程度和迅速的程度，于目前的军事作战的过程，可以说完全不能相应。这层在我们看来，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征候，平时我们的一切规划和施设已经是落后了的，到战时的现在，如还要落后于人，那我们在抗战上是要增加很大的困难的。

现在且举出几个事例来证明。

譬如上海纱厂的内地移动吧。这是自战事发动以来早已宣传着的问题，政府也有一定的规定来奖励迁徙，然而直到现在大家都还在观望。这纱厂移动不仅是于国家有利的重要国

策，就在经营产业的个人也是有利益的。上海在目前的状态之下，无论怎样是不能够继续营业，即使上海在短时期之内得以恢复和平（这是断断乎没有的事），然而日本人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隔了若干时，必然地又会有同样的战事发生。上海已被证明不是国家产业可以安置的地方了。而且这次淞沪抗战的结果，日本纱厂被毁了三分之二以上，这正给我们的棉纱业以扩张的机会，聪明的产业家是应该见到这些，自动地把产业向内地移，用不着还要等待鞭策奖励的。然而大家经了鞭策奖励，却依然在心存观望，不肯移动。因此失业的工人便多多沦落为难民；其有些不爱国的人不能逃出战区的，为生活所迫也就不能不被敌人利诱而做出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这种游移的态度，对于国家实在是人财两失。

最近我们见到报上载着，就是今年的棉絮丰收。前几天我到浦东去过两次；看见沿途的农民正在采集棉花，大家都辛辛苦苦地采集大包小袋的，的确也呈着丰收的景象。这在平时本是应该庆贺的事，然而在目前的战时却是值得我们深深考虑的一件。平时浙江一带的棉花，大抵为上海的日本纱厂所收买，今年抗战的结果，日本纱厂既被毁灭，棉花的出路便不能不成为问题，因而种植棉花的江浙一带的农民生活也就不能不成为问题。这一批批的农民如一失掉生活，势必又成为难民，而其一部分人只以为战争的结果是使他们失掉生活，势必又为敌人所利用！我想在这时候应该要由我们聪明的爱国的资产家来负担起责任，譬如不要把自己的资本窖藏起来，多多拿些来收买棉花，解救农民的生活，迅速把工厂内移，迅

速开工使失业工人复业，这是对于自己的产业大有利益的事业，而同时也就在执行着最高的国策了。

以上所说是战时的产业计划推动得很迂缓的事实。此外如战时的外交计划也推动得同样迂缓，我们在这次的抗战上多多需要国际友人的帮助是明如观火的事。我们全靠正式的外交，这力量是不够的。苏联的援助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在一月以前早就有发动国民外交的计划提供了出来，希望多多选择于国际有声望的文化人作为国民代表派遣欧美，以发动英、法、美等国的民间力量，使他们了解我们抗战的意义，并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资助，这实在是有绝对的必要。例如有些国家的资本家在抗战期间借款或拍卖大批军火给我们的敌人，这在我们没有宣战的抗战上，正式的外交是没法阻止的；但如我们发动了国民外交，在各该国的内部得到了民众的同情，资本家们的利欲心至少会稍稍收敛一下。那种消极的结果，于我们已经是莫大的利益了。如有积极的结果，能和各国爱好和平、尊重文化的国家成立互助公约，那对于国家的利益更是不可计量。然而发动国民外交的动议已经有了一个月，而其实现却渺无影响。倒是据报章所载，日本人的国民外交反比我们先发动了起来，连人选都已经决定了。象这样，在战时的规划上，我们又落人后；我们要望抗战持久，并望抗战必胜，那是有点南辕而北辙的。

总之，所谓全面抗战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再加认识；而我们所希望的，尤其是民间的有力者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答，严肃地执行起来。有好些事应该不必要等待政府去办的。更有好

些事一经措办，不仅于国家有益，而且同时更于个人有益。希望大家于保卫国族的神圣誓约之前，担当起执行全面抗战的实际。

1937年9月15日

关于敏子的信

今晨见《申报》① 载有"敌机长斧田一封凄凉的家信"的一段记事。斧田和其"妻"(据原信口气当是未婚妻或爱人)敏子的像,及敏子给斧田的信两叶,都用照片揭载了出来。

据说,斧田机是八月二十七日由我空军在天长击落下来的,照片和信是由斧田身上搜出。报上没有人说斧田的生死,大约是死了吧。

原信被译载了,读起来苦格塞,勉强和那不甚鲜明的原信照片对照了一下,才知道译得太走样。

原信本来是两封,一封不全。这不全的一封我先把它转译在下边吧:

> 每天在酷暑中回来(?),怕是耽心的原故吧,什么也不想吃。不过大家都是平安的。
>
> 你想来也平安吧。但是一封信也没收到,十分地在耽心着呢。假使是忙,倒还好呵,怕的有万一的事体,真是耽心得不能睡。
>
> 木更津的战死者已经很多了,十六日以后的战死者,听说还没有发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请你每天都给我一点消息吧，我在等着。

黑崎兵曹听说也阵亡了，他是笑得那样豪爽的人，简直象在做梦的一样。

望月兵曹的夫人，我昨天去拜访了来，但还没有回馆山，据说在主人(丈夫)归来以前，她一直要住在木更津……

这封信不全，就只存这一点。

另一封是完整的。信上写到自斧田出征后，敏子与母亲(应该是敏子的母亲)一同求神拜佛祈祷他的平安；写到自己的寂寞，希望斧田早点回国；又写到她在学校里很用功，希望将来可以称斧田为“阿哥”而不愧。最后是恕她的不客气，以后再写信，并希望斧田写信给她。

这封完全的信大约是最初的一封，前一封不完全的信当是隔了若干时日，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信了。

信并不是“一封”，敏子并不是斧田的“妻”是很明白的。中国，尤其是上海懂日本文的朋友很不少，不知道这样的宣传资料，为甚么毫不经周密的检讨，便在大报上梦梦然登出了。

我们的宣传机构在这儿透露出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漏洞。

1937年“九一八”第六周年纪念日清晨

“侵略日本”的两种姿态

侵略国这个烙印已经深透了日本的额骨，无论怎样是掩饰不了的。

但它的侵略姿态也有两种：一种是“艺伎”(Geshya)姿态，另一种是“武士”(Samurai)姿态。前一种爱弄些美妙的外交辞令，说什么“同文同种”，说什么“共存共荣”，利用着虚伪的和平，以吮吸我们的膏血。后一种则高呼“生命线”，高呼“皇军的威力”，老实不客气地用飞机大炮来脔制我们。

事实上这两种姿态，其实只是一种。

《聊斋志异》上有《画皮》一段异闻，值得想起。大意是某生得艳遇，后隔窗窥之，乃一夜叉在画着一件美人皮。

“艺伎”姿态不外是“武士”姿态的美人画皮而已。

不用说，夜叉是比美人可怕的，但对事实上，“艺伎”之可怕实胜于“武士”。

自从“九一八”以来，日本对华侵略上的内部摩擦，可以说就是这“艺伎”与“武士”之争。它一向是以《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① 的艳装来麻醉我们的。然而那样和平的吮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文摘战时旬刊》第一期。

① 意大利著名歌剧，普契尼作曲，伯拉什柯编剧。描写日本姑娘蝴蝶与美国海军士官相恋的故事。

吸似乎还不够饱，它索性把画皮抛掉，张牙舞爪地呈出了它的真容。

自由主义的日本政治家和言论家的亲善剧退了场，法西斯谛的军阀及其爪牙的全武行，正打得锣鼓喧天。

立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那一种在事实上更于我们有害，那是用不着多加思索的。

日本人最怕的是我们的反抗，而“武士”的姿态却恰恰只能唤起我们的反抗。日本的较为聪明的人，晓得这于他们是一种危险，要尽力主张再蒙上画皮，故尔他们的内部摩擦也就发生了。

这次淞沪抗战的结果，“武士”的姿态的日本受了一个严重教训，因而连他们的少壮军部都领悟到画皮作用之更有实效了。和平的声浪，在上海的一隅，就象“艺伎”所弹的“三味弦”一样，又在村村香地幽咽了起来。

我想，我们总不会愚蠢到那样十足吧。已经露出了原形的夜叉再蒙上画皮，我不相信我们还有胆量去爱抚。

但我们在这儿应该向夜叉致谢，由于它的露出原形不仅使我们对它由畏而生备，而且也使我们辨别出了在中国人中蒙着画皮的它的同类。

1937年9月20日

日本的儿童

儿童是可爱的对象，我自己是最爱儿童的人，然而日本的儿童大多数是失掉了他们可爱的性质的。

日本儿童动辄便爱作战争的儿戏，三五成群不是扮演强盗便是扮演士兵，你看他们拿报纸来作铁盔，拿竹杆木棍来做刀或枪。神气倒也还“无邪气”，然而“无邪气”得有点令人蹙额。

这当然是日本的教育使然。好战的日本人把侵略根性，从幼儿时代起，便培植得根深蒂固。

下边是一段小小的逸事，但留在我的脑里却怎么也不能忘记。

已经是约略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寄寓在日本东京邻县的一座村落里，我的四女淑子还小，只有八九岁的光景。

有一天清早，天在下雨，日本乡下的道路，一下雨，照例是异常泥泞的。我携着淑子到村上的一家小菜店里去买蔬菜，淑子和我站在小菜店的门首。

一位八九岁的男孩子踉跄地走来。街道本不狭隘，店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上海《文摘战时旬刊》第二期

首也并不是挡路的地方，然而那男孩子一走来便踏着了淑子的脚，脚被踏痛了，袜子被踏污了，淑子叫了出来，但那男孩子却在淑子的背上打了一拳。

——你这鬼东西，你挡着我的路！

孩子恶狠狠的发骂，握紧拳头漾了几漾，鼓着一双铜铃样的眼睛。

我瞠然了。觉得这孩子真恶辣，但我把淑子牵开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件往事，但印在我的脑里却怎样也不能消蚀。

日本的儿童们未必都是这样，但这种恶辣的儿童却不在少数。

被我抛在了日本的儿女，失掉了我的保护，目前使我发生着复杂难言的怅触。

1937年9月①

---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十月五日"。

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

外伤化了脓或有腐烂性的疮口，当其痊愈时，总要把腐肉除尽，新肌才能顺畅地发育，患处便容易交口。如腐肉过多、新肌的发育受着阻碍，患处的交口便要延宕下来。过多的腐肉，有时是不容易除去的。因为腐肉与新肌相间，去腐则伤新，不仅要流血，要发生剧痛，而且还有使新肌腐化的危险。遇着这种情形，旧时的医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新式的西医也往往束手无策。

近年因为科学愈见发达的结果，人们对于自然力的利用也愈见地奇妙起来，医术竟公然利用到蛆虫上来了。

蛆，就是那粪中的苍蝇的儿子，寻常虽有人利用为钓饵，但在稍有卫生常识的人都加倍地忌避它的。然而真有点出其不意，近时的外科医生竟有人利用它来促进我们的生肌作用了。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①，我相信总不会有使用蛆虫的这样新奇。

事实倒一点也不奇怪。

蛆是有名的腐食者，它们在粪中涌来涌去，并不是在那儿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八年上海开明书局版《沫若抗战文存》。

① 语见韩愈《进学解》。

肉搏取乐，而是在那儿争夺粪便中的残食。所被利用的便是这层本领。外疮口上有腐肉过多时正好请蛆虫先生们来聚餐。蛆虫是见腐必吃而且是吃得无微不至的。如此便为新肌驱除了阻碍而得到顺畅地发育的机会。蛆虫是被利用为了除旧布新的使者。

但有一件手续须得慎重地声明，便是近代医术上所利用的蛆，并非直接由粪里取来，也非听随苍蝇在疮口上生出（不然，则中国乞丐会是新医学的前驱），而是经过严密的消毒处理所培养出来的东西。要蛆身上的毒菌被消除了，然后才可以利用来消除腐肉。

好了，我在这儿可算写了一段医学讲义。读者怕在奇怪了吧？我的脑细胞是怎么的了？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离题太远的文章？但要请朋友们把脑细胞多多活用一下，我觉得这蛆虫的生肌作用正是我们对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

华北战局和淞沪战局呈着两样的姿态，尤其在最近因为雁门关失守，很有一部分人便忧虑了起来，以为会影响到战事的全局。这，我觉得是有点认识不足的。

我们中国素来是被人称为病夫，实在是千其疮而百其孔。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在南方虽已有些生机，而在北方则疮孔总不容易交口。这儿很明白地也就是因为腐肉积蓄得太多了。北方因为受向来的封建政权的中心支配更加直接，有几千年的腐肉，几百年的腐肉，几十年的腐肉，乃至几年来的腐肉积蓄在那儿，陈陈相因地使你怎样也无可如何。它们占领着广大的地盘，坐食着民脂民膏，使你下层的生肌始终不能畅发。

要强制地除掉它们吧，同样要流血，要发出剧痛，而且还恐把它们的毒素逼入深部以动摇国本。因此，你只好姑息，暂且让它们盘据在那儿，听候时间的解决。

好了，现在可以推开窗子说句亮话。日本的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与了顺畅地发育的机会。旧中国非经过一次大扫荡，新中国是不容易建设的。这大扫荡的工作，却由日本军部这大批蛆虫在替我们执行着了。

这一大批蛆虫的毒，我们已是知道的，而且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消毒手续。所谓“王道”，所谓“乐土”，所谓“自治”，所谓“亲善”，这些毒素是老早失掉了它们的作用的。

腐肉去尽，新肌发生，消了毒的大批蛆虫，只好在新兴中国的土地上惨死。这，是根据科学智识所能作出的预言。这也正是我们对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

只求抗战到底，莫作无谓的悲观。

1937 年 10 月 4 日

逢场作戏

我们有句极其大众化的熟语，便是“逢场作戏”。

这话的意思自然用不着我来解释，但我在这话里面却发现了新的启迪。

旧时的人把“戏”是看成为胡闹的一种东西，故尔随随便便地胡闹一下便叫作“逢场作戏”。

其实“戏”这样东西，用我们近代人的眼光来看，是最严肃的东西。它是一切艺术的综合。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都集中在这儿，而成为立体的一个结晶。

再就演戏的人来说吧。旧时俳优本来是有充分的胡闹性的，演剧不求其本身的调和，每每要闹时代错误的勾当，甚而可以离开戏中的世界对于台下的人说自己的话。这固然也就是所谓“逢场作戏”。

然而现代的演员是严肃到了极端的，自己的一颦一笑完全与戏剧本身成为有机的化合。演剧者完全为剧中人而灭却了他自己。

这纯粹地灭却自己以完成一个客观的美的世界——正是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救亡日报》。

近代的演剧精神。

懂得这个精神，因而对于“逢场作戏”一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在这儿可以发生出一个“价值的倒逆”来。

古语的“逢场作戏”是随便的胡闹，今语的“逢场作戏”，可以解为严肃的献身。

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体都希望秉承着近代的演剧精神，都希望灭却自己的私心以完成客观的美的世界。

1937年10月7日

惰力与革命

——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六周年

辛亥革命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要求战胜了专制政治的序幕。这战斗是依然继续着的，不仅在我们的国内，而且在我们的国际间。更切近地说时，目前我们的对日抗战，也可说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抗战。二十六年前我们所废立了的溥仪①，被日本人绑票去作为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件事在十月十日的今天值得我们提起。

日本的学者，已故的内藤湖南博士——这人和罗振玉、王国维②诸人颇有交谊，凡是研究国学的人大都是知道他的——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称赞溥仪有光武帝③的风度。这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八年上海北新书局驻粤办事处版《全面抗战的认识》。

① 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号宣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退位。一九三一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任伪满政府“执政”，后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②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任学部参事。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图谋复辟清王朝。著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曾任清华研究院教授。著有《静安文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等。

③ 即汉光武帝刘秀（前6—57），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话，其实并不是在赞美溥仪，而是露骨地表示了日本对于我们中国的野心，他们有一个历史上的类比，以为我们中国既有前汉和后汉，便当再来一个“前清”和“后清”，而这梦想中的“后清”却应该是日本的属国。

然而这样迂阔的“后清”梦，就在日本的少壮军部眼中，我相信，也会是不值一笑的。因为他们更来得直截了当，他们是“成吉斯汗的再来”。他们对于儿皇帝，没有迂阔的学者所估价得那么高。不过精神总是那么一套，是想以专制政治的惰力来阻碍我们的民主政治的革命运动而已。

二十六年来我们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努力，无论内部和外部，都受着莫大的阻挠，而阻挠力以日本为最大，因为我们内部的阻力也多是由日本人所扶植起来的。日本人自诩为“东亚的安定势力”，这话略加修正，我们可以承认，便是日本是“东亚的安定的专制势力”。不过这“安定”是人为的一时的安定而已。由专制而民主，是人类进化的基本动向，观乎一雄专制的猩猩社会之进化为比较开明的人类社会，便可以得到这个动向的前踪。到了二十世纪的今日，而欲以专制政治的惰力阻碍人类社会的进化，不过是猩猩社会之一时的回光返照而已，日本人的“后清”梦和“成吉斯汗”梦，我相信他们是永远不能做圆的。

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上和我们不能两立，我们现在和它作生死存亡的抗战了，我们根据着进化的原理，也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在这抗战的炮火声中纪念辛亥革命，我们要多放些大炮来作为喜炮，我们要多杀几个敌人来作为牲

栓，但我们在庆祝之余也应该加紧地检阅自己，我们要——

提醒我们的建立民主政治的革命精神！

促进我们的对于专制惰力的扫荡！

1937年10月9日

不 要 怕 死

汉奸有大有小，成因多少有点不同，因而对付的方法也就不免有点悬异。

小汉奸如人肉市场的野鸡，那是有点防不胜防的。治本的方法自然是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生计，然而这可以说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实在是远水不及近火。

为求救济近火起见，只好力求治标。对于汉奸处以严刑峻法，自然是必要的，然而这只能除患于已然，不必能防患于未然。最好的防患办法还是应该及早开放民众运动；一方面严密民众的组织，一方面扩大社会的宣传，以民间的力量来代替官宪力量之穷。

文艺家在这儿是大有活动的余地的。多多做些通俗的歌谣小说，加上图画，明白地晓以利害；多多制成小册子，让唱歌队或说书队，在下层民众间广事劝导，或者也怕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大汉奸的防闲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大抵都是有点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并不是无智，并不是不晓得做汉奸的利害，然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救亡日报》。

他们仍悍然为之者，我看有些是积渐使然，有些是出于不得已的。

积渐使然者，譬如男女关系之由恋爱而和奸，大汉奸之成，其当初大约也就是出于所谓“亲善”，所谓“交欢”，久而久之，受了敌人的利诱，于是乎便陷没下去。

出于不得已者有点类似男女关系的强奸。大约是临到生死关头受了敌人的威胁，最后一口气争不过来，于是乎也就陷没了下去。

对于大汉奸的处治自然是当以严刑峻法。已经明正典刑的汉奸们的供状，我觉得应该详细地记录出来，而且公布出来，以昭示敌人利诱的门径和威胁的方法，可以使旁人借鉴。

国家的最高政策要明显地决定，也怕是防止大汉奸的屏障吧。例如和战不决，或如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是所谓“半推半就”，那是很有危险性的。聪明的人在这儿便生出一种侥幸心，以为万一国家主和，那他便有余地。于是乎一夕和亲便千秋沦落矣。

大汉奸和小汉奸不同，小汉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愚者之多固防不胜防，智者之狡亦防不胜防。对于这种智者的犯罪，我看是应该多提倡名节吧。古圣先贤的节烈的故事、文章，我看是应该专门搜集起来广事传播。对于方今的气节凛烈的阵亡将士，由国家加以崇隆的表扬之外，为文艺者应该尽力以诗文来表彰，使成为一般人的楷范。

老实说一句话，凡是聪明的人，我看，都有成功为大汉奸的可能。多数人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只是没有处到那样的环

境。欲免除危险最好是凛烈自己的气节，要不受利诱，不受威胁，临到最后关头争这一口气：不要怕死！

1937年10月①

① 根据本文最初发表的时间推断，写作日期不会迟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

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

大场失守，闸北、江湾各阵地因战略上的撤退，淞沪战局又呈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对于战术及战略不甚明了的人，为这战局的转变颇呈出一种仓惶的现象。有的人发出忧虑，以为战局会从此停顿或者会至于向日本人屈膝求和，其实这完全是杞忧。自然，以出卖民族为专业的少数分子，乘着这个时期出而放出主和声浪的，也并不能说没有。但那种丧心病狂的东西，何能左右大局！我们如因此而发出惊惶，那是反为这些败类所乘，会扰乱我们自己的阵线。这，充分地表示着我们对于这次的抗战，未免太认识不足了。

我从二十三号的晚上起，一直到今天二十九号止，几乎每天都在前线上驱驰。我会见了不少的指挥作战的高级军事人员，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地坚决、沉毅，自称抗战到底的决心至死不变。

陈诚曾亲自对我说过：二十五、二十六那两天，敌人把飞机火力集中起来轰炸大场一带的阵线，每天所投的炸弹在二千个以上。我们的将士事实上是在以血肉作为长城；由前方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救亡日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传来的电话，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着“不成功，便成仁”，这话听来实在足以令人流泪。在这样悲壮情形之下，所有的工事遭了破坏，死伤过重，结局是退到第二道战线来了。然而象朱耀华师长的引罪自杀，四行仓库八百勇士的死守①，不是真正地做到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实际吗？

大场虽然被突破，战线虽然略有移动，我们的士气丝毫没有挫折。大场以外的整个战线，依然呈着“胶着”的状态。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寸土尺地，然而那寸土尺地都染遍了我们的神圣的血。这血是要求了敌人的高度的代价的。

已经是不只说过一次，前线上的旅进旅退，对于整个的战局并没有多么紧要的关系。大家的关心，说句不客气的话，与其说是关心着抗战的不能持久，怕还是在关心着自己的安全吧？真正对于抗战的持久性关心的人，他所忧虑的，倒并不在这些。一时的胜利并不足以怎样的矜夸，一时的退却也并不足以怎样的忧虑。有一位军事人员对我说：“我们即使挺战至三年五载，牺牲到千百万兵员，甚至退守到兰州、迪化，我们也还要继续奋战，与敌人决最后的雌雄，争最后一口气。”这样才是所谓“抗战到底”！抗战了两个月有半，才仅仅退却了几公里，怎么便值得惊惶起来呢？大家把顾虑自己的一身一家的心，多拿一点来真正地顾虑一下国家民族吧。大家在口头笔上都在讲漂亮话，然而事实上并不见得在“有钱者出钱，有力

---

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将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住四家银行，即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仓库，誓不投降，抵抗到底。

者出力”。反而相反，遇着战局一影响到了个人生活的安危，于是便手忙脚乱起来了。真真是民族的耻辱！

要使抗战持久，目前似乎可以坦白地说几句切实的话了吧。

抗战以来的事实已经明白地教训了我们，我们输于敌人的只是飞机大炮的数量。这缺陷的填补以及我们今后的军火的补充，是维持长期抗战的必要条件。要抗战必须有军火来支持；要抗战持久也必须军火的接济源源不绝。我们自己除制造之外要多多仰给友邦的援助，已是公开的秘密。敌人封锁我们的海岸也就是在想切断我们的军火接济。然而海路虽被封锁，我们尚有陆路的交通。这交通也可以说是由天然的形势指示了我们以正确的外交路线。

敌人除封锁我们的海岸之外，最近更用飞机四出轰炸我们陆上的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这用意也是很明白的，它是想切断我们的后续部队的增援。我们在这次的神圣抗战中，用不着掩讳，我们的伤亡是有相当数量的。要使抗战持久，兵员的补充也就是必要条件之一。交通如发生阻碍，后继部队的增援如欠敏速，必然是要影响到整个的战局。针对着敌人的阴谋，我们可以保持兵员补充不至发生障碍的最适当的方法，不就是武装民众吗？我们有四万万多的人，我们要流到最后的一珠血，是要流到我们全民族的最后一珠血，不要流到我们的现有的兵员的最后一珠血！在前线上的兵员和敌人拚完了，将何以为济呢，如不武装民众？

民众武装了起来，有人会以为是乌合之众不足以作战，这

实在是不顾实际的观念论者。请看西班牙的义勇军吧。老弱男女的民众集合为一体，和正规军以及德意的军队，不是抗战了已一年以上而仍未屈服吗？“强将手下无弱兵”，事实上只要指挥官勇敢沉着，善于指挥，善于获得部下的心理，我看任何脆弱的士兵都是可以成为钢铁一样的队伍。况且义勇军的使用法，还可以把它化整为零，插入正规的军队里面。日本人把东北同胞插入队伍里使用的方法，不正是给予了我们一个暗示吗？

武装民众的计划，好在第二战区已经在着手施行了。第二战区有“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其“工作纲领”业已发表。我看那个计划，略略加以斟酌损益，是应该及早地施行于全国的。

要之，要使抗战持久，务须及早确定外交路线以求军火的接济，务须及早武装民众以求兵员的补充，这两层是目前最迫切的必要条件。

1937年10月29日

由四行想到四川

二十七日因战略上的关系，闸北一线稍往后方撤退，把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勇士却誓死不动，在敌人的重围中，在烟焰涨天的火海中，高撑着青天白日的国旗，与敌人抗战到底，租界的英国兵，劝他们御下武装，退入租界，而他们不动。四围的狂敌集中火线来威胁他们，而他们仍不动。这忠勇壮烈的行为激起了国际的同情，振作了我军的士气，为我们国家民族增加了无限的光荣，无上的人格。

每逢东战线略略推移一次，租界上的寓公们总要大大地动摇一次。什么文化人内移，什么赴京商呈要略，巧立名目，大登广告，既可以奔出虎口，又可以出其风头，这些惯会欺世盗名聪明才智之士，看见这八百勇士的壮烈的意气，大约总可以稍稍内省一下了。

听人说，当大场失守的消息一在报上传播了出来，有钱的大寓公们便忙着想逃难，但到四行仓库的情形又在报上传播了出来的时候，便稍稍镇静了下来。这是应该的。是非羞恶之心为人所共具，到底那种值得我们景仰，那种值得我们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海《救亡日报》。

璧，就是三岁孩子都可以辨别。

四行仓库的八百勇士们，我现在仅以十二万分的诚意祷祝你们死守到底。因为你们的死守胜过你们的生还，但假如我军反攻得利把你们活活地救了回来，那是又当别论。人生是总有一死的，死有重如泰山，有轻于鸿毛。八百勇士们如战死在四行仓库，那你们的死便是你们的永生，你们将要与黄花岗烈士，宝山城烈士①，长垂不朽。国家民族将要永远赖着你们的死而增加光荣。

由四行仓库八百勇士的壮烈却又想到了我们四川的军人。

在这次的抗战上，所有全国的兵力，据我所知，几乎都是总动员了的。而且在这动员期中还有无数的佳话。例如在山西阵亡了的郝梦龄②军长，他本是驻扎在贵州的，当华北战局业已展开，他曾向中央请命，愿率所部赴前线效命。中央一时未加许可，他便把师长的位置辞了，让给了别人，一人独往北方去调查军事。中央对于他的倚重是没有变更的，时机到了。仍责成他指挥某部的作战，结果是促成了他的成仁的大志。——这是前几天陈诚将军亲自对我说的话。请看这郝梦龄将

① 黄花岗烈士，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同盟会在广州起义，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一百余人英勇牺牲。后经广州人民收殓死难者遗体，得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　宝山城烈士，指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役中，国民党驻宝山部队第十八军九十八师第三营全体官兵，为坚决抵抗日寇的进攻而壮烈牺牲的烈士。

② 郝梦龄(1897—1937)，字锡九，河北藁县人。国民党第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守卫山西忻口时阵亡。

军不是把张巡许远① 并而为一人了吗？

同样是关于贵州部队的开发。二十五号的晚上我由某处至某处，有一位旅长和我同车，他是从贵州开发来的。奉到中央的命令只开发×千×百人。然而开发至途中，却有一百人开小差赶上了。大家都说："如不能上前线，甘愿枪毙，不愿意留在后方。"旅长说："听了他们的话，我实在受了感动。从来只有开小差朝后方逃，决没有开小差朝前线赶的。所以我也就宽容了他们，也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命令，多带了一百人。"这段小小的故事，听了，觉得也值得令人涔涔下泪。

总之，在这次的抗战上，连僻远的贵州都早已动员了。贵州兵的动员，是经绕过四川的东部的。绕过四川境的贵州兵都已经赶上东战线，本是那儿的高级长官已经在西战线上阵亡，而我们四川的军队和他的指挥者呢？

据我所知道，杨森② 将军和他的所部在一个月以前早已是上了战线的，战绩亦相当可观。但是在四川军人中资望最重而部属最多的刘湘③ 将军，却至今还没有一兵一卒开出夔

---

① 张巡(709—757)，唐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安史之乱时，以真源县令起兵守雍丘(今河南杞县)。至德二年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与太守许远共同作战。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坚守数月不屈。睢阳失守后，遭杀害。

许远(709—757)，字令威，唐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安禄山叛乱时，被玄宗任为睢阳太守。至德二年，与张巡力守睢阳，最后兵尽粮绝被杀。

② 杨森(1882—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时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

③ 刘湘(1889—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曾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死于汉口。

门。这却不免有点使我们失望。记得八月初刘将军到南京的时候，对于公众说过些壮烈的话，主张和日本抗战，以为我们的军实准备只如坐着鸡公车，敌人的军实准备是坐着飞机（大意如此，原譬恐稍有出入），要准备充实然后作战，那是永没有作战之时。这话在全面抗战未开始时曾经博得多数人的喝彩，我自己也是感铭颇深的一个人。然而抗战以来已经三四个月了，却不见我们刘湘将军亲率所部在前线上周旋。甚至一兵一卒都还没有出夔门一步。该不是真真正正地在“坐着鸡公车准备”吧？大家都在望眼将穿了，我自己是四川人，尤其希望我们四川军在这次神圣抗战中多于替我们争一口气。

1937年10月30日晨

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删掉，因为刘湘将军不久就亲率所部，东出夔门远征，在第二年的春天竟在汉口因劳成疾而以身死国了，这证明我对他的非难，有点失诸急躁，但这篇文章仍然把它保存着，以表示自己的错误。刘将军死时我曾有一副对联輓他附录于次：

治蜀是韦皋① 以后一人，功高德懋，细谨不蠲，倍觉良工心独苦

征倭出夔门而东千里，志决身歼，大星忽坠，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1年8月15日记

---

① 韦皋（745—805），字城武，唐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任西川节度使。曾遣使与南诏通好，并多次击败吐蕃兵。

一位广东兵的诗

十月二十三号的晚上，我到前方某地去访问过叶伯芹①军长，林林②有一篇《月夜战地散记》登在《光明》③战时号外第七号上，其中有一段所记的便是那一晚的事。

叶军长人很沉着而诚恳，他看见了我去，真是就象见到自己的兄弟骨肉一样，一脸都被笑云遮满了，他领率的广东兵，素来是以勇敢著名的，据说他们一开上火线便遭遇着敌人。这遭遇是不很容易的事。因为敌人总是躲在战壕里的。在战线上只是用飞机大炮来轰，要等到我们的阵地有一角动摇了，他们才偷偷摸摸地赶出来。在十月某日，叶将军所部在某地便刚好遇着这样的机会，于是一上战线便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把敌人杀得一个落花流水。这一遭遇战，在日本报上也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叶伯芹（？—1954），名肇，广东新兴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历任国民党军旅长、师长。一九三七年任第六十六军军长。

② 林林，原名仰山，一九一〇年生，福建诏安人。作家、诗人。著有《崇高的忧郁》、《阿莱耶山》等。

③ 文艺半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

载了出来，自称比日俄战争时的“旅顺之役”① 还要猛烈。

和叶军长一别又已十日了，我连接过他两封信，他希望我再到前方去一趟，说他部下的官长和士兵同志们都愿意和我见面。我自己是很感激的，大约稍微空闲得一下，我是定要再去看望他们的。

叶军长的第二封信中附了一首“广东兵”的诗，题目叫《后死感言》，诗后更附有一段跋语，我看了很受感动，现在要把它转录在下边：

后死感言　　广东兵

弹雨淋漓转空气，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卫祖国，为争生存狮展威。

十月十七日，我军一部在老陆宅新三宅阵地抗战。午后一时，敌用飞机大炮，猛烈轰炸。三时许，一面以机枪扫射我阵地后方，阻我增援，一面以步兵向我第一线冲锋，斯时激战之烈，空气为之改变。弹雨穿过阵前，树叶纷飞如蝗。我将士为祖国争独立生存，为民族争自由平等，敌忾同仇，奋不顾身，辗转肉搏。五时左右，即将敌人击退。双方伤亡枕藉，小卒竟忝后死。昨闻郭先生沫若驾临军部指导，因赋此，请转　斧正！

跋语至佳，诗并不好，但因为是士兵同志做的，而且写的是实感，所以难能可贵。作者要我“斧正”，我现在就老实不客气地把它修改一下。

---

① 日俄战争时，日军于一九〇五年元旦攻下俄军固守的旅顺口。日军约死伤六万人，俄军约死伤三万人。

弹雨淋漓风改色，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拚生死，狮吼摇天万里威。

跋语中所说的十月十七日新三宅阵地之战，不知道是否便是叶军长所说的那次遭遇战。下次见面时当问个详细。弹雨淋漓，空气改色，木叶蝗飞，伤亡枕藉，这种壮烈的景况，实在是绝好的文章，绝好的绘画。

1937年11月3日晨

后来者居上

苏联十月革命，转瞬已二十周年了。这艰难缔造的业绩，在人类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值得我们由衷庆祝的。

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仅仅费了六七十年的工夫便收到了成功，西方的学者每每称之为"东方的奇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费了二十年工夫，而它成功的迅速更在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以上了，这或许可以称为"人类的奇迹"。

苏联之所以迅速成功，自然有其物质条件，但我在这儿所想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努力，尤其是"后来者居上"的这一点。

人类是进化的，一切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生产，在其轴心的主流上，都呈着进化的趋势。只要后来者肯努力，择善而从，见贤思齐，必然地要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必然地要收到"居上"之效。

例如我们拿交通机关来说吧。六七十年前所争的是铁道的敷设，其后是电化，其后是航空路线网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谁还要"安步以当车"，那必然地落后无疑。但在这种的情形之下，聪明的人便知道赶最新锐的利器来采用，而免掉先进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上海《救亡日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者所走的枉路与其束缚。

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1937 年 11 月 6 日

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

淞沪抗战三个月，我们的军事布置，因为战略上的关系，暂时由上海附近向后撤退了。这撤退不用说并不是放弃上海，而是要更作猛烈的向敌人进击的攻势。我们的大上海在形势上虽然陷入了敌人的重围，然而在这三个月的抗战期间已经有眼不能见的血肉长城建筑了起来，环护着大上海的周围，而我们居住在上海的同胞也是誓死不能屈服的。我们在敌人的包围中要成为一个地雷，要成为一个潜航艇，等到时机到了，要在敌人怀中爆发出来，把敌人炸破得四分五裂。

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必在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而在上海周围的城市和土地的暂时失陷，在我们却是可以纪念、可以夸耀的事。敌人以百倍于我的火力进攻了我们三个月，它的所得并不足以偿其所失。抗战以来，敌人在上海所经营的产业已经遭了毁坏，所损耗的兵力火力已经不可计量。它的国家的实力已向全世界昭示了出来，而它的残暴、无耻、怯弱、卑劣，也由它自已暴露得毫无余蕴了。敌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救亡日报》，系作者为该报写的"沪版终刊致辞"。

敢于保证：它所得到的是一副狰狞而又畏怯的强盗面孔。

敌人是想奴化我们的，一面用着和平亲善的假面具来蒙蔽我们，暗地里进行着它的对于我们的灭种灭族的狠毒的计划。走私，卖白面，卖红丸，卖“王道乐土”，不知不觉之间在我们全国布满了它的间谍网、汉奸网，吸取了我们的脂膏还不足，还要毒化我们的血液。它的阴谋非把我们的种族灭绝不可。然而我们过于宽大，过于爱好和平，过于克己，过于以恕道待人的民族，近年来也渐渐地觉醒了。敌人看到我们的觉醒，因而发生了恐慌。假面具剥掉了，露出了它的狰狞的面孔来横抢武夺。还有什么呢？这只是愈见促进我们的民族的觉醒。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听着了这样的声音还有人不会觉醒的吗？假如是有，那一定是汉奸。汉奸之多，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明毒易御，暗毒难防，平常汉奸潜伏着毒害我们，我们受了大害也不知道，等到汉奸露出了水面，那已经是汉奸减少了它的毒素的时候了。

敌人真蠢，它自己破坏了它的积年经营，它自己破坏了它的积年的诡计。历年来它趁着我们睡着在我们身上缠了又缠的网子，自己用它的日本刀来替我们割断了。我们身上的腐肉，也就是由于日本人的毒化阴谋所生出的腐肉，也赖它的日本刀来替我们刮削了好些。不要看见我们遍体都在流血便害怕吧，这流血反是我们排泄毒素的机会。腐肉去了，使我们的新肌发育出来，也非经过一道流血不可。我们是丝毫也用不

着悲观的，胜利始终是属于我们。我们所持的消耗战术，要长期地消耗敌人。消耗敌人自然也要牺牲自己。但我们所牺牲的是什么呢？拿产业来讲，是未脱原始性的束缚着我们发展的旧式产业，这和敌人的新式产业拚掉，在我们是毫不足惜。拿人数来讲，我们多过敌人，姑且作为一与二之比吧。我们就拿一千万壮丁来和敌人拚，也要拚掉敌人五百万。我们总要拚到和它决最后的雌雄。一时的胜负不足以动我们的喜忧，我们所系念的是长期的抵抗。抵抗愈长，敌人的进攻愈猛，愈于我们有利。我们自己的牺牲是早在觉悟中的，最后胜利之属于我们，是必然的事理。我们只咬紧牙关和敌人拚命，不悲观，不踌躇，不畏怯，不中馁，拚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胜利之必至是我们全民的信念。我们从事文笔的人，在这淞沪抗战期中抗战了三个月，也愈见把我们的信念增强了。我们现在随着军事部署的后退也有暂时由上海附近向内地移动并稍稍改变战略的必要。因此，我们的一部分也要暂时和上海同胞们告别。但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1937 年 11 月《救亡日报》在上海暂时停刊之前夜

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

关于日本，我现在很想作一个简单的概观。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民族，七十年前对于我国不仅是文化上的附庸，而且有一个时期是政治上的附庸。

日本和我国发生关系，大约是在战国时代，但在史志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秦始皇时的一个骗子徐芾①，曾有带领童男童女去访问蓬壶三岛的事，甚至相传日本还有徐芾的墓，但那是荒渺难凭的。

不过在东汉年间，的确是有关系了。前些年辰九州博多湾的志贺岛上发掘了一颗黄金印，文为“汉倭奴国王印”，此印现尚存日本黑田侯爵家里。《三国志》的《魏志》里面有《倭人传》，那儿说：“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译使所通三十国。”汉时朝见的事实，算得到了古物上的明证。《隋书》②有《倭国传》，那儿便说道：“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贡，谓之倭奴国。”印上称倭奴国王，大约也就是汉安帝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救亡日报》。

① 亦作徐市，徐福，字君房，琅邪（今山东胶南南）人。秦时方士。他访问蓬壶三岛的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纪传体隋代史，唐魏徵等撰，凡八十五卷。

的封赠吧。

《魏志·倭人传》要算是有系统地记载日本的最早的文献，那儿所叙述的当时的日本，事实上还是一个野蛮未开化的民族，最有趣味的是那时候的日本女人的服装。“妇人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这是说就象拿一张被条来，中间打一个洞，套在颈子上便成为衣裳，这原始的程度，实在是颇有可观的。就在隋时，日本的文化程度也并没有增高到怎样。服装是相当进步了，但是饮食的习惯呢？《隋书》的《倭国传》说：“俗无盘俎，藉以槲叶，食用手餔之。”这情形和近时的南洋土人相差得并不多么远。

然而日本和我们隋唐时代的高度的文化相接触，它就象感了电的一样，突然跳起了。在隋唐时代它陆续遣了不少的留学生来，我们中国有不少的人去帮忙它，把我们的文明尽量地输运了去。于是乎日本也由原始的状态跳进了文明的园地来。最有趣味的是日本在考古学的年代上没有铜器时代这一时期。只在石器时代的原始日本和我们的高度的铁器文明相接触，它是跳过了一个时代。

然而七十年来的日本，它完全改了旧态，就和在隋唐时代接受中国文明成功了的一样，七十年来又把西方文明接受成功。这成功固然是由于日本民族的肯努力和它物质上的与局势上的便利，但我们中国实在也帮助了它不少。第一，它是因为我们的受害而觉醒了的。其二是我们替它做了挡箭牌。其三，我们把物质的资源供给了它。其四，我们的多量需要促进了它的生产。

我们这位老大哥实在运气不好，最不幸的便是清朝二百几十年的统制，把我们民族的生机阻止了。提到摧残文化，我们人人都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清的康熙帝与乾隆帝①，他们是罪浮于吕政②的。西方文明在明末已有移植于中国来的那种趋势，完全为他们所阻止了。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准备上，单为内部摩擦便延宕了三百年，因为有这一落后便陷入于半殖民地的运命，而身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万箭的簇射。日本在这时候觉醒了来，因其内部无多大阻碍，而其土地又并无多大殖民价值，故尔在我们的掩护之下，它便得以发育了起来，我们对于它的掩护，虽然是无意识的，但事实俱在，是不能否认的事体。至于我们对于它的资料供给和生产品消费，那是更加明而且白，用不着说明的事。

日本人就因为有这种种的便利得以收到成功，但他们却生出了民族的自负心，把自己看得天高，而把我们藐视得一钱不值。他们如肯发着良心思考一下，过去的日本应该感谢我们固不用说，就是现在的日本也多多少少是应该感谢我们。然而日本人不唯不知道感谢，反进而对于我们加以极残酷、极暴戾的摧毁。“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于我们所加的惨害，实在是非人所能为的。毒化，走私，屠杀，横蛮，种种非人的手段都已用尽而犹不足，还要继之以大规模的侵略，轰炸，宰割。人间

---

① 康熙(1654—1722)，即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时曾兴《明史》、《南山集》等文字狱。　　乾隆(1711—1799)，即爱新觉罗·弘历。在位时亦屡兴文字狱。

② 即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史载嬴政系秦相吕不韦之子，故又称吕政。

世尽管怎样的黑暗，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相信，是绝对要受惩罚的。这是当然的公理而且也是必然的事实，事理两方都明白地开示在面前了。

日本因为物质资源缺乏要取材料于我们，又因为多量生产需要我们做它的消费者，故尔我们中国的和平与对于它的亲善是维持日本资本主义的主要的一环。然而日本军部却自行来摧毁它的资源，自行来格杀它的消费者，这不是等于在促进自己的死灭？

日本军部的狂暴行为固然扰乱了我们中国的和平，同时也激起了我们民族间的仇恨。非到理想社会实现的一天，是不会止熄的。民族绝不是可以容易灭亡的东西，中国人也并不那么健忘。中国人现在是觉醒了，这，是把日本的将来暗示着的。

据我所知道，日本的农业是快要走到末路了。东京以东的所谓关东平原，据说，农人因贪便宜，用石灰肥田，积久便使地上结成一片三和土，使种植无由蕃茂。这在日本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日本的出路自然会和英国一样，扬弃了自己的农业而成为纯工商业的国家。然而工业的主要原料，煤与铁，这又是日本所最缺乏的物品，它要发展它的工业也非外求资源不可。这些或许也就是促进了它的侵略行为的物质条件，然而也明白地是促进了它的灭亡的物质条件，它的问题是在我们中国身上求解决的，几十年来我们不作声地替它解决了无数的问题。然而它的贪心却使它增长到要危害到我们民族的生存上来。我们的民族尽管是怎样的宽大，这残暴却

不是人所能忍耐的。

我们现在是醒了。打个比譬吧，日本是一位痨病框子的拳斗家，我们是多数身体结实的庄稼汉。讲打是打不过，讲拚命却有体力来和你拚。我们即使受你的打击，打得遍体鳞伤，打得尸骸枕藉，然而你这个痨病框子的打家，结果是弄得喘不过气，吐血而死。这是对于忘恩负义者的必然的果报。

持久抗战必能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是诱导自这儿。日本的将来也是明明白白的，结果是终归于死灭。

1937 年 11 月 10 日敌机狂炸上海南市的时候

武装民众之必要

我在十二年前到过广州来的。那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我参加了总司令部政治部，便跟着军队一道出发到前方去了。北伐以来，转瞬就已满了十二年，在这期间，我在日本足足亡命了十年，一直到今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在七月尾才脱离了重重的监视，从日本跑了回来。在上海住了四个月，从事于救亡的文化工作，不幸在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了。上海的救亡工作人员都受着敌人的压迫，先后离开，我也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了上海的。直至现在没有想出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又回到了十二年前住过的广州来，在我自己确实地就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十二年前的老朋友会见不少，然而也有不少的老朋友是已经分散了，或则已经战死在沙场或则已经为文化、思想、主义而牺牲，把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宝贵的血液，献给自己的祖国，献给自己的民族去了。回想起这些事来，在我也确确实实地感慨无量，自己都禁止不住眼泪要在眼眶子里汹涌。但是，现在不是我们感伤的时候，不能让

本篇是作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词，最初收入一九三八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集》。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改。

我们沉没在怀古思旧的那种情调里。现在是我们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的国难的确是临到了最后关头了。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我们对于日本的抗战，已经有了整五个月，这五个月的期间，我们的军事行动的确建立过好些次惊人的殊功，前线的将士也表现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行为，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增加了无数光荣的篇页。然而从整个说来，我们这次的抗战，却还没有做到真实的全面抗战的地步。一切的政治机构与社会运动，和前方的军事行动配合不起来，因此我们前方的初期的军事顺利，也就未能确保，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最大的遗憾的。华北的军事上的情形，我不大明了，但关于上海方面东战场的情形，我是比较明白的。有许多事情因为要顾虑着军事上的保密，在当时上海所不能讲的话，现在可以拿来讲了。在九月初头上有一次，我从上海到昆山询问陈总司令陈诚，无意之间也碰着了冯玉祥①副委员长。冯副委员长他亲自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北伐的时候，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在前面作战，后方老百姓便挑茶担水，送菜送饭，做向导，办运输，担任救护，报告敌情，非常的殷勤，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和日本作战，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浴血抗战而后方的老百姓却非常冷淡，比较更接近前方的更几乎逃一个精光，就想要拉夫都拉不得，而且只剩着一些汉奸在那儿活跃？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冯焕章先生对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相信那里面的

---

①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采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道理，他自己已经是明白了的，是他故意提出来促醒我们注意，同时更有意思要叫我促醒大众的注意。因此他叫我做篇文章把那道理阐明出来。其实这道理是很明白的，想来大家都知道，不过有的不便说，有的不好说出罢了。但是这种客气，这种有话不说的客气，我觉得很是危险的现象。国难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彼此都还要客气，大家都要明哲保身不肯得罪人，大家都抱着一个“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那样岂不是甘愿要把国家整个送葬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化除客气，一方面“集众思，广公益”①，一方面要“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大家开诚布公地，有话大家说，有祸大家当，然后我们的国难，才可以得救。现在我们请说到冯焕章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吧。北伐的当时，为什么民众运动与军事行动能够打成一片，而目前对日抗战，民众却和军队配合不起来，反而只剩下一些汉奸活动？这道理是值得我们现在来把它揭穿的。因为十年来的政治活动，便在这儿得到了它的一个具体批判，而战争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同时民众运动有绝对的必要，在这儿也表现得非常显著。在北伐前的民众运动是立在民众本身的利益上，而具有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当时从事于民众运动的指导者们，过的都是很艰苦的地下生活，是一般人所称为“左派”的革命分子。那时的革命标帜在社会上要铲除土豪劣绅，在政治上要肃清贪官污吏，在军事上要打倒军阀。这些都是关于民众自己本身的利

① 语出诸葛亮《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椽属》：“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益，民众本着自己的利益要求来参加行动，所以在极短的期间之内，便使北伐得到了意外的成功。

然而在北伐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以后的政治动向是怎样了呢？在这期间不幸的是我自己在海外亡命，对于国内的情形，不十分明了。然而从朋友方面，从许多事实根据，也略略知道这个动向的一个大概。在北伐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不幸的是革命阵营内发生了裂痕，因而更发生了摩擦，于是一时为了革命势力所制服着的土劣贪污军阀残余的一大群，又摇身一变混进了革命的阵营，在不识不知之间，运动的大纲领掉换了。把民众的解放换为了民众的剥削，而且变本加厉。土劣的比北伐以前更加土劣，贪污的比北伐以前更加贪污。十年来的政治动向，就是在怎样来制服那些所谓“左派”分子，杀头的杀头，投狱的投狱，逐放的逐放，稍稍聪明一点的人也就不敢再说话了。民众失掉了正当的领导，自然也就沉默下来。就在这期间，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得到了机会，不断地进攻我们。“九一八”事变以来，已经六周年，我们年年受着日本人的侵略，算也渐渐地觉醒了起来，大规模的内部摩擦算是停止了。形成了目前的“共赴国难”的团结抗战，这实在是国家民族的最大庆事。然而有许多事体积重难返。例如：十年来的专门制裁“左派”的民众运动，因为种种关系，便一时纠正不过来。民众深切地受着这十年来的教训，北伐时所发出的革命标语并未兑现，而且失掉了他本身的利益，失掉了他应有的指导者，受着重重的束缚，你教他怎样能够起来担负全面抗战的任务呢？十年来从事民众运动的人，我们并不敢说毫没有真

正的革命志士，然而多数机关为土劣分子所把持，使有为的志士一毫没展，这似乎也是事实。土劣分子脱掉制裁，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民众，在战时不是望风而逃，便是又来摇身一变，成为汉奸。汉奸遍地都是，而且潜伏在相当显贵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上，这些都是事实，而同时也就是民众未能尽量起来抗战的理由了。淞沪抗战的初期，陈辞修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到了苏州，而苏州的县长先逃了。到了崑山，崑山的县长也先逃了。凡是我们军队到的地方，总是不容易找着党政当局来接头。曾坐镇浦东几个月的张总司令张发奎，也向我说过这同样的话。这样的情形，你想，军事的胜利怎么能够长久保持？民众的力量也怎么能够起来？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①，我现在把这些往事提出来，也并不是存心想责备谁。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明了了这个缺陷，我们大家便应该急起直追的来填这个缺陷，“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更何况我们的羊还并未亡掉！我们的抗战虽然经过了四五个月，其实还仅由序幕战而达到主力战的过程，以后我们抗战的时期，应该还是相当长远的，民众运动要和军事运动配搭起来，才能保障军事的胜利。北伐的成功已经告诉了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恢复北伐时代的政治纲领，尤其是把民众运动彻底解放出来的时候了。彻底解放民众运动的步骤，我觉得最先应该化除一切党派的成见。所谓“精诚团结”，我们要真真正正地做到，实在的，只有彼此真正的“精诚”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团结”。在国

① 语见《后汉书·张衡传》。

家之前没有党派，在民族之前没有个人，我们应该大公无私，努力救亡图存。

其次是应彻底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目前除掉汉奸理论、汉奸集合之外，在救亡的大前提之下，民众的自由是应该充分允许的。要允许民众运动的自由，自然就先要废除妨碍民众运动自由的那些障碍。社会上的土劣，官僚中的贪污，应该加紧的加以制裁，应该把官绅的利益置换为民众的利益。官吏本来是人民的公仆，这层意识应该加以醒觉，尤其必要的，在目前是应该武装民众了。目前我们在前线上抗战的士卒，伤亡颇重，须得有多量的预备队来补充，非把各地的民众武装起来，在兵员补充上就要发生障碍。尤其是敌人深入了之后，我们除正面和他作主力战或阵地战之外，在敌人的后方应该利用游击的战术。所谓"奇正相因"①，我们才能制胜。在这儿上海的失陷是一个殷鉴。因为上海四周的民众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这已经使我们初期的军事胜利未能确保，而在敌军深入之后，我们的民众，也因为赤手空拳，无法打击敌人的后路。听说浦东一带的敌兵，剩下的只有几十个人，而我们的十几万民众是在少数的汉奸傀儡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的。这事情说起来实在可以令人痛心。假如我们的民众有了组织，敌人决不敢轻易地长驱深入。假如我们的民众已经武装了起来，便可以充分运用游击战，打击敌人的后路。因此我觉得这武装民众是再也不能迟缓的事了。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

① 语出《淮南子·兵略训》："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

但因为是沿海的省份，而在经济上又是顶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海口，因此，这儿是敌人所注目的地方，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现在敌人已经天天都来轰炸，在什么时候他还要大举来犯，那是谁也不敢断定的。因此我觉得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而且广东是革命的发祥地，民众是有过组织经验的，组织起来比别的地方应该更要容易。还有广东乡下所散存的枪枝很多，据一般的估计，约在八十万以上，这要使民众武装起来也比较容易。广东的民间有这样多散存着的枪枝，正应该趁早的活用起来使它在救亡运动上发生力量，这应该一刻也不容缓了。敌人未来时，前方需要战士的补充，敌人既来后，后方需要游击战的执行。这些都昭告着我们有武装民众的必要。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广东民众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国家处到最严重的关头了，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力量，保卫广东，保卫中国。

1937年12月20日

饥饿就是力量

我们和敌人的抗战已经快要半年了。天津、北平、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均相继沦陷，在一般浅见的人看来，会以为我们是失败了，但其实这是应有的历程，我们是早已觉悟着的。敌人的军事准备比我们好得多，敌人之想兼并我们，处心极虑的已经经营了几十年，而我们对于敌人的防卫准备是仅仅只有几年工夫的。我们以几年工夫的火迫的准备来和在新式国家的建立上已经成功了的敌人抗战，在短期间之内要想克服它，要想保持得自己祖国金瓯无缺，那在事理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的战略只是在消耗敌人，只是在使战期增长，战线延长，诱敌深入，使敌人终至走到自行溃灭的一步。

敌人是外强中干的，在支持其为近代国家的必要条件——物质的资源上，异常的缺乏。几十年来是我们把资料供给了他，并以多量的消费促进了他的生产。因此，他的工商业便勃兴了起来，蕞尔岛邦便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的强国。这原因，我们如明了了，我们便丝毫也没有悲观的必要。有利于敌人的是对于我们的和平榨取，有害于敌人的是对于我们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广州《救亡日报》。

武力侵略。蠢悍的敌人，却采取了后一条路，他的收获只是在日见促进我们的觉醒，而斩断自己的命脉。

欧洲大战的结果很明显的昭示我们，德意志帝国在当时并不是不强项，在战事上也屡屡得到胜利，然而帝德结果是自行溃灭了。俄罗斯帝国在当时是世界八大强国之一，而长期战争的结果，帝俄也自行溃灭了。这使帝俄、帝德溃灭了是什么？就是饥饿。饥饿驱迫了帝俄、帝德的人民向他们本国的统制者反战，结果是饥饿的力量克服了武力，饥饿产生了革命。日本的末路是明白地摆在那儿的。战期延长，战线扩大，必然使他的产业产生恐慌，早迟便有第二种的力量产生出来，和他现时的唯一的军部力量相颉颃，而驯致社会的质变。是的，饥饿就是力量。这力量在敌人是促进他的溃灭，而我们是促进我们的复兴。我们受敌人的压迫太甚，所失陷的土地愈多，为饥饿所迫的难民愈众，我们对于敌人的敌忾便愈见加强，而抗战的力量便愈见增大。我们是在和敌人争生死存亡，而敌人的生命的的确确是操纵在我们的手里的。

我们以前让它生，所以它强项到了现在；我们今后要叫它死，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死在世界的面前。

抗战半年来的结果，我们是诱敌深入了，消耗了它的不可计数的兵力、火力、财力，敌人的内部已经在发生着动摇，四处都在酝酿着反战运动。敌人的军部正在用尽他的力来加以镇压，连他们的内务大臣都由现役的海军大将末次①来充任了。

① 即末次信正(1880—1944)，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

这位末次是海军里面的法西斯派的领袖，据说，他不久还要驱逐日本的现任首相，取其地位而代之。日本的宪法是标榜着“军人不干政”的，然而他的现役军人，就象把国际公法毁灭了的一样，把他们本国的宪法也一概毁灭了，继之而起的应当是已在酝酿中的议会制度的废止；政党的解散；金融机构的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这些事实，大约就在这几年之内便可以次第演出的。

抗战半年的结果，我们自己的内部更见团结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更见坚强了。国际的同情也翕然集中于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太平洋上酝酿着，我们丝毫也没有悲观的必要。我们只应该加紧团结我们的内部，组织我们的民众，使民众的军队紧密地打成一片，肃清汉奸，拥护全民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1937年12月29日晨

抗战与文化问题

“抗战与文化问题”——当我接受到这个命题的时候，首先在我脑子里所浮现出的，便是医学上的一片理论。

我们人体是有自然疗养力的，凡是外来的细菌或它种物质侵入了体内时，体内的自然疗养力便发动了起来向异物抗战。这抗战如是局部的便呈现出局部症候，如是全面的便呈现出全身症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疾病的原理。所谓疾病就是异物的侵入和对于这侵略者的体力的抗战。这侵入和抗战如是局部的，倒无关大局，如是全面的，那情形便很严重。在这严重的全面抗战的时候，所有的体力几乎都集中于抗战的一点。凡是过高的精神活动和体魄劳动都是停止了的。最活跃的要算是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其它各系统的活动多多少少是呈示着静止的状态，而且有必要呈示着静止的状态。要这样，一切的力量才能集中于抗战这唯一的目的。

所谓医学也就是在于帮助人体的自然疗养力，除掉对于某几种病症有特效药，能对本治疗之外，所有一切的医术可以说都是对标治疗。这对标治疗的根本原则，是要促进对于抗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汉口《自由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原题为《抗战与文化》。

病必需的体力之集中，而驯致不必要的活动之静止。如打强心针，如养气吸入，这便是帮助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活跃。如禁止作过度的思考，禁止感情的激动，禁止用硬性或有刺激性的食物等等，便是驯致静止状态的必需的法门。故尔平时的营卫和病时的摄养，情形有点不同，甚至有时相反。如平时而打强心针，那于身体不唯无益，反而有害；病时而作过度的思考等等，结果是促进病势而至于死亡。

我想，当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遇着外敌的侵入而起来抗战的时候，那抗战过程和对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国家或社会的处理，应该和人体的抗病过程与医疗方术，在原则上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外寇作大规模的侵略，引起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全面抗战，使它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的时候，那情形和人体的得到重症，是相差不远的。在这时，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力量便须集中起来，在抗战上形成一个焦点。凡于抗战有益的活动便受着鼓舞，而于抗战无多大直接关系或甚至有害的活动便受着抑止。这种情形的出现，有时是超出乎意识以外，大约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社会是同样地具备有自然疗养力的。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中国的目前便是最好的一个例证。自从“八·一三”以来，所有国内的种种颓颇状态几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力量也渐渐地集中了起来，或已感觉着有集中的必要。就单拿文化问题来说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盘欧化的那些空洞的争论，似乎早已是停止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敌言论、抗敌诗歌、抗敌

音乐、抗敌戏剧、抗敌漫画、抗敌电影、抗敌木刻等，举凡于抗战过程有益的精神活动。而最显明地受着了抑止的却是一两年前风靡一世的幽默情趣和所谓渡越流俗的“反差不多”运动①的那种潮流。这是当然的，在目前须要打强心剂，须要养气吸入的中国，在抗战已成为了流俗的中国，而要继续幽默下去，过着清高的渡越生活，那径直是非国民的态度。

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越和大众绝缘，而减杀抗敌的动力。对于在全面抗战期中的社会而要求它作高深的理论的了解，卓越的艺术的欣赏，那等于是对于重症患者要求他作过度的思索并摄取甘美的饮食，那并不是在爱他，其实是在害他。社会的“自然疗养力”便是对于在抗战期中的一般处理的绝好的指标。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这对于文化活动的要求，便是需要它充分的大众化，充分的通俗化，充分地产出多量的成果。但要使大众和文化能够迅速而普遍地接近，在文化问题的本身之外有必须预先解决的政治问题，便是除掉汉奸及汉奸理论的活动当制止之外，所有一切于抗战有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应该许以彻底的自由。要有这种自由，然后大众才有接近文化活动的机会，而文化活动也

---

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报》副刊发表炯之《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认为近几年来“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并说：“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此文在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应。

才有普及于大众，并深入于大众的可能。而从事于这种文化活动的人员之多量的养成，即是战时教育的实施，不用说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真确的，所谓抗敌理论并不怎么高深，否，实在是极端的单纯。敌人的大规模的侵犯是企图灭亡我，我如不起来抵抗，便是坐而待亡。但敌人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缺乏种种的资源，所以才来孤注一掷地对我作大规模的侵犯，我如彻底的加以抵抗，便是断绝敌人的资源而促进敌人的灭亡。所谓“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的理论，的的确确是很简单的，但我们需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理论，并需要有多量的机会来发挥这种理论，务使理论化而为行动。对于这种理论的表现和发挥是应该不厌其繁复的。因为理论虽简单，而对于大众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众既需要简单的理论，而尤需要这种理论的翻来复去的重述。普及并深入于民间的民话和箴言，所含的理论并不怎样高深，有的重述了几千百年，而大众并不加以厌弃，否，反而愈感觉亲切。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就是条件反射积久而成为无条件反射。故尔我们总要把抗敌理论这个简单的条件，刻刻在大众中生出反射，处处在大众中生出反射，使他习惯了便自然地群趋于抗敌的一途，而毫不踌躇，毫不顾虑。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着了为虎作伥的嫌疑。这种

想念，在我们文化人自身是应当彻底克服的。

要之，(一)在抗战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个焦点。(二)抗战必须动员大众，因而一切文化活动必须充分地大众化。(三)在使大众与文化活动迅速并普遍的接近上，当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彻底自由，并要求战时教育的实施。(四)抗敌理论不厌其单纯，并不嫌其重述，应该要多样地表现它，并多量地发挥它。(五)对于抗敌理论嫌其单纯，嫌其重复的那种“反差不多”的论调，或故作高深的理论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实上是犯着了资敌的嫌疑。——这些是我在这篇小文中所拉杂地叙述了的几个要点。

1938年1月18日夜

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对日抗战业已经过了七个月，现在是已经达到第二阶段了。在第一期中，有我们英勇的将士在前面浴血抗战，给予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博得了国际间深厚的同情，这完全是事实。但是，现代的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作战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立体的战争了。我们现在是以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整个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是以我们全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我们知道，凡是在作战期中后方的民众运动必定要和前方军事行动严密地配合起来，然后才可以得到胜利的保障。前方的军事行动有军事上的指挥者负责，而后方的民众运动便要靠文化人来多多努力。文化在抗战上演着重大的节目，把敌人进攻我们的态度来看，便最足以明了。无论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敌人每进攻我们的一个据点，在以猛烈的炮火毁灭我们军事上的工事建筑之外，同时还要摧毁我们的一切文化机关，毁坏我

本篇系作者在长沙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讲演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广州《救亡日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们的学校和图书馆，封锁我们的报章杂志，逮捕并枪决我们的智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敌人，明明白白是把我们的文化力量看得来与军事力量有同等的重要的。我们文化人，应该要认清楚这一点，要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运用自己的才能，通力合作地抢做救亡工作，然后国家民族才能够得到最后胜利的保障。

抗战半年的结果，不错，我们在事实上是沦陷了广大的土地，死伤了几十万的英勇士兵，并使好几省的同胞流离失所，这在表面上看起来象是失败了。因此，在目前便酿成了一部分同胞的徬徨歧路的悲观态度，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很危险。这在摧毁我们自己的战斗能力上，比敌人的飞机大炮还要厉害，切实地说，这种态度，简直可以算是亡国的现象。我们应该要首先打破这种悲观的情绪，我们的第二期作战然后才有把握。不然，我们用不着敌人来进攻我们，我们自己便要内溃了。

第一期抗战中我们的牺牲的确是不少，但是要知道，敌人所受的损失事实上比我们还要严重。敌人也牺牲了不少的士兵，消耗了不少的军火，尤其是损失了几十年来在我国各通商口岸上的商业经营。国内的生产事业也因战事的影响大遭打击，敌人的内部现在是渐渐在呈现着崩溃的现象了。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事实来说吧。据最近敌人的报章杂志上的记事看来，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街头游凫着揽客的汽车，近来每到夜间十一点钟便要被强迫着停止运驶。汽车行每隔三五日也要轮流地被强迫停歇业一日。这所表示的是什么？便是汽

油的告乏啊！还有铁路的干线上所运转着的客车，近来也有好些班次停驶。这所表示的又是甚么？便是煤炭的缺乏啊！敌人的军队，大多是部分地现代化，机械化了的。军队愈机械化，所需要的汽油之类的燃料便愈多。这些燃料，日本自己多是不出产的，只好仰给于外。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向敌人施行经济封锁的倾向，汽油、煤炭等一受封锁，敌人的军事侵略就要遭受严重的困难。敌人燃料统制，明明是在表示着这种困难的开始，认清了这一层，我们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念，加强我们的团结，使抗战支持到底。

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所损失的尽管怎样多，然而我们所收获的却并不少。即拿文化人内移这一点来说，也就是抗战的结果，我们所得的好处之一。过去，我们文化工作者大抵是集中在几个大都市里，例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便是文化集中的地方。"八一三"抗战起来以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文化人集中都市的现象不好，大家都在呐喊着文化人内移的口号，然而在抗战初期内移了的文化人却极其少数，大家都集中在都市上，做来做去的都是马路工作。因此，文化宣传的力量便未能十分深入并普及于民间，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便未能严密地配合起来，第一期在军事上所遭受的失败，有大部分怕是应该由我们文化人来负责的。但是，现在好了，各大都市沦陷的结果，文化人便不能不向内移。我自己到过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到处都可以碰见许多文化界的朋友。我们的文化人就便如几簇地丁花的种子，被抗战的暴风一吹，向我们全国分播了来。这一分播，对于国家民族是有莫大的好处的。因为有这

一分播，文化的力量便更能深入并普及于民间，在这第二期作战中后方民众的动员，一定能够和前方的军事行动，更密切地配合得起来。这，在抗战上比增加了无数兵器还要重要。所以，凡事我们是不应该悲观的。一切悲观的材料，我们只要肯朝乐观处想，便都立地可以化为乐观。凡事朝远大处去想，朝乐观处去想吧，要这样我们的信念才可以愈见加强，而有油然的希望发生出来。人人要有希望，然后一切的工作才有兴趣和勇气去担当，而工作的进行自然也就可以更加顺利了。

总之，文化的力量是推动后方民众的飞机头，文化人内移已经是我们所获得的一项胜利品。然而目前程度的内移，在我看来，还很不够。因为文化人依然集中在后方的大都市里，这比在上海、北平时虽然已算是内移了，但还没有十足地深入于民间。因此我倒生出了一个对于文化人的希望。便是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散播得愈广，受文化宣传的民众便愈多，最后胜利的保障便愈见加强了。

其次，我们文化人，尤其文艺工作者，有一种通病，便是过于洁癖。但我这儿说的洁癖是文字上的洁癖，至如那些高抬身价不愿与民众接近的文化人，那根本不是我所说话的对象。文化人在文字上的洁癖是一方面过于修词，一方面不愿意说重复话。这后者的不愿意说重复话，对于宣传上是大有不利的。文化人每不肯耐烦，一种理论或一种言语，如说过了一遍便不想说第二遍。不仅不愿意自己说第二遍，而且不愿意听别人说第二遍。如一种话头说得太多了，便要烦腻起来，轻轻

地批评一句，说“大家都差不多”，或“仅仅是那一套”。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尤其是在目前。目前的战时文化是应该注重在宣传上的，而宣传的对象则是民众。我们应该以民众的水准来做标准。民众是很朴讷的，民众是不惮烦的。同样的言论，只要你肯亲切地对他说，就说上千百遍也不会烦腻。譬如民间的童谣童话，民间的山歌故事，那不知是唱了多少年，说了多少遍，然而一点也没有失掉它们的魅力。据此可以知道，“差不多”并不要紧，反而是值得欢迎的现象。假使抗敌的理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说得来差不多，那正是我们的宣传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效果。抗敌的理论是很简单的，并不费怎样高深的头脑。如对于这种理论要想差得多，那怕是只好去唱道汉奸理论去。所以“差不多”的现象倒值得欢迎，我们倒应该来喊几声“差不多”万岁！我对于文化人的第二个希望，便是不要怕“差不多”。

第三，我觉得我们文化人也有好些是呈现着彷徨歧路的现象的，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因为自抗战以来，有好些文艺工作者几乎完全把自己的工作停止了（自然我是诚恳地希望着他们在从事着伟大的名山事业）。又有好些人，一见面总是说没有工作做，或者说请你把点工作给我做。我觉得这种倾向也不很好。目前在抗战期中，到处都是工作，在动员广大的民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文化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不应该存一个等待的心理，一定要做甚么不平凡的工作。还有人爱叹息，说工作做不通。当然无论做那一样工作，并不是怎么容易的事体。困难是难免的，但要有诚意去

克服那困难。凡真是有诚意的人，我相信工作没有做不通的。从前拿破仑说过"'不可能'是愚人字典中的字"，我们现在可以改为"'不可能'是无诚意者字典中的字"。只要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地做去，便自然会有贡献。工作在等人，不要等工作。

在这儿倒有一件事体值得向诸位报告，那是现在流亡到汉口的一个"孩子剧团"①。他们的团员有二十多个人，顶大的不过十九岁，顶小的只有九岁。他们大抵是上海杨树浦工厂里的工人子弟。战事一起，他们的家烧毁了，父母失散了，便流落在难民收容所里。起初是几个孩子碰在一起，据他们自己说：那难民收容所里的生活，简直是猪狗一样的生活，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一点可做的工作也没有。那几个孩子便不甘过这种猪狗生活，团结起来干些歌咏演剧的事体。收容所的管理人不高兴，说他们捣蛋。管理人说："你们如要捣蛋，我便要叫你们滚蛋。"孩子说："滚蛋就滚蛋。"于是乎他们便从第一处的收容所里"滚蛋"了出来。他们又辗转地改换了好些地方，最后进了法租界马斯南路的国际收容所里，在这儿他们的工作价值才被人认识了，团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了。他们时常对于所内难民乃至所外的市民做工作，一直没有懈怠。上海沦陷后，他们有一次被请去作歌咏播音，顺便说到他们有意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工作。于是有同情的人送了他们三百块

---

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于上海，成员大多为难民收容所的十二、三岁的儿童，吴新稼任团长。一九三八年一月流亡到武汉，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亲切关怀，被纳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编制。

钱，他们把来作了路费。他们由南通逃到镇江，又由镇江逃到了徐州，经过了很远的路程，又才逃到了汉口。据他们自己讲起他们逃难时的情形，小兄弟们的聪明实在是有为我们大人所不能及的。他们说："他们由南通到镇江的时候，沿途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插入难民群里面混充他们的儿女。就那样便逃出了敌人的虎口。"这聪明，这组织能力，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九岁的小孩子晓得抢工作做，而我们文化人中似乎有九十岁的大孩子都还在等工作做。我们不是应该惭愧吗？

"孩子剧团"的存在，我在上海时早就知道的，但没有去看过他们，这次到汉口去才和他们见了面，真是受了莫大的感动。是我们这一辈人太不中用，没有把中国弄好，以致弄得一群孩子失去了他们所应有的一切保障和教养。而他们却自行组织了起来，工作做得满好。他们能够自己教育自己。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孩子，中国是绝对不会亡的。我们大人们，学学孩子吧！

1938年2月15日晨于长沙

长沙哟，再见！

春天渐渐苏醒了。

在长沙不知不觉地便滞留了二十二天，认识了不少的友人，吃过了不少的凉薯，游过了三次岳麓山，在渐渐地知道了长沙的好处、不想离开的时候，偏在今天我便要和长沙离别了。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不错，从岳麓山俯瞰的时候，长沙的确是卑。在街上没有太阳而且下雨的时候，长沙的确是湿。但我在长沙滞留了的这二十二天，却是晴天多雨天少，长沙所给予我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

可不是么？那平淡而有疏落之趣的水陆洲，怕是长沙的最好的特征吧。无论从湘水两岸平看，无论从岳麓山顶俯瞰，那横在湘水中的一只长艇，特别令人醒目。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淡淡的点缀着，"潇湘"二字中所含的雅趣，俨然为它所独占了。或者也怕是时季使然吧。假使是在春夏两季之交，绿叶成荫的时候，或许感触又有两样吧。

春天渐渐苏醒了，在渐渐知道了长沙的好处、不想离开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广州《救亡日报》。

时候，偏在今晚就要离开长沙。

但我在离开长沙之前，却有一个类似无情的告别。

我此去是往武汉的，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我在最近的时期之内却希望不要再到长沙。

我希望我在年内能够到南京、上海，或者杭州，或者是济南，或者是北平。能够离开长沙愈远便愈好。

待到国难解除了，假使自己尚未成为炮灰，我一定要再到长沙来多吃凉薯。率性就卜居在我所喜欢的水陆洲，怕也是人生的大幸事吧。

春天渐渐苏醒了，我同南来的燕子一样，又要飞向北边。长沙哟，再见！

1938年2月28日在警报中草此

日寇残酷心理的解剖

自从"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寇的大规模的侵略激起了我们的神圣的全民抗战，到现在已经快九个月了，以去年年底为界限的第一期抗战的半年中间，无论在那一个战区，或非战区中，日寇都表示尽了它的惨无人道。他们对于我们无防御的城市，无武装的逃难的老弱妇女，任意施行轰炸。把我们多少有历史的优美城市炸成为了一些瓦砾场，把我们多少可怜的酷爱和平的同胞炸得来血肉横飞，肢体异地。记得去年上海先施公司被炸的时候，有一位年纪青青的母亲被炸死了，手里所怀抱着的孩子只剩下两只脚。这样的悲惨是令人目不忍睹的现象。象这种悲惨的现象，凡是被日寇轰炸过的地方，随处都有。

跟着年头的改换，战争已进到第二期，日寇的惨无人道也更加露骨了。日寇的出征军队，上而官长，下而士兵，都把他们的凶恶的强盗面孔完全表露了出来。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且闹到了杀人比赛的地步。就拿奸淫来说，说来已委实令人伤惨。八十岁的老妈妈，八九岁的小娃娃，都难逃他们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汉口《新华日报》。

魔手。而且奸了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杀了之后还要继之以死后为口舌笔墨所不能形容的侮辱。谁无姊妹？谁无姑母？谁无儿女？凡是中国人，我相信这耻辱是深深地铭刻进了我们的肺腑的。

比这奸淫掳掠更进了一步的大规模的残酷兽行，日寇也在企图中，而且公开地传播出来。根据中央社①由徐州发出的二十二号的电报，说是得到天津方面的确实消息——日寇在山西屡次失利，深受重创，又因河北、山东、山西各处的游击队甚形活跃，因此决心要施行毒辣的报复，打算用几十架飞机，飞到山西、陕北各地去投掷细菌弹，要把各该地的人民和军队全盘消灭。前两天第八路军朱、彭总副指挥有“请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人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的通电，也说到三月二十七日天津的确实消息，日寇决计要以飞机百架飞向陕北，向几十县的军民施放剧烈性的伤寒病菌，打算把陕北的几千百万的男女老幼的生命一网打尽。

日寇的残忍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极端残忍的手段，为日本的狂暴军部所采用，不用说是想用来歼绝我们的种族，满足他们的并吞中国的野心。然而我敢于相信，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只有愈见加强我们的团结和抗战力量，因而也就是愈见促进日寇的崩溃与灭亡。

我们要晓得日本的狂暴军部已经闹到了脚忙手乱的程度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本来是已经怀蓄了几十年。他们

---

① 即"中央通讯社"。国民党的通讯组织，一九二七年创立于南京。

的最高的策略是想"以华制华"，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打，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然而中国民族并没有他们所估计的那么"劣等"。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以来，随着日寇的加紧侵略，中国内部也就正比例地加紧团结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以为是决难团结的党派，然而在民族国家的危难之前，把过往的纠纷解消了，亲密地携起手来，完成了有多样性的统一。这统一就象一幅光彩陆离的油画，表示有无限的魄力。日寇是因此感受着了威胁的。它看得最清楚，他知道中国内部如一团结了起来，那力量是不可轻侮的，会使他们的所谓"大陆政策"彻底遭受打击。因此日本的狂暴军部也就决计发动了自芦沟桥事变以来的大举的侵略。这侵略，论理已经就是表现着日寇之脚忙手乱。因为它是怕中国的统一加强了，以后没办法，所以要赶快地下手，来一个先发制人。这在他们发动了战争以后所号召的策略上也是表现得很明白的，便是所谓"速战速决"。他们是想在短期间之内把战事结束，发动了多量的海陆空军，用尽了各种的利器，想要很快地使我们"屈膝"。故在第一期作战中，日寇的残暴是有计划有企图地在执行他们的"速战速决"的战略。

日本军阀为什么要主张"速战速决"呢？这理由很明显，因为他们也知道侵略战争是一种危险的投机事业，他们是冒着绝大的危险来干这一投机事业的。日本本来是外强中干的国家，无论在他们的国内和国外都有严重的危机潜伏着，如在短期内冒险成功自然于他们有利，假使战争一延长了，那就要使他们的国家失掉它的存在。日本军阀的这一战略因遭受了

我们的坚决英勇的抗战而完全失败了。战争一发动了起来，一直没有中止的可能。截至去年年底为止的六个月的第一期作战中，日寇的一切损失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时的损失的两倍。据最近日本政府在议会上的报告，截至去年为止，单在军队的损失方面，士兵的死伤合计有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人，官佐的死伤中，中少将五人，大佐十三人，中少佐百人；破坏了的军舰有十三只，损失了的飞机合计三百八十七架。这数目是决不会有夸张的。此外它的枪械弹药损失自然是不计其数。军事上的损失已经有这样的严重，经济上的损失，也有同样的严重，更是不言而喻的。

"速战速决"的企图既经失败，日寇也就被迫不得不和我们作持久战，倾它的国力来和我们作生死存亡的拚斗。第二期作战以来，日寇的主要目的在东战场是想打通津浦线，在西战场是想囊括山西，切断陇海的交通，然而战争了三个月，敌人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最近山东方面，临沂的胜利、临城的胜利，给予我们的记忆还是很新鲜的。我们把敌人所称为最精锐的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几乎全部消灭了，这是使敌人愈见要脚忙手乱的。"速战速决"的企图变而为"难战难决"的苦境了。在这儿日寇在第二期作战中更加露骨的惨无人道，可以得到正当的说明。那可以说明为自暴自弃的心理表现。

然而这目的就在"速战速决"的、有计划有企图的残暴，只激起了我们全民族的敌忾和全世界的义愤，使敌人的困难愈见增加，敌人在潜意识中是已经达到了瞠然自失的境地了。

因此，在第二期作战中的敌军兵士是受着了死的威胁的。据俘虏兵的谈话和阵亡了的敌兵日记看来，他们的心境都非常惨淡，以为到了中国是只有死，没有办法再回到他们的本国去了。受着这死的威胁，在侵略战争中既寻不出死的价值出来，而战争的结束又遥遥无期，这就必然地要引起心境的颓丧。厌战的心理是必然要发生出来的。勇气不足，不能使这厌战的心理转变为掉过枪口的反战行动，因而更必然地要流而为享乐主义。敌寇的奸淫掳掠，不守军纪，便是这种消极的反战心理的表现。

打算施放细菌弹，同样也是自暴自弃的心理表现。敌人是闹到了甘冒世界的大不韪，以它整个民族的名誉来作孤注一掷之举。敌人的脚忙手乱的情形快要表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作战以来，敌兵的死伤已经在二十万人以上，由这二十万人的死伤者，在他国内所引起的社会悲剧是可以推想得到的。日本的社会是以小家庭组织为基础的，男子在三十以上大抵成家立业，有了妻室儿女。日寇此次的用兵多征调后备兵和预备兵，这些多是三十以上的人，一有伤亡，他们的家族便受着致命的打击。故尔前方的反战情绪必然地要和后方的关联起来。近来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日见高涨，反战的智识分子遭受逮捕的已经有七八千人。日本的反战作家鹿地亘① 目前来汉，据他说来，“今年二月间曾得

① 鹿地亘(1903—1982)，原名濑口贡，日本反战作家。曾任日本普洛文化同盟书记。一九三五年因受政治迫害到上海避难，后参加我国抗日工作，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一九四六年回国。

到佳音，即在川崎已发生一士兵哗变案，其意义甚为重大。川崎一带，乃日本重工业的心脏地带，该地人民在历史上屡有解放民族的运动，故此次哗变，确为全日本之警钟。本人预料继此案后，必有反响，果然不久在日本北方一带，神户、大阪及其它各地，屡屡发生兵变。由以上情形观之，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运动之转机已至，短期内必有惊人发展”。这不用说是使日本军部最头痛的事，他们是受着反战心理的内外夹击。为着想急于解决这种进退维谷的困难，故企图施行最残忍的手段，疯狂的日寇是名实相符的已经发了疯了。

明白了日寇的残暴心理是快要走到末路的表现，我们就应该加紧我们的团结，来促进敌人的没落。敌人的“以华制华”的阴谋虽受打击，但它并没有放弃，在它的军事陷到了“难战难决”的今天，它在企图使用最不人道的细菌战的同时，也是会使用分化的阴谋的。我们要警惕它，不要作无谓的阋墙斗争，堕入敌人的诡计。

1938年3月31日

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救亡日报》复刊词

《救亡日报》随着东战线的烽火的炎上，自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创刊以来，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火力，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足足抗战了三个月，终因军事上的战略的后退，在上海的刊行便中止了下来。

起初我们的计划本是打算在汉口复刊的，但念到广州在文化战线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念到敌人每日都来肆行轰炸，企图溃灭我们这个枢要的据点，我们当得尽力加以保卫，更念到广州的文化界及其它各界的同胞们都热烈地欢迎我们，希望我们在这儿对于保卫工作有所贡献，因此我们便决心把我们这座堡垒，重新在广州建立起来了。

我们的态度是用不着再加声明的，已经有三个月的历史呈献在国人的面前，我们只有继续着以往的步骤，加紧地向前奋斗。总之，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凡是抗敌救亡的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不分老幼，不分新旧，不分男女，不分上下，不分党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广州《救亡日报》。

派，不分阶层，在“团结抗战”的标帜之下，诚心诚意地为国家为民族而携手，而努力，而牺牲。

敌人是在尽力摧毁我们的文化的，所谓“灭国必先灭其文化”，敌人是有意识地在执行着这种毒狠的战略的。敌人不灭，祖国无由复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

朋友们，起来！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砖块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炸弹去轰炸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

1938年4月5日①

① 根据本篇最初发表的时间推断，写作日期应早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鲁南胜利之外因

只要抗战继续，我们便已经走上胜利的途径。因为持久抗战的结果，必然消耗敌人，增加敌人的困难，终至于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只要是在继续抗战，则在抗战的途中虽有一时的成败利钝，而整个地是向着最后胜利的目标迈进。

胜利或失败，必有其在我者的内因，与在敌者的外因存在。内因与外因相推相荡，而后形成为胜利或失败的综合结果。这种因素的分析，可以使往后的抗战得到指示，而促进最后胜利的到来。古人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者，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最近临沂、临城等地的连捷，使我全国军民均振奋了起来，真真是可以庆贺的事。我国之所以得了目前的胜利，自有多数的内因，例如，团结加强，战线配合得宜，将士忠勇听命等等，论者多已侧重于这一方面加以叙述。我现在却想从敌方求其对我作战有利的外因而略略加以分析。

一，师出无名，敌兵厌战。——敌人自发动侵略战以来，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汉口《新华日报》。

鲁南胜利，指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日寇在山东南部发动攻袭，企图夺取临沂，直薄徐州，被中国守军击退。

九阅月，所有调遣来华的军队，多系后备兵与预备兵，对于战争之目的不明，本无充分的敌忾，在第一期作战中复遭遇我坚强的抵抗，伤亡二十万左右，敌虽赖军械较优，获得了初期的胜利，而战争之结束遥遥无期，出征兵士，欲归不得，日日感受死亡的威胁，自必使心境颓丧，而驯至厌战。第二期作战以来，敌军上下骄奢淫逸，军纪荡然，便是这厌战心理的表现。

二，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自我南京、杭州，及山西之太原、临汾失陷以后，战线延长，敌军分裂成为多数单位，力量已稀薄化，而增援复不易。满洲敌军已被调遣入关者有十分之七，余数自难再行征调。由敌本国再调遣新兵来华时，则只好增加敌人财政上的困难，并加紧国际间压力比重之改变。这在敌军首脑部，自然是要加以深长的考虑，而不能不踌躇的。

三，牵制甚多，不易集中。——因战线延长之故，我军于敌前方对阵，于敌后方游击，以牵制敌人。尤其江南一带，我与敌抗拒之兵力特别雄厚，敌人自不能不于南京、苏州等地采取守势，不敢轻易将兵力调动以增援其作战不利之据点。敌已深入，后方辽阔，而我游击部队复四处活跃，将主要交通线破坏，使敌进退两难，化成为海洋中的群岛。

四，士兵哗变，不愿出征。——近来敌国内部屡有出征军士哗变之举，发难是在东京附近的重工业地的川崎，继起则日本北部，大坂、神户一带也均有响应。这种情形对敌军首脑部自是重大打击。敌军首脑部所最畏惧者，即是反战运动，凡有反战倾向的人或嫌疑分子，自战争发动以来，遭逮捕者已近万人。然而反战形势却愈由底层透露出来，将要象达到活动期

的火山一样猛烈地爆发了。有此，于派兵增援上，尤其不能不发生踌躇。

以上为敌人军事上的主要弱点，而同时便是于我作战有利的主要外因。这些外因，并不是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我九阅月间的坚苦抗战所得的结果。这结果随着战期的愈见延长，战地的愈见辽阔，是只有愈见增大的。目前的困难，在敌人方面，不仅无法解除，而且只有日见增加。因此，我们在获得了目前的胜利时，我们对于前方浴血苦战的将士当尽力慰劳，而对于前此九阅月间在各战区内伤亡的将士更当特别致敬，而对于其家属或本人尽力地慰劳。在保障将来的胜利上，我们尤其应当加强我们的内因，以前仆后继之精神，踏着将士们的神圣血迹，勇往前进。

1938年4月5日夜

纪念台儿庄

“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两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算。敌板垣及矶谷① 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残敌正在我包围扫荡中。”

这个消息在目前大约是已经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武汉各界得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真是欢欣鼓舞，人人都在道贺，家家都在庆祝。尤其到了晚上，由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主持，举行大规模的祝捷大会，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汉口《自由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台儿庄，在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鲁南胜利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带又取得歼敌两万余人的胜利。

① 板垣，即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战犯、陆军大将。一九三六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任陆相，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任侵华派遣军参谋长。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矶谷，即矶谷廉介(1886—1967)，曾任日本驻华武官、在华特殊情报部长，后任关东军参谋、侵华军师团长。

虑有五十万人，真真是呈出了空巷空城的壮观。就是这个祝捷大会的消息，我也相信，大约已由各通讯社传遍了全国，甚至由各外国记者传遍了全世界了。

抗战以来已经九阅月，中间虽屡有胜利，但以这次的规模最大，是毫无可疑的。而且自从南京失陷以来，一般民气总不免有几分衰竭气象，由这一次大规模的胜利立即振奋了起来，这愈见增加了这次胜利的意义。这次胜利，在整个抗战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间的转机。它告诉了我们已由被动转而为主动，它告诉了我们已由被击转而为进攻，它告诉了我们只要有艰苦抗战的决心，只要我们能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无论敌人以怎样精锐的部队来，我们是可以摧毁它的。

敌人此次在鲁南作战的部队，即所谓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在敌兵中要算是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板垣，他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是日本少壮军人派的领袖。日本在"二二六"事变的时候，少壮军人们是想拥戴他来做首相的，这次竟由我们把他摧毁了。这一方面固可以壮我们的士气，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挫折了敌人的威风。在这几个月的抗战期中，敌人本已经是受了不少的教训的，经过了这一次的最严厉的教训之后，我想敌人总不会再轻视我们的武力了吧。

日本人的教育，尤其是军事教育，是以轻侮中国为它的大原则的。他们平时不屑于称我们为中华民国或中国，一定要称为"支那"。从日本人口中说出的"支那人"径直可以说不是人。因为它蓄意要亡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种族，故尔总要把我们说得来非常"劣等"。然而轻敌者必败，日本的狂暴军部

在这一次的抗战中总算是受了充分的教训了。

然而日寇的力量我们现在也还不好轻视，抗战以来仅仅八、九个月，日寇虽然已经死伤了三十万人，但我们还不曾消灭它的全部主力。日寇大举图华，所开到中国来的军队，确实的数目虽无从得知，但至少总已在一百万以上吧。仅仅死伤它三十万，还不到它的出征兵力三分之一。加以它得到了教训之后，必然要比以前更沉着，更周详地来对付我们。而且日本人的习性是不肯服输的，吃了一次大败仗，它必然要大举报复，企图恢复它的名誉。还有，日本军部是残酷成性的，被逼到水尽山穷的时候，它便要不择手段地，滥施毒计。就在这次台儿庄之役，它也是使用过催泪弹和毒气弹的。这种毒辣的惨无人道的手段，将来也恐怕有大规模地施行的可能。

因此，我们在得到中途的胜利的时候，我们固然应该表现我们的庆祝的热诚，然而我们的庆祝的表现，仅仅是欢呼忭舞热闹了一阵是还不够的，我们庆祝一项胜利应该要保证这项胜利，要使这项胜利成为步步升高的达到最后胜利的一个阶梯。要想保障胜利，唯一的方法是加强自己的力量。怎样才能加强自己的力量呢？话很简单，便是“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号召如能切实地做到，那就是庆祝胜利的最好的方法了。

譬如我们要提防敌人的反攻吧，我们总得要增加前线的兵力。我们要预防敌人的施毒气，我们总得要增加全国的军备。要想增加兵力，便须得全国的壮丁都有踊跃从军的决心。要想增加军备，便须得有钱的人多多为国输将，把金钱来报

效民族。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一个人的力为国家用了，那力的效用是增加了四万万五千万倍。一个人的钱为国家用了，那钱的效用也是加了四万万五千万倍。还不仅这一点，这力这钱的效用还留存到了后代子孙，那效用的增大是更加不计其数的。

台儿庄这次的胜利的确是可以称为空前的大胜利，我们如要切实地纪念它，因此便应该来一个空前的出钱出力的大运动。“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呼声，已经号召了很久了，但坦白地说，全国的同胞实在是并不曾切实地做到。不仅没有切实地做到，而且还闹到了“无钱者出钱无力者出力”的一种反语来。这，我们是应该警惕的。我们获得了这次的胜利，我们应该自己反省：有钱的究竟拿出了好多钱来报国，有力的究竟拿出了几分力来报国？我们要切实地反省：自己究竟有没有私心？假如是有，那我们便应该消灭自己的私心，把自己的所有，不要说是全部，至少是拿出大部分来报国家的。

台儿庄胜利的确是空前的，但我们决不要使它绝后。我们决不要存丝毫的怠心，我们决不要存丝毫的骄意。这一次的胜利是牺牲了莫大的代价而得来的。九阅月间在前线上伤亡了的几十万士兵，遭了毁坏的无数产业和建设，陷在敌人蹂躏下的几省失地，流离失所的无数同胞，这些都是我们所牺牲了的伤心的代价。这些牺牲我们是应该时时刻刻挂记在心上的。

还有，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战争是长期的全面的战争。从时间上说来，从抗战之日起，在抗战期中无论那一个时刻，

都是与整个时期不可分的。一次的胜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偶尔的际遇，而是每时每刻的抗战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纪念台儿庄的胜利应该同时纪念九阅月间牺牲了的一切死难同胞。

再从地域上说来，无论在那一个战区中的地点，也与整个中国是不可分的。一个据点的胜利固然应该归功于担当该一地点的抗战任务的将士，然而整个前线的战士是有同样的功劳的。因为如无全体的牵制，敌人便得以集中力量来增援，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一个单独的据点的胜利是难以确保的。故尔我们要纪念台儿庄的胜利，同时应该感谢在整个前线上坚苦作战的整个武装同志。

能够明白这战局的不可分性，能够消灭掉自己的私心，切实地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不骄不怠，不屈不挠，一心一德，再接再厉，那最后的胜利便可以确保，而台儿庄的胜利也就能够在历史上永远焕发着它的光辉了。

1938年4月7日

来他个“四面倭歌”

——扩大宣传周广场歌咏会上致辞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

歌咏的声音能把人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并且可以立即化为行动。

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

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

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军士①。

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然而敌不过歌咏的声音。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汉口《自由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① 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得我们歌咏的。

我们在台儿庄歼灭了敌人两个师团，歼灭了敌军两万。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咏来庆祝。

我们要歌出我们前敌将士的英勇。

我们要歌出我们全中华民族的潜力。

我们要歌出敌寇的惨无人道，寡廉鲜耻，自掘坟墓。

我们要歌出我们从千辛万苦之中创造出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几省的失地。

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多的敌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的倭寇驱除。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来他个"四面倭歌"！

1938年4月7日

文艺与宣传

——为庆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今天宣布成立，这个可庆贺的事不仅向我们告白了中华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共赴国难而团结了起来，同时也把文艺的本质昭示着了。

“文艺的本质就是宣传”，在平时颇有一部分人不肯相信，甚且加以攻击，但到了战时却愈见显示着这是道破了一片真理。事实是最好的证人。我们试把“八一三”抗战以来的我国的文艺作品来检讨一下，便可以知道整个文艺界的动向和文艺的本来面目。

自“八一三”抗战以来，中国文坛上所出现而最受欢迎的，大家都知道，是抗战诗歌、抗战戏剧、抗战杂文等等。凡是能够集中力量于抗战有益的文艺部门和作风，大都受着了鼓舞，而作家们的努力于无形之间有趋于统一的倾向。其在一两年前曾经风靡一世的所谓幽默小品和“反差不多”运动，倒反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重庆《大公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系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汉口成立。

销声匿迹了。

主张幽默小品和"反差不多"运动的人大率就是反对文艺之宣传性的人。其实所谓幽默小品与"反差不多"运动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些宣传呢？它们是在向人宣传为文艺而文艺，向人宣传"渡越流俗"的生活。这在平时，在麻醉舆情和维持偏颇的统制上自然有相当的效果，但到了战时，尤其全民族为争生死存亡而发扬蹈厉的时候，便不能不被人抛弃了。这是时代的结论。

真的，无论你是赞成或反对，文艺的本质不外是宣传。这道理我们古代的哲人也早就道破了。古人说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①，我们如把它翻译成现代语，便是"宣传如不用文艺的方式，便不能够深入而普及"。

但文艺是宣传，这是所谓"实如"(sein)，是事实；而宣传当切于人生，则是所谓"当然"(soll)，是价值。价值是须由人力来创造，来策进的。我们既经知道，在抗战期中，凡能集中力量于抗战有益的文艺部门和作风，大都受着了鼓舞而作家们的努力于无形之间有趋于统一的倾向，我们便当策进这种倾向，使之愈受鼓舞而实行统一。因此我感觉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在今日宣告成立，实在是适合时宜而值得庆贺的事。

作家们的意见和流派，素来是不易统一的，如今借着抗战的旋风象海啸一样把它们统一了起来，这实在是国家民族的福利，也就是抗战对于国族的一项赐与。统一就是力量，以

①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前作家们个别地活动着，每每有感觉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而且个别的无统制的活动，有时虽能相生，有时亦往往相杀。现在经过了统一，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有统制的企划，那必然要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然而，仅是形式上的统一却无济于事，为要使这个协会具有着真实的力量，在精神上作家们的团结固是必要的条件，而在物质上使协会本身能够具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倒应该是更必要的条件。就同跟近日在进行着的保育儿童醵金一样，我们似乎应该来一个文艺醵金，或者由政府每月对于协会给予若干的津贴。姑且假定为每月二十万元吧，由这二十万元所产生出来的文艺效果，我相信那力量决不亚于武装同志之一个军团的。

作家和群众生活的接触须得保障，作品的出版须得保障，出版品的流通也须得保障，在在都非有经济基础不可。有了经济基础，然后一切实际工作才能得到展开。到那时再来一个统筹全局的详细的计划或一年计划吧。到那时我至少想向协会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把“八一三”以来的抗敌战史从速编制起来。这需要有广泛的作家的动员，广泛的材料的搜集、整理、编制，而且还需要有广泛的流通——不仅要普遍地流通于全国，还要普遍地流通于国外。这是对于全世界乃至对于千秋万世后的一个伟大的宣传。这个事业是值得协会来举办的。

1938年4月①

① 根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日期和最初发表的时间，本文应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或稍前几天。

把精神武装起来

今年的“五三”至“五九”① 被规定为了“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已经扩展为了全国的运动。有些朋友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主张，以为不如索性把整个的五月规定为“宣传月”，这意思是值得酌取的。便是说，我们的扩大宣传不应该以“五九”为限而告终结，即使“五九”过了，也还继续宣传。再扩充之，即使五月过了，也还要继续宣传。宣传工作应该不间断，不限制，一步一步地扩大开去。

事情委实也太凑巧，仅仅七天之中，纪念日便占有五个。而五个纪念日中，除“五五”② 而外又都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密切地关联着的。“五九”、“五七”③，是难忘的国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广州《救亡日报》。

① “五三”，指“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五月三日，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 “五九”，指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以这天为国耻纪念日。

②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国民政府成立，遂定是日为五五节，亦称五五纪念日。

③ “五七”，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五四”、“五三”，都是这国耻所派生出来的结果。我诚恳地希望着，象“五九”、“五七”，乃至“五三”，这样的纪念日子，只以今年为限，以后便永远从民族史中消灭下去。

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们，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处心积虑地企图了至少三四十年的。请计算一下吧：“五三”已经十周年了。“五四”十九周年了。“五七”、“五九”，更已二十三周年了。这数字所告诉我们的，不是日寇的露骨侵略之久远和我们的雪耻运动之纡缓吗？我们的雪耻运动一日未能成功，即应该日日都在国耻纪念里过活。天天都是“五九”、“五七”，日日都是“五三”。要有这样的精神，国耻的湔雪或者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十年的忍辱含垢，十年的卧薪尝胆，算结晶成为了自芦沟桥事变以来的神圣的雪耻战争。战争已经继续了十个月，早已打破了敌人的“速战速决”的幻梦。敌人的困难是只有随着战期的延长，战区的扩大，而愈见增加的。敌军中的反战行动日渐暴露，敌人的军事公债无法推销，不是明显地把敌人的运命告诉了我们吗？然而敌人是顽强的狂寇，常常不择手段、不顾人道正义而横肆残暴。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要想促进敌人的崩溃，非把我们的雪耻的决心加强，非把全中国民众在精神上武装起来，我看，是不能有十分保障的。

我们的精神实在太萎靡了。烂熟的封建文明持续了过分长久的年代，没有得到蜕变，更加以清朝三百年的无理的统制，养成了一种苟且因循的习惯，毫无积极进取的精神。我们要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目前正是绝好的时期。我们希望全

国的青年受军训，全国的壮丁服兵役，这于民族精神的改造上，必然有很良好的效果。但我们使青年受军训，使壮丁服兵役，所当注意的，不仅是形式上的武装化，而是精神上的武装化。而这精神的武装化不仅是在受训的期间，服兵役的期间当注意，而是应该推广它成为一般的国民生活。要使一般的国民有团结的精神，有强健的体魄，有坚实的生活，有敏捷的行动，道之以学理，辅之以技能，使之御内御外成为一个近代的斗士。中国人能够养成到这种的程度，我相信，日本的法西斯军阀一定不够我们消灭，而全世界的文化，一定要受着我们的第二次的寄与的。

要怎样才能使国民精神武装化，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大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举动，首先只要在日常生活上加以调整，便可以得到初步的效果。古人说"居移气，养移体"①，这在衣食住行中只说到两项，但举一可以反三，衣之足以移气移体，实在并不亚于居与养。中国的服装是应该加以改良的时候了。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实在是无用的长物。不仅糜费材料，而且一穿上长衫和旗袍，精神便立地萎靡了下来，行动便自然纡缓，生活体魄便因而大受影响，学术技能的长进更因此而受着束缚。中国的长衫旗袍，要说一句类似夸张的话，实在是亡国灭种的服装。而这种服装的改革，我看是并不费事的，只要我们放下决心，衣长不过膝，袖长不过腕，除中山装而外，并认定普通中国工农所常用的"短打"为礼服，我看便可以收

① 语见《孟子·尽心上》。

到移气移俗之效。

中国的茶楼酒馆也是应该加以取缔的对象，中国人的光阴和精神，一多半是消费在这茶楼酒馆里面去了。茶楼酒馆之为害，其实并不亚于烟馆。尤其是在最近，宴会之多而且破费实在足以惊人。普遍的一桌席起码要上三十元才可以见客，古人所谓“一食破中人之产”者，现在大家都见惯不惊，而且竞相比赛。这样下去，中国实在是很危险的。国民的食粮政策，政府应该有通盘的计划，现在姑且不论，象目前的饱食浪费的恶习，是应该首先来加以革除的。据我的想法，茶馆的营业可以全废，而宴会的席面也可以定出一种常规。例如簋数的限制、菜价的限制，似乎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假如怕茶馆废止了，闲人没有消闲的地方，那些闲人正好教他去服兵役，服工役。假如嫌菜少了，钱多无浪费处，那些多余的钱正好拿来买国防公债，买救国公债。

日常生活的调整，如切实地执行起来，起初虽会有一部分人感觉不便，然而习惯成自然，这不便也形成了风气，人们反而会以为光荣。消极的调整而外自应该有积极的设施，例如提倡集体学习、集体运动、集体旅行，便可以代替茶馆中的参禅；提倡高级娱乐如音乐演奏、文艺朗诵等，便可以代替徒满口腹之欲的宴会。这样，我相信于国民生活的改进上，一定会有良好的效果。

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一个最不合理的现象，便是文职与武职的待遇之不均衡，武职俸廉而文职俸优。这层，我看也是应该加以改革的对象。假使是可能，一切的文职应该受与武职

同样的待遇。这样做去，一面可以使国家节省费用，一面可以使服务文职者，因物质的限制，而使自己的精神和生活受着变革。服务文职者，至少要在精神上穿上武装。但服务武职者，尤须把自己的精神武装起来。假使虚有其表，而陷溺于因循苟且之旧习，目前的救亡建国的大任是断难担负的。

1938年5月3日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① 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份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份，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倒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汉口《新华日报》。

① 王铭章（1892—1938），字子钟。四川新都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在鲁南战役中，为保卫滕县而阵亡。

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① 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

---

①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曾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十二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

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①

① 刘铮磊（1894—1937），又名家麒，湖北武昌人。国民党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守卫山西忻县时阵亡。

师长，广德的饶国华①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虏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②，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早迟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

---

① 饶国华(1893—1938)，字弼臣，四川资阳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广德战役中阵亡。

② 语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①。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

① 语见《论语·里仁》。

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致华南友人们

离开广州，转瞬已就八个月了。在初离开时本来是想立即南归的，但业务把我缠着，我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但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广州，思念着华南的朋友们的。尤其在这两天，在广州复活了的《救亡日报》看看便要满周年了，朋友们写信来，要我抽身南下一次，我也诚实的在这样作想，但也恐怕是办不到的。

《救亡日报》多承社里的朋友们的劳力和社外朋友们的爱护，使它一直维持到了现在，在恶战苦斗中，也就要一周年了。对于朋友们应该作怎样的感伤，我自己实在是找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表现。我只是虔诚地希望着，努力的朋友们更加努力，爱护它的朋友们更加爱护，使这座几乎是唯一的华南文化堡垒，得以长久维持，发挥它的抗战建国的、唤起民众的力量。

广州前次受敌人连日轰炸，华南的友人们不为所屈，且益加坚强了起来。近见报载：广州市"八一三"献金，异常热烈，有超过武汉"七七"献金的形势。逖听之余，使人异常振奋。这种百折不挠、努力奋斗的广东精神，的确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我希望把这种精神扩大起来，发扬起来，使成为复兴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民族的原动力。敌人已成强弩之末，我们和它抗战了十三个月，已经把它打得来向苏联屈膝了。由张鼓峰事件引起的苏倭间的军事行动，结果由倭寇的屈服而告了一个段落。① 这是我们的英勇的抗战已经走上了胜利的途径的最具体的客观证明。我们要再接再厉，把倭寇打得来向我们中国屈膝。

朋友们，你们大约很关心武汉吧。武汉最近和前些时的广州一样，几乎连日都遭受轰炸。死伤了多数的居民，炸毁了多数的房屋，连庙宇、医院、学校，也炸毁了不少。美国教会所办的文华大学也遭了轰炸，而且有一位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林诚厚② 正在那儿遭了难，真真是足以令人悲愤的事。但是武汉的民气照常热烈，疏散人口的工作，已经做到了相当满意的程度。此后再遇狂炸时，伤亡是可以减少的了。各种宣传的队伍，救护救助的队伍，已经次第进行，保卫武汉的大会战也在积极准备着。

敌人西侵的部队，在长江的南北两岸都呈着胶着状态了。在九江附近的敌人多患瘟疫，为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安庆一带，也有霍乱、痢疾等流行，敌兵受传染的也非常多，一连的战斗兵不足百人。朋友们，你们有的怕读过英国作家威尔士(Wells)③ 的《未来的世界》吧？那里面叙述着倭寇将以二百

---

① 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苏、朝交界处哈桑湖畔的张鼓峰向苏军挑衅，遭到苏军的有力回击，失败求和。

② 林诚厚(1910—1938)，湖北鄂城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法律科毕业。时任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

③ 威尔士(H·G·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长篇小说《巴海姆先生的独裁政治》、《未来的世界》等。

万的大兵进攻武汉，但在到达武汉后，便有霍乱病蔓延，敌人罹病而死者过半，其余逃窜东返，沿途尽为我游击队所歼灭。看目前的情形，威尔士的预言似乎快要中了。

朋友们，我们的确是已经获得了八成的胜利的。在京沪、沪杭等地，我游击队非常活跃，"八一三"的前夜，我们曾经占领过一次上海的虹桥飞机场，这个消息想来各位是已经在报上看见了。山东方面我们几番获得胜利，泰安、临济都相继收复了。山西方面的胜利① 尤其是大规模的。在七八月间的四、五星期中，八路军击溃了四万以上的敌人，敌人死伤者在一万一千人以上，有四百余辆汽车被我俘获了，其它俘获无算。敌人想渡河西侵的企图完全破碎了。

敌人所最仗恃的便是它军事上的优势，然在军事上却呈现出了这样走头无路的状态。至于它的财政上的困难，物资上的缺乏，国际上的寡助，民怨沸腾，军心厌战，在在都是它的败亡的征候。敌人的脚不仅陷在泥里，而它脚下的泥甚且看看便要淹到颈部了。敌人也明白地知道，因此便一方面向苏联屈膝，虽然并不是诚意的，一方面则向我们用尽各种恶劣的手段来猛攻。轰炸我们不设防城市，轰毙我非战斗员的老弱平民，在前线则用毒瓦斯来对待我英勇的士兵，这些违背公约、灭绝人性的暴行是敌人所惯爱采用的，现在又不断地表演了出来。然而这正表现着敌人的焦躁，敌人的挣扎而已。我们早就准备着忍受一切的牺牲，一切的痛苦，而与敌人争生死存亡

① 即平型关战役的胜利。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东北平型关伏击日本侵略军，歼敌一千余人。

的，任何的残虐惨酷都不足阻挠我们的初志。敌人愈焦躁，愈挣扎，我们是愈有获得胜利的把握的。

朋友们，恕我不能再写了。我写了这千儿百字的信，都是偷着空闲的时间，潦草的乱涂出来的，请你们容恕我吧。但最后我还要再说一遍，便是虔诚的希望着，努力编辑本报的朋友们更加努力，爱护本报的朋友们也更加爱护。这是华南的几乎唯一的一座文化堡垒，请你们长久的维持着它，使它发挥更伟大的力量。我听说，稿件每感缺乏，这是希望有文笔的朋友们要不断地源源赐稿。又听说，经济也颇感支绌，这是希望亲爱的读者们想方法使它更能广泛地推销。我时常在幻想着，假使救亡日报社能够自行置备印刷机，能够大规模地扩大起来，和国内的各大报的篇幅相等，不是很能使人愉快的事体吗？我诚恳的希望：我这个幻想不要永远地只是幻想。

朋友们，再见！

1938年8月19日于武昌

后方民众的责任

今天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扩大宣传的第七天，我要向各位谈一谈后方民众的责任。

我作为武汉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的先遣队，是十五号离开武汉的。经过了咸宁、通山、阳新、武宁，更绕道修水、平江，并访问了一次长沙，在昨天晚上才回到了武汉。

前方的情形想来是各位所关心的。因此我想择要的向各位报告一下，希望各位对于前方的需要，加以充分的考虑和切实的执行。

第三期抗战也快要满四个月了。前方的战斗是很激烈的。敌我两方的伤亡均在十万人以上。单拿长江南岸的战区来讲，敌人的第九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几乎全部被我歼灭了。因此不能不有新的补充。有第十一师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师团的一旅在新近开到了。敌人以它优越的武器和设备，更以海陆空军的配合，向我进攻，想企图夺取武汉。我们屡次听见它在广播中声明，说到七月底要得到武汉，继后又改在八月底，继后又改在九月底，然而现在九月也快要过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汉口《新华日报》。

了，大约敌人不两天又要改期了吧。前方的负责的指挥官告诉我们：自九江失陷以来，敌人的进程，每日平均只有一华里。假使照着这样的比例，敌人要想走到武汉，恐怕都要走到年底的。这些不用说，都是我们的武装同志们在前线上浴血牺牲，英勇抗战的成绩。

前方的士气的确是异常振奋，因而可歌可泣的佳话，也非常之多。例如第××师第××旅第××团的营长李树兰，他在岷山大屋一带作战，负了相当的重伤，师长命令他往后方治疗，而他却要求留在前方工作。象这样负伤不屈的精神，在前方是很普遍的。长江南岸的战区多山，我们的将士常和敌人争夺山头，每一个山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要进出四五次。我们的将士们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乃至毒气的袭击之下，作殊死的肉搏战，那壮烈的情景，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和我们的敌忾同仇的精神相对照，敌军的精神则异常萎靡。这儿的原因自然有种种。公平的观察起来，可以说侵略战的师出无名，和一年零二个月的长期战的兵疲师老，要算最大的原因。敌军中厌战的心理非常普遍。由敌兵阵亡者身下所搜出的日记看来，十人有九人都是表示着对于战争的绝望。他们望乡心切，而战事的结束又遥遥无期，因此在敌军中更发生出了"造病"的运动。这运动说来也是最值得同情的。战区中多疟疾，痢疾也很流行，敌兵罹病的很多。有一个时期为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得了病是可以到后方去疗养的。因此大部分的敌兵，便自己有意的去找病害。他们知道疟疾是由蚊虫传染的，晚上便故意把衣服脱光睡觉，让蚊子来叮。他们知

道痢疾多由腹部着凉而起，他们故意让自己的腹部去着凉。这些消息是由俘虏口中和阵亡敌兵的日记中所得到的。有一名叫斋藤繁的敌兵，也热心地采用过让蚊叮的方法，但总是得不到疟疾。他自己十分焦躁，然而结果是阵亡了。那些充作侵略战炮灰的敌兵们，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也委实是可怜的。

然而敌人的武器和设备，究竟是优越于我们。我们的将士尽管英勇善战，而每以血肉之躯，和敌人的炮弹相搏击。我们的伤亡因此也是相当大的。加以敌人因为士兵厌战、战事不能如意进展的结果，近来的前线上更大量的使用毒气，有时甚至用飞机散播。而我们的防毒设备并不十分完备。这在前方是成为了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敌人军部是充分地丧尽了人性的。毒气的使用，要想用人道上的抗议，使它停止，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最近欧洲局势紧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政府对于民间颁布了四千五百万个防毒面具，便是一个很好的实物示教。凡是侵略国，他们根本是蹂躏人道的。只有实质的防卫，才是对于他们的惨无人道的进攻的保障。

前方同样成为问题的便是疾病。疟疾之多，真是多到可以惊人。大约这疟疾是目前成为了战区的那一带区域的地方病吧。我可以举一个事实来向各位报告。有一个政治工作大队的分队，队员男女一共有二十三人，工作非常努力，然而他们之中二十一人是得了疟疾的，疟疾本来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便是金鸡纳霜。这在平时虽然是很容易得到的药品，但在目前的战时和战地，却无法得到。因此，有的竟病了三个月而得不到治疗，在不发病的日期仍然去做工作。每一个人都是面黄

饥瘦，了无血色，有的甚至显出浮肿。他们这样的苦干，说起来是值得令人流眼泪的。政工人员是这样，在战壕里作战的士兵同志，更是可以想象得到了。我们的英勇的士兵，在战壕里一面和敌人肉搏，一面还要和疾病肉搏。这情景，我们处在后方安全地带的人，应该加以深切的思索。我们目前所享受的安全，究竟是什么人给予我们的？是什么人在替我们作保障，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来替我们作保障？

天气一天一天的寒冷起来了。这在前方也成为了迫切的问题。我们处在后方的人，白天如不用毛衣，夜间如不用棉被，已经感觉着不能抵御寒气。然而我们前方的士兵同志，依然是穿着单衣的。晚间顶多也只有一条毛毯。以这样的防寒衣被，使他们在露天作战，这苦况只好请大家设身处地的着想一下吧！这不用说是成为疾病，尤其痢疾的重要的诱因。日本兵故意让自己的腹部着凉，以发生痢疾，固然是"造病"；但我们后方的人，如不迅速的把防寒的衣被输送到前方，也同样的是"造病"。这对于国家民族所犯的罪过，怕还要更深一层吧。

就这样对于伤、病、寒的救护，医药，棉衣是前方目前迫切的需要。有些将士告诉我们打退敌人的办法，但对于救伤、治病、防寒，在目前的前方实在没有办法。这是实在的情形。我们的政府自然是早有通盘的筹划的，但目前是万端待举的时候，在政府的筹措之外，一般的民众应该尽自己所能做到的事体，尽力的输将协助。譬如参加并组织救护队，捐款购买药品，捐募寒衣，这些是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体。这些工作，

最近也在进行。但总嫌有缓不及济之势。前方的战斗所争的是一分一秒，而后方的计划却悬以一月两月。后方的工作一般的说来是太迟缓了，非尽力的赶上绝对应付不了前方的需要。这严重的责任，是全在我们后方民众身上的。第三期的抗战已经四个月，我们的英勇将士已尽了他们的努力。在敌国军阀加紧的蔑视人道，天气又日趋寒冷的目前，要使将士们长久的负伤、负病、负寒，而从事坚苦的抗战，那在我们是太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做国民的天职。万一由伤寒的影响，使前方士气有所亏损，严重的责任实实在在是全在我们的后方民众的身上。

请大家猛省吧！切实地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抢救前方的伤病寒，以保卫我们的大武汉。

1938年9月

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是中华民国的摇篮，是北伐会师的重镇。这个有革命历史的大都市的神圣的对日抗战的三期战中又成了战局的中心。敌人集中其侵华兵力，猛烈进攻，看看也快要满五个月了。敌人屡次扬言，说要在某月某日夺取武汉，然而每月改期一次，改到现在，而武汉依然是我们的。整个的抗战已经打破了敌人的速战速决的迷梦，尤其在这三期抗战中，敌人伤亡了二十余万人，损失了无数的飞机、船舰、军械、弹药，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

在军事上想于短时期之内克服敌人，我们素来没有怀抱过那样侥幸的念头；因为敌人是强横的帝国主义者，蓄心吞灭我国，是已经有几十年的岁月的。我们的最高战略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某高级司令长官曾经说过“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这话是值得玩味的。目前的敌人在军事上虽然尚能保持其相当的优势，但它国内的经济已经发生动摇，精神总动员一直无法发动，人民士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扫荡报》。

兵普遍的厌战甚且已有反战的行动，这些是无可掩盖的事实。

最近，敌人复出孤注一掷的暴举，进攻我们的华南了，这固然是由于欧洲局势的发展，使它感觉到英法的不足畏，然其更重要的原因实是保卫武汉的持久战使它发生了焦躁。敌人是在更加紧地向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敌人的用意是想以扩大战局的手段来结束战争，以为切断了我们通海口的交通干线便可以切断我们的接济，多多攻略我们的大都市便可以牵制武汉的军事行动，愚蠢的敌人真可以说是在"饮鸩止渴"了。

我们的国际交通路口不限于粤海，目前军火的储蓄尚足以支持一年以上的战斗，后方西南西北的经济建设及军需工业在长期的保卫武汉战的掩护之下已有了顺畅的发展，敌人的封锁反足以促进我们节约，促进我们加工。是则敌人的扩大战局反是合乎我们的要求，我们所抱定的原是相为表里的全面战与持久战，战局愈扩大，愈展开为全面的斗争，战期便愈延长，局势便愈于我们有利。"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之乡村与民心"，这对于愚蠢的敌人是必然会领受到的教训。

敌人所占领的大都市已经不少了，但几曾影响到我们抗战的全局？最近则广州又告沦陷了，但愈益增加了我们的敌忾，愈益扩展了我们的游击地区，愈益鼓舞了我们的百粤健儿，我们坚决地相信，华南的战局今后是要完全改变形势的。因为敌愈深入，愈失其海军之优越火力，而交通给养一切均感困难，我们只要不断地展开游击战，终归要把敌人拖得疲于奔命。

武汉现在已临到垂危的时候了，但于整个战局也无多大影响。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在两三个月以前早已不断地进行着了。我们一方面既尽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尽了减轻牺牲，和掩护后方建设的能事。我抗战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的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故尔我们可以断言：敌人的侵入武汉实等于窜进坟墓。最近敌人的论客们也已觉察到了这一点，知道即使武汉攻入而战争也不会终结，大有瞠然自失的神气了。我们的武汉不是对于佛朗哥的玛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愚蠢的敌人偏要来投罗网！

我们已禁不住要以激越的声调来高呼：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1938年10月24日武汉准备撤退之前日于汉口

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战局每转变一次，信心不坚固的人，总要起一次动摇。最近在武汉的撤退准备快要完结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就惶惶然失去了主宰，甚且有身居显位的人竟违背最高国策，梦梦然放出了类似向敌人求和的言论，以淆惑国内国外的视听，那是未免太不谨慎了。

我国的抗战，和普通历史上的两国交绥、争雄图霸的战争不同。我国的抗战是为求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的民族战争，同时也就是完成人民革命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为一切的困苦艰难所阻止。战争的目的达到的一天，战争才能够终结。即是说，要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完全得到保障的一天，战事才可以告一段落。抗日战争是我们五千年来的国家民族的生命的呼声。我们全民族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派别、阶层，都是应该切实的听取，切实的遵循，切实的执行。尤其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们，素来是以唤起民众，教育民众为自己的任务，更应该以身作则，躬体力行，加倍的奋勉，然后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有较大删改。

自从抗战发动以来，文化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相当尽了一些力量。但在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抗战期中，一切的文化工作者，却有普遍的一种偏向。这偏向是什么呢？便是沿着向来的习惯，工作仅仅集中在几个核心的都市，而忽略了一般的农村。这在目前抗战达到更加严重阶段的时候，如不尽量地加以克服，在保持抗战力量的持久和增强上，一定会毫无贡献的。

持久抗战和全面抗战所急切需要的是大众动员，更直切地说，是需要有不断的兵员的补充，需要有各种的战时工作队组织，以为军队的辅助，需要有广大的游击队的发动，以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我们动员大众，要动员一般的人民，使人们自动地认识自己的责任，认识抗战的意义，而甘愿服兵役，甘愿参加各种工作队，从事游击战。除掉一般的城市工作之外，自然是应当以全国广大的农村，广大的农民大众为对象。但是文化工作者却把这一层忽略了，大家都集中在都市地方，所做的都是对都市市民的工作，甚且可以说都以少数知识青年为对象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

工作以都市的市民为对象的结果，一般的水准都不免过高。工作的成品拿到乡间去，便几乎全不适用。例如最能动人的电影影片，政治部所直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自从抗战以来，也制出了一些影片，如象《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①，在武汉及其它各都市上演的时候，也很博得观众的喝彩。但

① 《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两片皆中国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三八年摄制。

有一次拿到阳新的一个农村里去放映，农民们便丝毫也不感到趣味。他们甚且把片子里的穿西装的人，便认为外国人，根本不了解片子里面所表现的是什么意义。这是值得一般从事宣传的人加以考虑的。中国的教育没有普及，一般民众的知识水平还低，这个事实，我们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时时刻刻的顾虑到。

为要纠正偏重都市的错误，今后的文化人，应该分散到乡间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域里去。这可以说是我们的根本原则。我们要分散到民间去，先决的问题是我们须得有刻苦耐劳的精神，把向来所过的安逸的都市生活抛掉，要以最下层的农民生活为生活。同时我们的文化工作的水平不用说要切实的放低，所有一切通俗的旧有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文字上的演技上的，凡是可以利用的东西，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先要去迁就一下才行。能够以农民生活为生活，在那儿切实地学习些实地的经验，对于农民的疾苦、要求、习俗、思想，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在放低文化工作的水平上也就自然有所依据。从这儿，我相信反可以产生出更有力的更踏实的伟大工作成品出来，就恰象从宏大的原野里，产生出参天的大树木一样。参天的大树，在都市的庭园里是不能产生出来的。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文化工作的水平放低，是文化本身的水平提高的要素。同时，不用说也就是一般人民的知识水准提高的要素。

沦陷区域的工作尤其迫切地在等待着文化人。文化人因为习于安逸的都市生活的结果，每逢一个都市快要沦陷的时候，早就一窝蜂地又飞到后方安全地带的另一个都市里去了。

因此广大的沦陷地区便一任敌人和汉奸的各种活动在那儿蹀躏，这径直可以说是文化人的罪恶。大家把头掉过来吧，不要向后跑，我们要往前跑。我们要恢复起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革命先烈们的精神。辛亥革命前中国全部都是沦陷区域，沦陷在清廷的统制下二百几十年，革命先烈们不畏严刑斧钺，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各地做工作，终于把中国光复了。何况目前的所谓沦陷区域，除掉几个大都市，几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外，事实上大部分还是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放弃？文化人应该作为游走细胞，分散到各处的沦陷区域里做地下工作，去教育那儿的民众，教他们组织游击队，或参加既成的游击队，扰乱敌人的后方，牵制敌人的兵力，以企图国土的光复。

其次，我们大家都知道抗战和建国的工作是同时并进的，并且可以说只是一个事业的在现阶段上的两面。我们的抗战为的是建国，要建国必须抗战。两者在实质上是分不开的。无论从抗战方面着想，或从建国方面着想，除掉动员大众要尽量通俗地用文化为工具，以作广大的宣传而外，专业部门的应用和研究，应当是有同样的重要。例如我们要用高级的武器，或对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和化学兵器的防御，都需要有相当高级的专门学识和技能。我们要图谋后方抗战根据地的充实，例如扩充实业，发展交通，举凡一切的建设工作，也都需要有相当高级的专门学识和技能。这些学识和技能，非有刻苦持久的精神是不能够学习到的。在这儿，抗战以来的文化工作者的第二种偏向，而忽略了更切于实际的学术上的探讨，是值得我们注意而加以纠正的。

抛弃了学术的探讨，而从事抗战工作，本来是处在目前的国家境遇迫不得已的行为，并不是怎样可以庆幸的事。近代的学术在中国假如已经进步了，一切产业上的技能假如已经发达了，我们根本不会受外来的侵略。但正因为我们的学术和技能落后，因而一切的产业和设备都落后，故尔招致了暴敌的凭凌。我们在准备不充分的态度中起来和敌人应战，竟已经支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已经可以说是惊人的成绩，但今后要维持这种成绩；更进而使这成绩增高扩大，除掉动员大众外，高级的学术研究和技能学习，是断断乎不可缺少的。这工作自然要多仰仗处在后方的人，然而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都不免呈着焦躁的状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

武汉撤退了。这是有战略意义的撤退。我们在军事行动上不能为狭小的核心而忘却广大之图；更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略长久之计。在文化工作上，我们的文化工作，今后更应该以广大的农村和广大的沦陷区域为对象，努力于动员大众的宣传。而同时也要努力于切合实际的学术研究与技能学习。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应付目前全面抗战的新局面，而达到最后胜利的目标。

1938年11月5日于长沙

复兴民族的真谛

一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

一，富于创造力；

二，富于同化力；

三，富于反侵略性。

二

我们的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历史，直到现在，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依然在世界上焕发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语言、文字、思想、文艺、学术、产业、生活，都有我们民族的特征表现在里面。创造欲望强，占有欲望弱，这是我们民族的第二天性。

我们的祖先把文化创造了出来，使我们本族得到了丰饶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的享受，而同时也使环绕着我们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得到了丰饶的享受。我们把许多民族同化了，或则诱导了他们，使他们也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本能而臻于文明的畛域。

我们的祖先，不仅能创造有特征的文化，并能吸取异民族的文化的精华。印度的佛法，西域的音乐，斯基泰的艺术①，希腊的星历②，都尽量为我们所吸收，化为了我们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使我们固有的文化愈加充实了起来。

故我们在同化异民族和异民族的文化上，都是具有特殊的能力的。

而我们的特性尤其表现于富有反侵略性的一点。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

三

但在清朝的二百六十年的统治间，我们的民族精神，无可

① 斯基泰(Scythians skyehai)，通译西徐亚，原是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后迁到黑海西北，前三世纪建立“西徐亚王国”。西徐亚人善用木头、皮子、骨头或金属制作动物，尤喜制作两兽相争斗的形象，是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品。

② 希腊文化至公元前五——前四世纪臻于极盛，当时在文学、艺术、哲学、天文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星历，就是其中之一。

讳言地是遭了损失。

我们费了二百六十年的间歇性的反抗，虽算终于把满族同化了，但我们的同化力不免因而减衰，而反侵略性亦不免因而模棱了。对于科学文明之不易接受成功，对于和平之无条件的酷爱，使我们由进取变而为保守，由坚毅变而为懦弱，由生动变而为硬化，由自信自力变而为自暴自弃。创造的本能是遭受了锢闭的。

民族在世界文化的竞赛上便因而落伍了，更因而招致了目前的空前的危难。

四

现在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渐渐地苏活转来了。

我们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

1938年12月23日于桂林

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

抗战一年有半，无论在军事、政治、外交、产业的种种方面上，我们都是占了胜利的。我们在军事上一向站在主动地位，诱敌深入，愈诱愈深，使它陷进了无底的泥淖里，不能振拔，因此敌国的内部矛盾日益增加，国际关系日趋孤立，产业民生日就凋敝，和我们恰恰是呈着正反的现象。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和事实，就单举最近敌国内阁更替的一件事来加以诠释，已就是无上的证明了。

敌人的内阁在实行改组了。"七七"事变以来的祸首——近卫内阁，改为了更加一层法西斯化的平沼① 内阁。这所表现的固然是日本军部势力的更进一步，但也是日本的内部矛盾的更进一步。早就在外作最后挣扎的日本军部，现在真可以说是挣扎到最后阶段了，因为对华估计过低，狂妄地发动了这一次的侵略战争，消耗了有限的国力，成为了内外的怨府，心中早就在希望着战争的及早结束，但又没有别的方法来使它结束，只好走到以自己的国运来作孤注一掷的地步。日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桂林《十日文萃》第一卷第七期。

① 即平沼骐一郎（1867—1952），日本战犯。一九三九年一至六月组织内阁，强化战争体制。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人所爱用的成语，所谓“乾坤一掷”，正足以表示日本法西斯派的当前的心境了。请看平沼在昨天举行第一次阁议后的声明吧：“日本今日所处之紧要关头为有史以来所未有，欲克服目前的局势，殊非易易。惟余坚信政府与人民苟能在天皇之指导下团结一致，表现其传统之民族精神，则克服此项困难，并非不可能者。”真真是把本心话吐露出来了。说也奇怪，日本人，尤其日本的少壮军部，不是常常在豪语，说他们得到了胜利吗？然而他们却被逼到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紧要关头”，要想“克服”，都到了几乎“不可能”的地步。平沼以“团结一致”来作为他克服困难的主要条件，正证明日本内部的分崩离析，必须“团结一致”。但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吗？假使能够，近卫可以不必辞职，平沼可不必上台。平沼的上台，其实就是表现日本内部的不能团结，不能一致。军阀想继续侵华，便不得不加强其国内的榨取，而代表着财阀的近卫和池田① 却首先抽身了。财阀政党与军部法西斯派的对立，愈见表面化、尖锐化了起来。因而日本内阁的强化，实在可以说是僵化。一般人推论平沼内阁是短命内阁，那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也必然是短命的帝国主义。

仅仅一年有半的抗战便使敌人陷于不能自拔的困难环境里，这不是我们的胜利是什么呢？仅仅一年有半的抗战便使敌人的困难不易克服，假使抗战再支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敌人必归于崩溃，不是明如观火的吗？“抗战

① 即池田成彬（1867—1950），日本财阀代表。一九三七年任日本银行总裁，次年任近卫内阁工商大臣。

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毫无可以动摇的道理。当然，抗战了一年有半，我们自己的困难也是在增加的，但敌人所受的困难，的确比我们更甚，而且没法解决。只看见自己的困难而没看见敌人的困难，便容易发生动摇；只看见敌人的困难而忘记了自己的困难，便会流为浮躁，两者都是要不得的。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是要认清敌人的困难，以坚定必胜的信念，并要认清自己的困难，尽力想方法来克服。

敌人的困难是偏于生产一方面的，因为军备的扩充，军需工业的畸形发展，使财界和一般产业界均受致命的打击，而军需工业的重要资源又不能不仰给于外。军备愈扩充，军需工业愈发展，便只好使财界和一般产业界愈萎缩，在后者愈萎缩的状态之下却又不能不愈求前者的发展和扩充。这就是平沼所说的不易克服的困难的主因了。日本的陆相板垣代表军部对平沼所提出的七项要求，把这些困难和矛盾，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很想休养生息把中日战争早早结束，但因无法结束，便只好把战争更加推进。所以要“实行扩充军备”，要“增强日德意轴心”，要“充实全国总动员计划”，结果岂不是把中日战争更推广而为世界大战？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自然是必须“增加国家生产力”，“增加对外贸易”，“提高国民精神”。然而日本的生产力，对外贸易，和国民精神，正因为受了战事的影响萎缩了。现在更要把战事扩大，却如何使这些萎缩了的东西增加和提高呢？很明显的只是提高并增加其萎缩的速度而已。七项要求都是互相水火、互相矛盾的东西，就好象干姜胡片与芒硝大黄开在一道，结果是促进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告

终正寝。无怪较为狡猾的近卫不愿意做这个不肖子，而把自己的职位让给那做了十年宰相梦的平沼去了。平沼也不能算不聪明，他也知道困难之不易克服，但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的困难则是偏于享受的一方面。我们是产业后进的国家，敌人的生产事业愈困难，便和我们的生产水准扯平，愈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抗战以来，我们是把好些重要的海口和城市失掉了，也失掉了好些交通路线，在生活上自然要感受着很多的不便，但这些个人享受上的不便，正是促进国家进步的主要原因。海口失掉，我们可以脱离外来货物的羁绊，而使内地的新旧产业处在无竞争的保护状态之下，得到发展和改进的机会。中国目前正是脱掉买办经济的千载一时的时候。事实上自抗战以来许多产业是内移了，内地的交通是发达了，液体燃料也有新的发现，经济界的独立自主的机运已经拓辟了出来，这机运是只有继续增长下去的。因而我们的困难多是享受上的困难，而且是一时性的。要解决这种困难也很容易，就靠每一个人降低自己的生活也就可以办到。我们前方的人都以士兵生活为水准，后方的人都以老百姓的生活为水准。这就是解决一时性困难的最好而又最简便的办法。

我们是坚决地相信日本必败而中国必胜的。为要达到这个必胜的目的，每一个人最初步的努力便是降低自己的生活要求，把有用的金钱和物品节约下来，以供持久抗战和增加生产之用。降低生活，是信念坚定者的义务，是坚定信念的必要条件。生活要求一降低，便容易应变，能够刻苦，信念也就不会动摇。大凡信念容易动摇的人，多是因为生活要求过高的

原故。生活要求过高，稍有困难便经受不起，敌人便从而利诱勾结，于是便沦为汉奸间谍。有的人竟举终身的令名而毁于一旦，这是值得警惕的。因而降低生活，从积极方面来说，有利于抗战建国；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可以减少自己堕落的危险。凡是生物都是有自卫的本能的，就是最原始的生物如原生虫，到了环境困难的时候都要降低生活，以求自己的保存，何况我们还是脊椎动物中的最高级的人！这是起码的自卫工作，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

1939年1月6日于重庆

纪念“一·二八”剪辑

飞机在机场上静静地停留着，
我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
远远望着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
在战区里在敌人的心脏中活跃着的青年。

后天便是“一·二八”七周年纪念了。朋友们要我做篇纪念文章，觉得再也不能迟延了。但我的头脑不知怎的，自到重庆以来，就和这重庆的天气一样，总是每天都有雾了，迷迷茫茫，浑浑沌沌，得不到一点清晰的思路。提起笔来勉强的写吧，也写了几节，实在枯涩得很。

我们的办公室是一间中学校的讲堂。和几十个同事象学生上课一样，联合办公，虽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半聋，却连别人的呼吸，都比平时健旺，不断的在耳鼓上打击。文章是断难写好的，毁了，索性偷些巧，来写它几节诗。也够勉强得很。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重庆《大公报》。

“一·二八”，指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事件。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从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给了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文来了，客来了，仅仅写了四节，又写不下去了。因为又要开会。

以上是昨天下半天在办公室里写文章的情形。结果是文章也没有写好，诗也没有做完。怎么办呢？今天上半天是交稿期了。索性学学我们电影界同志们的手法吧，叫作“剪辑”。把昨天没有做完的东西“剪辑”起来，送给朋友们去告罪吧。表明我实在是写了，并不是躲懒没有写。写不好，没有办法，但我诚心诚意是在纪念着的。

“在第二期抗战的开幕中，我们来纪念‘一·二八’的七周年，这使今年的‘一·二八’已经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而全世界反侵略运动代表大会① 复于此日在伦敦举行，将有四十三国分会代表及四十余国际团体代表参加，而‘援助被侵略国之种种办法’又将为讨论问题之一，‘一·二八’纪念俨然象成为了一项国际纪念日了。

“‘一·二八’仅仅是全民抗战的先声，是正义对于侵略者的一次薄惩。当时我国还在积极准备期中，内部的统一，尚未完成，故隐忍委屈仅以一部分力量对敌反攻，已使敌人受了相当严重的打击。

“敌人对于我国素来是估计得很低的，‘一·二八’以前只

① 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代表会议。“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发起人为薛西尔（Lord Cecil）。详见本集中《和平的武器与武器的和平》一文。

以为我们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和它对敌，中国军队通是脆弱不堪一击的。但经过一次的‘一·二八’，他们的观点便稍稍改变了。他们以为我们中国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是可以作战的，而且战斗力很强，甚至还有位‘支那通’对我们这样说过：‘除掉日本陆军之外，中国的陆军可以横行世界。’

“然而日本人毕竟是愚蠢，愚蠢得令人佩服。他们以为中国只有十九路军① 能抗战，而不知道我国有些单位更要精锐善战。愚蠢的日本军部不明白这层实际，在‘一·二八’遭了一次薄惩之后，依然不知悔悟，又发动了这一次已经继续了十九个月的战争。在这一次，日本人算已得到透辟的教训了。‘不战而屈’的企图，一变而为‘速战速决’，再变而为“速和速结”，三变而为‘百年战争’，可憎亦复可悯。

“日本人尤其愚蠢的，是只知道我军队的力量，而不知道我民众的力量。‘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固善战，然实赖有上海附近及全国海内外民众组织一致加以热烈的声援、鼓舞、协助。武力无民众的协作，是断难制胜的。……”

这便是没有写完全的残文，以下我是还想写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②，便是说愚蠢的日本人更不知道还有全世界维护正义的力量。

结尾我是想写出，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这“最好是当兵”，是我酝酿着的诗的题目。我的意思，

---

① 国民党军队，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蔡廷锴兼军长。原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驻守上海。

② 语出《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以为最切实地在纪念"一·二八"的是前线上的武装同志和战区中的工作者。他们是以生命、血肉，来纪念这个血的纪念的，他们是"一·二八"精神的维系者。我们要想切实的纪念"一·二八"，最好是效法他们，便是"最好是当兵"。

要纪念"一·二八"便须肃清倭寇，要肃清倭寇，便须充实目前抗战的实力。——最好是当兵。

我们在国际上的友人是很多的，但"天助自助者"，我们总要自助，别人才能来助我。所以我们要争取国际上的援助——最好是当兵。

这些意思在诗里也是没有写完的。

"一·二八"纪念已经七周年了。
我们要纪念它，纪念它，纪念它。
纪念它的方法自然是很多的，
各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也就足以纪念它，
但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法中，
我是这样的感觉着：最好是当兵！

人的一生，反正是为服务而来。
而早迟终免不得有一个死的结束。
这个死，希望它切实地有报国的意义，
就如象太阳要下山时的光芒万丈。
这样的死法，要直截了当而且有保证的，
我是这样的感觉着：最好是当兵！

当兵，能锻炼成钢骨水泥般的身体，
活泼无碍，慷慨发扬，倒下床便能睡熟。
生活是那么坚实，明朗，而有秩序，
朋友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骨肉手足，
打得一次胜仗，那用生命所掉换来的快乐，
不是坐在家里所能想象的：最好是当兵！

国家是需要多数的人去当兵的时候。
我们又担负了劝人去当兵的责任。
读熟了兵役法和优待家属的条例，
《日寇暴行实录》① 也翻破了，有的剪成了招贴，
但你自己要想真的问心无愧，
望你的劝告有效吗？"最好是当兵！"

朋友们，请原谅我吧。我把这些残稿剪贴起来塞责。但我要再说一遍，我只是表明我在诚心诚意的纪念，并不希望发表。但如你们所搜辑的文字不够，一定要把这些残稿拿去填补空白，就请题为"纪念'一·二八'剪辑"吧。

飞机在太空中愉快地飞翔着。

---

① 即《敌寇暴行实录》，为揭露日寇在我国各地所犯罪行的图片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纂，一九三八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

我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
远远望着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
在战区里在敌人的心脏中活跃着的青年。

1939年1月27日

世界反侵略秩序的建设

——纪念"一·二八"

今天是"一·二八"的七周年纪念，世界反侵略运动代表大会又选着这个日期在伦敦开幕，我们在这神圣抗战期中来纪念"一·二八"，来响应反侵略，我们首先要对"一·二八"之役的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表示悼念，同时对于声援我们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表示谢意。

我们不妨把往事来回顾一下吧。那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民国二十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继续夺取了我们的东北数省之后，二十一年的正月又在上海向我挑衅，放火烧毁三友实业社的总厂，发动起他们的浪人①在虹口一带巡行，任意捣毁我们的商店。日本海军调遣了大批的战舰到达上海，派遣陆战队登陆，向我提出通牒，要求取缔抗日运动并解散抗日团体。到了"一·二八"的前夜，更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顿②书，限于二十八日下午六时答复。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和平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有删节。

① 日本幕府时代失去封禄、离开主家到处流浪的武士。明治维新后，有些浪人为军部利用，充当侵略扩张的先锋。

② 拉丁文 Ultimatum 的音译，意即"最后通牒"。

在当晚，敌寇便不顾信义侵入闸北，在当时守卫上海的将士和上海的民众便予以坚强的抵抗。“一·二八”的英勇抗战便从此开幕了，在上海一隅便抗战了三十四昼夜，使敌寇屡次增援，三次易其主帅，始得勉强和结。这一次的抗战给与了敌人以相当的教训。当时我自己还住在日本，我军民合作下的英勇抗战，使敌寇惊愕的情形，从他们的报章杂志和个人的口头谈话上，表示得十分明白。有一位日本的“支那通”，曾经对我这样说过：“除掉日本的陆军而外，中国陆军是世界无敌。”单由这一句话，便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日本人的惊惶的心境了。

但是日本人是最器小、最短见的民族。事前总是藐视别人而轻举妄动，事到又只能认识局部而看不到全体，事后更容易健忘而再蹈复辙。日本的国民教育，本来是以藐视中国人为宗旨的。他骂我们中国人是劣等民族，骂我们中国军队是腐败军队，除掉能发动内乱之外，根本没有抵御外侮的能力和决心。经过了“一·二八”的薄惩，算把他们的观点稍稍改变了。但他们的心目中又以为只有当时的十九路军是能够抗战的。十九路军以外没有能够抗战的军队。十九路军一解体，中国抗战力量便消灭了。这真可以说是天大的错误。它只看见我们军队的一部，并没有看及全部，已经是错误；而它只看见军队的力量，并没有看见民众的力量，尤其是错误。“一·二八”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诚然英勇善战，然而实赖有上海的民众和国内外同胞的一致声援和鼓励。当时的战役，几几乎是做到了军民合作的极致的。武力没有民众的合作，绝对的难以制胜，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日本人却连这种明

显的真理和事实都没有见到。就由于有这样的错误，日本人在目前是充分地受着了它的应得的惩罚了。“一·二八”之后，仍继续不断的对我侵略，更悍然发动了这一次的大规模的侵略战，已经绵延了十九个月，牺牲了七十余万士兵，消耗了将近百万万元的军费，由“不战而屈”的企图，变而为“速战速决”，再变而为“速和速结”，然而自己套在颈子上的绞绳，愈挣扎只是愈紧。可怜日本军部的发言人竟吐出“战争百年化”的悲鸣了。“战争百年化”吗？我敢于负责地回答，只是“日本百年化”，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告终正寝。

历史和各种文化的成绩昭示我们：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创造文化的优秀民族，他知道创造的辛苦，同时也就知道文化的尊贵。我们创造了文化，更能慷慨地把我们的文化成品送给和我们邻接的民族，使他们同样沾受文化的恩惠。我们当前的敌人日本民族，也正是受了我们恩惠的一个民族。我们能创造文化，故能重视文化，保卫文化。当文化受着侵害的时候，我们不惜以生命血肉来加以保卫，有时更不惜举全民族的力量来为保卫文化而战，战至二三百年，非达到侵略者消灭不止。我们的历史这样昭示我们：我们民族的潜在力是异常伟大的。“一·二八”仅是这种精神、这种潜在力的小小的发露。全世界人类反侵略的精神都受了我们的感召，阿比西尼亚①和西班牙的护国之战，在精神上多少应该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我们民族的这种反侵略的精神和力量，自从“七七”抗战

① 即今埃塞俄比亚(Ethiopia)。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翌年五月，将阿全部占领。阿比西尼亚人民为保卫祖国奋起反抗。

以来，是逐渐的发扬到它的最高峰了。

对于狂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肯干犯它的逆鳞的。一般的都把它估计得很高，因而便愈加增进了敌寇的狂暴。然而经过了我们这一次的十九个月的抗战，把它一切弱点都暴露出来了。窒息了很久的正义的呼息，由于我们的努力，苏复了转来。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发起和其成立，便是应付着这种机运而出现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力量是逐渐地团结强化起来了。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自成立以来，还不上三年，已经有了四十三个强有力的分会，有四十几种国际团体同它协作，在目前要算是国际上最有力量的民众团体。自成立以来，对于被侵略民族的援助，尤其对于我们的援助，大会是尽了力量的。例如发动各国工友拒绝运输军火赴敌，发动反轰炸不设防城市运动，派遣代表来华慰问，捐助医药和其它必需品，普遍作援华制日之国际宣传等，我们都是应该由衷感谢的。抗战以来，国际上对于我们的援助，出于民众方面者较多，出于政府方面者较少，是明白的事实。有的政府当局过于优容了侵略者，反增进了世界文化的危机，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们深切地知道民众力量的伟大，所以我们更有迫切的希望，希望反侵略大会能够把国际间民众团体的力量更加团结增强起来，督促各个和平国家的政府当局，使他们早早认识：姑息的手段绝不足以维系和平，而只是对于侵略的促进。

真正的和平应该是建设在正义的基础上的各国民族间的

相互友惠。各个民族应各自克服其占有欲望，而发挥其创造欲望，征服自然界的灾害，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和潜力以求人类生活的改进，逐渐地达到幸福的理想的境界。我们所当要求的是这样的和平。为要实现这样的和平，则占有欲望过于旺盛的国家或民族，我们全人类是应该以集体的力量来加以克服的。对于强盗的妥协决不是治安，只是纵容强盗，使它更加扰乱社会秩序。对于侵略国家的妥协也决不是和平，只是纵容侵略国家，使它更加扰乱世界秩序。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假使参加国际联盟的各国，在“九·一八”当时不肯纵容日本强盗，决不会有“一·二八”及“七七”以来的战祸。国联的妥协，直接纵容了日本，间接纵容了德、意，阿比西尼亚和奥大利是为这样的妥协所葬送了。英、法两国的妥协外交，使捷克受了瓜分，使西班牙濒于危殆。然而更大规模的战祸可以因而避免吗？不，不仅丝毫也没有，而且反因而更加深刻化了。美国的孤立派的活动，也同样犯着这样的错误和危险，他们只图局部的安稳，而不顾全世界的和平，只顾少数资本家的利得，而不顾全人类的福祉。事实上目前的世界和人类是不可分的，局部失其平，则全部受其乱。保持少数人的利润，只是增加多数人的祸害。这祸害早迟也还要落在这些少数人头上的。

我们所理解的反侵略运动，应该是追求真正的和平，建设世界新秩序，并逐渐实现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的共同体，在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中，各个民族平等地各献其所能，各遂其独自的发展，相辅相助而决不是相侵相尅。这种并不是怎样玄

虚的难于实现的理想，我们中国在这种理想中事实上已经立国了四五千年。我们主要用文化的侵润来感染并沾溉我们的兄弟民族，很少用侵略的暴力来消灭我们的兄弟民族。越南、朝鲜、日本，虽都同样受过我们文化的感染，我们不曾消灭他们或侵害他们。汉、蒙、回、藏、满各兄弟民族，更在整个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而各遂其平等的发展的。故尔人类共同体和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不可能，在其实现的步骤上，当前的急务是要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的加紧团结，并促进各个民主国家的团结，以集体的力量对于侵略者加以实际的制裁，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反侵略性的民族，“一·二八”以来，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反侵略运动的急先锋。我们目前是为国家的独立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保护世界和平正义而战。我们担当着这种使命，在抗战已进入第二期的目前，自然只有以加紧我们的内部团结来促进全民主国家的和平阵线的团结；以增进我们的工作效率来促进全世界反侵略精神的行动化。兵员的补充、国防生产的充实、战区游击工作的推进，在在都须要我们努力，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直接是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间接也就是对于世界人类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高呼：我们的抗战是为的建设世界新秩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全世界富于反侵略精神的民族，请一致团结起来对于这个目标——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共同猛进。

1939年1月28日

巩固反侵略的战线

最近正尽力在鼓动着和平声浪的敌人，它的海军二月十日又在海南岛登陆了。这项事件对内对外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当局昨天对外国记者的谈话，已经表明：那是敌人想借此以完成它的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威胁英、法、美三国，向全世界挑战。“日军今年(一九三九)二月十日之进窥海南岛，即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占领沈阳，日本之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区容有海陆之分，影响却完全相同”。“九一八”纵容了敌人一次于前，酿成了九年来不断的战祸，不仅我们中国人民受了空前的灾害，就是欧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都同样受了损失的。敌人的野心不仅想并吞中国，想独霸太平洋，而且想统一世界，在这一次的海南岛登陆上可算是暴露无遗了。这一次如还要加以纵容，敌人的海军在海南岛上建立了相当的根据地时，独霸太平洋的形势便以形成，全世界便会永无宁日了。

照昨日的国际情势看来，各关系国家似乎也不能再坐视了。英、法两国首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交涉，质问占领理由与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其期限；并传广州湾的法国舰队，已开足马力向海南岛开驶。美国官方目前虽然尚无表示，但她的舆论界已经一致的惊愕，如《纽约时报》的评论，谓“征服亚洲与征服欧洲，原属一个问题，又可于此获一明证”。这是把敌人的野心揭破了的一针见血之语。

海南岛是中国的领土，敌人虽然登了陆，我们在岛上已有周密的布置，决不能让敌人轻易地占领。因此，敌人的登陆“对于我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但对英、美、法各国的情形是怎样呢？那影响的轻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英国言，海南岛依它所占的地位，它切断了香港和新加坡的海上交通，威胁着英国在新加坡的筑港；就法国言，海南岛距法国所租借的广州湾仅七十哩，距法领安南① 仅一百六十哩，而且是一九〇七年的法日协定② 的公然的违背；再就美国言，对于菲律滨实是莫大的威胁，对于美国最近拟在关岛设防的计划，更是行动上的答复。各国要提出抗议，要发生警惕，是能够理解的。但我们也明白地知道，对于疯狂了的日本军阀，仅仅靠着口头抗议或笔上抗议，是已经不生效力了。假使口头和笔上的抗议，可以生效，那末一九〇七年的法日协定不致撕破，九国公约③ 不

---

① 安南，即今越南。一八八四年沦为法国保护国。

②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在巴黎签订，是日俄战争后有关亚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规定法日双方在中国享有工商业均等权。

③ 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等原则。

致遭敌蹂躏，国联的各种议决案也不致成为废文了。最近英、美、法三国不是曾先后向敌人提出强硬的通牒，声明不承认以武力所造成的一切形势，而要要求敌人遵守九国公约吗？敌人不仅一直没有答复，不仅由其外相有田①在议院中声明无答复必要，甚且用这一次的海南岛登陆来加以傲慢的侮辱了。海南岛登陆，不啻是疯狂的日本军部在英、美、法三国的面孔上打了一拳；对于这种疯狂者的唯一有效的教训，怕也只有拳头的回敬了吧。如不切实迅速地发动实力制裁，疯狂者的侮辱行为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有些朋友在作这样的揣测，以为敌人自从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持续了十九个月，把它三个月吞并中国的预定计划打破了。它的陆军本有一大部分是准备来对付苏联的，但用到侵华战事上来牺牲了不少。敌人的泥足，愈陷愈深，已经弄到了欲进不能欲罢不可的地步。故尔敌人又发动了这一次的海南岛登陆事件，想拿来激动英法，希图他们出来转圜，或者中止他们的援华行动，使中日战事得以告一段落。这一推测，也不能说毫无理由，但英、法恐怕也不会因受敌人的威胁，而向它屈服吧。我自己也有一种推测：我觉得这一次的登陆事件，是敌人内部矛盾的又一暴露。我们知道日本的海陆军部，在战略上是常相对立的。海军主南进，陆军则主北上。海军以英美为假想敌人，陆军则以苏联。在平时争取预算是对立的，在战时争取功名，也每每是对立的，有了“九一八”的陆军的蛮

---

① 即有田八郎（1884—1965），广田内阁外相。

干，接着便有“一二八”的海军蠢动。陆军在“七七”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海军便在“八一三”发动了淞沪战争。海军的发动，照例是出于争功，为陆军所不赞同，但在既已发动了之后，它们也只好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是日本军部的冒险行动的向来的惯例。这一次登陆，又是出于海军的蠢动。自从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以后，海军失掉了它的活动的机会，我们料到它早迟一定又要蠢动的，结果又有这一次的登陆，愈见把战局扩大了，而且冒犯着诱发世界大战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个动机，可在日、德、意将要缔结军事同盟的消息中，找得它的线索。伦敦十一日发出的路透电，传达着《新闻纪事报》的记载，据说“二月一日意轮‘瓦德’号由沪驶出时，轮上有日本秘密使员三人，其任务为转达日方对于本月杪在柏林召集会议之意见。按此次会议将决定改三国反共协定为三国军事同盟。三密使计为参谋本部代表，海军军令部代表阿部少将，及外务省代表伊藤，日本驻欧洲各国大使公使亦将出席此次会议”。《新闻纪事报》又说“关于改反共协定为军事同盟事，其迟迟不能实现之原因，系日本主张该同盟应专对付苏联，而德意二国则坚持该同盟亦须以对付英法美三国。传上月日驻欧各国大使在巴黎会议时，即赞成请求日政府接受德意之意见，因此乃有此次之柏林会议”。这种消息，早就有传说的，大约不会是无稽之谈。但这种同盟的对象，《新闻纪事报》以为“日本主张应专对付苏联”，却不一定全合乎事实。据我的揣想，主张专对付苏联的是日本的陆军军部，但日本的海军军部，一定也是主张要同时对付英、法、美三国的。日本

海军的这一次的侵犯海南岛，也就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向英、美、法挑战，而使日本完全采取德意路线。

日本人是惯爱将错就错的民族，由于这一次的海军的蠢动，日、德、意的军事同盟如果缔订，它的对象一定是同时的对付英、美、法、苏，那是毫无疑问的。

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由于它内部的矛盾对立的力量的偶力，拖着它向着崩溃的路上走。它在大陆上的十九个月的军事行动，已经使它感受异常的恐慌了。陆相板垣在议会中的答辩，说明他们正在补充在战事中已经消耗了的防备苏联的力量。在他们的这项补充还未完成，而且也无法完成的目前，他们的海军军部，又公然在海上要以英、美、法三国为敌，这真是自找末路。剩给英、美、法三国的路，是很明白的，便是与我国和苏联切实地联合起来，形成巩固的和平阵营，以惩膺扰乱世界和平的侵略者和它的同盟。两个壁垒，极森严地对立起来了，要掩饰无可掩饰，要回避也无可回避，所争的只是时间问题；要趁着侵略者的阵线尚未十分稳定，准备尚未十分周到之前，及早的予以实力的教训。

1939年2月13日于重庆

“中国人的确是天才”

“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这是日本的一位老作家秋田雨雀① 对我说的话。

是前年春天了，那时候我还住在日本。东京的一部分留学生要公演曹禺② 的《日出》，扮演女主角的是封禾子③ 小姐，她是才从复旦大学毕业，往日本去留学的。

《日出》一共演了三天，大大地受了日本人的欢迎，封小姐的照片几乎每一家报纸上都印出来了。

我是第二天晚上去看的，偶然遇着秋田雨雀也在，他是看第二次了。他很诚恳的对我说：

“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象《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象封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桂林《救亡日报》。

① 秋田雨雀(1883—1962)，本名秋田德三，日本戏剧家。曾创办艺术座、先驱座等剧团。一九四九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写有剧本《国境之夜》、《被埋葬的春天》等。

② 曹禺，原名万家宝，一九一〇年生，原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剧作家。作品有《雷雨》、《日出》、《北京人》等。

③ 即凤子，原名封季壬，笔名禾子，一九一二年生，广西容县人。戏剧家。

我对他说："封小姐还是一位大学生呢。"

"是啦，"他立即回答着，"我昨晚同她谈了好一会，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天才。"他那一头的银发都荡漾着他的诚意。

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在七月尾上，单身回国以来，将近两年了。我在上海看见过《武则天》①，在汉口看见过《李秀成之死》②，在重庆看见过《中国万岁》、《凤凰城》、《民族光荣》、《战斗》③。这些剧本，我觉得都比《日出》还要进步，而演员的技艺更是有一日千里之概。

当我每看一次话剧，我总要回忆起日本的那位有良心的老作家，同时更要回想起他对我所说过的那番诚恳的话。

昨天我过江去，在中央摄影场的宿舍里，看见了朋友们的《一年间》④的排演。我看见朋友们的废寝忘餐的努力，行动音容的那样动人，我不免又把秋田雨雀和他的话想起了："中国人的确是天才。"

象秋田雨雀那样的人，能把中国人的好处看成自己人一样的好处，在日本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就让我再把封禾子小姐为例吧。

封小姐本打算在日本留学，再求深造，但她受不过日本人

---

① 五幕历史剧，宋之的作。一九三七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② 四幕历史剧，阳翰笙作。一九三八年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出版。

③ 《中国万岁》，话剧，唐纳作。一九三八年怒潮剧社出版。《凤凰城》，话剧，吴祖光作。一九三九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民族光荣》，又名《自卫队》，话剧，宋之的作。一九三九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战斗》，话剧，章泯作。一九三九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④ 话剧，夏衍作。一九三九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的迫害，终于在芦沟桥事变未发生之前便跑回来了。她自己也曾经对我说过好几次，说她那儿总常有刑士和宪兵去麻烦，总不相信她是学生，总说她是专门的演员，而且还怀疑她是借演剧为烟幕的女间谍。她往热海去洗温泉的时候，连赴厕所，进浴池，都有人尾随。因此，她实在吃不消，便打断了留学的念头。

我这也算是——"举一个例"，可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天才，而一般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日本人，是嫉妒我们，尽力阻碍我们的发展的。

但我们丝毫也不要气馁，同时也不要自满。我们中国人不仅在演剧方面是天才，便在任何方面都富有天才，有天才须得努力发展，有天才而不肯努力，那正是有恶意的日本人所馨香祷祝的。

朋友们，我们大家下一个决心，刻苦的奋励吧。我们要把各种成绩提供出来贡献于人类文化，要使全世界的人心悦诚服地这样说：

"中国人的确是天才！"

1939年4月10日为《一年间》的演出写此

发挥大无畏的精神

人的精神活动，不外乎智、情、意三方面，而精神总动员的目标是在最后的意的活动上，便是要使全体国民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认识之下，使“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故尔发动精神的途径也不外乎由智以达意与由情以达意的两种。但理智有深有浅，而情感则老弱无殊，故由智以达意不如由情以达意之较为捷便，详其理论不如列举事实，以言服人不如以身作则，在这儿正为文艺作家开辟出了极广大的活动疆域。

文艺是诉诸情感的最有效的工具，它是要把一切理论形象化，使理论的骨骼，得到血肉，得到色泽，得到呼吸，得到生命，得到一切的声音笑貌，具体的，活鲜鲜的，呈献在人们感受的门前，而窜入其堂奥。作者由形象以表现理论的纲领，读者则因感发而生出实践的步骤。故在精神总动员纲领的实施上活用文艺的各种部门，尽量动员文艺作家从事广泛的活动，也是最方便而且最有效的法门。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原有副标题《论文艺作家在精神总动员中的任务》。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有删节。

但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是人的问题，便是工作者自身的精神修养。要具有这个基本条件，然后工作方能生效。同样的工作，甲为之而漠无影响，乙为之则效果立著。工作的巧拙固有攸关，工作者的精神条件的具备与否，实为最大的契机。文艺工作者如欲用文艺部门以动员国民精神，必须自己的精神先可以做人的模范。必须先有诚意，然后工作方能得心应手，必须先能见重，然后对象方能响应影从。自来有"文人无行"的批判，故在我国虽号称尚文而实则轻文。这原因一多半是在文艺工作者自己的不觉悟，忽略了自己的修养，因而也放弃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在目前须实施精神总动员的时期而又处在当以原动力自任的地位，文艺作家们是应该切实地检点自己，使自己的精神严肃化，使自己的生活合理化，使自己的本身成为一个美好的文艺作品，使人见而生爱，见而起信，见而思齐，那我们的工作便已经做到一半以上了。

有了这精神上的基本条件，当然还须要有确切的工作成绩。抗战以来文艺作家们在工作上的努力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成绩的表现也获得一般人的赞许。但我们觉得还不够，而且不够得有可以令自己惭愧的程度。一般的说来，文艺是落在现实的后边去了。例如抗战以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我们的前线上，在我们的战地内，在我们浴血抗战的前敌士兵中，在我们努力输将踊跃服兵役的后方民众里，正不知有多少，然而被我们记录下来的，却真是寥如晨星。更如严格地说来，我们全体的国民精神在事实上大体已经总动员起来了，而不曾总动员的却反是我们作家自己，这不真是可以令我们惭愧

的吗？

是的，军民间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民间向我们需要，军队间向我们需要，国际间也向我们需要。不知道有多少的国际友人曾经在口头和信札上向我们要求关于这种故事的作品，然而我们提供不出。我们全体的国民正合力在用自己的血，自己的肉，自己的生命，写作动魄惊心的光芒万丈的伟大的诗篇，而我们作家们的笔却好象僵冻着了的一样插在笔筒里，插在银制的英克斯汤德（Ink-stand，墨水瓶）里，插在西装的荷包里，安闲地在做着装饰品，这不是真可以令人惭愧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学贫儿”。我们有好些人在焦躁中企仰着外国的伟大作家，在焦躁中企仰着外国的伟大作品，在焦躁中把大时代的任务、人民的天职、作家的使命忘却了。这种倾向，我们似乎应该发誓：应该尽量的来加以克服。

写吧，我们尽力的写吧，作家所怕的是没有可写的题材，而现在遍地都是题材。作家所怕的是没有能写的自由，而我们的国族正给与了我们以无限的自由。只要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范围之内，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主题之下，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动向之前，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顾虑。而且这范围是多么的宏大，这主题是多么的显豁，这动向是多么的正确。目前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我们应该发誓，应该尽量的来克服我们自己的弱点。

我们不怕敌人，而怕的是自己不振作；我们不怕汉奸，而怕的是自己的荒怠。敌人愈蛮横，只要我们自己的精神振作，

我们终有消灭了它的胜算。汉奸虽猖獗，只要我们无间可乘，那种为万民所唾弃的败类无所施其巧。我们的号召是已经不少了，我们早就号召着要到民间，要到医院，要到战区，要到前线，要到工厂，要到敌人的后方，我们就切实的鼓起勇气来到这些目的地点去吧。到这些目的地点去正可以搜集无限的资料，供给我们的营养。我们即使单抱着一种忠实的记录者的态度也就足以有为了。自己虽不能酝酿成为完整的作品，也可以留诸后代，供给未来的作家。成功不必在我，成仁未可后人。我们文艺作家们是应该发挥大无畏的精神的时候了。

文艺作家是国民的一分子，而且是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应当发誓，使我们所参预的文艺部门切实成为精神总动员的一个动力，发挥我们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向民间去，向医院去，向战区去，向前线去，向工厂去，向敌人后方去；我们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

1939 年 4 月 11 日

争取最后五分钟

——对于失败主义的批判

自从汪精卫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他的《艳电》①，响应日本前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主和以后，他的论调早已经受了最严正的批判。一月一日国民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除他的一切的职务。三月二十一日有海外志士五人在夜间闯进汪在河内的住居，打算为国锄奸，结果汪虽然得免于死，而由他的秘书曾仲鸣②代替了他。这是国民对于他的严正的批判。他受到了这样的批判，我们替汪精卫设想，他假如还留存得有一点国家观念，他是应该警惕悔悟，至少也要做到谨慎缄默才是道理。但他近来却是不顾一切的愈见倒行逆施了。本月初头，他在香港的他的机关报《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举一个例》，为要证明他自己主和有据，他把国民党中央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桂林《救亡日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略有删改。

① 旧时的电报以韵目代日，艳即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由重庆出走到香港发表电文，公开宣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此电文简称“艳电”。

② 曾仲鸣(1896—1939)，福建闽县人。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后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精卫在河内遇刺时身亡。

一种机要文件① 发表了。对于他这篇文章有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② 驳斥他。四月八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答华侨某君书》。任意的诬蔑在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据他说来，好象我们英勇的将士连宋、明亡国时的将士都比不上。军委会政治部前天也针对他这封信，发表了一篇《汪精卫诬陷抗战官兵的罪恶》，沉痛地加以驳斥。除掉汪精卫自己有这些文章发表之外，他的机关报上还不断的有许许多多荒谬的言论，而且他的一派更四处活动，淆惑人心，大有非把整个抗战局势破坏不可的样子。这应该是我们全体国民所碍难容忍的。

汪精卫和他一派的主和论据始终是立在近卫的那个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③ 上。看他们的言论，他们是始终认为那个东西是十足可靠。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近卫的声明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方已加以驳斥，指明它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内容的总暴露；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经过了这样的驳斥，举国的

---

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五十四次常委会曾讨论对日投降的有关内容。"机要文件"，即指此次会议的记录。

② 吴稚晖(1866—1953)，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一九二四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十二日重庆《中央日报》。

③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对华声明中，提出所谓"日中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以"建立东亚新秩序"。

人都洞烛了敌人的奸计，汪精卫却在二十九日还要发表通电来响应；说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并不算亡国的条件。他看见近卫在说不要中国割地，不要中国赔款，他便为他所眩惑了；事实上中国如加入了日本的所谓“新秩序”就无异成为了日本的藩属，而近卫也明白的要求着日本臣民能够在中国的内地自由居住，自由的营业。这就是说中国的土地整个成为日本的领土，他何必还要让你割地，更何必还要让你赔款呢？汪精卫更真的相信近卫声明中所要求的“中国公认日本在特定地点驻兵防共，并将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以及“在华北及内蒙各地，关于资源之开发与利用，应予日本以积极的便利”，即是所谓并非亡国的条件，认为日本所要的只是内蒙华北，而不要华中华南，在华中华南的日本兵可望全部撤退，那中国即使失去一半，也还有一半可以作为小朝廷而偏安，所以说并不算是亡国。汪精卫在《艳电》中，是在这样解释着的。然而在他的《艳电》发表之后，日本方面早就在报上声明，说他是“误解”了。报上的声明自然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把本年正月日本的海陆军大臣在他们议会中的正式的答辩揭举出来。

本年一月三十日在众议院的预算总会上，对于议员北聆吉①关于在华驻兵问题的质问，日本的陆相板垣和海相米内②都有明白的答辩。板垣说在中国是有相当长期驻兵的必

---

① 北聆吉(1885—？)，日本自由民主党总务，军国主义分子。战后主张重整军备，恢复战前的特务警察制度，以消灭日共。

② 米内，即米内光政(1880—1948)，一九三七年任日本内阁海军大臣，一九四〇年任总理大臣，被陆军撵下台。一九四四年再任海军大臣。

要的，因此陆军方面也正在考虑准备半久远性的驻兵的设施，日本兵的衣食住都要取给于中国。又说“自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以后，外面有日本陆军由华中华南撤兵的传说，这完全是谣传，绝无其事”。他还在这句话中加上了“特别郑重声明”之类的字样。米内接着也就称赞板垣，说日本陆军不轻视华中华南，是极妥当的话，又说日本海军对于华中华南即使在事变以后也依然要严加警备，以贡献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这可算是明白可靠的证据了吧。这样明白的答辩，我们相信，汪精卫和他的一派总不会没有看见。所以近卫的声明，就在日本本国也由他们的军部自行戳穿了它的骗局。然而汪精卫却仍然还在相信，既发表了《艳电》，还要来《举一个例》，又要来《答某君书》。他在《举一个例》里面仍然在说近卫声明并不苛刻，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他在《答某君书》里面更用力的说“只要和的条件不是亡国条件，我们就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他的真意不用说依然是固执着近卫声明中的条件不是亡国的条件。再请看他四月九日在《南华日报》上所发表的《重要声明》吧。他说，他既发表了《艳电》，那吗以后的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艳电》，而贯彻和平的主张。他又说，他反对日本再以战事胜利，而变更其觉悟，改变其条件。他对于日本当局甚且还有一个希望，他希望“日本当局，深察事实，推诚磋商，必使中国为一领土主权完整之国家”。真真是在做梦！近卫所提出的条件老早不成其为条件的，你还怕他们把它“改变”！中华民国堂堂的一个独立国家，不能够独立自主，而偏要希望日本当局来“使”我们成为“一个领土主权完整之国家”，

这成什么话！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由汪精卫自己把他已经向日本屈膝投降了的心事具体的表白了出来了吗？所以其它的一切的一切，如《汪平沼协定》①，如派高宗武②赴日乞降，如在沪港两地分头通敌，这些都姑置不论，单就汪精卫自己所公开发表的言论看来，也就足以证明他是存心向日本投降了。

投降就投降，在这些地方也不妨说一点"老实话"，何必一定要说主和呢？究竟还是不大"老实"。

中国并不是好战的国家，要和，我们也觉得任何时刻都可以和，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敌人停止它的侵略。经过我们的长期的抗战，敌国的危机是一天一天的显著了；因而在敌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觉悟到了他自已本国的危险，希望中途媾和，以清灭他们自已的内忧外患。这是事实，我们也并不否认。不，宁是认为这就是中国抗战以来的伟大收获，是我们的抗战把敌国逼近了危机，而生出了求和的愿望，但日本内部的求和的愿望还没有形成为具体的力量足以制服目前海陆军部的主战派的势力，这也是明白的事实，不能否认的。就譬如近卫吧，他刚好把和平声明发表了之后，不久便被逼下野。又看本年度的敌国的军事预算吧，那里有丝毫和平停战的气息在里面？而且最近少壮派的首脑部之一人，小矶③，又新入日

①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签订的卖国协定。

② 高宗武，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成为汪精卫投降日本的谈判密使。

③ 即小矶国昭(1880—1950)，日本战犯。一九三九年任平沼内阁拓殖大臣。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朝鲜总督，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本内阁，担任拓殖大臣了。这些都足证明日本少壮主战派依然还维持着他们的统制权，主和的愿望是还不足以左右大局。因此假如我们这时候便来响应敌人的诱和，那正是中了敌人以华制华，不战而屈的诡计。这样的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求降，我想就是中小学生都可以知道，然而汪精卫和他的一派却始终在那儿执扭地公开主张，而且公开活动，这到底是什么存心呢？

国家对于汪精卫和他的一派似乎不可谓不仁厚了。仅仅开除了汪个人的党籍而没有惩罚他的党羽，仅仅撤去了汪个人的职务，而没有下他的通缉令——不怕举国都在要求通缉他。这仁厚的用意，大约是要为错误者开自新之路吧。汪精卫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他如真心为国，总该幡然悔悟才是。自有历史以来没有永远持续下去的战争，目前的中日战事，早迟也总有一天是要结束的。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至少我们总还要抗战到使日本内部的反战要求足以克制他们的主战派的势力的时候。这时期的到来，也并不会是怎么长远的事。敌人的陆上战斗力是已经削弱了，财政也濒于破产，海上又四面都是强敌，连建舰竞争都使它喘不过气。敌人在高呼着"国难严重"，在高呼着"国难已经到了最紧急的关头"，那些都是实情。所以目前我们正应该加紧我们的反攻力量，以图达到我们的胜利的前途。我们全体国民是应该争取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汪精卫如果不甘愿埋葬自己，目前也是他自己争取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了。

1939年4月23日

绝妙的对照

——请看希特勒替我们痛骂汪精卫

香港的朋友把《南华日报》一篇专论，叫做《德国是怎样复兴的?》剪寄了来。那是费了两天工夫——四月二十四与二十五——才登载完了的长文。作者署名"天游"，不知是那一位才子。凡是《南华日报》上的议论，反正是那一套，老实说，是用不着费时间来看的。但因为希特勒答复罗斯福劝告的演说①，恰巧在今天的报上登出来了，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在我把希特勒的演说看了一遍之后，接着也把《德国是怎样复兴的?》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觉得这两篇文章真是一个绝妙的对照。

"德国是怎样复兴的呢?"果不出那一套公式，在天游才子的高见中是说因为议和而复兴的。他先把欧战四年后德国的内外环境，详细地叙述了一通篇，说到德国的同盟国怎样离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①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希特勒，要求他们保证不对波兰等三十一个国家发动侵略。四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议会演说中拒绝罗斯福总统的呼吁，宣布废除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一九三四年的德波协定，重申对波兰的领土要求。

散，内部怎样瓦解。后来全师而还，倡导和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①，就这样才把德国救了。真真是干脆透顶！且将天游才子的高论照抄一段吧。

"当时德国危险的状态，……国亡无日。苟非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主张和议，则德国即为协约国所瓜分；苟非老成沉着的兴登堡② 支持和议，保存德国实力，则德国即为共产党所乘，而成为帝俄之续；苟非德国人民自动起而赞成威尔逊③ 的提议，推翻战争祸首之威廉皇帝④，则和议无法进行。凡此数者，均为拯救德国的基点，缺一则德国即陷于亡国。而当时代表主和势力，遄赴凡尔塞签订和约的代表赛得曼氏及兰超⑤伯爵，尤具超人的胆识，不畏强暴，不怕险阻，断然行之，……

---

① 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战胜国英、法、美、日、意等为一方，以战败国德国为另一方，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

② 兴登堡(P. V. Hindenburg, 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二年两度当选总统。一九三三年授命希特勒组阁，使政权落入纳粹党手中。

③ 威尔逊(T. W. Wilson, 1856—1924)，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任美国总统，任内促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八年倡议成立国际联盟，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

④ 即威廉二世(WilhelmII, 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在位时推行容克——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强占中国胶州湾，参加八国联军。一九一四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避居荷兰。

⑤ 赛得曼(P. Scheidemann, 1865—1939)，通译谢德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一九一九年二月至六月担任临时政府首脑，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后流亡国外。　兰超(U. V. Brockdorff—Rantzau, 1869—1928)，通译布罗克道夫—兰佐，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德方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

毅然签字，事后即为德国青年所害。赛德曼以一人之生命，易德意志全民族之永久生命，其牺牲为国的精神可垂百世而不朽。”

这不消说还仅是借题，另外是还有发挥的那便是最后的画龙点睛——结论的结论。

“德国人民既运用和平的方法，以挽救其国家民族的危亡，则我国今日的和平运动，实为确切不易的救国南针。……我们景仰德国民族今日的强盛，追想其复兴的途径，使中华民族益自振奋。……我们应该万众一心，争取和平政策的实现。”

这样“景仰德国民族今日的强盛”的亚希特勒们，且看他们的祖师当面便要撇他们几个耳光。真是凑巧得很，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对于凡尔赛和议是怎样批评着的：“凡尽职效忠为国作战者，均有享受公道与和平之权利，然受此和平所欺者，不知若干万人，盖不独我日尔曼人或其同盟之其它民族身受和约之苦，即彼战胜国家，亦皆蒙其殃害，而有毁灭之虞。若夫仇恨、怨毒与无理，皆凡尔赛条约精神上之祖先也。约有一万一千五百万人被彼疯狂之政客而非被彼得胜之战士剥削其自决之权利，并武断的迫其脱离祖国，并入新邦，而置一切血统起源与经济生活于不顾。语其结果，殊属可怖。”

不用再征引了吧。就把这几句话来和汪派的言论对照着，简直是希特勒在替我们痛骂汪派。这是使我感受着无限的趣味的。汪派的人们如果还保存得有几分天良，我相信他们在“景仰”希特勒之余，一定会多多少少的感觉着一些面红耳

赤吧。

希特勒的演说里面还有一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是他把捷克所储蓄的武器报告了一番。为使读者一目了然起见，索性把它写成一个表，揭举在下面：

飞机	一、五九二架
高射炮	五〇一尊
轻炮重炮	二、一七五尊
来福枪	一、〇九〇、〇〇〇支
步枪子弹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发
炮弹	三、〇〇〇、〇〇〇发

有这样多的武器，竟拱手送给了德国，而且在一夜之间把祖国也送了。这是什么在作弄，使捷克上了这样一个大当呢？它的名字是很显豁的，就是"疯狂之政客"——汪精卫们所鼓吹的屈辱的"和平"！

还有，希特勒的演说没有提到共产主义。这也是对于汪精卫的一个无言的教训——"防共"的幌子毕竟连骗人的价值都没有了。

1939年4月29日

青年化，永远青年化

三民主义青年团① 把今年“五一”至“五七”的七天作为青年运动周，并把“五四”规定为青年节，这是很有意义的擘画。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确是值得我们全中国的青年们永远纪念的大有光辉的历史事件。中国的一切是从那个划时代的运动起，透辟地青年化了。我们要纪念它，就是要全中国的青年永远保持着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我们要纪念它，就是要全民族的精神永远发扬着那种青年化的光采。我们无数先烈的心血是在“五四”运动上开了花，这花我们要不断的用心血来培植，要使它永不断绝地开放，要使它永不断绝地结成硕大无朋的果，果，果。

“五四”运动的意义，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它是在抗敌行动中进行了建国工作的最显著的先例。它以抗拒日本的侵略、肃清汉奸、拒绝不合理的和约起，而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这洪流还在前波后澜的奔涌着，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① 简称“三青团”。国民党用以控制青年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组织。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七月组成中央团部，蒋介石自任团长。

并且望它永远不断的奔涌着。在目前抗战建国的工作达到最高潮的期中我们来纪念它，是希望青年们，乃至全中国的同胞，都成为“五四”时代的斗士；是希望万年无疆的与宇宙共悠久的全中国的历史，每一页都充满着“五四”运动的精神，每一日都是“五四”纪念。

一切自然现象的运行都是呈着波状曲线的，便是有上行的轨迹，达到一定的高峰后便要次第的下行。但加以人为的努力，这种自然的运行可以使它生出极度的变化，便是上行的轨迹，我们可以使它上行到无止境的高度，或者达到了一定的最高峰时，我们可以使它保持着这一定的最高水准，永远不让它下降。这便是人类的精神力足以克服自然力的最高准度，也便是人类文化所应当企及的理想的究竟。这便是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①，而达到“至诚如神”的境地。事实上这种“神”的威权，实在是人性所能独具的功用。人的充实便是神，我们充实我们人的精神力量，确是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我们中国民族便是富有这种神性的民族。我们五千年来的生生不息的一部文化进展史，便是充分的证明。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的文化，尽管有兴有替，有盛有衰，或则曾光荣一时而永远消声匿迹，或则突经外患而一蹶不振。但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我们虽然也曾经遭遇过极险恶的外患，但每经受一

① 语出《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次外患，只增加了我们民族和文化的繁荣。我们的民族精神是确实地保持着了它的永远青年化的动向。我们的民族确实是永远不老的。看着便要达到老境了，立地便有一针青年化的血清注射。这妙机是我们能够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去克服自然，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建力的触媒。我们对于自己的反文化的自然隋性能尽力加以克服，对于异族的反文化的自然惰性也尽力的抗拒，更进而使之同化，把人类的大患消灭于未萌。在这儿正表现着我们民族的仁，我们民族的智，我们民族的勇。我们的民族是以仁民爱物为发展精神的指针，以好学不倦为推进文化的动力，以知耻不屈为抗拒横逆的武器。这些是我们的先哲所给予我们的遗训，是亘古不磨的真理。我们中国民族的发展史是把这些真理具体化了的。

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是要复兴我们民族的这种精神——这种自强不息、永远青年化的精神。我们不是象少数法西斯蒂的极权国家那样，高唱着“复兴”的口号以肆行侵略，向着反文化的下行曲线进行。他们的“复兴”只是自趋于毁灭，充其极并将使全人类及全人类的文化同趋于毁灭。那种途辙和我们民族精神的动向根本相反，我们的民族自有历史以来便是反抗那种行径的。我们要复兴我们创建文化的力量，要复兴我们同化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力量。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反文化的隋性，同时也要克服异民族的反文化的隋性。这种反文化的隋性，把全人类拉向无文化状态的堕落的下行曲

线，正由少数的极权国家，尤其是我们当前的寇仇日本，用尽蛮力的在牵引着。我们正要竭尽我们全民族的力量来加以克服，而且我们深信是能够克服的。克服这种隋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条件我们有充分的具备。以往的由外患中复兴的史绩，我们无须乎一一的缕述了，“五四”运动便是一个最显著最捷近的先例。我们震慑了当时的误国媚敌的北洋政府，我们制止了当时的日寇野心，我们相当地提高了吸收科学文明的同化力，而确切地走上创建新文化的上坡路。我们中国的一切，从那时起，确切地又接受了青年化血清注射的一针。有这“五四”运动的成功也就足以证明我们目前的抗战建国之必胜必成是断无疑义。

全中国的青年们，我们尽量发挥我们人性中所具有的神性吧！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自新，把奔向无文化惨状的目前世界的狂潮挽回理想高峰，把我们的祖国和全人类，从危机中救起。一切反文化的隋性——侵略与向侵略的投降——是与神性为对的兽性，是我们当前大敌，我们要尽量的加以克制而使之贴服。我们要保持我们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永远上行，永远前进，要使我们自身的一切，中国的一切，世界的一切，时时刻刻青年化，永远青年化！

1939年5月3日

和平的武器与武器的和平

——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第二次年会宣言

目前的世界，已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世界和平，受着少数侵略国的威胁、扰乱、破坏，不仅到了应当保卫的时候，而且到了应当争取的时候。和平与武器成为了不可分。要想制止侵略，只有砥砺武器来保障和平；而奸狡的侵略者，竟假借虚伪的和平以作为他们侵略的武器了。侵略者既已挥动着武器的和平，我们更应当高举起和平的武器。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①，是在这样指导精神之下发展起来，也将在这样指导精神之下发展起去。大会的成立仅仅三年，已有了四十三个强有力的分会，分布于全世界，有了四十多个国际团体和它通力合作。它一方面在策动着反战的方略，一方面在鼓励着抗战的精神。它虽然还未达到制止侵略的目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汉口成立，陈铭枢任总主席。

① 作者原注：当时国际间有这么一个组织，名为“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中国避免“和平”二字，称为“反侵略”。但这个组织后来消灭了，和战后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无关系。

标，但已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保障和平、拱卫正义的坚强的堡垒。我们对于这个堡垒，是只有加强它的武备，以期达到集体的安全，和平的恢复，人性的改造。

我们中国，事实上已是反侵略的急先锋，因而我们反侵略分会，也已成为反侵略运动的一条主要的干脉。本分会成立于抗日战争期中，由于民族的号召与大会的鼓励，两相辉映，相得益彰，成立以来，仅仅一年零四个月的工夫，也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四个支会，有了十万名的会员，会员的分布，已散布于全中国了。我们对于国内国外曾不断地进行广大的服务与宣传，期于把我们的精诚贡献于祖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贡献于世界和平的保卫与争取。但这已得的成绩，我们不敢妄自满足。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还相当遥远，我们的业务还须加倍的策进。

今后我们努力的动向，大略言之，不出普及与深入二途。普及是将使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皆成为反侵略的战士，使本分会的支会与区会，遍布于海内外凡有中国人住居的地方。深入是要使反侵略的精神遍植于每一个中国同胞的心坎，要使每一个中国人的细胞都成为反侵略的细胞，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球都成为反侵略的血球。我们要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侵略，并摧毁敌人和民族叛徒们的一切阴谋。我们也要策励每一个人的精神来涤荡自己血液中的苟且偷安与损人利己的渣滓。我们深切地知道，要有集体的组织才能有集体的安全，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健全的个体与健全的集体，实相互为用，故尔我们的努力，是要一纵一横，亦大亦小，

决不好高骛远，亦不拘虚笃时①。我们愿意以此自励，并希望以此进言于总会及全世界各分会。

最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解，综合成为几个誓言。

反侵略运动的战场，应当是全世界，同时也应当是每个个人。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孤立只是侵略的兄弟，因为他们同是以自私为其母亲。

和平决不是偷安与妥协，和平只有在正义的血的裁判之下才能奠定。

侵略者口中的和平只是武器，反侵略者手中的武器便是和平。

我们要加紧地砥砺和平的武器，摧毁武器的和平。

1939年5月21日于重庆

① 语出《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大人物与小朋友

要养成独立互助的精神。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友爱，谦和，坦白以对人。
要刻苦，严格，坚忍以处己。
要机敏，周到，奋勇以治事。
要有集体的锻炼，根据科学，通力合作。
要有前进的思想，坚定志趣，终身不挠。
要知道生之可贵，但不可苟且偷生。
要知道死不足惧，但不可轻易言死。
生要生得有精神，死要死得有气概。
要永远学习大人物的本领。
要永远保持小朋友的心情。

1939年6月6日为《抗战儿童》①
纪念"七七"三周年写此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七月重庆《抗战儿童》第七期。

① 半月刊，抗战儿童社编，一九三九年四月在重庆创刊。

“无条件反射”解

二十七年十月中旬，国军已准备从武汉四周转移阵地的时候，《国民公论》① 的第三号上，登载了一篇胡风② 的《要普及也要提高》，里面有了这样的话：

> 有些热心的人说：战争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一点上的非常紧张的事情，那有功夫谈文化底提倡呢？而且战争是非常简单的行为，只消把“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些简单的理论再三再四地告诉民众，使他们“习惯成自然”，由“条件反射”变成“无条件反射”就成了，那里用得着“高深的理论”“卓越的艺术”呢？想在战争里面提高文化，那只是浪费民众底力量，结果是等于妨害战争，也就是等于汉奸的行为了。

这所指责的对象，至少有一部分是我：因为这里所征引的意见和文字有一部分是由于我的一篇小论《抗战与文化》（见《抗战中国》③ 第三期）。我在那篇小论里面，发表过这样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九月重庆《文学月报》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① 张仲实主编，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汉口创刊。原为旬刊，一九三九年起改为半月刊。后迁至重庆、桂林。一九四一年二月停刊。

② 胡风（1902—1985），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作家。著有《胡风评论集》等。

③ 应为《自由中国》。文艺月刊，自由中国社编，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汉口创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迁桂林。

意见：

“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所谓抗敌理论并不怎么高深，否，实在是极端的单纯。敌人的大规模的侵犯是企图灭亡我，我如不起来抵抗，便是坐而待亡。但敌人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缺乏种种的资源，所以才来孤注一掷地对我作大规模的侵犯。我如彻底的加以抵抗，便是断绝敌人的资源而促进敌人的灭亡。所谓‘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的理论，的的确确是很简单的。但我们需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理论，并需要有多量的机会来发挥这种理论，务使理论化而为行动。对于这种理论的表现和发挥，是应该不厌其繁复的。因为理论虽简单，而对于大众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众既需要简单的理论，而尤需要这种理论的翻来复去的重述。普及并深入于民间的民话和箴言，所含的理论并不怎样高深，有的重述了几千百年，而大众并不加以厌弃，否，反而愈感觉亲切。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就是条件反射积久而成为无条件反射。”

把我这节文字和胡风的那节文字对照起来，便明白地可以看出，他所讥讽的“有些热心的人”中有一个当然是我。但如说“想提高文化也就是等于汉奸的行为”那种主张，我是从来不曾说过，而且也不曾想过的，不知道又出于那一位“热心的人”，我自可不必过问。不过我最感遗憾的是胡风征引我的文字时，过于断章取义，把我那“在动员大众上”的一个主要的条件，“需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和“多量的机会来发挥”的

一些重要的提示，完全抹杀了。因此便成为了我反对提高文化的罪状，这是不大妥当的。而且胡风根本没有懂得“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这两个术语，他竟把“无条件反射”解释成木偶的活动去了。

“在叫着《玩具世界》的影片里面，”胡风说，“当猛兽们侵入了‘玩具世界’的时候，劳莱、哈台慌忙地开动了玩具兵队身上的机关，这些玩具的兵队居然排着队前进，把那些侵略者打出了国境，我曾用这来譬比过愚民政策底信仰者们，但现在的这个‘无条件反射’论，其实也是和劳莱、哈台底梦想一脉相通的。”

胡风既这样解释了“无条件反射”，所以他接着便对于我施予了好些严厉的教训。

“如果肯定了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弱者底完全战胜了强者，须得在‘力量对比’起了‘一些的变化’以后，那么问题就无论如何不会是用‘无条件反射’可以对付过去的那么单纯。”——教训之一。

“我们原有祖传的‘精神胜利法’，但阿Q的一生已经证明了它的惨败；现在到底时代进步了。来了‘无条件反射’。然而我很耽心，即令这个‘无条件反射’能够把人民射到战场上去，如劳莱、哈台底发动玩具兵队底机关一样，恐怕还是经不起一打，因为我们的敌人到底不是兽，或者说，到底是获得了高等智力的兽，不会一望见拿着枪的傀儡兵就‘抱头鼠窜’的。”——教训之二。

“公式主义，它只是反反复复地向民众宣传说几个概念或

结论，希望由这达到‘无条件反射’，而文化运动却‘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于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于士兵与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原注：《论持久战》页四九）——教训之三。

我受教训是应该感谢的，只是“无条件反射”太可怜了。“梦想”啦，“单纯”啦，“愚民政策”啦，“公式主义”啦，“进步”的“阿Q”啦，真如“劳莱、哈台底发动玩具兵队底机关一样”，遭了胡风一阵阵乱射，劳莱、哈台会变成堂·吉珂德，而“无条件反射”只是一座风车，胡风却不曾料想到。

说来还是要怪我太炫学，用了“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这两个在中国比较罕用（或者从不曾用过）的新术语，而未加以说明，以致胡风费了那样大的力气来和它们，尤其是后者，搏斗。这是应该由我负责的。胡风主张“要普及也要提高”，这主张和我的并没有两样，只是我是以动员大众为前提，故须得侧重在普及方面，而且是认定普及为提高的手段的。因为要把文化的恩惠普及于大众，把大众的文化水准提高了，而后文化本身的提高也才有着落。我感觉着我自己似乎并未糊涂到把教育干部和教育民众的工作，混成一片的地步。就是教育民众吧，我自己也并不曾说过要人“只是反反复复地向民众宣说几个概念或结论”，我只是说，要把简单的理论用多量的方法来表现，用多量的机会来发挥。理论要简单，而表现要多样。表现理论的形式，无论用言语，用文字，用艺术，用生活，以及发挥这些形式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已经足够我们从事

动员大众工作者，乃至从事文化工作者，费尽苦心去从事的。在这儿自然要我们“联系于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于士兵与老百姓的生活”，还要联系于其它，如敌伪情形，国际形势等等。要这样也才能够“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也就是说——由“条件反射”变成为“无条件反射”。

还是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吧。

这所谓“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是苏联的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鲍佛乐夫(I.P.Pavlov)所创用的。他与高尔基同年逝世，在三年前才结束了他的八十六岁零五个月的有光辉的生涯，他献身于生理学，足足有六十年以上的岁月，对于心脏、血液循环、消化器、大脑作用，发明了种种新的方法来研究；成就了无数的发现，提出了不少的新问题。他是全世界所最尊敬的一位自然科学家，他的业绩超越生理学的范围扩展到生物学、心理学，和其它科学智识的分支里去了。尤其关于大脑的研究，费了他晚年来三十四年的岁月。我现在当然没有可能来介绍他的学术的全貌。因为他所著的书，我手中一本也没有，但他的条件反射说已经成为了现代行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已成为了世界的常识，中国的批评家至少也应该知道一点梗概才好。

据鲍佛乐夫的实地研究(主要是用狗)，一切大脑活动在其本质上不外是反射作用，但可由人为的条件而使之错综。例如狗见食物则呈思食的生理反应，闻钟则不必思食，但如予食与狗而同时扣钟，如此反复行之，则狗可至仅闻钟声即呈思食的生理反应。这见食思食，便是“无条件反射”，言无人为的

条件制约而自然呈食欲的反应；而闻钟思食则为“条件反射”，言有人为的条件制约而生食欲的反应。普通所谓“自发性”或“自动性”，其实均是条件反射，都是由于历久的锻炼而养成的。而且锻炼还须长久的持续，如中辍过久，自发性可以消失，这也由鲍佛乐夫用实验来证明了，便是条件反射也有消失的可能性。例如狗经训练可至闻钟而思食了，但如屡次仅扣钟而不予以食物，则狗所获得的“条件反射”即逐渐消除，竟返其闻钟而不思食的故态。以上便是鲍佛乐夫的条件反射说的大略，事实上他的理论也很简单，而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则甚为繁难。有许多问题，一直到现在都在苏联政府的保护之下，由鲍佛乐夫的门徒们在继续研究着。

我们知道了“无条件反射”的定义，我相信就是胡风自己回头看见他的文字时也定然会发笑的。他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奉为圭臬，而却在嘲骂“无条件反射”，未免有点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其实所谓“战争的政治动员”者，就是条件反射，因有此战争的条件，而生此民众动员的反应，但我们须得用种种的方法来使它变成为经常的运动，便是说即使没有此战争的条件也要经常保此政治动员，使大众获得“无条件反射”。

说穿了，可以说完全是一幕小小的悲喜剧，但在我总是应该负点责的，不应该炫学了一点，竟然使用了不甚常识的术语。不过我很恳切的希望着，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在自我修养上，倒似乎应该再把智识水准提高一些才好。

1939年6月29日

附　录

本篇初刊时，文末有附记。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删去。现附录如下：

这篇稿子写好了后已经搁置了一年了。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了一篇，更远在前年的十月底，终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论争，耗费彼此有用的精力，竟把它毁了。以同样的理由被搁置了一年的这篇，因张家花园的寓所被炸，得到机会把一些残稿清理，结果是被清理了出来，觉得在目前发表是无妨事的了。因为胡风先生的主张和我并没有两样，只是在术语上有些误会，而解释这误会的责任是在我这一边的。

1940年6月27日

汪精卫进了坟墓

汪精卫的傀儡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年多，最近看样子是快要开台了。报上报他和一群娄罗，在十八日已经乘着敌人的飞机，由上海飞到了南京，当天便去叩拜了南京方面的他的后台老板——日本鬼子的什么遣华军总司令西尾①，这怕就是打加官屈膝军门的第一道幕吧。“北平”“蒙疆”②等伪组织的人也都到齐了。汪精卫的什么中央政治会议的名单也发表了。名单一共有三十个人，老是那几名臭脚色。我想汪精卫自己恐怕都不免有点失望。傀儡戏喧嚷了一年多，总是不容易开台的原因，从这儿也透露了一部分。——尽管敌人和它的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汪逆傀儡是自进坟墓》。

① 即西尾寿造（1881—？），一九三七年任侵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一九三九年任第一任侵华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美军擅自释放。

②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把察南、晋北、绥远各地的伪政权统一起来，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又把平、津和华北各地的维持会统一起来，在北平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

狗汪、温、王、王①之流，四处威胁利诱，想多拉些脚色来撑台凑趣，然而终于没有人响应。这正表示着那些丧尽了廉耻的国贼们，并不如象敌人所期待的能够发生什么作用，也正明白表示着中华民族的“汉贼不两立”的凛然的骨气。

在汪精卫逃出了行都还不久的时候，那时不免有些人心惶惶。有的替汪精卫可惜，有的怕他会发生什么大的作用，有的甚至疑心是苦肉计。随着时间的进展，忠奸的分别，已经显明，这些怀疑杞忧惋惜的念头，大概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我对于汪始终是怀着这样的见解。汪和他的一派潜伏在我们的内部，就等于我们患了前头部的蓄脓症一样，弄得总是头痛不舒服，而且这脓如不开刀，早迟是要溃出来的。它假如是向内溃，就是说朝脑髓里溃去，那可了不得，脑髓受了脓毒的袭击，我们不仅要发狂，而且要丢命。但遇到运气好的人，脓是向外溃，便是把面部的骨层淤烂了之后，溃到了面部的外边来。那样是恰到好处。等脓流完了，蓄脓症也就好了。虽然在额上要留下一个窟窿，但那是于生命无碍的，而且那个难看的痕迹，也可以用整容外科的手术，把它弥补。汪精卫的逃出重庆，就等于我们的前头部蓄脓症的向外溃烂。这倒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幸事。我们不要怕这溃烂的形象难看，只怕这脓毒没有溃出得干净。假使脓毒都流干净了，

---

① 作者原注：汪精卫、温宗尧、王克敏、王揖唐，四字有类犬吠声。（温宗尧，广东新宁人，汪伪南京政府司法院长；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汪伪南京政府考试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1873—1945），浙江余杭人，汪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注释者）

那我们的蓄脓症也就消除了。这岂不是我们的幸事吗？脓毒谁个见了是不厌恶的？日本鬼子把我们身上所排泄出的脓毒收了去，想拿来再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那真是梦想。让日本鬼子自己去受传染好了。日本鬼子在目前不仅是额部都患着了蓄脓症，而且全身都是脓泡疮。化脓菌，在鬼子的血液里面传遍了，大约不久总会要来一个溃烂的。我这也并不是空洞的诅咒，日本人的腐化程度，的确惊人。尤其是到中国来：从事抢劫的那些野兽军部，他们的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已经造成了人类的最高纪录。这样的东西，也能够长大，天地间断没有这个道理。

昨天在报上所登载的一段新闻，各位想来是注意到了的吧。那是记载着褚民谊，罗君强① 那一批汪逆走卒，到南京去筹备傀儡登场的时候，在国际联欢社招待日本鬼子和南京伪组织的一些傀儡。眷属参加的也有不少的人，日本鬼子在喝醉了酒之后，便疯狂万状抱着一些伪太太、伪小姐们取乐起来，弄得连褚民谊那样的人都不好意思地悄悄跑开了。据说还有一位附逆的目睹这样情形，不禁浩叹说道，“这是连奴隶也不如，那还说得上亲善。”因此他私下劝告自己的部下，赶快离开南京，找寻自新之路。这或者也可以说是汉奸的天良发现吧？究竟是“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侮辱轮到自己的妻女身上来的时候，不免也要感受着难言的痛苦，其实这人也是少见多

---

① 褚民谊（1884—？），字重行，浙江吴兴人。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罗君强，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曾任汪伪南京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安徽省省长。

怪。日本鬼子吃醉了酒，才要搂搂你的妻女，那要算是客气的了，南京沦陷的当时，日本人在南京城里的奸淫残杀，以及在其它沦陷区域里的奸淫残杀，外国人很多的都在替我们伤心惨目，且不用说，就连日本的兵士都有人感觉过分而愤恨自杀了的。那位附逆的竟还在说“那还说得上亲善”，可怜的很，你们难道还不知道日本人所号召的“亲善”，正是这样的“亲善”，而你们所倡导的“和平”，也正是这样的“和平”吗？由强奸进而为和奸，是之谓“和”，是你们自己要求的，所谓自作孽自受，怪得谁呢？

日本人早迟是要崩溃的，这是我的确信。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身对我说过的一两句话。那是大前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日本人用七十二架飞机三次轰炸南京的一天，正午将近的时分，我在陵园汪的公馆里面，看见了汪——是北伐以后我和他隔了十年的第一次见面。他照例是那殷勤如妓女的态度，这态度在他大约是以为可以引起人的好感吧，其实是相反的，那是表示着毫无骨气和虚伪。可是他那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是成了汪精卫的坟墓了。据敌人的广播说：汪精卫在十八日到了南京，先行拜谒了西尾司令官之后，第二天的十九日，才去拜谒中山陵。据说汪逆在中山陵堂里面哭起来了。这大约也是天良发现的哭吧？看见中山陵庙受敌人摧毁，又想到自己的

背叛，旧地重来，忠奸异路，这是有可能把他的天良多少激发一下的。尤其是先要拜见了西尾主子，然后才去拜陵，自称为“总理信徒”的人，不哭，在面子上恐怕也有些难过吧？

打了一年多的锣鼓，仅仅凑集了三十名的臭傀儡，没有办法，勉强准备登台，在日本人也可以说是“黔驴技穷”了。这傀儡戏骗得了谁呀？中国人我相信是谁也不会受骗的。日本人或者想拿去骗骗它自己的本国人，要想拿去骗骗国际，它能够收到多少效果，大有疑问。反正决定一切的权柄是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我们中国人只要人人都怀抱着耿耿忠贞的正气，时时都表示着凛凛难犯的精神，敌人和汉奸就用尽它们的鬼蜮伎俩，也把我们无可如何。“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①，只要我们不自侮，不再出汪、温、王、王之流的汉奸，不中敌奸理论的毒，我们是很可以乐观的，除恶务尽，排脓去根。在这个观点上，我对于重庆市民近时所发起的建墓铸奸运动，是极端赞成的。这运动的步骤，是要在重庆市中建立一座为抗战牺牲了的无名英雄墓，在墓前用铁来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全部的工程，打算募集五万块钱来做，地点已经决定在都邮街，款项已经在募集了。五万块钱并不算多，重庆市民每人如平均出一块钱，不要一天工夫，便可募足了。假使这计划能够早早实现，在汪逆精卫在南京登台的时候，我们这儿也让他们夫妇登台。那倒是很有意义的对照。这个运动，我极希望它能够赶快的实现，并且能够普遍的实现。成都已在响应了，其

---

① 语出《孟子·离娄上》：“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它各地大约不久也会响应起来。假使能够普遍到全国的各乡村，那对于爱国心的唤起与奸逆的防闲，是很有作用的。有的朋友或者会嫌铁的浪费吧，但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再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容，譬如塑两尊狗像，在身上各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① 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多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的照片来的。但是在重庆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不屈的精神和这精神永远不断的净化。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忠贞，都应该克服着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

1940年3月21日

① 陈璧君(1891—1959)，原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汪精卫之妻。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汪精卫投降日本。

成仁便是成功

抗战三年来，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无数的政工同志是牺牲了。

有的阵亡在前线，有的阵亡在敌后。

有的遭敌机轰炸，或受敌奸惨杀，或则因积劳成疾而终于为国捐躯。

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先烈们是牺牲了，然而留下了光辉的功绩。

先烈们是牺牲了，然而留下了光辉的典型。

民族精神已得先烈们之牺牲而发扬，同仇敌忾已得先烈们之牺牲而高涨。

先烈们是"求仁得仁"①。

先烈们的牺牲是国家民族的成就，是政治工作的成就，是先烈们自身的成就。

"不成功便成仁"的信条得到了血肉与生命。

它蜕变了。

它变而为：——"成仁便是伟大的成功"。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书店版《羽书集》。

① 语出《论语·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先烈是死了吗？

先烈们是没有死的，永远不会死的！

你们看，他们矫健的步武永远在我们的前头走着。

你们听，他们沉雄的声音永远在我们的前头号召着。

追赶，向前！

责任是在我们后死者的身上！

然而，不要浮躁！

我们心坎里应该含着无限的悲哀，国家民族所受的劫难已经不小了。

应该常常思念的：抗战以来有多少生命遭了牺牲，有多少生命陷于流离，有多少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财产遭了毁灭，而且还正在继续遭受着。

先烈们是死无遗憾的了，我们还须想想：他们所遗留下的家属的情形，究竟怎样？

幼小的儿女丧失了他们的父亲，

年老的双亲丧失了他们的儿子，

妻失去夫，

兄弟姊妹失去骨肉手足——

甚或家庭遭了破坏，阖家老小的生活失去凭依——

这些是如何悲痛的事？

责任是在我们后死者的身上呵！

1940年4月12日

先乱后治的精神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两句含有责难性质的批评，是说四川人好乱，四川人难治。再直愎一点说，便是四川人刁顽。这在以前天下为一姓之私器的时候，原是作这样解释的。但是天下为国民的公物时候，解释便须得变更了。在我看来，这先乱后治的精神，正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①。

"乱"是什么？就是革命。天下的一切机构已经腐败，须得发生变革的时候，但是向来的统治者本其自私的念头，总是压抑着人民，不使应有的变革发生。一切因陋就简，甚且每况愈下，这样便愈见促进国族的危殆，增加人民的忧困。先知先觉者，每每敢有犯万难，轻生死，作天下之前驱，以诱导变革的行动。行动既经开始，他要困心衡虑，必使改革的趋于至善，天下归于至安。然后他才能够放心。先乱后治的精神应该就是这样。四川人是有这样的精神的，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七月重庆《现代读物》月刊第五卷第七期。

①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散文《岳阳楼记》中的名句。

四川和中原发生关系是很久远的，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蜀和蜀人字样，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蜀人是他的同盟之一。我向来怀抱着这样一种想念，我觉得我们汉民族乃至一切单音语系的东方民族，如西藏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部分居民，都应该是起源于四川西部和西康一带。这种同一语的各个民族，在原始时代必定是聚居在同一地点的，在时代的进行中，先后沿着各条水道向四方发展。沿着怒江更转入雅鲁藏布江而西上，便入西藏。沿澜沧江、怒江而南下，便入印度支那半岛。汉族是应该由几个时代向东迁移的。夏殷民族殆沿金沙江、岷江而南下，更随长江东折，至长江下游而转入黄河流域，定居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周秦民族殆沿金沙江、岷江而北上，同样转入黄河流域而定居于陕、甘。西藏及南方民族因分徙过早而相会无期，故形成独立的发展。汉民族则因分徙较迟而相会甚速，故终至融成一片。我这个观念，在人种学、语言学及各民族之各代传说上是有其证明的，将来如于地底发掘求得更坚确之根据，那是最所希望的事。

但西蜀虽可认为汉民族的发祥地，但汉文化却发展于东方，应该将其大部分的劳绩归诸殷人。周受殷赐，秦受周赐，西蜀则更受秦赐。西蜀的开辟我们应该感谢秦时的郡守李冰①，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李冰凿离堆以御蒙水之患，这是何等的革命精神，为

---

① 李冰，秦时蜀郡太守。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修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都江堰为最著名 传说李冰"凿离堆以御蒙水之患"，蒙水，即今之铜河（大渡河）。

了增进民间福利而敢于和大自然的魔力作斗争，表示了我们人力的伟大。虽然这离堆的所在地传说不一，但总是得在四川境内，而且这伟大的斗争精神是深深地刻印在历代的四川人的性格里的。四川与海岸远隔，古代在食盐上必感受过很大的困难，这困难也由李冰把它克服了，从几十百丈的地底把盐泉吸出来，解决民间的食盐饥馑，直到抗战的目前我们都还深切地受着他的恩惠，这建设性是何等的彻底！李冰的建设，文翁①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这些在我们四川庙食百代的伟人，给予我们四川人的感化，不是用数字可以表达出来的。四川人也不愧受了这些人的感化，委实是代有传人，特别在文学的贡献上，如汉代的司马相如②、扬雄，宋代的三苏③，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要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四川人之所以好乱而难治，这些外来的和本省的伟大人物的感化，大约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都有一个相当高的悬鹄，对于现状颇难满足。要想满足，故尔乱就要乱到底，治也想治到尽头。在这种历史人物的精神感召之外，地方的偏僻和物产的丰富也不失为副次的原因，地方偏僻则离统治力量

---

① 文翁，西汉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景帝末为蜀郡守，在成都市中设官学（即文翁石室），入学得免除徭役，并以成绩优良者为郡县吏。

②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

③ 即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眉山（今属四川）人，俱北宋文学家。苏洵（1009—1066），字明允，著有《嘉佑集》；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子，著有《东坡七集》等；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苏轼弟，著有《栾城集》。

的中枢较远，中枢力量鞭长莫及，故能先天下而发难。物产丰富则能闭关自守，支持长久消耗，故可后天下而太平。

在历史已成定例的先乱后治的四川，自辛亥革命以来可说是又得到一个近例。辛亥革命是四川的保路同志会①首先发难的，杀死了端方、赵尔丰②，逼溃了清廷的新旧军队，激烈的程度为他省所未有。民国二十余年间，别省都差不多次第就绪了，而四川的内部却一直不曾安定过。现在，在国难空前的关头，又承受着复兴民族的使命了。军队陆续的东征，产业陆续的开发，是我们四川人发挥后治精神的时候了。我们要倾倒我们无尽藏的人力物力来拯救国族的危亡，更进而实现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国。大义所关，责无旁贷。

1940年6月12日

①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之名，将民办川汉、粤汉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民众的反对。六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

② 赵尔丰（？—1911），字季和，清末汉军正蓝旗人。一九一一年任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仍企图操纵政权，煽动兵变，后被民军所杀。

写在菜油灯下

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象“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①，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

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内在的重重陈腐，外来的不断侵凌，毫不容情地压抑着我们，有时几乎快要使我们窒气。但我们就在那样的态度之下，顷刻也不曾停止过反抗的呼声。这呼声象在千岩万壑中冲进着的流泉，蜿蜒，洄沍，激荡，停蓄，有时在深处潜行，有时忽然暴怒成银河倒泻的瀑布。

这呼声，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通被录音下来了，便在鲁迅的全部著述里面。

民族的境遇根本不平，代表民族呼声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平畅。

民族的境遇根本暗淡，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字自然不能求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重庆《抗战文艺》月刊第六卷第四期《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

①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昌黎先生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其鲜丽。

汪洋万顷的感觉，惠风和畅的感觉，在鲁迅的文字中罕有。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性格使然，宁是时代的性格使然。

许多对于鲁迅的恶评："褊狭"，"偏私"，"刻薄"，"世故"……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的诬蔑。

我不曾和鲁迅见过面，他的生活、性情、思想，不曾有过直接的接触。——这在我是莫大的遗憾。

但以鲁迅的学识、经验、名望，假如他真是"世故"，或多少"世故"得一点，他决不会那样疾恶如仇，尽力以他的标枪匕首向社会恶魔投掷。

假如要代表社会恶魔来说话，那鲁迅诚不免是"褊狭"，"偏私"，"刻薄"。这在鲁迅正是光荣。

我曾经对于骂鲁迅的人，替鲁迅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同一样是骂人，而鲁迅之所以受青年爱戴者，是因为他所骂的对象，既成的社会恶魔，为无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鲁迅之骂是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人，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替青年们作指路的工夫，说这儿有条蛇，那儿有只虎，这儿有个坑，那儿有个坎，然而也并不是叫他们一味回避，而是鼓励他们把那蛇虎驱掉，把那坎陷填平。"①

---

① 见作者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所作《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第一节《替鲁迅说几句话》，全文收入一九四二年重庆文学出版社版《青铜时代·驳〈说儒〉》。

这几句话，我不敢说果能道着鲁迅的心事，但在我是毫无溢美、毫无阿好的直感。

鲁迅在时，使一部分人“有所恃而不恐”，使另一部分人“有所惮而不为”的，现在鲁迅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蛇虎呢？依然出没。坎陷呢？依然纵横。

剩给我们的是：加紧驱逐和填平的工作。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1940年6月①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十月十二日夜”。

三年来的文化战

抗战满了三年了。回想起在战争发动以前敌寇的“三月亡华”的狂妄宣传，更想到欧洲二次大战发生以来，还不上一年的期间便亡了六七个国家，象法国那样的强国，实际打起仗来也不上两个月就屈服了，我们对于自己的战果是可以引为安慰的。不用说我们是不应该就以这样的程度而自行满足，我们还有更艰苦的斗争和更伟大的胜利在前途等着。我们不把敌寇全部扫荡，不把大地完全收复，不把建设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的外来障碍全部肃清，我们的抗战是不能告一段落的。

事实已告诉我们，现代的战争决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赛。敌寇这三年来的大侵略，除了军事的进攻以外，还不断的使用着政治进攻、经济进攻、文化进攻，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于敌人的抗战，也是得到了相当的战果的。我们在这抗战建国的七月七日，来检讨一下过去，用以策励将来，是有意义的工作，我现在把这三年来敌我两方的文化战情况，略略加以检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十七日重庆《大公报》。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一卷时，文字有删节。

本来敌寇对我的文化侵略并不是和这一次的大规模的侵略战同时开始的，它在很久以前便采取着文化进攻的体势了。它在上海早有同文书院①的设立，养成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历年来深入我国内地，四处作公开的或秘密的调查，密布着它的间谍网。在它的外务省里面有所谓“对支文化局”的设置（近年更扩大为所谓“兴亚院”的“文化部”了），那便是对华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它更利用我们的庚子赔款②在上海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北平建立了“文化研究所”，利用这些机关对于我们的各种宝贵的研究资料和各种有价值的古物，作学术上的掠夺。还有它在华的各种公私机关和它们的特派员等所作的文化上的偷盗，那差不多是不可以计数的，这些都还是有形的侵略而已。数十年来，敌寇是以侵略中国为它的重要国策，因此它们国内的教育体系事实上可以说整个是对我国文化侵略的体系。在那种教育之下所培养出来的日本人，几乎都是把侮辱中国、侵略中国认为了它们的天职。我们历年来不断向日本派去的留学生在这种教育之下，自不免有一部分人受着影响，养成一种侮辱自己祖国和破坏自己祖国的倾向；加以敌寇的差别待遇，自“九一八”以来的露骨的威胁利诱，更有一部分意志薄弱的青年乃至老年，无可讳言

① 全称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东亚同文会于一九〇五年在上海创办的学校，校址在虹桥路一〇〇号。校长先后为根津、大内畅三等。

②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给各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通称“庚子赔款”。

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早就在进行着背叛祖国的勾当了。

这些在抗战前的文化侵略的情形，我国有远识的人早已见到，而且是早已在布置着和进行着反侵略战斗的。因此自抗战以来，敌寇对于我国的文化战线的破坏，也就进行得非常猛烈。在战争发动的初期，敌人为配合着它的军略上的“速战速决”的梦想，对于我国的文化机关和文艺阵地，使用武力来作狂妄的摧残和掠夺。据教育部的统计，由战争开始时至一九三九年的年初止，在敌机的狂乱轰炸之下的战区各省市的教育机关财产损失的数目，已达一亿八千三百七十九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元。此中中学的损失是六千五百一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三元；小学的损失是九千六百四十八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元；社会教育机关的损失是一千八百一十四万四千三百八十元。这里面大学的损失还是除外了的，我们如想到天津的南开大学，上海的同济、暨南等等大学的全部炸毁，可以知道那损失是怎样大的一个惊人的数目，更单就图书馆的损失而言，敌人的蛮横也真是登峰造极了。据全民通讯社的调查：自“七七”事变以来，图书被敌人劫去了的，北平约二十万册，上海约四十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约十万余册。战前全国图书馆在教育部有统计可查者共计大小四千余所，大部分都分布在沿海地带，被敌寇毁灭了的竟达三分之二；至于私家藏书如海盐、镇江、苏州等地方的多被敌人运走，或则散失无踪，类皆珍贵的书籍。象这样极不完全的一项调查，也可以见到我国的文物是遭了怎样残烈的一个空前浩劫！

但自徐州会战以后，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被我粉碎了。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敌人感觉到专靠野蛮的摧残，不唯不能消灭我国国民的爱国意识，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同仇敌忾。它便高唱其欺骗、麻醉的理论，进行其腐化、奴化的设施。它的武力的文化摧残，变而为文化的武力威胁，便是说恢复了它的向来的文化侵略的体势。它在这种侵略之下的行动，是直接策动它的文化浪人和所豢养的文化汉奸宣扬其所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那些臭不堪闻的老调，更进而梦想以所谓“新民主义”、“全民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高唱其“灭党反共”。华北有所谓“新民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华中华南有所谓“大民会”，都是在它的特务机关的宰制之下，一夜泡制出来的奴化政策宣传机关。收买、利诱并强迫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开办各种训练班以养成奴化教育人才，修改并编印各种教科书，出版各种报章杂志，建立通讯社，并实行复古运动，提倡迷信，诲盗诲淫，遍设烟馆妓馆、赌场舞场，强迫学习日文日语。单是宗教团体的组织一项便是五花八门，有所谓“佛教联合会”、“佛教居士林”、“中日密教会”、“日华佛教亲和会”、“一心道器会”、“黄会”、“中华理教会”、“天理教会”、“黄道会”、“安清同盟会”等等，真真是造成了一个百鬼夜行、群魔乱舞的世界。

直至汪逆精卫和他的一批狐群狗党公开叛国以后，敌人的文化侵略又加上了新鲜花样。敌人的泥脚愈陷愈深，“速战速决”既不可能，“速战速结”又不可得，一面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谬论，一面利用汉奸汪精卫们打出伪“三民主义”的旗帜，期以淆惑观听，更进而盗窃名器，使汪逆组织伪中央政府，

作为敌寇的和平攻势的先锋。同时在香港、上海等地大办其汉奸报纸与杂志，诱胁一部分文化界的败种举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宣传与活动，并以暗杀威胁手段摧残当地的坚持抗战的文化人与文化事业。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等下流无耻的宣传，便更加波谲云诡了。

三年以来敌寇的文化侵略可说是日紧一日的，它虽然时时在改变花样，但它一贯的目的是想摧毁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精神。它这目的究竟达到了没有呢？在表面上看来，无可否认的，它多少是收到了一点效果，有好些民族败类是被它吸引去了。然而这正是在替我们肃清障碍。没有比较不足以见优劣。有了敌寇的披着兽皮的“文化”行列，愈见显示出了为真理为正义而战的纯正文化的光芒。敌伪是破坏的，我们是建设的。敌伪是倒退的，我们是前进的，敌伪是向着万劫不返的兽域走，我们是向着自由、平等、幸福的地上乐园走。因而我们反文化侵略的斗争，阵营是严整的，声势是雄浑的，步武是刚健的，力量是深厚的，配合着抗战阶段的展开，我们的反侵略的文化战线，不断的在扩大着，深入着，持久着。

在抗战开始前后，“唯武器论”与“三月亡国论”等等荒谬论的恐日思想，是相当跋扈的，我们毫不容情的予以了打击，把国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提高了，作为对于敌人的狂暴摧残的一个坚强回答。各种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出版界、艺术团体等，都向后方移撤，分布到内地的各城市，各乡村，建立了更多的文化核心。文化工作者们也分布到了各处，或则深入农村，或则参加前线，浩浩荡荡的使文化力量弥漫到了全

国。在武汉时期，更曾经汇合而成为了各种中心的组织，如戏剧、电影、漫画、木刻、文艺、音乐、教育、新闻等等，都前后在武汉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铸成了文化界的空前团结。这一团结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文化战线更显出了刚健雄伟的姿态了。迭次军事上的大捷，坚定了全国人民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民族意识亢扬了，爱国情绪高涨了，文化界的活动更加促进了。流动剧团、歌咏队、放映队，流到四方，四处都有广大的群众受着鼓舞。《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等等抗战歌曲流传到深山中的牧童口里，拣煤渣的贫儿口里。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队等等，一队复一队的走向军队，走入乡村。兵营、战壕、广场、原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特辑、救亡歌曲，成为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了一时的潮流。有好些文化团体，尤其小学教师，都纷纷散入武汉四乡去响应政府的号召。抗战书报与各种小册子的出版，真如风起云涌。书报供应社、文化服务站等更努力于报章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宣传周，运输周，一次热烈过一次的举行着。前方将士英勇的战绩兴奋了后方人民，后方人民踊跃的输将鼓励了前方将士。热烈的民族意识，高扬的政治水准，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

自武汉转移了阵地以后，文化战线的动向是走向沉着、深刻、充实的道路上来了。学术界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要求，尤其是科学界的专家们在无声无臭之间奠定着大后方的各种新

兴产业的基础。水力的测量和利用，煤油的发现和采掘，制钢炼铁，采煤煮盐，都在采用着新式的科学方法。单是四川一地在三年之间已经有了三十年的进步。自然，各种工作为客观条件所限，是还未达到应有的磅礴的活跃气象。不过那底流在不断地奔腾的，不断地唱着最后胜利的凯歌。更请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吧！请看铸逆锄奸的反汪运动吧，那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响透了。敌寇的本国内也是有"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然而总是运而不动。我们中国的情形则恰和它相反，高瞻远瞩的指导抗战的理论文章，只要清早一发表，转瞬之间便传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些历史的文献在中国文化战上发着极大的威力，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将是永不磨灭的丰碑。

在我们反侵略的文化斗争中还有两个特点须得指出：第一是军队中的学习研究风气磅礴着了。有好些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加强，一方面提高了士兵同志的政治水准与警觉性，对于敌人的文化侵略成为了坚强的防线。同时，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便必然的可以促进并扶助战地以至沦陷区中的反文化侵略运动的开展。就这样，对于军队与民众都赋予了文化侵略的免疫性，而于伪军反正的争取上发挥着甚大的功能。第二是对敌军工作的建立与猛进，在华日本反战同盟①，朝鲜义

① 日军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士兵组成的反战团体。一九三九年后，部分被俘日本士兵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一九四二年八月，由上述反战团体组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一九四四年四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勇队，台湾义勇队，都先后成立了，他们在华南华中各战地进行的对敌工作是卓著成效的。华北对敌工作也收了宏大效果。对敌工作是从根本上瓦解敌人侵华武力的文化斗争，在今日敌我的相持阶段中，无疑地具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今后我们是应当更要加强而且不断的加以改进的。对敌宣传品的内容要更活泼、尖锐、具体，更多的指出敌国的困难和敌人家属的苦境，数量要更多，传达的方法要更神速深入。不仅在正规军中要有对敌工作，在游击队，在民众武装自卫队中都要有这项工作的推进。

文艺作家们不断地暴露着敌寇的惨绝人寰的残暴兽行，表扬着抗战将士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描写着努力于抗战建国的各方面艰苦奋斗的种种姿态。新闻记者们不断地出入于枪林弹雨，采集前方战讯向国内外报告，在前后方创设着并支持着大型小型、全国性、地方性的报纸，尽力于抗战建国的鼓吹督励。社会科学家奋勉地从事于革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增进着全国人民对于抗建事业的认识与了解，并常常地对于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等汉奸论调予以毫不放松的诛伐，自然科学家埋头苦干，对于战争上、交通运输上、国防工业上、战时生产上、医药卫生上，各种迫切的要求，从事于资源的考查与技术的探讨，以求得适当的解决。教育家以及一般的文化工作者们不断地努力于文盲的扫除、普教的改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文化娱乐的设施。出版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不稍懈怠地从事着全国文化食粮的产出与供应。所有这些反文化侵略的战士们，三年来尽

瘁于抗战建国的种种业迹，无疑地为了反侵略斗争的伟大任务。由于这些工作者们的努力，我们在文化上的抗战，也和整个的抗战一样的是愈战愈强了。我们把汉奸的文化侵略打击得原形毕露、体无完肤，一天天地走向更下流、更卑劣无耻的欺骗宣传去，走向恼羞成怒、无法可施的焦躁状态去。敌寇的武力摧残的旧态又发作起来了。近来连续炸我们的复旦中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及各种训练学校，在敌人兽性的疯狂头脑里，大约以为只要炸坏了这些文化机关，便可以断绝我们的文化抗战的人的资源吧。真正可怜得很！只要你的炸弹还有存储，尽量的运来消耗吧！无论山巅水涯，森林岩穴，战壕工厂，祠宇农场，我们遍地都是抗日学校。峨眉山可以让你炸平，只要你能够。扬子江可以让你炸断，只要你能够。但我们的国民精神，抗战种子，是永远炸不平，永远炸不断的！

三年来的文化战确实是使我们增加了无限的自信，但我们要重行申述一次：不可以有丝毫的自满。我们的站在真理与正义的立场上为国家民族求自由解放的反文化侵略，和敌人欺骗麻醉、破坏倒行的文化侵略比起来，力量要蓬勃得多，声势是要浩大得多，效果是要丰裕得多，然而在我们自己本身说来，依然是难以令人满足的一种状况。文化运动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而且是不相连续的。有的工作在发展的途上每每受着严重的阻碍，甚至停顿了，因而工作者的精神也不免要受着严重打击，于是主观上的努力，和客观上的需要及可能程度便还远远未能密切配合。这是当前的事实，我们是应该切实地设法改进，不好熟视无睹，讳疾忌医，更不好变本加厉每况

愈下的。那样不仅胜利的可能永远不会实现，反而会招致“鱼烂”的危险。

我们对于新文化的内容和性质，固应得要求它是民族的，民权的，民生的；对于处理文化的方法和态度，也应得要求其为民族的，民权的，民生的。民族的呢，自抗战以来是相当做到了。假使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能象民族主义的畅行无阻，走上实践的道路，文化战必然会平衡而不间歇的展开起来，阵容必然会更加严整，声势必然会更加雄浑，步武必然会更加刚健，力量必然会更加深厚。汪逆的盗窃，敌寇的欺骗与摧残，是丝毫也不能影响我们的。

1940年7月7日

龙战与鸡鸣

昨晚的一阵骤雨，使这炼狱般的山城，突然化为了清凉境地。在敌机连续不断的盲目轰炸，尤其是为纪念“七七”特别流了几天热汗之后，得到了这个境地，加倍地领略着苦尽甘来之感。天象高了一些，大江南岸的连山似乎转青翠了。最难得的是这一阵阵的说强也不算强，然而也并不微弱的风，使人满吃着无限的凉味。

十点钟了，阳光带着几分秋意。在前两天约略是在防空洞里瞌闷睡的时候，今天却能坐在裸体的一片片肋骨剥露着的楼房里，就不十分详细的世界地图，查看苏德战争发生以来的形势，真是难得的事。

季龙① 来了，谈了些工作上的话，并就国内国外的情形交换了一些消息和意见，最后他把汪精卫的近作，一首七律，给我看了。——

忧患重重到枕边，星光灯影照无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香港《笔谈》半月刊第二期。

① 即张志让(1893—1978)，江苏常州人。法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先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鸩毒山川亦可怜。

季龙说：这诗是从衡山①先生那里拿来的，题不知道是甚么。并指着"如含瓦石"四字问我，这有甚么典故吗？衡山先生也不知道。

但关于这，究竟有没有甚么典故，我自己也委实不知道。②要说就是用的精卫含石填海的故事吧，又多了一个"瓦"字，和"愧先贤"的念头也连接不起。要说有甚么错字吧，从字面和韵律看来，也似乎没有。因此我生出了一种解释，便是取其与含珠玉为对的汪记的新感觉。

古人的习惯，人死了在口里有含玉的一种礼节，被含的玉就叫作"含玉"，那玉的形式有时候是珠，有时候似乎是蝉。《庄子》上有一段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③，一位大儒和一位小儒根据古诗中有"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的提示，便去盗发坟墓，偷那死人嘴里所含的珠。

这习惯的起源大约也不外是尊重货币的意思吧，因为珠玉在古时本有一个时期是货币。但到后来解释是稍稍变了，

---

① 即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持抗日救亡和反蒋爱国活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

② 作者原注：典出《晋书·卞壸传》"阮孚谓壸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

③ 事见《庄子·外物》。

以为珠玉的精气可以使人不朽，死人口里含了珠，含了玉，他的肉体便可以永远保存。

这习惯不用说是有珠有玉可含，而且有安逸的享受的那种人的习惯。这习惯虽然早已废了。但现今能够发讣告或在报上登哀启的人是依然保存着“亲视含敛”或“不克亲视含敛”的那种字样的。

汪精卫是尽有含珠玉的资格的了，单是最近在倭寇的宫廷里去朝觐了一次，便得了三万万圆倭币的叩头钱，他要在嘴里含珠玉或率性“玉食”一下，大可不成问题。

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卑劣无耻或穷凶极恶的人，似乎也总有天良发现的一个时候。尤其在晚上睡不着觉，在清冷的夜气中横陈在枕席上辗转反侧的那样的情形下边，一线的天良，更具体点说，便是惭愧和悔恨的念头，是有偶然发现的可能的。

汪精卫的这首诗，分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做出的了。在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无限的往事象波澜一样重重叠叠的涌来，要想不想，也不由你不想，眼睁睁一直坐到天亮——年青时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时的往事，单身赴北京行刺时的往事，在中山先生病榻旁笔录《总理遗嘱》时的往事，在北伐期中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资格受武汉民众热烈欢迎时的往事，……毫不夸张地真真是“不尽(的)波澜”。

但是，现在呢？

他这诗必然是在赴日朝觐以前做的，由那“郊原仍作青春色”句看来，大约是在四五月的时候吧。地点呢，说不定怕就是南京城外中山先生陵寝所在的陵园，汪的公馆在那儿。那

时正是汪逆极端受日寇冷视的时候。以被冷落了的心情，睡在那样足以令人发深省的地方，又偏偏睡不着觉，那怎么能够不发生一点惭愧的念头呢？他分明感觉着“愧”了，所“愧”的“先贤”，说不定就是指的中山先生吧。中山先生临终时所说的“我死后，敌人一定要以种种的方法来诱惑你们”的那番警告，当然是会被想起的。

这样追究起来，“如含瓦石”的意义似乎可以充分地了解了。那是汪精卫在那被发觉了的天良一线的光照之下，他自己也明明感觉着是一条朽败的死尸了。他睡在床上，实际如同睡在墓里，但已腐烂透地，恶臭冲天，口里所“含”的当然不是珠，不是玉，而是“瓦”而是“石”。

这天良的发现，其实就是社会的正义对于奸恶小人的一种责罚。奸恶小人无论在肉体上是怎样的安富尊荣，而在精神上总要受无形的鞭挞。汪精卫的诗算又提出了一个证据。

我把这番意见说出了，季龙在大体上表示同意。但他说：汪精卫或许不会有这样的深刻，不过我们是有充分的自由作这样的解释的。他又指着最末一句问：“鸩毒山川”四个字也有问题，“山川”是被“鸩毒”了，但把“山川”“鸩毒”了的，在汪精卫的心目中不知道指的甚么人。

——他不是在“反共”吗？

——总不免太勉强了吧，这是良心发现时说的话，大约依然指的是日本鬼。

——我看在将来鬼子打算不再要他的时候，尽可以把这四个字来锻炼成文字狱，说他诽谤“皇道”。

——怕难免。季龙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我前几天在一位朋友家里看见你写的一副对联。

——是“龙战玄黄溅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吧？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接过了来。

——对的，他说。那对联是成句，还是你自己编的？

——是从我的一首旧诗里面摘录下来的。

——我觉得和汪精卫这第三第四两句太巧合了。

——这些是熟的典故，我看是不足怪的，说不定在前已经有人用过。我的诗是两年前做的，并不曾发表过，只是爱把那两句摘下来替朋友们写对联，两年来怕写过好几十副。

——你那全诗是怎样，索性请你抄出来看看。

我顺手把案头的一张信笺拉过来写着：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溅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①

我一面写着，一面说：我这诗是前年三月回乐山的时候做的。乐山城的东北角上，大渡河同岷江合流，顺流而下，有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在江的北岸骈列着。乌尤山的景致最好，据说就是秦时的蜀郡太守李冰“凿离堆以御蒙水之患”的离堆。蒙水就是沫水，就是大渡河了，现今一般是称为铜河，因

① 此诗见本编第二卷《汐集》。

为上游有铜山，就是邓通①铸钱富埒天子的资源地。乌尤山的绝顶，临江有一座尔雅台，是汉武帝时的犍为舍人郭氏注《尔雅》②的地方，失掉了他的名字，后人误传为郭璞③，其实郭璞是没有到过乐山的。我这诗就是登尔雅台的时候做的。诗意侧重在感事怀人，对于当前的风物差不多没有说到。我后来又做过一首“寺字韵”的诗，那就侧重在风物上了，我索性一并把它写出。

雨余独上乌尤寺，遍山尽见赵熙字。
凤苟如鸡麟如羊，毛角寻常何足异？
树间隐隐见来岷，水光山色香阘阘。
李冰功德逾海通，竟使濛水为之驯。
尔来已越二千载，堆跌犹有凿痕在。
江流万古泣鬼工，鞭挞鼋鼍入沧海。
汉代子云与长卿，谅曾骨拆并心惊。
只今尔雅高台古，无人能道舍人名。④

——两首诗都很有意思，季龙说。这赵熙，就是前一向到重庆来曾蒙党国要人欢迎过的那位老先生吗？

---

① 邓通，西汉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汉文帝时受宠幸，得赐蜀郡严道铜山，许其铸钱，由此极富。

② 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由汉初学者编缀周汉旧文，递相补充而成。

③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东晋训诂学家。著有《尔雅注》等。

④ 此诗见本编第二卷《汐集》。

——是的，是前清翰林。曾经做过御史，诗和字都很好。不过他的字在乌尤山上却是刻得太多了，多则未能免俗。

——你这登尔雅台怀人的一首是寄怀北边的朋友吧？

——是的，是寄怀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玉阶。十五年北伐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候朱总才从德国回来，到政治部来访我，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象一位乡下的村长。最近的一次分别也在汉口，是大前年武汉撤退时仅仅两天前的事，那时候恩来和我同住在鄱阳街，朱总乘飞机来武汉，便在我们的寓里住宿过一夜。在他临走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出乎意外地他竟写了一首白话诗给我留别。诗题叫《重逢》，内容是：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

——很有点气魄啦。季龙称赞着。

——真是有点气魄。他这诗是用墨笔写的，我替他裱背了起来，此刻放在乡下，将来有机会时我可以给你看。

——这个是值得保存的纪念品。

——我对于武汉有一种特别的怀念，大约北伐时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武汉，抗战以来也是在武汉比较的做了一些工作的原故吧。我觉得它比我的故乡乐山，尤其值得令人怀念。珞珈山你是到过的，就拿东湖来说，我觉得是远胜于杭州的西湖。

——那儿暑天特别好。特别是鱼多。

——可惜西湖东湖，现在都是日本鬼子在那儿享福。

有不相熟的朋友来访，我们的话便中断了。

窗外突然有小孩子的声音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由楼头望去，看见街上有十来个小朋友在作行军的游戏。

1941年7月27日

告 鞭 尸 者

我不曾和鲁迅见过面，说起来有好些朋友都觉得奇异，"五四"前后，鲁迅在国内而我在日本。"五卅"前后，鲁迅在北平而我在上海。北伐前后，鲁迅到了广州时我已经离开广州去到武汉了。关于这层，鲁迅也曾意识到，他在一篇文字里面说道："我和郭沫若未尝面识，虽曾以笔墨相讥，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①（大意）。"曾以笔墨相讥"也确是事实。鲁迅讥诮过我为"隐士"，"带着一副'创造'脸"，我呢也讥诮过他那"蒙眬的醉眼是玲珑的复眼"。鲁迅的讥诮人和骂人是很能抓到别人的痛痒处的，和好些人的随意的讥诮和漫骂，实在是无关痛痒者，全然不同，昨天在鲁迅四周年纪念开会之前，我对某一位朋友说："鲁迅生前曾经骂了我一辈子，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朋友反诘我："你这话可以向今天的大会场上说吗？"我说："我是要准备说的，而且还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重庆《新蜀报·七天文艺》第二十三期.

① 见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文为："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要加点扩充。”我要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够恭维得尽致。”这话我在会场上没有说出，但我在这儿却把它写出。

一般的人以为中国是重文的国家，例如俗谚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其实也并不尽然，中国在前诚然有轻武的实际，但也未见得并不轻文。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历代的创业帝王都是以“马上得天下”。无赖汉的刘季便曾箕踞跣足以见儒生①。汉武要算是把孔夫子的神位抬出来的第一人②，但被他阉了的司马迁的牢骚便明明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甚鄙也。”③历代的文人实在是被养成为一大群的倡优，所以一说到文人差不多就有点鄙屑。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人差不多就等于不是人了。鲁迅生前在欢迎萧伯纳时，上海一位文人④也曾经把他和梅兰芳⑤博士并举，加以讽刺。足证汉以来的

---

① 刘季，即汉高祖刘邦（前247—前195）。他“箕踞跣足以见儒生”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②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河。

③ 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引文出于他的《报任少卿书》：“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④ 指伍实，原名傅东华（1893—1971）。他在《休士在中国》（刊一九三三年上海《文学》第一卷第二号）一文中，把鲁迅和梅兰芳并举，加以讥讽。

⑤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一九三〇年五月获美国南加利佛尼亚大学文学名誉博士、波摩拿学院文学荣誉博士。

“流俗”一直维系到民国二十年代。民国以来轻武的风气焕然丕变。中华民国全身披挂了起来，确确实实地“武装化”了。尤其是抗战以来，只见民众向军长献旗，没见民众向寒士送衣。尚武之风，倚欤盛矣！

这是一篇未写完的稿子。是去年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的第二天写的，以下还想写些什么，却是忘了。就这样也觉得有点意思，就让它去见见世面吧。

1941年8月10日记

〔本集注释者：陆文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